民國叢書

第四編

·77·

歷史·地理類

清代史　蕭一山著

清史講義　孟森著

清史探微　鄭天挺著

上海書店

清代史

蕭一山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上海三版
(93252滬報紙)

復興叢書
清代史 原名清史大綱 一冊
定價國幣伍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蕭一山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影印

目次

清代史

引論

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近來常有人把近百年史作爲近代史，這是不很合理的。因爲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歷史，那能把一百年以前，就算作「近古」呢？他們的理由是以爲近百年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最甚，我們在這個時期內，要建設一個近代國家，恰如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殊不知就整個世界潮流和中國歷史來看，三百年以前，纔是這「變局」的開端呢？姑不論西洋的近代文化，是始於十六七世紀，就說歐亞通航和西力東漸，不也是在明清之際麽？中國受異族最大的蹂躪，積專制無上的權威，都在於淸代，社會文化之迴照和沒落，也恰在其時，民國以後，仍屬餘波而已。現在「貞卜起元」，「窮變則通」，將來的復興正是可以預期的；又何況三百年以來，我們天天在民族解放運動中過日子呢？

我是主張民族革命史觀的，尤其講中國近代史，必須以它爲骨幹，爲史心。因爲它——民族革命——整個支配了中國近代社會，一切都是依它爲樞紐，而變動的。我們爲什麽革命？因

爲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們，不得自由，不得平等，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抵抗是人類的天性，我們能不努力嗎？然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是分作三個時期，換了三個對象的，我們的民族革命運動，則始終一貫，不過領導的人物和標幟的口號有些不同能了。我先表列出來：

時期	對象	領導者	口號
（一）從反清運動起	滿清	天地會 太平軍	「反清復明」
（二）從自強運動起	帝國主義	維新人物 革命黨	「振興中華」 「建立民國」
（三）從討袁運動起	帝國主義	國民黨	三民主義
（前）民元至民十七——甲	列強	國父	自由平等
（後）民十七至現在——乙	日本	總裁	抗戰建國

在第一個時期裏，我們民族革命的對象是滿清，目的是「反清復明」。因爲滿清宰制中國，在當時是異族，本於民族主義的觀念，是要抵抗驅除的。明太祖驅逐胡元，爲民族主義播下一顆種子，恢復明朝的正統，就是復興華夏的宗國，所以鄭成功佔據台灣來保持明朝的正

朔，天地會就借此組織而從事於革命運動了。他們全憑小說拜盟的方式，組織祕密的革命集團，以下層社會的人物爲基礎，用隱語詩歌來傳達「暗藏三點革命，誓滅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共享榮華，同樂太平天下」的意義，這不是革命黨麼？自張念一擁朱三太子起義於大嵐山，歷康雍乾嘉四朝，朱一貴張玉林爽文胡秉耀鍾體剛，眞是前仆後繼，代有興者。至洪大全洪秀全始大張其軍，由暗流而滙爲狂瀾，開出一朵燦爛的奇花，第一期的民族革命，總算一半成功了。因爲反清的目的已達到，政權轉移於漢人之手，愛新覺羅的皇位，不過「尸居餘氣」而已。

在第二個時期裏，我們民族革命的對象，不是滿清的帝國主義，而是列強的帝國主義了。以『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我們的先民，乃無間朝野，都孜孜以救亡圖存爲事，提倡自強運動，維新運動。但這些運動，都沒有多大的效果，因爲『滿洲政府既無力以禦外侮，而鈐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側媚列強。』於是 國父孫先生知非顚覆清廷，無由改造中國，乃「奮然而起」，組織興中會，同盟會，爲國民前驅，從乙未廣州舉義，激進不已，以至於辛亥革命，始推翻清廷，建立民國。這一舉不但完成了前期的民族革命，『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軋轢凌制之象；』（見中國革命史）而且劃除了『四千餘年君王專制之迹，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雖列強的帝國主

義尚未掃除，而建設「革命政府」之目的，却又達到了一半。『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這正是二百餘年來民族革命的碩果。

在第三個時期裏，又分前後兩個階段：前一段民族革命的對象是列強的帝國主義，後一段民族革命的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列強壓迫中國，是由瓜分而變爲共管；日本侵略中國，是由蠶食而變爲鯨吞。前者是經濟的壓迫，後者是武力的掠奪，它們都以專制封建餘孽的軍閥爲之倀，所以想抵抗外力，打倒帝國主義，必須先打倒軍閥，克服民敵，建設眞正的革命政府。自討袁之役，護法之役，以至組黨建軍，完成北伐，都是要肅清反革命勢力，取得政權，以爲實行三民主義的張本。列強的帝國主義一個個漸漸的縮手了，而日本的帝國主義反露出猙獰的面目，不恤變本加厲，於是有九一八事變，有七七全面抗戰之發生。這是我們民族革命的最後關頭，不僅是成敗所繫，而且是生死攸關，依照歷史的趨勢來看，只須我們加緊努力，第三期的民族革命，必然可以完成的。

這三個時期的民族革命，始終有其一貫性，和連環性。天地會之革命集團，雖因洪大全的被殺而一蹶不振，然洪秀全承其餘緒，再加上基督教義而建立太平天國，使清室命運不絕如縷。可惜他數典忘祖，引起湘淮軍的反對而遭失敗了，其餘黨又回到老家——天地會來。湘軍自陷同族，有功不賞，裁撤以後，憤鬱慘沮，也多半加入了。所以會黨的勢力又大盛，海外華僑，兩廣洪門，長江哥老，都是後來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再有一種主要力量，就是新軍，新

軍乃由淮軍演變而來，在一方面看，是反革命的勢力之源，在另一方面看，却又是漢人的政權所寄，所以它能因會黨之聯絡，而協同起義，推翻滿清，但終究變成民國以後的軍閥，露出本來面目。 國父知道革命是逐步成功的，革命黨也有它的時代性，爲完成最後使命，不能不重新組織，以嚴格之規律的精神，樹立黨的基礎；同時也要建立民衆武力，訓練黨軍，不再假手他人，因此纔有北伐與抗戰的革命事業。從國民革命史上看： 中山先生眞是天挺異人，他不僅建立了民國，而且爲民族復興奠定強固之實力，又託付得人，——蔣總裁，始有今日。若從民族革命史上看： 中山先生仍然是受了洪秀全的影響，而洪秀全又是從天地會來的。革命運動原爲一貫，革命思想也有所自來：民族主義「實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可不具論；民權主義 國父溯自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實天地會無階級觀念，洪秀全亦崇尚平等，似乎不無影響。至民生主義，則洪秀全固嘗實行「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之共產制矣，不過 中山先生依中國固有的思想，參以歐美之學說和制度，創爲主義，詳訂方略，整個的加以系統化，具體化。所以他不僅完成了近代民族革命，而且繼中國古聖王的道統，集歐美文化的大成，依中庸的道理，使之並行而不相悖，「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 中山先生的偉大就在此，因爲三民主義是民族革命最後的也是最好的方案。三百年來民族革命的事業，剝蕉抽繭，步步成功，在世界歷史上可以說是唯一無二的奇蹟。

何以說民族革命有連環性？這不能不把中國近代史加以剖視了：清人入關，內滿外漢，政

治大權，操在宗室舊侶之手，視漢人若奴隸，然而絕大多數的民衆，却是漢人。其統治之方法愈嚴，則反抗之思想愈烈，而畛域之見也愈深了。漢奸降人，爲避嫌遠禍計，不惜降志辱身，以媚茲一人，喪失了臣僚的體態，助長了君主的權威。生殺予奪，唯意所欲，祖宗歷史，隨便揑造。一人怨順，株連九族；隻字不敬，殃及枯骨。人民慴伏於積威之下，不特無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且亦無治學謀生思想之自由，於是士子相率鑽研於故紙堆中，而考據訓詁之小學遂風靡於一世，罷明道救世之大學——經世學——而不敢講，買櫝還珠，號稱漢學復興，實際是瞀世的俗學。清帝又以稽古右文自命，用利祿來收買人心，表章尊君大一統之說，把讀書人都變成八股闈墨的祿蠹，三家村裏的學究，人不能盡其才，學不能致其用，於是『政治經濟無正直指導之人，貪庸當道，政以賄成，國計民生，同歸凋敝，馴至喪師失地，終遂覆亡，此皆尊治古學，不問時事者厲之階也』。（見清代通史朱序）這是政治和文化兩方面交互的影響。清以半耕半牧之民族，統治農業經濟之大國，官莊旗田，全賴奴僕，口糧賞賜，半資遊手，食衆生寡，漸漸就難支持了。旗丁既不准經營商業，又要過優裕生活，從那裏來得錢呢？只有憑藉宗屬的關係，來鑽營作貪官汚吏了。政治以貪汚爲固常，焉得不民窮財盡呢？因此水旱交祲，萑苻遍野，人民日處於水火之中，而白蓮教天地會以及太平天國都抓到了絕好的機會。再加帝國主義者把鴉片和洋貨輸入進來，人民習染日深，漸喪了身體，勞動力減退了，摧毀了生計，手工業破產了。於是乎「國日貧民日弱」。清廷毫無辦法，反變本加厲，稅鴉片，開捐

例，賄賂公行，民不聊生，在雙重的帝國主義（列強及滿清）枷鎖之下，不革命還有什麼出路？這是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交互的影響。文化原是指導人生的，喪失了文化的活力，走入靜寂，瑣碎，無爲，無用之境域，無異把文化變成僵屍了，學術不能利濟蒼生，使匹夫匹婦受其澤，只爲少數人寫意寄情的娛樂品，陞官發財的敲門磚，一般小百姓日處泥犂地獄之中，謀生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哉」？受盡生計的壓迫，大多數不能讀書，文盲遍於全國，智識愚昧得可憐，物資既不能發達，生活就越痛苦了。生活愈苦，而文化愈低，列強以科學機械之優勢，侵入中國，箝制我們的政治，摧殘我們的經濟，淪我們爲次殖民地，頤指氣使，讓我們不能不變更深閉固拒的態度，而一味摹仿，一味崇拜，文化也失掉自由了。洋奴買辦可以操縱政治，剝削人民，替帝國主義者作侵略的工具，使我們的產業不能發達，我們的文化成爲附庸。這又是文化和經濟兩方面交互的影響。總而言之：中國近代社會之形成，實以異民族的統治壓迫而造其因，吾民族之革命抵抗而結其果，因果疊乘，而變生焉。所謂「一大變局」也者，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特色：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無一不變，而且要變革命的性質，如同盟會宣言所說：『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嘗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卽皆負革命之責任』。這是民族革命變爲國民革命的主要理由。以往民族革命運動只有民族主義，爭民族的解放自由而已，對滿清的帝國主義儘夠了，因

爲它只有政治侵略，文化經濟皆落我後。而列強的帝國主義則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還有經濟侵略，文化侵略。因爲西洋在十八世紀中葉起始用機械生產打仗，到十九世紀，科學已經很發達，我們的科學不如人，知識就落後了。況西洋人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養成了愛國心和民族觀念，團結得非常堅固，而我們好像一盤散沙，毫無組織力量。所以非「改良社會經濟組織，無一夫不獲其所」，是不能抵抗經濟侵略的。非「恢復固有道德，迎頭趕上科學」，使「一國之內，人人平等，行民主之制，合五權憲法」，是不能抵抗文化侵略的。中山先生盱衡中外，因時制宜，要造成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近代國家，乃發明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不僅配合歷史背景，適應世界潮流，且有它一貫的哲學根據，我先列一個簡表：

主義	精神	解喻	重點	哲學背景	歷史背景	近代國家特色	世界思潮
民族	自由	民有	文化	內諸夏	天地會反清運動	國防民族化	民族自決
民權	平等	民治	政治	民爲貴	明遺民經世學說	組織民主化	憲政運動
民生	博愛	民享	經濟	患不均	太平軍共產制度	產業民生化	社會主義

爲什麼要解釋三民主義？因爲三民主義是近代民族革命的產物，也是世界文化的結晶品，不懂得它就不能瞭解民族革命史觀，也就不能瞭解近代史造成的由來。近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變局」，我們只看見它變是不行的，必須知道它爲什麼變，和怎樣變，推求變的原則，預測將來趨向，這纔是研究歷史的功用。以民族革命而論：天地會肇其端，太平軍揚其波，革

命黨竟其功，然而太平軍起義後，就不再假借天地會，革命黨却又利用了反革命的新軍，其故安在呢？乃因革命黨本身是進步的，而反革命勢力也者，仍然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產物，天地會的「反清復明」口號，在清初是合乎時宜的，到太平天國時就不行了，洪楊只反清而不復明。太平天國的驅除光復運動，到清末又不行了，因爲滿清仍舊是我們的支屬，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成了新的對象。我們抵抗滿清，很簡單，很容易，要是抵抗列強，抵抗日本，却很複雜，很困難，用一個單純的主義，解決某一部份問題，實在不夠了。必須「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底潮流」，使革命內容，益加充實，各種問題，共求解決，纔能符合「易經」「中庸」的道理。歷史法則是漸變的：變的速率，越後越快，變的程度，越來越好。前因必生後果，後果又靡前因，且前因之「果」，與後果之「因」，常互爲影響，因果疊來，對立一致，其道理仍然是辯證的：如前舉政治文化經濟三方面相互的影響，總逃不出歷史的公例。再如二百年的民族革命，造成一個太平天國，六十年的漢人政權，造成一個中華民國，四十年的黨治運動，建立了國民政府，但漢人政權却種因於太平天國，方能培植新軍的武力，黨治運動却種因於漢人政權，方能瀰漫革新的思想。在前一時期中它們互相影響而助成，在後一時期中它們又互相牴牾而消長。革命黨之所以利用新軍的助力，而完成辛亥革命，絕不是偶然的，因爲新軍仍然是前期革命中所造成的漢人武力；而新軍領袖袁世凱，却以此食得二百餘年民族革命之果，取得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統；但終久因爲來路不同，袁世凱壓迫革命黨，革命黨又將北洋餘孽的

軍閥打倒。其中機括，甚爲微妙，如果知道變的原則，也就「無啥希奇」了。我們的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在變，我們的革命動力也在變，我們的革命對象在變，我們的革命口號也在變。第一期滿清和列強，都在壓迫我們，到第二期滿清和我們「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只賸下列強了。第二期列強和日本，都在壓迫我們，到第三期列強已放棄侵略的魔手，和我們並肩作戰，而一致對付暴日了。所以三民主義不僅是「曲突徙薪」的「一次革命」論，而實爲尋求與國，共同奮鬭，最後不移的好方案。它可以解決中國所要解決的問題，可以完成三百年來全國人民朝暮相處的民族革命，因爲它是適應世界潮流，歷史趨勢，把中國「變」成一個近代國家，和列強並駕齊驅的正確理論。如果我們不曉得它是三百年來抵抗外力，振興中華，救國經世的思想之結晶品，那我們研究近代史還有什麽用處呢？

就近代史實的演變而論，民族革命是有其一貫性和連環性的，反清，倒帝，抗日，逐步成功；社會，政治，經濟，同時改造：治近代思潮於一鑪，期中庸文化之復興，然而因果疊乘，源流隱見，非從祕密社會的運動，中西國際的交通說起，不足以畢其眞而括其全。三百年來的社會變遷，其端由愛新入主發之，道咸而後，纔走到劇烈變動的時斯，民國則急轉直下了。所以我說：「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

第一章　明清之際

第一節　後金汗國與大淸帝國

中華民族現在是單純的國族（Nation），在古代則是極複雜的宗族，經過四五千年的混合同化，纔凝結而爲一體，雖然還勝下少數所謂蒙藏回苗等族，都是因爲地域的關係，暫時保守其言語風俗習慣，而血統早已混合，生活逐漸改變，宗教也差不多一致了。四萬萬五千萬人全是漢族，但漢族並非原始的名稱，僅以漢朝的聲威而得名，它是融合了匈奴，東胡，西羌，南蠻而構成的。上推至於開國時期，我們的老祖宗是黃帝炎帝，黃帝起於北方，號軒轅，就是獯鬻，玁狁，一個字音的轉寫，也就是後來的匈奴。炎帝姜姓，是西羌的代表，羌原爲牧羊人之意。在當時還有南方的九黎，比較開化早些，而涿鹿一戰，他們的領袖蚩尤被殺，於是三族混而爲一，這就是原始的華族。因爲那時交通不方便，有些遺留於本土的人，還保存着舊態，到中原混合起來的人，便逐漸同化而成一個新的民族了。新民族的力量一天一天的擴充，吸收異民族——其實也是同族中之一種支，——的成份也一天一天的增加，春秋戰國，以至於兩漢魏晉，纔形成東亞大國的規模。五胡亂華，五代紛爭，都是「蠻夷猾華」的時代，而劉淵宗漢，

沙陀宗李，從前覺得很可笑，如今看起來，又有什麼足異呢？元魏大改漢姓，隋唐更多胡風，這不又是一次大混合嗎？宋代以後，就只有東北一隅的金元人了。試問唐以前那麼許多的種族，都到那裏去了？還不是都變成了漢人。變漢人的法子很簡單，只要加一個漢姓就夠了，譬如遼之后族，盡稱蕭氏，百年以後，誰能分出那家是「殷民之遺」？那家是「契丹之裔」呢？所以中華民族是大混合的血統，姓氏老早就靠不住了。若爲存眞求全起見，最好漢族叫作華族，或稱中華民族。因爲漢族的意義太狹，而華族仍舊有中原本位的意思，合之則成一家，分之則成爲敵體，我們始終抱着「四海兄弟」的觀念，只看你願不願「進於中國」能了！

清朝原來是女眞人，乃東胡之支裔，古時叫肅愼，唐宋叫女眞，建國號曰金，在宋朝歷追中國，強盛一時，後爲蒙古人所滅。元朝把他們分爲五萬戶府，設官管理。明初只賸下三萬戶府，在三姓（金語依蘭豆漫，卽三萬戶意。）附近，以漁獵爲生。他們幫助明兵征服東邊，明朝派其頭目阿哈出（李思誠）爲建州衛指揮，算是明朝看邊的一個武官。另一部落頭目叫猛哥帖木兒（清肇祖孟特穆），從三姓南移至琿春，又至朝鮮之孔州，明朝派他爲建州左衛指揮，他曾和阿哈出的兒子李顯忠在永樂年間一齊到北京朝貢，明朝很厚賞他們。後來猛哥爲另一支派的野人女眞（一稱忽剌溫野人，在黑龍江一帶，遊牧民族，行止無定。）所殺，其弟凡察逃至東良（今茂山）奏聞，明廷敕野人還所掠，升他爲建州左衛都督僉事。可是凡察依附朝鮮，有點兩屬性質，到正統五年，纔率屬至佟家江流域，和建州衛住在一處。因爲建州衛也是被野人

所逼，早就移來了。那時還有猛哥的兒子董山，從野人贖回了舊衛印，也承襲指揮職，一衛那能有兩個頭目？叔姪就不免爭起來了！明廷爲安撫邊夷計，乃分設建州右衛，安置凡察。這三衛都在興京附近，接近明邊，靠明朝的粮食來接濟，他們只須刨些人參，獵些貂皮去進貢，而且可以換回他們日用所必需的物品。——如布帛農具之類。

明朝稱女眞爲「邊夷」，待他們很優厚，他們也很恭順「天朝」，但一遇着變亂，武力不足以鎭攝，或受邊吏的欺侮，——挑剔貢品，尅扣賞賜，他們就起來掠奪了。蒙古也先入犯人，董山和李滿住（顯忠子）都爲其耳目，犯邊幾年，明廷派大兵征討，殺董山李滿住而以其子姪襲職。以後叛服無常，或剿或撫，建州從此不振了，一直到努兒哈赤——淸太祖才強大起來。努兒哈赤的父親名他失（淸顯祖塔克世），祖父名叫場（淸景祖覺昌安），都是建州左衛指揮，爲明將李成梁作間諜，導引明兵打建州的「悍酋」王杲王兀堂，及杲子阿台，他們和阿台是親戚，混進山寨去說降，都被明兵誤殺了。努兒哈赤纔二十四歲，聽說大慟，以遺甲十三副，起兵復仇，不敢顯然敵視明朝，只說是同族尼堪外蘭（圖倫城主）陷害的，要去尋毆，以此東打西打，吞倂了附近的部落，攻克了圖倫的小城，追擊尼堪外蘭而殺之，建州五部（先屬三衛後分五部），竟被他征服了。

原來女眞人除建州野人外，尚有海西女眞，初居吉林省城附近，後來拓展到開原邊外，稱爲扈倫四部——哈達、輝發、烏拉、葉赫。明稱哈達爲南關，葉赫爲北關，因爲在開原的兩個

邊門以外，利用他們來看邊，而哈達尤效忠於明。努兒哈赤結婚葉赫，先滅哈達，得膏腴之地，以發展農業，半耕半牧，儲備糧食，明朝竟無可奈何。——其實是李成梁以廝養視之，太輕視他的結果。而他又「藏機不露，狙詐自喜，」於是北滅輝發、烏拉、漸及江夷（野人女眞），女眞全部統一，只賸下一個葉赫了。努兒哈赤知道葉赫賴明兵保護，非先攻明不可：乃於萬歷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建立大金汗國，改元天命，紹述金源，脫離明朝的羈絆。又二年，以七大恨誓師（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將我二祖無罪加誅，恨一。我與北關同是外番，事一處異，恨二。漢人私出挖參，遵約傷毀，勒要十夷償命，恨三。北關與我，同是屬夷，衞彼拒我，畸輕畸重，恨四。北關老女改嫁西虜，恨五。逼令退地，田禾丟棄，恨六。蕭伯芝大作威福，百般欺辱，恨七。）伐明，攻下撫順清河。明廷震驚，發大兵去討他，命揚鎬爲經略，分四路深入，號稱二十四萬，實只八九萬人，努兒哈赤則已有「八旗」兵六萬人了。四路兵力不能集中，努兒哈赤用各個擊破的方法，把明兵打得大敗逃散，遂攻克開原鐵嶺，滅掉葉赫。開原是明朝東邊的重鎮，儲積甚多，金兵俘獲不盡，一切都充實起來。不數年，乃攻下遼陽瀋陽，取得遼東的首府，建都遷居，以爲女眞復興的根據地。

這時候明朝纔知道：「建酋」不是邊境的小寇，而是腹心的大患，但廷臣黨派鬪爭，議論紛呶，戰守茫無成劃，用人不問功罪，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沒有實權，王化貞「願得六萬兵一舉蕩平」，只說大話，經（略）（巡）撫不和，把遼西也丟掉了，難民擁進了山海關。可

憐遼東西從來漢人的地方，這時都變爲女眞的俘虜，金人把他們編爲漢軍旗，入關以後，老「漢奸」儼然是新貴族，有些數典忘祖的樣子，此是後話不題。且說：熊廷弼懷才未展，反受極刑，王化貞喪師失地，得以末減，明朝的政治，還成個體統嗎？然而亂世出英雄，袁崇煥錢一個小官（主事）單騎出關，徧閱形勢，居然要守山海關，築城寧遠，擴地二百餘里，擋住新興金軍的銳氣，打敗百戰創業的老將，——努兒哈赤鬱鬱而死了，第八子皇太極（清太宗）繼位，更加利害。

努兒哈赤建立一個封建王國，八旗旗主就等於封建的諸侯，他們沒有封邑而有屬人，旗下都是奴隸，人民沒有戶籍而有旗籍，披甲者盡屬士兵。八固山王（和碩貝勒）共治國政，金汗是公推的共主，這是部落社會以戰爭而成立國家的必然狀態。他們唯一的事業是打仗，刼財物以爲生，俘虜人來種地，平時打獵督耕，放馬習武，所以兵力強盛，踴躍出征，皇太極不過是八旗主之一，他以戰功領有兩旗，逼他的哥哥代善讓位，又把叔兄阿敏，異母兄莽古爾泰兩個強有力的人治死了，由共主而造成獨裁的君權，政治組織上是進了一步。他知道袁崇煥不好惹，避免正面衝突，一方派喇嘛去與他議和，一方就發兵征服朝鮮，又降服察哈爾諸蒙古，佔據了長城的險要，隨時可以出入中國。天聰三年，遂圍攻北京。袁崇煥兼程入援，他又用反間計，讓崇禎帝輕信「縱敵脅和」的謠言，把袁崇煥殺了。明人「自壞長城」，金人飽掠而歸，因爲他已經有了屬邦，乃改號爲大清，自稱皇帝，儼然與明朝爲敵體，不再說是明朝「看邊進

貢，忠順已久」的「屬夷」了。因此他不但諱言女眞，並且諱言建州，簡直把後金國號也改了，揑造一個「滿洲」的名辭，魚目混珠，說他們不是女眞人，而是滿洲人，國號不稱金，而稱滿洲。其實滿洲乃「瞞咄」「滿住」之轉音，是女眞稱酋長的意思，歷史上何嘗有一個滿族？又何嘗有個滿洲國？最可笑的：是他們更造出一個始祖名叫布庫里雍順，說是天女吞朱果生的，定三姓之亂，創國於俄朵里。其實三姓是從三萬戶來的，俄朵里，就是三萬戶之一的斡朵憐，孟哥帖木兒在明初是這一部落的頭目，史蹟顯然，欲蓋彌彰。然而中國人被他騙了二三百年，現在還有許多不明白事實的，以爲有什麼滿族，其實女眞人早就被同化了，充其量不過脫下愛新——卽金——一姓而已，還能叫做「滿族」嗎？

第二節　明朝覆亡與淸室入主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驅逐胡元，建立明朝，恢復漢人的治權，他兒子朱棣遷都北平，捍衞邊疆，都是何等的英武！不料中葉以後，晏安深宮，威柄下移，把一個錦繡河山，鬧得烏煙瘴氣！女眞勃興於東北，沒把它當一回事，終天還結黨互爭，刮民自肥，於是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流寇起於西北，淸人佔據兩遼，內外交鬨，政府不能不用兵，又不能不籌餉，而貪吏追迫，士卒逃散，以致流寇的勢焰日張，外力的壓迫更甚，互爲因果，就不免踵決肘見了。崇禎帝奮發有爲，勵精圖治，懲除閹黨，任用清流，可算是一個好皇帝，但卞急多疑，任察倚

氣，對於人才的賢否，議論的是非，政治的得失，軍機的成敗，都不大很明白，所以正人多不能終其位，小人反因緣爲奸利。我們看李自成即位詔和檄文上說：

>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
>
> 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痛！

這眞是極沉痛的一幅寫照。因爲明朝在神熹二宗以後，邊患養成了，綱紀敗壞了，官吏黷私，人民痛苦，社會的道德墮落，宗紳的豪奢益甚，只有一個人在上邊着急，做什麼用？帝又高拱深宮之中，受左右的包圍蒙蔽，直到流寇進逼北京，纔知道大勢已去，「諸臣誤朕」，在煤山上自殺了。李自成佔據北京，拷掠衆官，一般無恥勸進的大臣，還不免一死。他並未正式即皇帝位，只呆了四十天，（從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三十日）吳三桂引清兵一到，就倉皇西逃了。

崇禎帝的運氣眞夠壞，他作了十七年的皇帝，偏撞着兩個死對頭；一個是皇太極，即位和死的時候都比他早一年，一個是李自成，造反和死的時候都比他遲一年，他一生受這兩個磨難星的內外夾攻，簡直無法翻身，結果斷送了明朝三百年的天下。但他也有些自取之咎，自己的國力不足，還始終不肯和清人議和，皇太極三次入塞，明朝的國防算完了。邊境搶攘，事權不一，流寇猖獗，人心攜貳，他不懂得「釜底抽薪」的法子，還有點「火上加油」，終必「自

使」而後已。明史批評說：『君非亡國之君，而臣盡亡國之臣』，我們如果用春秋責備賢者的筆法要問一問：亡國之臣是誰用的？爲君主的缺竅，只有知人善任四字，國家之大，萬機之繁，一切都以爲非我莫辦，別人自不願而且不敢負責，推諉敷衍，政治完全失去了作用，這責任究竟由誰負呢？

清人的運氣又太好了，皇太極是一個英主。三次入塞，總不肯「取而代之」，因爲他知道明朝是大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京城雖可攻下，各地潛藏的勢力還很大，他們不過幾十萬人的小國，如何吞食得下！他只希望明朝承認他的帝國就夠了，或封以國王也可以。（天聰告諭說：「崇禎帝教我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因爲他的祖宗都是明朝的屬夷，他極願取得一種正式對等或屬國的資格，可惜明朝狃於成見，總以宋人爲戒而不肯議和，殊不知清人的國力，並非前金之比！皇太極不惜委曲求全，否認了他的祖宗，以減少明朝的猜忌，但終久不成，皇太極不得不攻下寧（遠）錦（州）杏（山）松（山）準備打開山海關的通道。洪承疇被虜投降了，清國得到一個領江帶路的人，皇太極怎不特別歡喜呢？不料他雄圖未展，忽而暴崩，內部卻發生問題了。清國的組織是封建式的，力量大的諸侯，就可當共主，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勢力不如其叔多爾袞濟爾哈朗等，他自然要退避；但太宗建立帝國，統一君權，尸骨未寒，遺威尚在，不傳其子，又何足以服諸將？二者調和折衷，結果是皇太極一個六歲的小兒子福臨被立爲皇帝，多爾袞和濟爾哈朗二人輔政。但實

權完全在多爾袞一人手裏，自稱爲皇叔父攝政王，當然也有些人不贊成，豪格更不用說了。這時清國的戰鬪力業已衰退，（觀太宗實錄可知）要不是許多漢奸——如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洪承疇范文程等，爲虎作倀，又遇着一個開門揖盜的吳三桂，他們那能夠進據中原呢？

吳三桂是在洪承疇兵敗後，奉命據守山海關的一個總兵，李自成到北京就招降他，他已經答應了，因爲聽說愛妾陳圓圓被擄，始「怒髮衝冠」，縞素誓師，向清國借兵，欲仿唐朝和回紇的故事，但多爾袞却說他「率衆來歸」。叫他作前鋒，攻打李自成，自成敗走了，清兵就安然到了北京。幾個月以後，迎接福臨遷都北京，告廟祭天，算是代替了明朝，入爲中國之主了。

李自成在明清之際的舞台上，不過是一個丑角——自然崇禎帝和多爾袞是老生，陳圓圓是小旦了——他原無大志，只是如彗星般的一掃而過，有破壞無建設，要不然的話，皇帝豈不是他作的！『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饝饝，送與對巷趙大哥，』江淮間的民謠，不久竟成事實，便宜了趙大哥的清朝，李自成這彗星也就完了。他的同伴張獻忠是一個黑頭，從陝北到陝南，出豫皖，掠江東，可是他被迫而入蜀了。不曉得他怎麼把四川人殺得「幾無噍類」，據說他因爲：『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德報天』。（見廣漢公園聖諭碑）最後這兩個角色都被一個武小生——吳三桂收拾了，而指揮小生的却是兩個番將。——一是英王阿濟格，一是豫親王豪格。

這一齣悲劇還未演完，而「桃花扇」又上場了。清朝剿撫了河北山陝，江淮以南仍為明朝所有，南京——原是明朝的陪都，諸臣擁立了福王由崧，派使節去慰勞清廷，希望能成立一個和約，多爾袞全然不理會，說：「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我們是「不憚征繕之勞，代為雪恥」；你們想「坐收漁人之利，雄據江南，」那就不成。因為他們究竟是明朝的嫡胤，怕降將靠不住，多爾袞的同母弟多鐸親自出馬，打到揚州，可憐史可法孤忠耿耿，號為相國督師，而外有四鎮——黃得功，高傑，劉良左，劉澤清，——的橫暴，內有馬（士英）阮（大鋮）的奸黨，只得一死報國。清兵屠殺漢人，這是最慘的一次，有揚州十日記為證。由崧根本就不是一個復興的人，天天玩戲子，漁女人，飲酒作樂，一任馬阮弄錢，賣官，胡鬧，長江天塹，毫無防備，清兵到了南京，他出亡蕪湖，依黃得功軍中。上游坐鎮武昌的左良玉因要清君側，引兵東下，心中內疚，嘔血而死，其子夢庚正被得功打敗，投降了追擊李自成的清兵。多鐸又打發降將劉良佐射死黃得功，由崧被俘殺，長江一帶也歸清人的統治了！這是南明三王之一的結局。

其次是福建的唐王聿鍵，和浙江的魯王以海，叔姪二人分據兩省，還不能和衷共濟，弄成水火之局，失掉脣齒之勢。浙江依靠着農丐烏合之義兵，福建依靠着海盜投降的悍將，一個稱監國，一個稱皇帝，清兵一到，不免瓦解。幸而魯王航海，又奪據舟山，在海上支持了六年。唐王在閩不過一年，因為鄭芝龍有貳心，撤仙霞嶺防兵，想由贛入湘，去依湖廣總督何騰蛟，

——李自成死後，其部衆郝搖旗等俱降於騰蛟，兵勢甚盛，——走到汀州，清兵冒明旗馳追被獲不食而死了。唐王的學問才幹都好，傷國家多難，布衣禁酒，辭氣慷慨，很能夠感動人，鄭芝龍的兒子成功，就是被感動而做出轟轟烈烈的事業。可惜他所處的局勢太壞了，又頗有書生氣，出走時還載十幾箱子書，以致走得不快而被執，這是南明三王之二的結局。

最後一個是桂王由榔，他的時間相當長——在位十三年始末十六年，——局面相當大，而崎嶇艱危也相當甚。最初是瞿式耜在桂林支持，肇慶小朝廷將爲降將李成棟金聲桓的反正，居然收復了廣東江西；何騰蛟雖因清朝三王——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原是明朝據守皮島的總兵毛文龍的部下，毛被殺，始降清。——的大舉進攻，而輾轉入桂林，但乘間督師，又規復了湖南大部，川東川南則爲義軍所有，都受桂王的封號，他據有七省——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的地方，同時鄭成功和魯王出沒閩浙，姜瓖叛於山陝，皆遙相應和，聲勢並不算小，可惜羣臣又鬧黨爭，水火相仇，不務大計，以故軍事上不能聯絡一致。清廷特別重要的將領，率領八旗兵，會合四王——加上平西王吳三桂，分地任事；耿尙攻江西，廣東；有德攻湖南，廣西；三桂攻川陝。金聲桓李成棟先失敗赴水死了，何騰蛟被虜絕食，瞿式耜死守桂林，均爲有德所殺。吳三桂進軍川東南，桂王窮促無似，不得不乞憐於張獻忠的餘黨了。

原來張獻忠死後，他的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都各有幾萬人，佔據了雲貴，桂王封

可望秦王，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趣他們出兵。孫可望把桂王遷到安隆所，毫無人臣禮，李定國却忠於所事，引兵攻入桂林，孔有德自殺了，劉文秀敗吳三桂於敍州，圍之保寧，三桂退漢中。清廷命洪承疇經略西南，從江寧移鎮長沙，滿漢兵齊進，定國文秀均敗。可望待桂王益薄，擅殺大臣，定國遂奉桂王赴雲南，與文秀合，可望攻之，兵潰降清。清兵三路攻雲南，順治十六年正月朔，遂入昆明，桂王逃至緬甸，定國設伏計泄，退據孟艮土府。吳三桂奉命入緬，脅迫緬人獻桂王，桂王致書有云：

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微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險阻，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何其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要功乎？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已之祖若父乎？……千載而下，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

但三桂不省，還是把他殺了。桂王日角龍顏，顧盼偉如，刻苦自勵，孳孳以中興爲念，然仁柔畏葸，顚竄流離，焉能成其大事？李定國雖出身微賤，因感於小說家言，頗以孔明輔漢自詡，後來邀擊不過，憤懣殉身，竟爲明朝三百年忠臣之殿。南明三王都滅亡了，清朝的天下一統了！

第三節 清初政治與建國方策

清人進關，不費一兵一矢，（觀明史紀事本末及乾隆帝修改該書的詔諭可知）就奠定了北京，招撫了河朔，接承中國累代傳統的皇位，享有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這眞是一種幸運。但他們對於統治中國，也曾經費了一番苦心，以異族宰制如此之久，在歷史上還是僅有的。試看元朝的威力多嗎強盛，統治也不過幾十年；清朝所以能成功，不是武力的關係而是政治的關係。政治成功的最大素素，就是它把握着中國社會的基層，認識了中國人民的特性，一鬆一緊，一張一弛，深得兩重政策的運用，使漢人「啼笑皆非」，不知不覺的上了圈套，可是他們也敵不過四千年文化的潛力，糊裏糊塗的被牽扯而同化了。這一段公案，說起來甚是有趣。

他們初到中國，說是弔民伐罪的仁義之師，進據北京，只因明朝沒有嫡胤——其實崇禎帝的太子還在，後來都被他們殺了——對於明正言順，自立於江南的福王，不能不予以承認，所以檄又上說：

明朝嫡胤無遺，勢難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以富有天下爲心，實以拯救中國爲計。……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無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思，此敦睦鄰之誼。

但事實上不盡然，他們那裏是「義切同仇」來「救災卹患」呢？等到山陜已底定，闖賊一

逃亡，馬上就「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了，這可說鬆一陣，緊一陣。

中國是家族宗族的社會，對於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向來很薄的，所以在異代興替的時候，朝朝統變更，無論姓趙姓李，胡人漢人，都無所謂，忠君愛國也有相當限度的。不過一涉及文化禮俗，則有其傳統的保守特性，絕不容隨便更改。明人的裝束，是「峨冠博帶」，清朝的裝束是「金錢鼠尾」，那怎麼辦呢？最初是「照舊束髮，悉聽其便」。（諭言：「前因分別順降之民，故以雉髮分順逆，今聞甚拂民願，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等江南平定以後，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了。（諭言：『今中外一家，天下一體，若不劃一，終屬異心，不幾爲異國之人乎？今限旬日，盡使雉髮，遵依者爲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果然激起上下江民兵的反抗，「保護一己之髮，竟捨身命以抵抗敵軍，其關切較勝於爲國家，爲皇室」。（見 Matini Matiii 韃靼戰爭記）眞是：「腕可折，頭可斷，肉可臠，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髮，必不可雉！其意豈在一髮哉？蓋不忍中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見髮史序）但國家已經亡了，還有什麼用？只多添些流血的慘劇而已。（閻應元守江陰，城破，題「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里江山！」民兵義舉，不過如此，嘉定因此三次屠城，均有書紀載）。這又是鬆一陣，緊一陣。

明朝的亡國，三餉是一大原因，清人「以養民之道，莫大於省刑罰，薄稅斂，前朝弊政，

譬如加派遼餉外，又有剿餉練餉，數倍正供，更有名目，巧取殃民」，所以把額賦外一切加派，盡爲刪除，依照舊會計錄作準，並且到處蠲免逋負錢糧。但是順治十八年江南報銷一案，蘇松常鎮四府，官紳士子，革黜至一萬三千五百餘人，鞭扑枷責，衣冠掃地，貪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這也是鬆一陣，緊一陣。

最顯明的：是金之俊建議的十從十不從之綱：「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言語文字不從」。這把清朝一鬆一緊一張一弛的施政方略完全都表現出來了。

可是清朝政治的成功，不僅在對於一般人民的心理感情之控制，而尤在對一般士大夫的籠絡和駕馭，因爲中國社會組織的基層，是中間讀書作官的士大夫，而不是下級勞苦的民衆。他們對於士大夫的利用是煞費苦心的。所有官吏降附者，各與升級，殉難者各予諡立廟，建言能諫諸臣及山中隱逸懷才抱德者，縉紳士大夫清望所歸者，皆徵辟錄用。使一般士大夫不致因亡國而失掉職業，他們就相安無事了。順治一年開科取士，一切都依明朝的制度，使一般讀書人有了進身之階，他們自然就不愁無用武之地了。這樣可以籠絡着大多數的士大夫，有少數特殊的人物，不是科舉功名所能誘惑的，他們著書立論，常慨然有故國之思，甚或如顧炎武閻爾梅等，終日奔走，從事革命，那怎麼樣辦呢？清廷詔舉博學鴻儒，請他們纂修明史，來寄託他們孤

臣孽子的深痛，碩儒如顧亭林黃梨洲李二曲等雖然還寧死不就，但萬季野等却以私人襄贊史館了。清初有「一隊夷齊下首陽」「蕨薇堪嗟已吃光」的諧詩，可見當時一般士大夫的無恥，後來革命黨不向他們宣傳，就因為他們已經被清人利用了。可是清人有時還要擺擺統治者的架子，濟之以威，譬如哭廟之案，殺蘇州士子多人，金人瑞（聖嘆）即以此而死。奏銷之案，徐元文以狀元而降經歷，葉方藹以折錢一釐挂誤，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三輔識略說：『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罰，仕籍學校，為之一空，吁過矣』！這眞是有意荼毒縉紳，和士大夫為難了。如此玩弄，却仍然是一張一弛的作風。

至於他們矜恤無告，獎勵節義，封賞勳親，養老赦囚，確可以收拾人心，但「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攝政王令旨）而「積怨南方，人心之未盡懾服，假大獄以示威。」（心史叢刊）也是寬嚴互濟的一貫方針。這政策是誰手定的？攝政王多爾袞。是誰建議的？洪承疇一般漢奸了。多爾袞在入關後，就加崇號為皇父攝政王，為什麼稱為「皇父」？在歷史上是一大疑案。世傳順治帝的母親——孝莊后曾下嫁於多爾袞，所以不祔太宗陵寢。當時大權在多爾袞手中，諸王貝勒大臣，都只知道諂媚他，孝莊后又何嘗不可為兒子計，去「紆尊降貴」令呢？況且女眞人的風俗，婚娶繼母伯母嬸母兄嫂弟婦侄婦，又滿不在乎麼？（太宗實錄曾諭」禁止，謂明與朝鮮禮義之國，同族從不婚娶。但不能遵行，遂停止，見順治中索尼奏。）孟森說：「皇父之稱，猶之尙父仲父，純為報功，不關瀆倫；皇后不祔葬者，清歷朝有之，不足為

證」。（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但我們看：若果是尊崇多爾袞的豐功，順治七年他死時，已追尊爲成宗義皇帝，爲什麼不幾天就說他有「逆蹟」，撤去廟享，籍沒家產呢？可見順治帝有難言的苦衷。多爾袞以色疾致死，選八旗美女，索蒙古有夫之婦，納豪格之妃，（他的姪媳婦）令朝鮮選送女子，都見於官書，皇帝之位，在他覺得是讓給福臨的，他從沒有把這個小孩子看在眼裏！太后下嫁算什麼？可是順治帝長大以後，又當了中國的皇帝，總不免有些難爲情吧！這件事仍舊存疑好了。洪承疇在召對時所說的話，（有傳刻本）眞是深切時艱，太宗沒有認錯人，「皇父」沒有用錯人，他鎮撫了江南，經略了西南，幾乎兩目失明，（見明清史料甲編洪氏揭）結果賞一個三等輕車都尉，——九等二十六級世爵中之第二十三級——侘傺以終。（見嘯亭雜錄）大漢奸的下場，不過如此！其餘就不用說了。

順治八年，福臨親政時，纔十四歲，當年就結了婚，娶一個蒙古女子，不大滿意，過三年就廢了。順治十三年，他十九歲，熱戀他的弟媳婦——襄親王妃，他弟弟羞憤而死，他把弟婦納進宮來，封爲賢妃，這就是有名的董鄂妃。建州董鄂部人，內大臣鄂碩女，時年十八歲，入宮一月，就晉爲皇貴妃。次年生一子，封榮親王，順治帝許立爲皇太子，未幾殤。又過了三年，（十七年八月）董妃也死了。順治帝經此打擊，頗欲自殺，又把頭髮削去，要出家當和尙，經太后阻止，不久，他也就死了。（順治出家之說，本一疑案，孟森謂順治確死於痘。最近陳垣據湯若望回憶錄木陳忞北遊集等撰湯若望與木陳忞及語錄與順治宮庭兩文，證明確有出

家之事，惟未遂耳。）在位十八年，——其實只有十七年，多爾袞攝政八年，戀愛生活，過了五年，中間五年，也還是小孩子，有什麼政治可說？況且那時還有明桂王偏安西南，鄭成功規復沿海，天天用兵，還不是全靠宗室宿將來維持嗎？但他那火烈急燥的性情，聰穎恬退的天資，是值得一提的。北遊集載：『上龍性難攖，不時鞭扑左右』。但和一些和尚往來以後，卻好學佛法，頗悟禪機，遂有效釋迦遠際之意。惟以靑年斵喪太甚，身體羸弱，枯瘦如柴，所以不能永年了。

第四節　國際交通與西力東漸

當明淸兩朝興替的時候，中國開始要轉變一種新局面，同時西洋也因爲航海事業發達，促進了資本主義和實業革命，而世界纔慢慢變成近代的樣子。「近代」有三種特色：（一）民族國家，（二）資本主義，（三）機器科學。民族國家的造成，是因爲他們彼此爭雄稱霸；資本主義的產生，是因爲毛織業繁榮，貴族把土地收回作牧場，以致大量的失業農民聚集都市，供擁有資產的人利用；機器科學的發達，是因爲海外市場的需求：總而言之，都由於新航路發現，開拓了新的世界，美國就是這新世界第一個產品，歐美同時向東方世界進攻，使東方世界也漸趨於同化了。十八世紀以前，西洋社會本身正在演變過程中，其基礎尙未穩固，所以力量很小，中國受影響還不大；十九世紀以後，西洋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我們纔吃了大虧。如

果我們在和西洋開始接觸的時候，就認識這世界潮流，隨之而進，那我們的近代史，就要完全改觀了。可惜我們當時未能瞭解，即或有少數人瞭解，但總敵不過四千年傳統的根性，所以把時間錯過了。原來我們和歐美是東西文化根本不同的兩個世界：我們在東方，是一向居於領袖的地位，其他的國家——連日本在內，都承認我們是「天朝大邦」。直到西方另一個世界的陌生客人踏進了大門，我們還依舊用對付「藩屬」「朝貢國」的態度去應付。他們最初也頗能將就，但後來漸漸就不行了。因為我們的科學知識不如人，國家組織也不如人，而打仗生產的機械更不如人，我們一切都落伍，還能叫人家來恭維嗎？以後我們受壓迫，求解放，造成慘痛的民族革命史；然而前一個階段的因循貽誤，也是值得我們深切回憶的。

西洋文化自來就和海洋結不解緣，腓尼基克列特不用說了，而希臘羅馬的繁榮，就是以海外貿易，海外掠奪，和海外殖民做基礎的。直到文藝復興時代，西南歐的海外貿易同時也復興，十二世紀的準市府經濟，和近代海洋的帝國主義都有一線相承的關係。惟東西國際交通的開始，是在印度航路發現以後。因為中古時代，歐亞的交通，被土耳其人遮斷了，歐洲人想另闢途徑，遂獎勵航海。一四九七年葡萄牙人伽瑪（Vaseo de Gama）從里斯本繞道好望角而至印度海口喀利各達（Calicut）為世界開闢一個新紀元。歐洲人多年的理想實現了。他們利用這條航路，發展東方的商業，換回香料和其他物品，葡都里斯本遂成歐洲商業的重心。他們戰勝久握印度商權的阿剌伯人，攻取卧亞（Goa）為根據地，進一步又佔領馬剌加（Malacca），掌

握國際貿易的中心，稱雄海上。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就首先到了廣東。我們對海外貿易，從隋唐以後，都以廣州爲要港，設有市舶司，明德正間移電白縣，嘉靖十四年，又移濠境（即澳門）。這是外洋商船停舶入口的地方，廣州設有「客綱」「客紀」的牙行，以「代客買賣」。明朝禁止葡人入廣州城，「止令商人載貨下澳」，然而城外就有貿易的地方。嘉靖三十六年葡人用賄賂取得澳門租借權，葡政府公然設官來治理。至今三百八十多年，還沒有收回來。

葡萄牙人壟斷東方貿易約六十餘年，只有西班牙人和他們競爭。在一四九二年西班牙發現美洲新大陸以後，取墨西哥爲殖民地，更欲西航以尋找通東方印度之捷徑，麥哲倫（Magellan）遂於一五一九年從大西洋出美洲南端，以三十三個月的航行，到達菲律賓羣島的塞布（Cebu）宿務。他是繞行世界，開闢歐美至東亞西南航路的第一個人。一五六五年西班牙佔領菲島，馬尼剌爲都會，銳意經營，以爲東方殖民地，利用基督教以勸化征服之人民，並無心發展商業，所以它的勢力始終不如葡萄牙。但中國商船常到馬尼剌去貿易，因此就有了間接的通商關係。

荷蘭和英吉利都是繼葡萄牙而代興的「後起之秀」。荷本爲西班牙之叛屬，英助荷爲交戰國，都不能到里斯本去販運，故不得不自闢商路，遂各自組織東印度公司，（荷一五九五年英一六〇〇年）直接與東方通商了。這兩個公司都是私人的資本，不似西葡兩國由政府經營，都

有擴張殖民地的性質。可是他們也一樣用攻擊掠奪的方法，到處驅逐葡萄牙的勢力。一六〇二年荷蘭人佔據了錫蘭島，一六一九年建巴達維亞(Batavia)政府於爪哇，以爲東洋貿易之中樞。同時英國人也奪據紅海和波斯灣口許多地方，並意侵略印度，葡萄牙人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一六一四年馬尼剌被荷蘭人攻下，葡萄牙的海上霸權，也就不得不讓給荷蘭和英國了。荷英二國，最初因爲有共同的敵人，——葡萄牙——是合作的，葡人的勢力愈小，他們的鬭爭愈烈。最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因賠累而瓦解，其所屬諸島，也爲英國人攻佔，霸權又操之於英國了。

荷蘭人在一六二二年就進攻過澳門，因爲中國援助葡萄牙，未能得志，乃轉而據澎湖台灣，和中國人直接往來。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派 Coyer 和 Keyzer 二人到北京請互市。清廷把他們當作貢使，許八年來朝一次，船以四艘爲限，在商館貿易。不久，台灣被鄭成功奪去了，荷蘭人幫助清軍攻廈門，挾功求報酬，許二年朝貢一次，旋即停止。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軍攻下台灣，開始開海禁，准許荷蘭人通商，西洋諸國都援例要求。翌二年，(一六八五年)設粵海閩海浙海江海四榷關於澳門、漳州、寧波、雲台山。這是我們對於國際貿易自動開放的四個商港。姜宸英在海防總論上說：

『商舶交於四省，徧於諸國，緩耳雕脚之倫，貫領橫裙之衆，莫不累譯款貢叩關，蒲伏請命下吏，凡藏山隱谷方物，瓌寶可效之珍，畢致於闕下，輸積於內府。於是恩賚之詔日下，德澤汪濊，耄倪歡悅，喜見太平，可謂一時之盛！』

可見清初我們並未採取閉關政策。當時葡西荷英以及其他諸國的商人教士早就一天一天的湧進來了。

西方的帝國主義很早就已產生，希臘羅馬不都是麼？近代民族國家之造成，實在是以帝國主義爲骨幹的。葡萄牙之佔領臥亞，西班牙之佔領菲律賓，荷蘭人之經營南洋羣島，英國人之宰制印度，那一個不是侵略呢？它們的侵略有三方面：（一）是經濟的，（二）是文化的，（三）是政治的。這可以說是三位一體，原和西洋文化，及所謂近代國家是相應的。試問那一隻商船不帶有武力？那一隻兵艦，不攜有教士？只看被侵略者的抵抗能力如何耳。如南洋羣島，則先用武力征服，強迫納貢，通商傳教，配合並進，可謂一舉成功，如印度、緬甸、暹羅、安南、則先通商傳教而後用武力征服，可謂再舉成功；中國地大物博，文化悠久，自與南洋印度不同。只得用「剝蕉抽繭」的工夫，步步蠶食，他們用的方法愈巧，我們受的痛苦就愈大。我不敢說所有西洋的教士，都帶文化侵略的目的，但他們常常和政府玩一套把戲，總不免令人懷疑。雖然如此，我們仍舊要感謝他們替我們帶進來一部份的西洋文化。

宗教的宣傳，是那時羅馬教皇包辦的，然而傳教士並非限於一個國籍的人，這是西洋的舊教，中國稱爲天主教。在馬丁路德的新教興起以後，他們在歐洲早就失勢了。舊教國家，如葡西法意都極力提倡向海外發展。耶穌會(Jesuit)遂負起東方宣教的責任，首派利瑪竇（Matteo Ricci)到中國來，在廣東住了十幾年，學習華語，結交士紳，穿着中國服裝，介紹西洋科學，

萬歷二十八年，到北京覲見明朝皇帝，進貢方物，頗受優待，撥給教堂，（就是現在北平的南堂）。幾年間就有二百多個信徒。大臣如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等皆服習其說。以後來的教士有幾十個人，他們在文藝復興以後，受了科學發達的洗禮，都對於西洋學術有所介紹，其中最著名的，是艾儒略(Julius Aleni)畢方濟(Franciscus Samliaso)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a)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除龐爲西班牙餘皆意大利人）等，他們對於學術的貢獻，約有四端：

（一）製造礮銃　火器是中國傳入歐洲的，他們逐漸改良成近代礮銃，又借教士傳回中國來，幫助打仗，收效最速。明廷購銃募兵，始於澳門葡萄牙人，故稱佛郎斯銃，其小者爲鳥槍。鑄礮攻城，始於荷蘭人，故稱紅夷礮，長有二丈餘，可洞裂石城。其實二國都有礮銃，徐光啓李之藻等均精於製作，其門生孫元化張燾等皆爲當時的專家。明史兵志列銃礮凡數十種，大都採用西法，遂爲明清間戰爭之利器。

（二）天文曆象　明欽天監有大統回回二曆，向來沿襲舊規，粗疏不合。利瑪竇等至中國，與李之藻合譯乾坤體義，以傳入天文學。明廷始注意研究西洋曆法，許龐迪我等入局測驗。崇禎二年設西局，以徐光啓督其事，鄧玉函(Joannes Terrens)龍華民(Nicolaus Longobordi)羅雅各(Jacobus Rho)及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龍羅皆意大利人鄧湯皆德意志人）等均入局，製造儀器，譯纂曆書，所測無不合。崇禎十六年詔以新曆代大統曆。順治二年，令

湯若望與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 比利時人)並爲欽天監官。自後採用西洋的曆法。

(三)地理測繪 畢方濟在崇禎十二年上書言四事，除曆法，通商，製銃外，還有「辦礦脈以裕軍需」，可見採冶學也爲當時所注意。康熙中，法皇路易十四應南懷仁請，派白晉(Joachim Bouvet)張誠(Gerbillon)等五人來中國，都精於輿地曆算之學，康熙帝遂令教士十餘人測繪各省地圖，白晉又彙爲總圖，名皇輿全覽圖。康熙帝說是費了三十多年的心力始成。這個精確縝密的新地圖，也多半是依照西洋測繪的方法。

(四)物理數學 數學是科學的基礎，西洋人既介紹科學，自然離不了它。利瑪竇首與徐光啓合譯歐幾里特 (Euclid) 的幾何原本。又合譯測量法義。清初薛鳳祚從穆尼閣 (Joan Nicolous Smogolenski) 遊，著天學會通，內有對數比例，就是現在的對數表。康熙最精於算學，以算法致通顯，如梅文鼎一類的人很多。帝譯西洋的代數學曰借根方，又發明與天元之術相通。更製三角形推算法。數學全傳進來了。後來飭編數理精蘊，律曆淵源等書，借西法以貫通中國的算理，可說更進一步了。至物理學之傳入，則熊三拔泰西水法，湯若望鏡圖說開其端，王徵(陝西與陽人天啓二年進士)與鄧玉函合譯之遠西奇器圖說繼其成。圖說謂：『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爲算學，度爲測量，重即力藝之學，皆相資而成。』他們是講重學的，可與測算並著其美。

除以上所舉外，醫藥、美術、音樂、語言、論理、倫理，都有傳入，只因我們對於這些學

術還有點根基，所以不容易多接受。天算等科學，是我們所缺乏，而又為時勢所必需，所以首先受士大夫的歡迎。徐光啓李之藻等的開明態度，和科學精神是不用說了，即如王徵所謂：『學原不問精粗，總期有濟於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於天。』又是何等的見解呢？他曾自製虹吸，鶴飲，輪壺，代耕，及自轉磨，自行車等，一般人也不以為這是工匠技藝的事而鄙棄他，可見當時學者對於西洋文化，並無深閉固拒之心，後來為什麼却未繼長增高而反致中途頓挫呢？

這原因似乎全由於政治的關係。崇禎帝初年崇奉天主教，將供奉銅佛毀碎，順治康熙二帝優遇湯若望，南懷仁等，宮廷之間，西人往來甚衆，士大夫也樂與交遊。他們尊重西洋的科學，並且尊重西洋人，在各省傳教通商都很自由，中國人信教的也非常多。可是西洋人總不免有他們的把戲，我們是因為需要科學而始令其傳教，通商，他們是因為要通商殖民，纔來傳教，纔講科學，根本是相反的。他們蔑視中國的主權，不願遵守中國的法律，瞧不起中國，尤其在海口方面，常常有些違法妄行。清吏目睹他們在印度南洋一帶的暴虐情形，不管商人教士，都和政府有密切關係，而作帝國主義侵略的前鋒，能不有點戒心嗎？況且多少年不能解決的儀禮問題，教皇忽然下令禁止教士祀天地，拜祖先，改變調和的思想，而出以攻擊的態度，雖寬大開明如康熙帝，也不能再事容忍了。所以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七年）有禁止傳教之令，這仍然是杜絕外人侵略的意思，誠如 John J. Heeveus 所說：『若教士不為政治之活動，則可安

居而不加干涉。』（見遠東史）但他們怎樣能不爲政治活動呢？所以後來逐漸採取嚴厲的處置，雍正時，還只放逐於澳門，到乾隆時，私入傳教，簡直要永遠監禁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但責任究竟屬於那一方面呢？

楊光先在康熙初年的時候，和湯若望賭測日食，失敗了，著不得已書，謂：『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因舉日本及呂宋之往事爲戒。可見學術不如人是他自己知道的，因爲怕教士偵察形勢，收拾人心，作政治侵略的引線，所以不得不辭而闢之。雍正時，皇九子胤禟以天主教神父穆經遠爲謀主，宗室蘇努一家人都信天主教，蘇是胤禩的黨羽，西洋教士也幫助胤禩奪位，雍正帝因此遷怒而禁習天主教。西洋教士爲什麼參加他們的政治鬬爭呢？卽此兩例，就知當時禁止傳教的眞正原故了。淸廷防微杜漸，原未可厚非，不過法子有點笨拙，把科學也一齊阻擋住了。漢人不是有「以敵之長技而制敵」的話嗎？爲什麼我們不能改進文化政治經濟，截長補短，借以抵抗侵略呢？但是其中也另有一種道理，就是那時候素來傳教最力的西葡二國，業已不成強國，法自路易十五以後，對傳教事業所抱的態度和政策，也有變更，耶穌會於一七七三年被羅馬教皇解散，在歐洲失去了傳教的動力，在中國仍有優越的地位，西洋人的種種侵略，我們都還能擋得住，自大之夢未醒，一切滿不在乎。如果不信，我們只看一看對付日俄兩國的事實，就可以知道了。原來帝國主義除經濟文化侵略外，還有政治侵略，在三百年以前，列強就四面包圍來了。從東南海上而來的，是歐西各國的資本主義，宗教

政策；從東北陸路而來的，是日俄二國的帝國主義。十六世紀末，日本豐臣秀吉傾國「西征」，欲奪取東亞大陸，使四百州盡化其俗，我們在朝鮮整整抵抗了七年，結果算是把它打退了。而俄羅斯帝國在十五六世紀，就銳意東進，十七世紀佔領了西伯利亞，因爲糧食接濟困難，羨慕黑龍江一帶的肥沃富饒，清初遂侵入什爾喀，額爾古納兩河流域，築雅克薩尼布楚二城，抄掠東北。黑龍江一帶的居民，大爲所苦。寧古塔駐軍，屢次出擊，俄國人始稍却。但因我們邊外土曠人稀，守備空虛，且方有三藩之亂，無暇北顧，俄人益乘間經營精奇里江一帶，並遣使北京，佯爲修好。康熙二十四年，清廷知非用武力解決不可，遂派大兵圍雅克薩，克之。俄將圖爾布青（Alexei Tollusin）退尼布楚，清兵僅毀城而還。未幾，圖爾布清得可薩克援軍，遂復築壘雅克薩，以爲防禦計。清廷又發水陸兵八千圍之，約二年，俄兵死傷殆盡，至康熙二十七年八月，始以尼布楚條約畫押而解圍。這時俄皇大彼得卽位未久，其姊專政，內外交攻，實力有限，所以不願和中國衝突，特派費要多羅（Theodorus Alexieviez Golowin）爲全權公使與清廷內大臣索額圖會議於尼布楚，訂定和約六條。最重要的：是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爲界，兩國人民，不許越界，不許收納逃亡准持文票往來貿易及拆毀雅克薩城等。這是我國正式與外國訂立的條約，在俄國藉貿易以解決其食糧的困難，當然不再進逼了，在中國看是勝利，因爲我們的使者盛陳兵威，武裝議和，俄人爲之氣沮。但康熙帝有憐憫遠人之心，實際仍多讓步，尼布楚之未收回，卽爲一例。可見中國從未辦過對等外交，任何事都要表現大國的風度，後來主

權之喪失，多半由此。那時我們擋住了東方的日本，又擋住了西方的俄國，總覺得自己的國力還不錯，所以對待外國都是像藩屬一樣的，而外國也不敢輕於嘗試，只好將就敷衍。如荷蘭使者之朝貢，行跪拜禮，俄英商人之時遭拒絕，且飭訂條約，諭其國王，因此中國越發驕矜自喜，把機會因循貽誤了二百年。鴉片戰爭以後，吾國受制外人，領土日削，主權日喪，其端緒皆從明清之際發之，當時日俄在東北，列強在東南，還不是「四夷交侵」的情形嗎？可惜前人未能見「履霜」之機，後人又輒作昧源之論，使歷史事實不明，而因果也常常顛倒了。

第二章 民族革命之醞釀

第一節 革命運動之倡導者——鄭成功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人不能不大書特書的，就是鄭成功。當國破家亡之後，奮身而起，作光復運動，攻取南京，不克，則率雄師以驅逐西洋人，建海外之王國，奉明朝保持二十多年的正朔。最後則爲民族革命組織一個祕密的集團，以負荷反清復明的使命，作民族解放的前驅。像這樣雄才偉略，可歌可泣的事實，眞是亙古罕有。箕子的朝鮮，耶律逵石的西遼，雖有點相似，但畢竟環境不同，對後來的影響更不同了。況且遺澤後世，蜚聲歐亞，不僅在中國史上是無比的光輝，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是值得我們自豪的。可是英雄莫問由來，他的家庭環境，似乎不甚高明——父親是一個海盜出身的軍人，母親是一個外國（日本）女子，伯叔兄弟都是些土豪劣紳，老師又是一個名滿天下降志辱身的「貳臣」——錢謙益。而他自己却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太學生。

他父親鄭芝龍和叔父鄭鴻逵等擁立唐王的時候，大權歸於鄭氏，芝龍叫他入侍唐王，窺察動靜。唐王看見他的相貌不凡，賜姓名朱成功——原名鄭森——令統禁旅儀同駙馬都尉。當時

人稱他爲賜姓，日本人和西洋人都稱他爲國姓爺（Koksing,Koxiga）。有一天唐王悶坐，他哭着說：『陛下鬱鬱不樂，莫非是我父親的原故？但我受國家的厚恩，義無反顧，要以死來報答的！』他又條陳許多復興的計劃，唐王說：「犁牛之子騂且角」，就封他爲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唐王敗死以後，他父親先已受洪承疇的密款，成功這時纔二十三歲，痛哭諫阻，芝龍不從，被清兵擁去。他母親也被清兵淫辱而自殺。他氣憤極了，跑到孔廟，把儒服燒了，說：『我現在是孤臣孽子，應該幹我的事了！』因聯合許多親友，坐兩隻大船，在南澳收幾千兵，到鼓浪嶼，設明太祖的神位，插血訂盟，誓圖恢復。不久就佔領了他本家的弟兄據有的廈門金門二島，作爲根據地，招賢練軍，縱橫海上。屢次登陸攻擊清兵，漳泉一帶，都是極劇烈的戰場，清兵無可奈何。清廷常命他父親派人招撫，他一概不理。桂王立肇慶，他派人稱賀，會合恢復，桂王封他爲威遠侯，旋晉漳國公。這正是金李敗亡，湘贛失守的時候，桂王要他出兵廣東，以保後路。成功遂親征潮揭，希望連師粵西。但肇慶小朝廷瓦解了。永曆七八年間，李定國由湘粵而攻廣東，圖新會，約成功會師廣州。桂王在安隆，遣使封爲延平王，册文說：

克敍彝倫，首重君臣之義；有功世道，在嚴夷夏之防。蓋天地之常經，實邦家之良翰。爾漳國公賜姓，忠猷愷摯，壯略沈雄，方閩浙之飛塵，痛長汀之鳴鏑，登舟灑泣，聯袍澤以同仇，嚼背盟心，謝辰昏於異域。而乃戈船浪泊，轉戰十年，臚表與元，間行高里，絕燕山之僞款，覆虎穴之名酋，作砥柱於東南，繫遺民以弁冕，弘勳有奕，苦節彌

貞。惟移忠以作孝，斯爲大孝；蓋忘家而許國，乃克承家。銘具金石之誠，式重山河之誓。是用錫以册封爲延平王，其矢志股肱，砥修矛戟，丕建犂庭之業，永承胙土之庥！尚敬之哉！

這一篇册文，把成功前半生的事跡，說得極爲淸切，所以我全錄出來。然而成功以所復失土尙少，驚天動地的事業還未做，拜表辭讓，足見謙德。他乃函約定國：「修矛戟而奏膚功，大符夙願」。可是定國不久敗囘，勤王之師，卒勞一行。永曆九年，封使再至，纔拜受封爵。改廈門爲思明州，設六官。十一年，桂王遷雲南，晉封李定國晉王，劉文秀蜀王，也以一字封成功爲潮王，不過潮仍爲郡，和晉蜀大國不同，仍兼鼓勵功勳和鄭重名器的意思。成功始終謙辭未受。李定國書云：『東事輔車之誼，潮惠壘湊之勳，上每召問，附髀久之！用特專勅遙頒，冀公於咫尺天顏，枕戈擠懈耳。公其堅帆飭旅，布號宣威，待我於長洋把臂，聲桴論心，一償夙願，不亦快哉！』成功復書說：『宸居既云鞏固，帝業未可偏安，况中原有可乘之機，胡運值將盡之時，宜速乘勝，並力齊舉。不佞既提水陸精銳，收復閩浙，薰風盛發，指日北向』。他果於十二年率十餘萬大兵，由張煌言（魯王輔臣順治三年航海，康熙三年被執死。首尾十九年，三渡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黃宗羲墓誌謂較文天祥爲難。遺詩有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及慚將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句，忠烈可見。）領導北伐，攻克溫台，到了江口外的大小洋山，遇着颶風，暫時囘來。十四年纔又大舉北上，由崇明入長

江，攻抵瓜州鎮江，清兵抵禦，殲滅殆盡。崇明伯甘輝勸他攻取揚州，據京口，斷援師餉道，控扼咽喉，他因為謁陵心切，直薄南京。煌言以偏師下蕪湖，取徽甯。這時成功聲威大振，順治帝嚇得想逃回關外，皇太后叱責他，因而激怒狂暴，要親自出征。經湯若望勸住。錢謙益作秋興百餘首紀其事，有云：

樓船蕩日三江湧，石馬嘶風九域陰，掃穴金陵還帝脈，埋胡紫塞慰天心。

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他給與一般漢人的復興喜訊，和打擊清人的狼狽情形，都可以想見了。可惜這時桂王已失敗入緬，李定國「長洋把臂擊楫論心」之約，未能如願。而清兵從雲貴班師回來，擊敗煌言，崇明總兵梁化鳳用火攻把成功的兵船燒掉五百餘艘，甘輝也戰死了，成功不得不退回去。謙益的詩說：

金陵要定南朝鼎，鐵甕須爭北固關，……荷鋤父老雙垂淚，愁見橫江虎旅班。

可知成功已後悔未聽甘輝的話，一棋之差，全盤皆輸，眞是不幸極了。他在這一役以後，知道中原大局已不易規復，佔據金廈兩小島，終久不是法子，（清廷又下令遷沿海之民內徙數十里，片帆不許入海，為堅壁清野計，百姓大苦。）不得不建一個「海外扶餘」，保持明朝的正朔。在福建海外來尋根據地，就只有台灣了。台灣已為荷蘭人佔據三十七年，築城防守，非常堅固，但以前海盜出沒之地，中國移民尤多。成功率百艘克澎湖，進抵鹿耳門（台江），賴潮

漲得入，華人應之，遂自安平登陸，圍荷守將科愛德(Coyet)於安平，九閱月，荷人始投降引去。他既佔據這個大島，改名東都，設承天府，招徠沿海人民，開闢耕地，修訂法律，建立學校，招納宗室遺臣，聘處士陳永華爲謀主。又通使菲律賓，和西班牙人聯絡應援。張煌言遺書趣之內渡有：『棄此十萬生靈不收，安用爭頭島？且荷安一隅，將來金廈亦不可守』語，然而成功深知明朝的國運完了，只好別圖良法，組織會黨，以潛佈「反淸復明」的種子，來擴大民族革命的宣傳。竟因正統不存，抑鬱而終。這個偉大的民族革命倡導者，纔只三十九歲。台灣的人民，擁戴感傷，如喪考妣，現在還家家奉祀他。後來陳永華纔完成了他的遺志。

他的兒子鄭經承其業，改東都爲東甯，分南北二路，及澎湖行政區。置二州三司。製糖植穀，興學建廟，又和英人締約通商，諸事並舉，大體不差，一直又維持二十多年。等三藩亂後，淸將還請求他：「保境息兵，以台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並且有『台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荊榛，且睠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潛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等語。但是漢奸邀功心盛，竟在他剛死而內亂（長子克壓賢，祖母董氏信讒殺之，立幼子塽，年少而才薄，民心離散。）的時候，降將施琅率兵入台，把鄭氏三世經營，爲明朝圖謀恢復的根據地毀滅了。就是康熙二十二年（永曆三十八年）的事。鄭氏部下，隱藏民間，逃避海外，却仍然幹他們的「反淸復明」運動，爲民族革命別開生面。

第二節　革命集團之組織

革命首領鄭成功死去以後，明桂王也被殺了，復興的事業失掉重心，一般的希望，也感覺着渺茫。陳永華遂就鄭氏舉義插血訂盟的方式，組織一個革命集團，名叫天地會，取父天母地的意思，標反清復明的目的。借鄭氏部下來宣傳復仇主義，聯絡下級社會，江湖豪俠，作爲革命主要的力量。成立大約在康熙十三年。最初是在台灣福建發展，漸漸的傳到了浙江，江南，經過大嵐山張念一（稱一念和尚）起義失敗，以及雍正年間某俠僧無辜被殺以後，天地會纔形成強固的革命組織，演出一段神話來說：

福建圃龍縣九蓮山少林寺，有一百二十八個僧人，替康熙勦平西魯國，因奸臣陷害，用火圍燒，逃出五人，走到廣東石城高溪廟，水中浮起一個白錠香爐，爐底有「反清復明」四字。乃插草爲香，仿桃園故事，結拜天地會，欲豎義旗。清兵來捉，寡不敵衆，適鄭君達的妻妹來祭墳，現出桃李木寶劍各一口，劍尾有「反清復明」四字，揮劍力救，殺退清兵。訴說她丈夫與少林相交，也被清帝賜死。鄭君達是廈門人，原爲水軍都督，平西魯時督糧有功，出任湖廣。——一說其妻妹被一游方和尚逼奸不從，投水而死，漁翁吳成貴收屍埋葬，墳前忽生桃李樹，一日天作狂風，化爲寶劍，後遇五人，因獻上爲反清復明之用。——姑嫂被搜索，投三合河而死，謝邦恆葬之。五人到靈王廟下普庵居住，又有五個販馬的經過，結爲生死之交，同舉

大事。陳近南在白鶴洞修道，特來相助。七月二十五日，插血會盟，訂期出兵，崇禎帝李坤妃之孫朱洪竹也到了，衆兄弟奉他爲主，近南爲先生（軍師）蘇洪光來投，令爲先鋒，東邊紅氣一陣，以洪爲姓，以義爲主，改蘇名天祐洪。祭旗興師，經過浙江，萬雲山萬雲龍，法名和滿，問知其故，有仗義之心。兄弟拜他爲大哥，立他爲帥，戰了數陣，失馬而亡。近南先生占算天數未絕，不若分散各省，隱藏埋名，順天行道，設下天地會一個五色旗號，詩句，口白，日後記認相逢，反泪復泪。五僧就是所謂前五房的五祖：

長蔡德忠　福建　二方大洪　廣東　三馬超興　雲南廣西　四胡德帝　湖廣　五李色開　浙江　五個販馬的就是後五房：

長吳天成　西蜀　二洪大歲　貴州　三李識弟　江南　四姚必達　雲南　五林永昭　河南

他們的神話，很顯然是以三個故事作背景而湊成的：

（1）鄭君達冤死是影射鄭芝龍的。陳永華爲鄭成功的謀主，因自稱「先生」，欲利用鄭氏舊部，使團結以復仇。

（2）萬應龍起義是影射張念一的。朱三太子也死於是役，因假託一個小主朱洪竹。張念一首先影響天地會，所以被推爲大哥。

（3）少林寺被燬，是影射某俠僧的。草野遺聞，神話最多，所以五祖都沒有一定的

姓名，加以傳寫錯誤，而事跡更有些顛倒了。

這三種神話大約是三個時期發生的，最後發生的一個，反變為洪門傳說的中心，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為陳永華最初組織的時候，只有就鄭芝龍被殺的事實，訂立插血拜盟的形式，以寄託反清復明的思想。當時明遺民不願薙髮者，多祝髮以入道，所以革命黨以寺廟為藏跡之所。而張念一和某俠僧都因此變成天地會的中心人物了。這「傳久而謬」和「後來居上」的事實，在歷史上也是必然的。但以陳氏在傳說中仍佔極重要的地位，故還有線索可尋。天地會之所以有起原於康熙雍正兩說，和前後五房的分派，以及「復興天地會」的名稱。（見大清律例）都可以證明它演變而改組的情形。他們為什麼不公然宣傳民族主義，而偏用些荒唐不經的神話呢？因為中國人自來沒有國家民族觀念，只有「天地君親師」的宗法觀念，陳永華等利用鄭氏部曲的心理，下級社會的弱點，江湖豪傑的義氣，造出為祖宗君上宗派家族的復仇說，以寄託民族國家的大義，用心極苦。國父說：「他們眼光遠大，思想透澈，觀察清楚，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最易發常人之感情」。這真正是不錯的。

天地會的起源，從前人都說不清楚，——即令是他們自己的黨徒。就因為他們作反清復明運動，不能不採取祕密的結合，所以一切都用詩句隱語手勢來表達意思，尤其是怕向外人洩露，詩句說：

三點暗藏革命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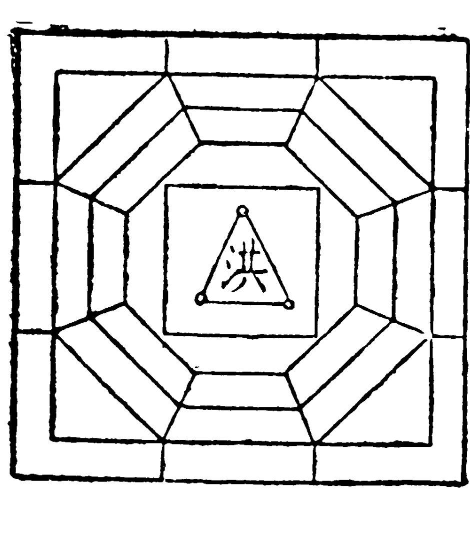
入我洪門莫通風，
養成銳勢復仇日，
誓滅清朝一掃空。

天地會一稱洪門，因爲他們取太祖洪武年號和小主洪竹（或曰洪竺，洪祝，洪英。）名中之一字，凡入會者均姓洪，故詩句有「四海九洲盡姓洪，」「滴血盟心本姓洪，」和「朋友相交盡姓洪」等。這仍是由於水滸傳「合異姓爲一家，指天地作父母」的思想而來的。把洪字拆開，就以「三八二十一」作符號。稱三點會的意思，因字旁常加氵，以淆亂外人的耳目，如寫明字爲汨，淸字爲涓，而淸字去主頭，尤有深意，蓋不承認滿淸是主宰。爲什麼又稱三合會呢？則因會中傳說，三合河是拜盟結義的地方，詩句說：「小會創始在三河，結義會盟兄弟多，正是天本團圓日，大家齊唱太平歌。」故天地會以三河爲小會，天本爲大會。凡新加入的會員（稱新丁），必由舊會員介紹，熟習暗語以後，在郊外設一會場，名穆陽城，行禮的地方，曰紅花亭，用演戲或放馬的名義來聚會，主持儀禮的人曰香主，是陳近南所擬。香主先道演詞，大略如下：

天地萬有，回復大明，滅絕胡虜。吾人當同生同死，倣桃園故事，約爲兄弟，姓洪名金蘭，合爲一家。拜天爲父，拜地爲母，日爲兄，月爲姊妹，復拜五祖及始祖萬雲龍等與洪家之全神靈。吾人以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刻爲生時。凡昔二京十三省，當一心同體。

令朝廷王侯非王侯，將相非將相，人心動搖，卽爲明朝回復，胡虜勦滅之天兆。吾人當行陳近南之命令，歷五湖四海以求英雄豪傑，焚香設誓，順行天道，恢復明朝，報仇雪恥。歃血盟誓，神明降鑒。

誓文有三十六條，讀能就焚化了，調和在斬雞剌血的碗裏，各啜少許。盟誓以後，再和首領相見。受以會規二十一則，十禁十刑。大都是彼此相處相待的規矩，及其罰法，和三十六誓差不多。可是三十六誓詞，到便也不一致，總不外「忠心義氣」，「報仇滅清」，「兄弟一家」，「患難相助」，「詐騙背盟」，「五雷誅滅」等類的辭句。他們的組織極簡單，首領稱大哥，香主稱二哥，下稱三哥、先鋒、紅棍、皆爲幹部，一般會員稱草鞋。各有票據，名叫腰憑，以爲識別，其式如下：



五人分開一首詩
身上洪英無人知
自此傳得衆兄弟
後來相認團圓時

每格裏皆有詩句隱語，隨意填寫，繁簡不同，惟以上四句，是任何腰憑都有的。其詩句大約有六七百首，問第均用之，我且舉一首天地會反清復明詩：

天生朱洪立爲尊
地結桃園四海同
會齊洪家兵百萬
反離撻子伴眞龍
汨連舉起迎兄弟
復國團圓處處齊
大家來慶唐虞世
明日當頭正是洪

其餘隱語，（如官府稱對頭外人稱風仔等）手勢，（如伸大二三指爲天中四小指爲地大二指爲人等）茶陣，（用茶壺茶杯煙筒等擺列各有詩句道出卽可結識同黨）皆不煩備舉。總之，他們是利用祕密結社的方法，來招納江湖上的豪傑，不分品類，凡贊成反清復明的人，都可以加入。入會以後，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因此它發展的非常快，而尤合乎江湖旅客，無家游子的需要，所以在下級社會海外華僑方面不久就瀰漫一種很大的力量。他們爲什麼要用些鄙俚粗俗的文字來作宣傳呢？這正可以避免官府士大夫的注意。 國父設譬，如「強盜入室，

藏寶汚穢之中」。眞是一個絕好的比喻。天地會經過幾十年的醞釀，「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致有後來民族革命的結果，可算是一件奇異偉大的事蹟。許多的先民——如陳永華等手創這一個集團，爲民族主義植根苗，爲解放運動爭羣衆，更是值得我們頂禮膜拜的。我們能「數典忘祖」麽？

第三節　革命之屢起屢蹶

在清初的時候：南明三王的繼立，上下江民兵的四起，以及中原豪傑的結寨自保，或流賊義民的受撫響應，這都算不得革命運動。因爲三王是偏安之局，豪傑義士全想着佐命中興，而民兵又僅只爲薙髮以抗戰，大半是消極的。革命是一種積極的行爲，鄭成功在國破家亡之後，連絡同志，插血訂盟，力圖光復，這纔是民族革命的運動。天地會繼之組織祕密集團，廣事宣傳，黨人遍於南部各省，可算是民族革命的主幹。有意義，有團體，有羣衆，自然就有行動了。從康熙以後，屢起屢蹶，史不絕書，但清人看他們是些叛逆，紀載不詳，又歪曲事實，久而久之，也就失傳了。官書固然如此，稗史更多謬誤。譬如彭公案施公案這兩部小說的主角彭鵬施世綸，照現在的眼光看，是兩個漢奸，甘心爲異族賣氣力，而尤其世綸是大漢奸施琅的兒子，投充旗人，世爲清室「忠僕」。他們所用的差弁，如黃天霸之流，不過是漢奸爪牙。而小說偏許爲忠義。至於竇爾敦一班的綠林響馬，纔是眞正的革命黨呢！他們打仗時所說的隱語，

都和天地會一樣，可見他們全是黨人。他們嘯聚山湖，祕密結合，任俠尚義，反抗滿清，傳佈民族意識，努力革命事業，而書中偏詆為盜賊。卽以竇爾敦而論：他原名竇開山，二東是乳名，訛為爾敦，或耳墩，二敦。他本是獻縣的無賴子，曾作過殺人越貨的事情，後來遇見一個史可法的部將姓石的，教以拳術，又拜河北大儒王餘佑為師，教以文學，兩個都是抱民族思想的人，自然也勸導他作革命運動。他從此改邪歸正，以除暴安良相號召。當清康熙帝南巡過濟南的時候，他要效法博浪椎去行刺，因侍衛森嚴，未得如願，僅將赤騏御馬盜去。後以所志不遂，披緇入山，英雄末路，人多嘆惜。絕不是施公案上所說的那樣一個人，也絕未被黃天霸擒獲正法。可是「連環套」一劇，把他形容像一個「黑花面」的盜魁，正如吳稚暉先生所說沒有見過 國父以前，猜想 國父是像「八蜡廟」裏的大王爺爺一樣的（見總理行誼）。所以清初的民族革命史簡直沒有法子寫得逼眞，或者說的愈多，距事實就愈遠，我們只好把幾件大事情畧微敍一些，記載它的年月人名和經過而已。

當吳三桂起兵反清的時候，檄文中曾提及朱三太子，「刺股為記，寄命託孤。」北京果有一個楊起隆以朱三太子為號召而起義了。他們潛聚在周全斌周公直父子家裏，改元廣德，黨人以白布裹頭，約在京城內外放火舉事，被人告發，捕獲周尙賢等數百人，均磔於市。而楊起隆和張子房，金玉鏍，鄭得勝等都逃走了。當時謠言繁興，人人自危，紛紛搬家，這可說是「首都革命」。楊起隆逃到山陝間，仍以朱三太子號召遠近，十九年被獲凌遲。他們雖和天地會沒

有關係，但天地會後來也擁戴朱三太子，更屬望於吳三桂，所以詩句有：

初進洪門結義兄，當天盟誓表眞情，長沙灣口連天近，渡過烏龍見太平。忠義堂前兄弟衆，城中點將百萬兵，福德祠前來誓願，反淸復汨我洪英。

因三桂屯兵長沙，有朱三太子「寄命託孤」的話，所以說連天近。而康熙十五年丙辰爲烏龍年，謂過此卽可享太平之福，藉以鼓勵會衆。或說朱三名洪英，一曰洪祝，洪竺，所以天地會就取洪字爲記號，造出源遠流長的革命黨出來。

楊起隆是否詐稱朱三太子呢？我們不敢說。這時朱三太子已四十餘歲，有了幾個兒子，都可以作復明的招牌，會衆訛傳以爲小主「洪竹」者，大約就是這種關係。到康熙四十五年左右，天地會的首領浙江大嵐山一念和尙，（名張念一）果眞奉朱三太子起義，改元天德。結果仍歸失敗，朱三太子時在山東蓬萊縣李家，皤皤老翁，裝作教書先生，康熙四十七年也被拿獲了。他的供辭說：

吾乃先朝皇子朱慈煥，（按明史云名慈烱，孟森考定名慈燦。慈煥乃四子永王名，明史謂五子悼靈王名亦誤。不知此處何以自言其弟之名，抑紀述者誤耶？）原封定王，崇禎十七年，流賊圍困京城，先皇帝交與王內官，往民間藏匿。及城破，王內官獻之闖賊，闖賊交與杜將軍。未幾，吳三桂同清兵殺敗流賊，各自奔逸。時吾年甫十三，自往南行，至鳳陽，遇一老鄉紳，曾爲諫垣，留在伊家，遂改姓王。吾年十八九，乃從江而南，舉目無

親，煢煢莫告，到一禪林大士前，削髮爲僧，後遊於浙，止一古剎中，有餘姚胡姓，亦宦裔，與我談經論文，乃延至其家，改換衣帽，勸吾蓄髮，以女妻焉。（見李方遠著張先生傳）

朱三太子在浙江名王士元，在山東名張用觀，字潛齋，據他解到杭州對質的供辭：「七十年來，改易姓名，冀以避禍，今年七十五歲，血氣已衰，鬚髮皆白，尙敢有謀反之事乎？」張念一說：「原是假他名色，以鼓動人，委實不認識他。」而太倉和尙鑄假印造定王劄符，煽惑作亂，對證也不認識。所以雍正帝的大義覺迷錄上說：『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輒以朱三太子爲名，如一念和尙朱一貴者，指不勝屈。』大致是不錯的。天地會傳說中有一個假託的小主，也就若隱若見了。但號稱寬大的康熙帝，究竟還有種族的戒心，拿「雖無謀反之事，未嘗無謀反之心」的罪名，把他和五個兒子，（朱皝、朱里、朱壬、朱在、朱坤）一個孫子，（朱鈺），等三十餘人都殺了。其媳女均自盡，孟森有列皇後紀一文，詳攷其事，可以參看。明朝嫡胤，自此斬絕。不久而朱一貴又起來了。

朱一貴和林爽文都是眞正的天地會首領，他們舉義的地方，又是天地會的策源地台灣。前者爲康熙六十年，後者爲乾隆五十一年，相距有六十多年的時間，可見天地會的組織雖祕密，而徒黨廣佈下層，泛弛無力，所以一貴雖以七日佔據全台，自稱中興王，建元永和，不過兩個月就失敗了。漢奸施世驃（水師提督）藍廷珍（南澳鎭總兵）會合一萬二千人的兵力，大小船六

百餘艘，也是七天工夫，就從鹿耳門攻到台灣府。一貫烏合之衆數十萬，雖得荷蘭人所藏的破位火藥，但兵非素練，一戰即潰。被村民所俘，送北京磔死。當時民謠說：『頭戴明朝冠，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可見一般人經過清朝八十年的統治，已經麻木不仁，而何黨倉卒舉事，究竟是不成的。但革命勢力，不易消滅，越聚越大。乾隆三十三年，黃教又舉義，幾個月纔平定，台灣官吏，均以措置乖方伏法。至林爽文起事，首尾三年，全台響應，只有總兵柴大紀守諸羅未下，清廷封爲一等義勇伯。及督師福康安勇將海蘭察率大兵至台，解諸羅圍，大紀未爲執櫜鞬之儀，福康安劾其奸詐難信，奏報不實。林爽文被俘獻以後，大紀也解京正法了。「狡兎死，走狗烹，」所謂忠義的漢奸之下場，不過如此！清廷以台民剽悍，建功臣生祠，以資鎮懾，福康安居中。然而未過七年，陳周全又起來了。「台地恆期樂民業，海濤不復動王師」（乾隆帝泐生祠詩），果眞清兵未動，而周全竟爲所謂民兵首領楊仲舍等所平。台灣在七十年間，經過四次的事變，可見天地會醞蓄的力量還不差。然而滿清利用福建漢奸，人民又樂業厭亂，始終無大成就，革命黨的活動遂不能不轉移他方了。

在康熙以後的雍正年代，打着朱姓的旗幟而起義的人也很多，如山東人張玉，卽其一也。所以雍正帝說：『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莽，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衆者！』不過他之所謂「奸民」，實際是革命黨人。爲什麽「若此之衆」？還不是因爲統制者是異族麽？雍正帝想從思想上來糾正

說：「滿洲」是中國一部份的籍貫，「天下一統，華夷一家」，見解本來是不錯的。但中國人總覺得「非我種族，其心必異。」所以民族革命是在不斷的進行，而民族思想也就不斷的傳播了。

第四節　清廷鈐制之政策

說起民族思想來，古人倒是滿不在乎的，孔子「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一句話就道破了。以「文化至上」來吸收四夷的民族，確實發生了很大的效果。自古迄唐，不乏顯例。及至元人君臨中國，壓制過甚，纔引起反響，明太祖遂以「中國人之中國，胡人焉得而治理之？」來號召天下，驅逐胡元，為民族思想播下一顆種子。剛巧代明而興的是那時還算異族的滿清，這一顆種子，就自然的苗生萌芽了。清初第一流學者，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孫夏峯、李二曲、傅青主等，那一個不眷懷故國，遯跡山林，闡種族之大義，倡革命之學說呢？這和元初的郝經虞集吳澄許衡諸人就迥然不同了。王船山在讀通鑑論裏發揮民族思想最為痛切，他說：

「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異類間之！」

「夷狄者，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非我族類，不入我倫。」

「即使桓溫誰成功而篡，猶賢於戴異族以為中國主。」

卽如投降的貳臣錢牧齋，也有「國殤何意存三戶，家祭無忘告兩河！」和「歌舞夢華前代恨，英雄復漢後人思！」等詩句。朱舜水逃避海外，國族難歸，非到「天厭夷德，神孫良翰，憤發敵愾，掃欃槍，靖胡虜」的時候，他絕不回來；寧願「捐棄墳墓妻子，」也不和異族同中國。顧亭林五謁思陵，十餘年策馬往來邊塞，開墾華陰；閻古古漫遊江淮間，破萬金之資，招納豪俊，都是爲什麼？峨冠白衣，高風勁節，爲國家報仇，爲革命運動，淸朝的籠絡政策，對於這一類特殊人物，是不易生效的。籠絡不成，則施以壓迫。亭林古古均曾下過濟南獄，以名高得縱遣。但文人因鼓吹民族思想而受禍的，成千累萬，歷亙三朝，這就是慘絕人寰的文字獄，其中最大的，有：

（一）莊氏史獄　潮州莊廷鑨購朱國楨遺稿以著明史，於淸入關以前的年號不書，而隆武永歷的正朔，則大書特書。又直書淸太祖之名，指孔有德等爲叛。且有「飲恨沙燐，銷亡左袵」諸句。刊板流行。康熙二年，罷官的知縣吳之榮想以告訐爲功，事聞，時廷鑨已死，戮其尸。誅兄廷鑾，弟廷鉞及列名參校作序刻板鬻書購書諸人，共二百二十一。有名的學者潘檉章吳炎均在內。廷鑾絕命詩有「一氣潮迴江上月，全家淚灑武林春」。廷鉞詩有「檮杌有名終累楚，鴟夷無后可留齊」等句。潘詩有：「抱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自憐腐草同湮沒，漫說雕蟲誤此生！」一首，可見他們的慘痛了。

（二）南山集獄　桐城方孝標著鈍齋文選，內有滇黔紀聞二篇，多述明末清初事，內載永歷年號，同里戴名世欲網羅放失，以修明史，適門生余湛遇一釋氏犂支，爲明桂王的宦官，名世因屬將所聞以告，既與滇黔紀聞對證，多有異同。乃致書余生，約犂支來面論，中有：『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流離遷播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等語，足見其惓懷故國。康熙四十八年，名世殿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業已出仕新朝了，不二年御史趙申喬據所著南山集載與余生書參其語多狂悖。清廷以孝標曾爲吳三桂學士，朱三太子案內也有名，牽連興獄，至數百人。康熙帝爲表示寬大，僅將名世處斬，方戴家人俱充軍入旗。

（三）呂留良獄　呂晚村（名留良字莊生一字用晦浙江崇德人）是發揮民族思想最深切最有力的一個人，其罹禍也最慘。他嘗說：『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個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所以他點勘八股文字，向一般士子中去宣傳，「假試課以爲媒，假逢掖以爲郵，偏致於諸公長者之側，其有豐穫焉。」（東萊語）這是他灌輸革命思想的最好方法。他在四書講義評語中說：

一部春秋大義，尤其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

所謂域中第一事，就是攘夷狄。他題如此江山圖一首長詩，說：『其爲宋之南渡耶？如此

江山眞可恥！其爲崖山以後耶？如此江山不忍視。……吾今始悟作畫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視昔昔猶今，吞聲不用枚銜嘴，畫將皐羽西臺淚，研入丹青提筆泚。所以有畫無詩文，詩文盡在四字裏！……嘗謂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何處登臨不狂喜！……胡爲犂眉覆踏詩，亡國之痛不絕齒，此曹豈云不讀書，眞是未明大義耳。興亡節義不可磨，……只此一番不與亡國比，……不特元亡不足悲，宋亡之恨亦雪矣。』（東莊詩存倀倀集）又有錢墓松歌說：『其中（指元代）雖有數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間，……不妨架漏如許日，何況短景窮廬天。』（東莊詩存眞臘凝寒集）他簡直不承認元朝接續中國的歷史，對明朝光復華夏，認爲可以雪恨而狂喜的。「以今視昔」，感慨萬端。他罵盡一切降臣和無恥的士子，說：「此曹豈復堪爲人」！後來湖南永興人曾靜看見他的書，很受感動，遂著知新錄說：『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爲域中第一義。所以聖人許管仲之功。……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又說：『夷狄侵陵中國，在聖人所必誅而不宥者，只有殺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說可以寬解得？』這和王船山的學說不是一樣麼？惟晚村只傳播民族思想，以裝作和尙來拒絕淸吏的徵薦，取程頤「尺布裹頭而死，必不削髮胡服而終」。康熙二十二年就逝世了。曾靜和呂氏子弟不僅宣傳，更要見諸實行。雍正七年，靜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他爲祖宗（指岳飛）復仇，反抗滿淸。鍾琪不明大義，百計曲誘，探得實情，將曾靜張熙均解京審問。雍正帝知道他們是受了呂晚村的學說影響，發官諭旨，辨正華夷

之說，並著義大覺迷錄，頒行天下。將晚村及其子葆中其徒嚴鴻逵都戮首梟示，子毅中及徒沈在寬俱斬決，族人發寧古塔爲奴。對於曾靜張熙却因他們「過而能改，免罪釋放」。到乾隆帝幹父之蠱，始殺之。據說呂葆中和張念一也有關係，可見晚村的子弟，後來想實行革命，乃與天地會黨人合流矣！

（四）齊周華獄　天台齊赤若，字周華，與叔召南齊名。後爲道士。年三十五，因呂留良案發生，上書爲之抗辨（疏略云：『呂留良於有明之季，延至我朝，著書立說，廣播四方，其胸中膠於前代，敢妄爲記撰，偏見甘效頑民，世論共推義士，又以其書能闡發聖賢精蘊，尊爲理學者有之。夫曾靜現在叛逆之徒，尙邀赦宥之典，豈呂留良以死後之空言，早對聖祖所赦宥者，獨不可貸其一門之罪乎？』）浙吏威脅言誘，令其中止，周華不允，遂下獄，瀕死者數，而矢志不移。部議永遠監禁，乾隆元年始得釋放。修道於武當山瓊台觀。乾隆三十二年，因年老回家省母，往訪召南，這時召南以原任禮部侍郎家居，有人寫「僧道不許濫入齊府」字揭於門首，周華以爲召南有意拒絕，遂作呈詞自訴。浙撫熊學鵬奏聞，詔磔周華，以召南循隱近族逆詞革職。周華實在是一個異人，他自以爲是東方木星，木不斲不成器，所以替呂晚村說話，就是準備受刑的，這次自訴，他寫一付門聯：「惡刼難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喪，庶幾無忝所生！」這無忝所生四字，確可以道出他的苦心來。大約他痛恨一般文人的無恥，所以纔甘就刀鋸鼎鑊，來激勵他們。

（五）徐述夔獄　東台舉人徐述夔，著一柱樓編年詩，多詠明末時事，以寄託他的民族思想。如詠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又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句。乾隆四十三年，地方官上疏奏聞。帝以用壺兒影射胡兒，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說到清都而言去清都，顯有興明滅清之意，命剖棺戮屍。子孫及校對諸人俱坐死。前禮部尚書沈德潛曾爲作傳，稱其文章品行可法，一併革爵，撤出賢良祠。或言德潛死後，乾隆帝閱其詩集，凡平日替他點竄捉刀的詩都錄在內，遂惡之。又閱其詠黑牡丹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以爲有意詬詈滿清，命戮其尸。

諸如此的文字獄，不曉得有好多起，故宮文字獄檔可考見。乾隆帝所以編纂四庫全書，就是對於民族思想的總檢查，明清間人的文集野史，大多數被銷毀。章炳麟有哀焚書一文紀其事。最可恨的是廣東丹霞寺和尚藏一册金堡的手稿，堡事桂王，失敗爲僧，稱澹歸和尚，著徧行堂集，乾隆帝以爲悖逆，命焚寺磨碑，寺僧五百餘人皆坐死。然而清廷「可知草莽偸垂淚，盡是詩書未死心」（見卓長齡高樟閣詩集爲乾隆朝文字獄之一，下引均獄檔。）麼？他們儘管用籠絡壓迫的手段，以鈐制漢人的民族思想，大多數無恥的士子，居然被利祿所誘，鼎鑊所脅，服服貼貼的作順民了，但是「志士終當營大業」（喬廷英詩稿）的天地會黨人，偏向江湖寺廟中去宣傳，把士子不放在眼內。所以就「髮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遁地僧」（祝廷錚續三字經）了。「廝養功名何足異？衣冠都作金銀氣！」（卓槐芥圃詩鈔）眞是罵盡當時讀書人甘心

作異族的走狗！而「大道日以沒，誰與相維持？」就不能不賴江湖上的豪傑來保存民族思想，推進革命運動了。誰知「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喬詩）到後來革命黨人竟如荼如火，終久有「飛龍大人見」（馮王孫五經簡詠）「且從卜太平」（戴昆約亭遺詩）的那一天！

第三章　大清帝國之盛衰

第一節　康雍乾三朝之政治

多爾袞攝政和順治帝在位的時候，只是確定了對付漢人的政策，戎馬倉皇，兵事未已。在康熙帝繼立的初年，他還是一個八歲的小孩子，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而鰲拜尤專橫，「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圖。」（熊錫履奏疏語）所以沒有什麼政治可言。玄燁親政以後，索尼先死了，蘇克薩哈因請守先帝陵寢說：「如線餘息，得以生全。」帝覽奏不悅。鰲拜本來和他有嫌隙，極力排擠，說他不願歸政，竟把他殺了。然而康熙帝很有作爲，對於鰲拜結黨擅權，早不滿意，乘其入宮，令羽林小兒執之，以大罪三十款，籍沒拘禁，降遏必隆爲侍衞。這時帝纔十六歲，他的偉大政治作風，已經露出頭角來，首先把圈佔閭民房地的事，永遠停止了。圈地是清初最壞的一件事情，旗人藉征服的餘威，任意圈佔人民的房屋土地，或指撥遠處荒地來掉換，人民驚竄流離，非常的不安生，尤以近畿一帶爲甚。二十幾年的秕政，到康熙正式行使職權，纔算除去。但不久三藩之亂起來，又擾攘了十年，所以清朝政治基礎的建立，還須待至康熙二十年以後。

康熙帝是歷史上有數的君主，他的聰明，學力辭才，都不亞於漢文帝唐太宗，他知道君主是爲人民服務的，「一事不謹，卽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卽貽千百世之患。」所以在位六十餘年，孜孜圖治，未敢少懈。他的設施言論，有康熙政要一書可看，茲僅述其大者：

（一）獎勵文學　詔舉博學鴻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取彭遹孫等五十名，俱授翰林院官，（因授官過優，科第出身者醜詆之曰野翰林，可見當時文人吃醋的醜態。尤侗題鍾馗像說：「進士也，鬼也，鬼也，進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纂修明史。又徵長於文學的人，得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等。在宮內召集「昇平嘉宴」，飲酒賦詩，笑語無禁。

（二）表章理學　帝以朱子注釋羣經，「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歸」，尊祀在十哲之列，極力提倡性理之學。也是因爲朱子主張尊君大一統，便於統治者利用而已。阿附之徒，因借此以求倖進，反對的人，更加以詆斥宋儒了。

（三）編纂書籍　當時購求遺書，編纂羣籍，飭頒三十幾種書，而尤以圖書集成一萬卷最爲鉅製，誠典籍之大觀，開纂書之新裁。花了十多年工夫，纔告完成。

（四）懲治貪汚　清初貪汚之風很甚，『地方官吏，剝民媚上，督撫司道，又轉餽政府，會推徇私，將帥扣餉，刑官鬻獄，豪右爲奸，百姓困苦已極，而大臣家益富。』（魏象樞語）康熙帝斥將大學士索額圖拘禁宗人府，又把大學士明珠褫職，滿大臣噶禮賜死，湖廣總督蔡毓榮拏問，侍郎宜昌阿福建巡撫金僑擬律，湖北巡撫張汧，交部議處。對於科場舞弊，責罰更嚴，

順天鄉試主考李蟠遣戍，副主考姜宸英瘐死。懲辦的都是政府要人，吏治自然要好得多了。

（五）南巡治河　帝以黃河號爲難治，欲親至其地，相度形勢，視察隄工，又以東南民情，未盡貼服，想仿效秦始皇巡遊天下，震懾人心的故事，曾六次南巡江浙，四次出巡邊外，四次巡幸山西五台，影響都很可觀。

（六）蠲免賦稅　他嘗說：「蠲租乃古今第一善政」，所以差不多每年都輪免錢糧，或普免逋欠，或減江南漕糧。而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諭，尤膾炙人口。

以上是他的治績大略，總結起來，不過「勤政愛民，統一思想」兩句話就完了。他本身是一個極好學的人，「手不釋卷」，「至於咯血」，因此他的學問見解都很高。他受理學家的影響，認爲學術是施政之本，藉以籠絡士子；勤恤是養民之本，藉以收拾人心。以實心行實政，極得休養生息之良效，而秉性又寬大，也頗有垂拱無爲的作風。且一事不妥，即罪責自己，待人精誠，則衆善皆歸。六十年間，熙熙皋皋，眞不愧「康熙」兩個字。然而晚年有一件極不如意的事情，就是太子胤礽的廢立，他的兒子很多，各樹朋黨，希冀儲位，把胤礽用鎮魘術給鬧瘋了，因此他絕口不談建儲事，大臣進言者皆得罪。康熙六十一年冬，他感覺不適，幾天就死去了。遺詔隆科多傳位十四子胤禵，時任撫遠大將軍，在青海軍中，隆科多因與皇四子胤禛合謀易十爲子字，因得立，就是雍正帝。

雍正帝對於兄弟的殺戮，實在有慚德，他沒有康熙帝的優容大度，勤學愛民；但他的政治

作風，却是一個法家，眼光很透澈，手段很高明，處事綜覈精嚴，任人賞罰悉當。他矯正了康熙晚年寬縱的弊病，把吏治重加整飭，財政納入正軌，用緹騎（即特務人員）來偵察奸宄，監督官吏，刺探民隱。興水利，修治直隸諸河；蠲浮糧，減輕江南賦稅；除賤民，解放奴隸階級；立社倉，周濟閭閻緩急；改土歸流，以安定邊防；火耗歸公，爲官吏養廉；諸如此類，多不勝舉。他最信任雲貴總督鄂爾泰，河南巡撫田文鏡（後特授河東總督，並管山東。），浙江巡撫李衞，這三人在轄境以內，摧抑紳衿，任用能吏，公正廉明，境無盜賊。眞所謂：「夜不閉戶，道不拾遺。」雍正帝常說他們，「忠誠體國，實心任事。」但當時都覺得他們：「爲政苛細」，是酷吏一流人物，每有人奏劾，帝均信任不移，並保證他們必無貪污壞法之事。後來鄂爾泰內遷爲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帝嘗說：「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大小必命他「平章以聞」（貢獻意見）。君明臣良，可謂盛事。因爲雍正能知人善任，所以內無權奸，外無貪黷，隆科多以擁戴殊勳，不惜殺之滅口，年羹堯以專征大將，毅然懲其跋扈，凡此都非庸主所能辦。至於頒刊大義覺迷錄和揀魔辨異錄，以帝王之尊，來和秀才和尚作學術上的辯論，其精神都是值得欽佩的。本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從秦漢以後，三公夾輔王室，丞相爲政府領袖，很像現代的內閣制。明太祖廢丞相不設，天子獨攬政權，很像現代的總統制。但明朝的君主都不勤政事，因此宦官佞臣，最容易竊權弄柄，淸沿明制，大學士有六個人，號稱宰輔，而實非古之丞相。雍正帝集權自身，索興設一個軍機處，選大臣入值，等於君主的祕書顧問，而

大學士簡直只有虛名了。這原爲用兵而設，後來一切政治，都出於此，軍機大臣遂成爲政府的要人。「摺奏」可以直達御前，「廷寄」可以密封馳遞，於是通政司的繳奏封駁之權，內閣的票擬批答之權，議政王大臣的會推立法之權，都無形減去了。這是一件很大的政制改革。全由於雍正帝尙任重法，以及精細的個性使然。可是他自己太勞累了：每天披閱奏摺，常至午夜不休，只有鄂爾泰和張廷玉（漢大學士）等兩三人幫得上忙，眞是宵旰乾惕，日不暇給；看他手批的硃批諭旨，就可以知道了。據嘯亭雜錄說，未刊者還堆積若山，他對於淸朝的政治，關係很大，若沒有他，康熙六十年培養國力的政績，顯示不出來，乾隆六十年好大喜功的威權，發揮不出來。他有一段話說：

『自古爲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濟之以嚴，方欲嚴而濟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勢，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總之寬嚴適協其宜，乃爲相濟，非參雜於寬嚴之間，而爲子莫之執中也。』

這眞是超人一等的見解，不僅是他的政治哲學，也可以解釋孔子的中庸之道。他兒子乾隆帝就不大懂得了。乾隆帝即位時的「大政方針」說：

『治道貴得乎中，矯枉不可過正。……聖祖久道化成，與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寬縱之弊；世宗整頓積習，仁育而兼義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嚴刻之弊。……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矯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難。』『中者，無過

不及，寬嚴並濟之道也。昔我皇考臨御之初，見人心玩愒，諸事廢弛，官吏不知公事，胥小不知畏法，勢不得不加意整頓，以除積弊。乃諸臣誤以聖心在於嚴厲，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覈，大爲閭閻之擾累。朕即位以來，深知從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經理，不過欲減去繁苛，與民休息，而諸臣又誤以爲朕意在寬，遂相率而趨於縱弛。……勢必至禁令廢弛，奸宄復作，良善受其擾害，風俗漸就澆漓，將我皇考十三年教養整理之苦心，功虧一簣。』

他標榜一個中字，說是寬嚴並濟，實際有些模稜，絕不如雍正帝標榜一個宜字，說寬嚴不參雜來得更深切。他微說雍正帝過於嚴厲，而自己要用中道，然呂留良案雍正並未殺曾靜張熙，他一上台就把二人殺了，誰寬乎？誰嚴乎？我們看乾隆六十年政治，總想模仿康熙，召試博學鴻詞，及山林隱逸之士，舉行千叟宴，蠲免租賦，編纂羣書，尤以「四庫全書」爲洋洋大觀，「六次南巡」爲巍巍盛典。然而康熙纂書，頗有學術上之價值，如數理之提倡發揮，因他自己是內行。乾隆帝虛心好學，都不如乃祖，更無創見，只是隨意改削實錄，僞造歷史，替祖宗朽屍上塗粉，借徵書來禁書，有人比之於秦火，可以想見其謬妄了。康熙南巡爲治河和鎮撫，乾隆時既不治河，又無須乎鎮撫，只是一味玩耍，踵事繁華，舖張揚厲，選歌徵色，供億無度，江南的老百姓苦極了。他晚年懺悔着說：「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他一身並無可取之處，學術德行不如康熙，政治能力不如雍正，但在外表上看，乾隆一朝，是清運的鼎盛

時代，爲什麼呢？因爲清朝經康雍兩朝的培植芟理，到這時纔開花結果，花之盛，果之實，是園丁的功績，而不是看花食果人的功績。乾隆帝好像一個紈袴子弟，得了先人的豐富遺產，窮極奢侈，富麗堂皇，實際不是他手上得來的東西。我們若檢視他所用的宰輔，就知道他的政治何如了。最初鄂爾泰張廷玉都是雍正時的舊人，後來嵇氏父子（曾筠及璜）劉氏父子（統勳及墉）雖際遇少有，而嵇氏功在河防，劉氏信任不專，尹繼善也是雍正帝簡用的，和舒赫德阿桂都是閫外之勳。于敏中宅心不醇，死後撤享，陳宏謀陳世倌皆無殊績，只有傅恆和珅二人當國最久，寵眷最甚。傅恆因姻戚關係，乾隆帝故意捧場，大致還過得去，也沒有什麼成就。和珅就不同了，招權納賄，無惡不作，吏治民風，均敗壞在他一人之手，而乾隆始終信任不移，要和康熙雍正兩朝比較一下，就可知隆替升降之故：他既沒有雍正殺隆科多年羹堯的辣手，又沒有康熙辦鰲拜明珠索額圖的英明，所以康雍是政治最清明的時候，乾隆則爲盛衰轉變的樞紐了。

三朝都免不掉朋黨，而康熙乾隆時最甚，鰲拜明珠徐乾學索額圖噶禮鄂爾泰張廷玉于敏中等，都各有黨羽，滿與滿，漢與漢，滿漢之間，互相攻訐，互相傾軋，以及各王樹黨奪位，真是一塲糊塗！官吏日奔走依附，不知公事，優遊博奕，畫諾而已，這是中國政治敗壞的根苗，盛世且然，遑論叔季？要不是雍正帝嚴加整飭，摧抑貴族，則後來的腐敗政治，早見端倪了。雍正御製朋黨論，以爲「欲除朋黨，當令輿論之所非是非，與朝廷之所賞罰，相爲一致。」彼

此顧及，原來不錯。可惜他執政的時間太短，只爲清朝造成君尊臣卑，大一統的無上威權耳歐美各國有政黨無朋黨，中國有朋黨無政黨，公私判然，應該注意。

第三節　康雍乾三朝之武功

乾隆帝所誇耀的「十全武功」，自號稱「十全老人」，其實也是三朝累積的事業。十功是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掃金川爲二，靖臺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除臺灣林爽文起兵事，已見前章，餘當依次敍述，而以平定準噶爾爲最麻煩，最重要。

原來蒙古地方是元朝遺下來的牧遊人所據：「不郛郭，不宮室，不耕殖，穹帳寄而水草逐者。」（見聖武紀）其稱以人不以地，而以沙漠爲大界限：（一）漠南內蒙古，（二）漠北外蒙古，（三）漠西厄魯特蒙古，（四）靑海蒙古。四部佔有今蒙古靑海及新疆天山北路地。漠南接近東北，科爾沁在天命時就臣服後金，太宗征察哈爾滅之，漠南蒙古合詞上尊號，纔構成大清帝國。漠北也叫喀爾喀，分三部：曰車臣，曰土謝圖，曰札薩克圖，明代事蹟無聞，至康熙始內附，入清代版圖，靑海也歸順了。只有漠西厄魯特，竭三朝之兵力，始克夷其部落，收歸清有。厄魯特共四部，除一部（和碩特）移靑海外，其餘三部都在新疆北部，以準噶爾爲最強，就是明朝的瓦剌。康熙時代準酋噶爾丹吞併四部及天山南路，又和俄國通使貿易，以貂皮換銃工諸物，勢力極盛。乘喀爾喀內亂，發兵攻之，三部不能抗，悉衆分路投漠南請降。清廷

遣使諭和，噶爾丹必欲得土謝圖汗，窮追至漠南，清兵敗績。康熙二十九年，始派大軍迎戰於烏蘭布通，破其「駝城」，噶爾丹遁走。帝親至塞外，安插蒙古降人。這時準噶爾的根據地伊犁，爲噶爾丹侄策妄阿拉布坦所佔。噶爾丹無所歸，在科布多休養生息，揚言借俄國鳥槍兵六萬入犯，其實俄國方在訂尼布楚條約後，並無意和中國開釁。帝親征至昭莫多，（大樹林意亦名東庫倫）誘之來攻，大敗之，噶爾丹窮促自殺。這是康熙三十六年的事。策妄阿拉布坦初與清廷通好，既而南侵西藏，清兵出援，準兵北還。雍正初年，策妄死，子噶爾丹策零，也很梟雄，屢謀犯邊，清命傅爾丹由北路進駐科布多，岳鍾琪由西路屯里坤，北路敗績，而蒙古三音諾顏策凌部異軍突起，制敵不得進。十年，又大敗之於光顯寺，策凌以功爵親王，自成一部，不復隸土謝圖了。準兵不得逞，到乾隆初年始來議和，以阿爾泰山爲界，清廷因爲遼遠難征，乃許其通市及入藏煎茶。十年以後，準部內亂，清廷以爲有機可乘，又因中原無事，正可以耀威邊外。二十年遂大舉仍分西北兩路出兵，不到四月，未經一戰，就會師伊犁，俘其酋達瓦齊而歸。爲什麼這樣容易？因爲有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策妄外孫原屬厄魯特四部之一的杜爾伯特）作嚮導。阿睦原想着事定清廷應令他總長四部，乾隆帝偏欲衆建以分其力，阿睦遂叛。翌年清兵雖入伊犁，而將帥失機，兩路均無功，阿睦逃哈薩克，復歸自立，準部大擾亂。時兆惠以巴里坤援軍，所向無前，窮追至哈薩克，阿睦逃至俄境，患痘死，清廷索其尸。因準部屢叛，窮搜谷壤，把這一種族人全殺光了。往往一部數千百戶，以次騈戮，或既降內移，中道變

殺，眞是可憐，也足見清人殘忍的性格，結果是奄有了西北廣大的疆土。

回部是在新疆天山南路，漢書所謂西域三十六國是也。原來龜玆于闐一帶佛教最盛，唐代伊斯蘭教由阿刺伯傳入，回回部人首先信仰，後來就叫做回教了。明季纔有阿刺伯人作回酋，徒衆漸盛。元朝的後裔逐衰弱，都被準噶爾遷往伊犂，準部令回酋民督民墾地輸稅。乾隆中，準部內亂，被滅於清，回人圖自立，大和卓木（教長意）欲受清約束，其弟小和卓木不可，聚衆戒嚴。清廷命雅爾哈善征之，圍庫車，不設備，和卓木兄弟逸去。詔誅雅爾哈善，命兆惠移師而南，以兵少被圍。及援師至，乃大舉攻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和卓木兄弟知不能敵，逃巴達克山，爲其人擒斬以獻。這是乾隆二十四年的事。清廷派參贊大臣駐喀爾噶爾，節制南路諸城，仍以阿奇木伯克理回務，蠲苛省斂，與民更始。每年只采玉進貢，從此新疆全歸中國版圖了。世傳乾隆帝用兵回疆是爲要看看小和卓木的香妃（體有異香），及掠歸京師，香妃抗節不屈，爲太后賜死。這都是委巷之談。其實香妃入宮，在回疆平定前一年，直到五十三歲纔死，侍帝三十年，東陵有其遺像，西洋名畫家郎世寧爲他們繪過行樂圖，可見乾隆帝是得意極了。

平定準回，得地二萬餘里，可以說是開疆拓土，雖勞費而有所收穫。若平定大小金川，只不過是鎭攝幾個土司，以蕞爾之地，方不滿千里，人不滿三萬戶，用兵三次，誅三大臣。（大學士訥親，四川總督張廣泗及阿爾泰）從乾隆十二年到十四年，始以岳鍾琪的餘威，爲寬大之受降；從乾隆三十六年到三十九年，始以阿桂明亮的銳師，攻克大小金川，並獻俘京師。然而

木果木之敗，將軍溫福中鎗死，全軍潰散，暮氣已深，首尾七年，費帑七千萬兩，比平定準回所用的三千餘萬兩，加了一倍，這是爲的什麼？這兩地都是大渡河的上游，萬山叢矗，中邊洶溪，皮船笮橋，曲通一線，番民以石築碉，大小林立，難攻易守。張廣泗以碉逼碉的戰法，雖未得成功，然後來步步立柵自護，以大礮轟擊，或繞道夾攻，分路各進，直搗巢穴，如同治年間席寶田之所謂「鵰剿」者，其大意都相同。從此中國始知山碉設險之利，湖南制苗，滇邊制猓，蜀制生番，川陝制教匪，以及最近江西制紅軍，都是仿用這種法子，可說是無形的收穫。

至於降緬甸安南廓爾喀，全然是掩耳盜鈴，自己打了大敗仗，人家怕兵連禍結，朝貢受封，含糊了事而已。緬甸之役，先就自壞邊防，無端把中國人所開的茂隆銀廠主人吳尚賢幽死，又把桂王遺官所據的波龍銀廠桂家部長宮裏雁正法，緬甸人說：『吳宮若在，豈有邊患？』可見邊吏僨事之由。乾隆三十至三十四年，兵敗失地，明瑞將大軍深入，距阿瓦僅七十里，以失道糧匱，力盡自縊。傅恆阿桂雖三路大捷，只一老官屯尚攻不下，傅恆回朝，憂恚而死，阿桂褫職，再出備邊，直到五十三年緬甸國衰，纔款關入貢罷了。安南之役，初令兩廣總督孫士毅爲黎氏興復仇之師，（明初滅安南，設交趾布政司，爲黎氏所據，建大越國。康熙初，黎氏請封，乾隆晚葉，爲阮氏所篡據。）抵河內，安故主，乃爲阮文惠所乘，大敗而還。福康安繼往督師，未經一戰，阮氏自動請降，受封爲安南國王。並於乾隆五十五年來京祝壽。

就在這個時候，廓爾喀興兵入藏，唐古特不能禦，清派侍衛巴忠等援之，未交一戰，即講停賠和。不敢奏聞，歲幣又爽約，以致次年廓兵再舉，大掠札什倫布，全藏大震。福康安率軍深入敵境七百餘里，氣驕無謀，「擁肩輿，揮羽扇，」儼然以諸葛武侯自比，結果吃了敗仗，死傷甚衆。幸而廓爾喀求援在印度之英人，印度總督 Marquis Cornwallis 主張調停，使者未出，廓人已乞和，遂班師。乾隆末年，用兵輒以福康安為師，福為傅恆子，恃寵奢汰，無才無武，惟恃勇將海蘭察以為助。或者說他就是乾隆帝的兒子，乃私通傅妻而生，欲借此以封王而已。可是軍紀士氣，都敗壞在他一人手裏了。

所謂「十全大武揚」者，不過如此而已，只有平準回之役是值得稱贊的，但也是三朝用兵的結果。清朝憑藉中國幾千年來的餘威，賓服了中亞哈薩克，布魯特，敖罕，巴達克山，及阿富汗；降服了朝鮮，安南，緬甸，尼泊爾；不丹，哲孟雄，也附帶入貢；琉球，暹羅更聞風來朝。琉球從明代就是屬國，暹羅在乾隆時中國人鄭昭新建王朝，納款祖邦，被封為王。現在改名泰國，和暴日聯合在一起，睥睨我們，真是數典忘祖了。清朝既具此種規模，遂造成亞洲無比的大帝國。

第三節　鉗制政策下之學術

康雍乾三朝不僅政治武極功盛，而學術亦甚為可觀。考據之學，風靡一世，當時號稱漢

學。曾國藩說：『乾隆中葉，海內魁碩奇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號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實這種學術風氣，並非起自乾隆中葉，但以乾嘉爲最盛的時候，可以籠罩有清一代，有些人比之爲歐洲的文藝復興，因爲二者都是以復古而求解放的。假如我們把清代學術，整個的加以觀察評述，則漢學復興之說，還不算是篤論。梁任公說：『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捲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見飲冰室集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這幾句話把清學的特色完全表示出來了。但一般人或者不明白怎樣是「倒捲而繅演之」？原來中國學術從周秦諸子而演爲漢唐經學，又由佛老影響而演爲宋明理學，經學分今文古文兩派，理學分程朱陸王兩派，到淸代作了一次的倒演，爲中國學術結一筆總帳。換句話說，就是把中國學術都重新整理一番。我們看清初學者因明末王學空疏的反動，推崇朱子，講求讀書傳注之學，文學家也極力規摹廣宋的古文，這可以說是由明反宋及唐。因爲要通經致用，而「漢儒去宋未遠，有法家，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之竹帛，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以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惠棟說）。由此纔成立了「凡漢皆好」的漢學。這可以說由唐宋以反於東漢。漢學是以校勘考據爲基礎的，而戴震一派，精於斷制，常州一派，脫落名物，同時經學有關的學科，如小學，史學，天算學，律歷學，地理學，音韻學，金石學，目錄學等無不講求，因

之而發達，雖稍軼出漢學訓詁的範圍，但解經求是，以微言大義爲歸，仍然是西漢的家法。這可以說東漢以反於西漢。晚淸以追根究底欲研究孔孟經學的眞面目，更不能不研究和孔孟同時的諸子之學。這可以說出兩漢復反於先秦。步步上溯，層層抽剝，不特漢學「如日中天」，而整個中國學術，也倒捲纍演一下，呈現出燦爛的奇觀，這究竟是什麼原故呢？

在歷史演進中有一種辯證法的公例：古聖相承，九流雜出，產生孔子中庸之合。「經」「理」兩端，漢宋疊乘，產生淸學的復古之果。就學術本身上看，明代就有這種趨勢，前後七子使學者無讀唐以後書，規摹漢唐，力詆宋學，不就是先河麼？在明朝晚葉，已經有讀古書識古字的說文音韻之學發生了，顧炎武始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而淸初大儒都受這種風氣的影響，極力反對「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狂禪」，欲矯正其弊。再加以西洋科學輸入的關係，天算地理都能幫助解釋古經，旁通子史，所以經學能夠發達起來，大都是時會造成的。

除此還有一種重要的時會因緣：就是淸人因民族思想的關係，一方面牢籠士大夫，用利祿誘惑，制義束縛，特科羅致；一方面又壓迫讀書人，禁止集會結社，挑剔字句，屢興大獄，學者在異族的政治鈐制政策下，不甘心作無恥的應聲蟲，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黨，乃至研究學問，也不能自由發揮思想，以免橫攖文網，遭受屠戮；如不「尙友古人」，「明哲保身」，還有什麼辦法呢？故不得已纔向書本上用功夫，以爲藏身在故紙堆中，可以「與世無患，與人無爭」。却不料會引起學術的新風氣，使逐步走上考據之途，而古學反賴以昌明了。積久成習，不但

「才智之士以此爲好尙，相與淬礪精進」；就是一般人也「希聲附和，以不獲廁於其林爲恥」。於是「家家許鄭，人人賈馬」。至嘉慶時代，書肆中風行經解說文輯佚一類的書籍，理學書幾乎無人過問了。奇特之士，既不屑於以科學求仕進，制義文對於他們的影響很少，而科舉試場中，反受了他們的影響，有以緯書及汲冢書穆天子傳等入文者，輒獲上選，黠者反爲撰典故，以愚試官，試官欲避空疏之誚，也不敢過問。（譬如晚清時代，蔡元培以周秦諸子典故作制義，竟獲聯捷，選入翰林院，時人謂之怪八股。然房官推薦，闈墨選刻，一時摹仿得售者很多。乾嘉時代之漢學，當然也是一樣。）可見風氣既成，人莫敢逆，潮流所屆，舉世歸心。他們究竟對於學術上有什麽貢獻呢？綜合起來，不外三點：

（一）整理古籍的成績　清代學者以經書爲研究之中心，所以對於十三經莫不有相當之整理，阮王兩氏皇清經解，所收入作者百五十七家，爲書三百八十九種，二千七百二十七卷，未收入及續出者尙不在內。這可算是自古未有的盛業。他們怎樣去研究經書，而傳出新的義疏呢？戴震曾言：『經以載道，明道爲詞，成詞者字也。學者先由字通其詞，由詞以求其道。予自十七歲志於聞道，謂非求之六經，不得孔孟之眞，非從事於字義無以通其制度名物語言，爲之拮据數十年，灼然而知古今治亂之源。謂宋儒之譏訓詁，輕語言文字，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所以明學家有欲通經訓，先就小學的逆說，是讀書必先識字的意思。而「讀書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音韵學又以小學爲附庸，故清代對於爾雅一

類的字義書，說文一類的字形書，以及古韻的研研，都是工作的重心所在。又因爲好古敏古，遂用校勘的方法整理古書，用輯佚的方法來發現古書，使後輩讀古書者可以省無限精力，也獲得不少的新資料。康熙間購求遺書之令，和乾隆間纂輯四庫全書，對此均有很大的鼓勵。其範圍又不僅限於經書，史書之改作與補作，校勘與注釋，方志與譜諜之普遍纂修，子集兩部之輯補校注，皆爲清人最大之貢獻。阮元序經義述聞說：『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這幾句話，最能把清人對於古學的成績完全表現出來！

（二）實事求是的精神　西洋人說科學的目的，在於探求眞理，我們的先儒也說治學要「實事求是」。如辛稼軒詩：「是是非非好讀書，莫將名實自相誣！」王陽明：「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菴書）又說：『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豈以一時之毀譽而動其心哉？』（與陸元靜書）清代學者確有此種精神。葉德輝論經學，說：『顧炎武實事求是，遂開東南漢學之先，論一代之儒宗，當以炎武爲不祧之祖。』我們且不談炎武的爲人是如何的剛正，就治學說一點來說，他是「凡文之不關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李二曲是他極要好的朋友，再三求爲其母親作傳，因爲「無關經

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他說：『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眞可爲一代的開山。於是閻若璩辨僞書，胡渭辨易圖，毛奇齡疑禮，姚際恆疑經，都是求心而非，雖言託孔子，不敢以爲是的精神。至戴震爲清學之代表人物，其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君子務在聞道也。』明道聞道，都是求眞理的意思，爲求眞理須力避傳統的束縛和私見的蒙蔽，不循情感，不計利害，這種認眞不苟的態度，專心一致的精神，不爲無益害有益的無病呻吟，而惟求學以經世之明辨是非，這就是清儒對於治學的精神上之貢獻了！

（三）歸納科學的方法　他們怎樣去求眞求是呢？只憑空想是不成的。朱子以格物致知，頗近似於科學的方法。陽明格竹七日，便因勞致疾，他是不懂得方法，所以雖有治學的精神而無科學的貢獻。清代學者，如顧炎武「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類，有得卽錄」，故日知錄：『自修史而外，凡國家政治，大而典禮財賦，小而館舍郵亭，無不疏通其源流，考論其得失，至於風俗之壞，世教之陵遲，則陳古諷今，尤三太息！』他一生漫遊各地，所至阨塞名山巨鎭寺廟伽藍之跡，無不蒐求考證，所以他著書列本證旁證二條，曲通博引，饒有近代科學的精神。這種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的態度，以施之於一身以及天下國家，頗和近代由觀察實證而得其因果，成爲系統的科

學方法相類似，古人所謂「由博反約」，也是歸納法的意思。清人治學，以亭林引其端，而日趨於繁密，所以能「辨名析物，梳文櫛字，剌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因為他們既注重實證，就必須用歸納法以求得其眞理，絕不能以孤證為足，盲從為是。戴震說：『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就可見一班了。『若夫依於博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這都是「失不知為不知」之意，清儒是引以為戒的。所以信則傳信，疑則闕疑，精覈縝密，一字不苟，胡適清代學者治學的方法，可以參考。後來焦循說：『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與劉端臨書）他從實證歸納而至於貫通運用，可謂更進一步了！「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多識於己而又思以通之於人」，這不是歸納演繹並用麼？清學至此，纔可以說「前無古人」。

以上三點，乃由互相的關係而產生，因為用推理歸納的方法，具求是求眞的精神，纔能有偉大成績的貢獻。他們既不偏執於一端，「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藉着思慮以推己及人，而得一貫之全，眞可以盡科學之能事了。可惜清儒最精詣的地方，未能實施於一般社會，而只在故紙堆裏來盤旋，以經義訓詁掩蔽了一切，買櫝還珠，日趨於瑣碎支離，貽餖飣補苴之譏。

誠如章實齋所云：『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爲學，是猶指秫黍以爲酒也。』他們最初又何嘗不知道治學問是爲的明道救世！但欲灼知古今治亂之源，非由字通詞，由詞通義不可，猶之乎渡江河必賴於舟楫，原意也是不錯的。但後來只在字與詞裏「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簡直是只籌舟而不渡江河了。顏習齋說：『書之文字固載道，而文字不是道；猶車載人，車豈是人？』又說：『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可謂學琴乎？更有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譜果琴乎』？漢學家大有謂車爲人，謂譜爲琴的氣味，學問只弄得半截，而風氣却靡漫一世，使聰明才智之士，疲精瘁神於經傳小學，忘其祖宗不得已之苦心，政治經濟，無正指導之人，貪庸當道，亂階由此醞釀。此皆專治古學不問時事者爲厲之階。甚至後來孫鼎臣作畚塘芻論，左宗棠作吾學錄序，都痛詆漢學，謂其致太平軍之亂，其言雖稍偏激，但漢學家不特忘記了治學的目的，而且忘記了學行一致的精神，加重文人無行的罪惡，狂蕩恣肆，受人詬病也是當然的。然而民國以後，竟有人揚其餘波，號曰「新漢學」；近年復有「新理學」的反動出來，都可以休矣。

清中葉以前，學術由明末的反動而至於漢學的鼎盛，其中人物和流派，也應該略說一下：順康時代有名的學者，大都是明朝遺民。而顧炎武（亭林崐山人）蔚然爲一代冠冕。亭林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開清人窮經之先路，著音學五書，饒有近代科學的精神，但這還不足以盡

其學，曾國藩說：『吾讀其書，言及禮樂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蓋亭林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所著日知錄以經術治道博聞爲三篇，謂：『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濟斯世於治古之隆。』他確實是一個經世學家，乃近代講經世學者不祧之宗。同時閻若璩（百詩淮安人）攻古文，胡渭（朏明德清人）辨圖書，毛奇齡（大可蕭山人）精易傳，姚際恆（立方休寧人）考僞書，懷疑之精神特強，足以振起學者求知的觀念。別派有顧祖禹（景范無錫人）黃儀（子鴻常熟人）之治地理，梅文鼎（定九宣城人）王錫闡（寅旭吳江人）之治天算，而黃宗羲（梨洲餘姚人）萬斯同（季野鄞縣人）等治史學，開浙東學派之端緒，其致用之精神，可以與亭林並稱。理學家如王夫之（船山衡陽人）推尊張載，其論史闡經，均有獨到之處；呂留良陸世儀（桴亭太倉人）陸隴其（稼書平湖人）張履祥（考夫桐鄉人）張爾岐（稷若濟陽人）李光地（晉卿安溪人）等推尊程朱，各有造詣。孫奇逢（啓泰容城人）李顒（二曲盩厔人）雖宗姚江，然重實用履踐，切己反躬，也和明人不同。尤以顏元（習齋博野人）李塨（恕谷蠡縣人）一派，異軍突起，反對漢宋之學，力倡習行主義，以四存（存學，存治，存人，存性。）三物（即周禮鄉三物：六德，六行，六藝也。）爲歸，具有明道救世之精神，是周孔實學的發揮者。朱之瑜（舜水餘姚人）逃避海外，劉獻廷（繼莊大興人）隱居修史，思想均與此派接近，惟不如顏李之澈底耳。文學家如甯都三魏，（祥，禧，禮。）易堂九子，（三魏及李騰蛟，彭士望，邱維屏，林時益，彭任，曾燦。）侯（方域）汪（琬）姜（宸

英）邵（長蘅）都宗法唐宋古文，陳（維崧）吳（綺）章（藻功）吳（兆騫）都規摹六朝駢文。江左三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南施（閏章）北宋（琬）都長於詩歌，而朱（彝尊）的博雅，王（士禎）以神韻，主盟壇坫者且數十年。孔尚任洪昇之傳奇，吳敬梓蒲松齡之小說，金人瑞何焯之書評，彭貽孫尤侗之雜纂，均有可稱，方苞開桐城派之先聲，然見輕於李紱，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是嶺南的宗匠，而尤重於氣節。其餘名家，多不勝數，要皆為明學反動之產物，而以讀書躬行為能事的。

這時期的人，雖重在批評破壞，也不是沒有創造建設，可惜有體有用的經世學說未曾傳續下去，雍乾以後學者，為明哲保身，纔只發揚他們的讀書明經之一點功力，而走入漢學的鼎盛時代了。清初最惡門戶方隅之見，常互相為師友的，到後來竟分作吳皖兩派：吳派始惠棟（定宇元和人），其祖周惕，父士奇，三世治經，恪宗漢儒。弟子江聲（叔澐吳縣人）余蕭客（古農吳縣人）承之，王鳴盛（西莊嘉定人）錢大昕（竹汀嘉定人）汪中（容甫揚州人）劉台拱（端臨寶應人）江藩（子屏甘泉人）等衍其說，而漢學纔有堅固的壁壘。藩著師承記，退顧黃於卷末，葉德輝謂其蜉蚍撼大樹，但墨守家法，就是這一派的特色。皖派始戴震，（東原休甯人）『分析條理，參嚴密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章炳麟情儒語）由好古近而為精核（由信古近而為斷制，其弟子段玉裁（懋堂金壇人）王念孫（懷祖高郵人）斷之，益樹考據之精神，確立治學之方法。同輩有金榜（蘂中歙縣人）程瑤田（易疇歙縣人）盧文弨（召弓餘

姚人）等，從學者有任大椿（幼植興化人）孔廣森（㢲軒曲阜人）凌廷堪（次中海州人）等，而王裁念孫及子引之（伯申）尤能光大其學，世稱戴段二王。這一派的特色，是不為漢學所拘，惟以求眞是為歸。東原由訓詁以言義理，實為一大思想家，曾國藩也說：『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夐乎不可幾已。』所以他們是清學的代表，較惠派更高一籌。同時陽湖孫星衍（淵如）疏今古文，卓然為名師勁旅，張惠言（皋文）專精易禮，皆惠氏之別派。而焦循（里堂甘泉人）以經學兼思想家，則戴震後一人而已。達官如紀昀（曉嵐獻縣人）王昶（德甫清浦人）畢沅（秋帆鎮洋人）朱筠（竹君大興人）阮元（雲台儀徵人）等又羽翼其間。曉嵐一生精力，全在四庫提要，謂古今著述已備，後人總不出古人的範圍，故不自著書，文亦不存稿。雲臺立學海堂於粵，詁經書院於浙，沿宗風者幾遍各省，其提倡之功最大。經學以外，文學則有桐城陽湖二派：桐城由方苞一傳為劉大櫆，（海峯）再傳為姚鼐，（姬傳）分義理詞章考據為學問三途，天下翕然推為正宗。陽湖張惠言又不僅以文學見長，惲敬（子居）亦泛濫百家，都是受桐城派的義法而稍變其體罷了。理學極衰微不振，但史學却有幾個特殊人物：顧棟高（震滄無錫人）之春秋大事表，秦蕙田（味經金匱人）之五禮通考，齊召南（次風天台人）之水道提綱帝王年表，全祖望（謝山鄞縣人）之鮚埼亭集宋元學案，催述（東壁大名人）之考信錄，邵晉涵（二雲餘姚人）之輯補舊五代史，王鳴盛（西莊嘉定人）之十七史商榷，趙翼（甌北陽湖人）之廿二史劄記，洪亮吉（北江陽湖人）之補疆域志，梁玉繩（曜北錢塘人）之史記志疑，

翁方綱（覃溪大興人）之兩漢金石文字記等，均有相當貢獻。尤以章學誠（實齋會稽人）的方志學及文史通義，發揮史學義蘊，見解較劉知幾更爲精透，所言六經皆政典，聖王經世，皆所以爲史，及撰記藏往知來，圓神方智之說，都可謂前無古人。而以歷史哲學的眼光，批評漢學家之襞績補苴，未能盡學問的能事，眞是一針見血，有功世道。像袁枚（子才上元人）那樣的詩人，寄情山水，何能和他相比！無怪乎被被他罵得一文不值了。

第四節　清運之漸衰

當乾隆文治武功學術都達到極盛的時候，而衰弱的朕兆也見端了，所謂「日中則昃」，原是一種公例。因爲滿而不溢，高而不顚，剛柔相濟，執兩用中，古聖教人持盈保泰的工夫，最爲難能，何況乾隆帝又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呢？和珅以二十年的宰輔，惟知聚斂自豐，朝臣疆吏，輦貨權門，結爲奧援，雖大獄屢興，而吏治益壞，上下征利，貪黷成風，一般老百姓，皆蹙額興嘆」。（尹壯圖奏語）及嘉慶四年，上皇崩逝，御史廣興王念孫等劾之，立即抄辦賜死。他的家產，估計竟有八萬萬兩，比較全國二十年歲收之半額還多，眞是駭人聽聞。薛福成說：「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爲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可見政府領袖的行爲，對於政治影響之大，清室國運，都敗壞在和珅一人之手。高宗明知他是一個俳優弄臣，而偏要信用他，實不可解，這只能說諂媚取悅的人，生就有一種魔手，攻入人類弱點，使之循情而不自

覺。但國家因此衰亂，遂悖了「一事不謹卽貽四海之憂」的祖訓，不知康熙帝冥冥中如何的痛心哩！朝內一個和珅把政治弄壞了，朝外又有個福康安把軍事弄壞了。乾隆末葉用兵，全是暮氣，很少勝仗，爲什麼呢？因爲八旗兵自入關以後，習於奢靡，戰鬭力早就不行了，三藩亂時，他們一聽到吳三桂進兵的消息，膽戰心驚，把大砲埋在土中，先行退却。堅閉營壘，頓兵不戰。（見嘯亭雜錄）幸而一般漢奸領的綠營兵賣氣力，纔把三藩打平。康熙帝說：『自古漢人之叛亂，俱以漢兵勦平，豈待滿兵之助耶？』這樣以漢攻漢的策略，簡直昭然若揭。其實不但三藩是漢奸征勦的，卽流寇和南明三王的覆滅，又何嘗不是漢奸之力！嘉慶初年，勒保奏：『健銳火器兩營京兵，不習勞苦，不受約束，征勦多不得力，請撤回無庸續調！』可見旗兵已全不可用。而各省常備的綠營兵，也因屢次征調，治軍無人，將領奢侈，糧可侵餉，弄得腐敗不堪！福康安專征二十年，以外戚邀功，實爲罪魁禍首。他到處婪索財帛，每日羅食珍異，並無功勳，但糜巨餉，軍紀爲之蕩然。乾隆帝又爲什麼信用他？據說福是帝的私生子。總而言之：徇私情而蔑公理！政治焉得不壞呢？況且財政經雍正帝整理以後，年有餘帑，戶部輒存七八千萬兩。乾隆用兵，共用去一萬二千萬兩以上，當時歲收僅三四千萬兩，但仍有餘裕。他却無端增加六萬名兵額，每年添餉三百萬。大學士阿桂深以爲憂，他全不管。戶部尚書梁詩正請他節儉，他反鋪張揚厲，興工建園，開宴邪遊，南巡東幸，縱慾敗度，結果是民窮財盡，「官逼民反」，而天下大亂了。

這時中國受清族一百五十餘年的統制，中層社會業已貼服，下級社會發生反動。反動力量都聚集在兩種祕密結合的團體裏：一是天地會，一是白蓮教。天地會起源在閩海，盛行於南方，是正當的革命運動，具有政治之目的。白蓮教發生在元末，盛行於北方，是迷信的反抗運動，具有宗教之性質。各有羣衆，不相爲謀，前者對於民族革命的貢獻極大，後者對於民族革命的惡果很多，但是乘滿清衰運降臨的時候，首先予以流寇式的擾亂打擊者，則爲白蓮教。白蓮教是佛教的支流下乘，以彌勒佛轉世惑人。在明朝永樂間，蒲台女子唐賽兒曾假以舉兵，天啓間，鉅野徐鴻儒和薊州王森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二百萬，都未成事。可見他們只是一種邪教，沒有什麼主義組織的。及至乾隆晚葉，人口增加很多，官吏貪墨益甚，民不聊生，疾苦思亂，王倫以清水教爲名，佔據臨清，一月而平。甚時劉松爲白蓮教首領，以符咒治病，運氣祈禱，號召遠近，後被發遣戍。其徒劉之協等分赴川陝湖北一帶傳教，他們多少染一點民族色彩，乃假託明裔朱姓，而有牛八掌教之言。當時因征勦湖南叛苗，牽動了七省的兵糧，而白蓮教案又在河南湖北兩省窮治擾累，於是他們就公開以「官逼民反」來起兵了。嘉慶元年初據湖北西半部及川邊豫南，襄陽有幾萬黨徒，除劉之協外，以姚之富齊王氏（齊林妻）爲首領。四川達州一帶的國匪和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祿等也響應起來。這就是官書所謂之「川楚教匪」。二年湖北教徒，由豫而陝而川，兩派會合，勢力大張。清兵分道要截，並無效果。其主力復由川回鄂，往還蹂躪幾千里。三年，纔以明亮德楞泰的勁兵健馬把姚之富齊王氏一股撲滅。但餘黨

散處陝西境內。川黨叫饒保甯，東陷長壽，勢獨張，勒保總統諸軍，未嘗有尺寸功，始誘擒王三槐，張皇入奏。這時和珅適用事，稽壓軍報，掩敗爲功，及其伏誅，嘉慶帝纔整頓軍旅，實行堅壁淸野之策，獎勵鄉勇，寬赦脅從，以明亮代勒保，軍事始稍有轉機。額勒登保一軍戰功較著，殺冷天祿於岳池。四年代爲總統，將帥無功者，多受嚴懲。登保逼教黨於川北，冉天元一股最強，擾川西至江油，與德楞泰血戰五日，被擒。時淸兵雲集潼川，又堡寨險固，鄉勇勁悍，教黨乃犇趨川東，而後起首領如苟文明等，皆馳突於川楚豫陝隴諸省，至八年始依次蕩平。劉之協也在葉縣被獲，教主云亡，劫運已盡。擾攘五省十年，人民流離轉徙，苦於脅迫，不得不練鄉勇，築堡寨以自衞。而東鄉羅思舉桂涵都是些無賴劇盜，以鄉勇出身，奮擊有功，擢至總兵提督。這次變亂，多靠他們的力量來戡定，但待遇微薄，形同乞丐，嚴如煜鄉兵行說：『鄉中豪俠子，亡命身未死，乘時得入驃騎營，誓取功名如折矢。黃巾十萬勢洶洶，來壓軍們雲不動。鄉兵憤怒火出鼻，大呼陷陣萬夫辟，頃刻驅狼若驅羊，諸軍鼓躁踵相繼。十年百戰掃攙槍，兩手依舊空男子！』又說：『老林百日無完衣，肘見踵决血流腓，殺賊要鄉勇，受賞偏說冊無名。十年凱撤人已老，欲補新兵糧額少，賞金多被領袖扣，區區微勞誰見收？』人類竟有這多爲異族賣死力的可憐傻瓜，可見君尊臣卑的愚民政策發生了很大的效果！

但天地會的革命黨人總比較聰明些，爲民族而流血，死也值得。他們在台灣四次舉義失敗，不得不向內地去宣傳，東南各省，遍佈了他們的勢力。江西胡秉耀（東華錄作輝恐誤）鍾

體剛途乘沿海寇亂，寧陝兵變以後，聯絡同黨，在奉新進賢崇義一帶起義，以積善禪林爲大本營，奉朱毛里爲後明主，年號妟朝，到處散播天地會的詩句腰牌陣圖，加入的人很不少。可惜被江西巡撫阮元於編查保甲時發覺，派兵會攻，胡秉耀等均被擒獲，凌遲處死，同黨被殺者有程麟祥曾化龍等七十餘人。毛里逃亡。胡臨刑謂劊子說：『我以爲一刀舉起，則人頭落地，今乃煩你們數十刀嗎？』過幾天，阮元接到一封信，內爲胡在獄中所作的四首詩說：

能解春秋有幾人？漫將劉備作黃巾！讀書怕見東林傳，爲有儒生入貳臣。

南渡詞臣說彥章，筆鋒能抑亦能揚，爲憐未解金人禍，草制徒工殺李綱。

幾多豪傑輔元胡，富貴人生不可無，論古且看明代史，因何文廟貶姚樞！

讀書萬卷桑維翰，五代雄才有幾人？惟向胡兒輕屈節，何如邯邑鐵將軍！

民族思想，忠義氣節，躍然紙上，阮氏只說句：「這人還懂得文字」？不知心裏頭究作何種感想？「此曹豈云不讀書，真是未明大義耳」，到後來連曾國藩都尚不免受同族自陷之譏，何況阮元呢？誠如胡秉耀所謂：「能解春秋有幾人」？這可以和呂留良之說並傳不朽矣。民族革命運動此仆彼興，至道光末年，纔又如荼如火的起來！

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沒有一天得安生。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教亂方張之時，東南海寇復猖獗，擾攘閩浙，其渠蔡牽朱濆輩，縱橫一時，僅賴李長庚的「霆船」，至十五年纔勉強戡定。未二年又有天理教之變。天理教乃白蓮教的餘支，滑縣李文成，大興林淸爲之魁。以

其經文有「專等北水歸漢帝，大地乾坤只一轉」，及「二八中秋，黃花落地」之語，約於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舉事。滑令強克捷偵知，捕文成，其常遂先期起據滑縣，直隸之東明長垣，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響應，有衆數萬。林淸結內監爲引導，直攻宮禁，已入隆宗門，因人數不多，爲禁旅圍殲。時帝謁東陵自白澗回京，下詔罪己。派那彥成攻滑，勦教黨的名將楊遇春楊芳助之。文成突圍入輝縣司寨，寨破自焚死，徒黨先後被殺者二萬餘人。同時又有陝西岐三才峽木箱工人之變，推萬五尤九爲首，一年始平。及二十二三年，雲南臨安邊夷高羅衣及從子老五，僭稱窩泥王，均數月而平。其餘零星的白蓮教和天地會黨人舉事，還時有所聞。可見淸室衰運已呈，內外交迫的時候快要來臨了。

第四章　近代之社會與經濟

第一節　政治社會之組織及其寄生者——士大夫階級

中國社會在大圈子裏看，二千多年好像沒有什麼變化，在小圈子上看，則每一時代都各有它的特色。所謂大圈者，如社會組織的級層，人民生活的方式，生產事業的工具，文化形成的素質。我國一向是農業宗法社會，人民習於勤苦守舊的生活，以孝友來維持彼此間的關係。所謂小圈者，如統治階級的屬性，經濟重心的移轉，民俗士習的好向，學術政治的影響，都是自成規摹，衍為風氣。然而小圈總不免受大圈的支配，大圈雖也因小圈而演變，但究竟很少。可是自西洋文化傳入以後，另一個大圈子的力量加乎我們之上，逼得我們不能不變質，近百年來一切的紛紜改革，多災多難，均由於此，這是後期的事情。前期約二百年間，雖已受西化之影響，然其力不強，固無礙於中國社會和人民生息的大體。所以我們描述這一階段的情況，不啻為中國社會史作一次結算。

清初的統治階級，在表面上是所謂異族的「旗閥」。太祖所定八旗主共議國政的封建制度，至太宗時已改為君主制，朝儀不得平列。順治親政，收多爾袞之正白旗，並原屬天子自將之正黃

鑲黃二旗爲上三旗，作爲侍衞親軍。下五旗諸王分領，已非關外宗藩世及之舊規，可以由朝廷隨意任命的。所以君主成爲一個積世的軍閥，親貴不過假天潢從龍之重，偶派以指揮禁旅，鎮懾雜軍而已。惟旗主各臣所屬，猶有定規。（見八旗通志典禮志）國事由議政王大臣裁決，諸王皆通兵略，植黨羽，納結士大夫，以邀聲譽，屬下爲官的，必勒令報效。自然也形成一種「旗閥」。雍正帝得位有些取巧，諸王臣屬，未盡貼服，乃盡量的呵譴誅戮，加以制裁，摧抑他們的權力，並以中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說壓之，不許於君主外，更以旗主爲主人，屬下人覲賀，必須由朝廷允許。改固山額眞（旗主意）之名，爲固山諳班，（管事意）加重都統的職權，直屬於朝廷，總攝旗內行政。諸王除享有包衣（包係清語「家」之意，衣係虛字「的」之意，如包衣佐領，即家的佐領，專爲諸王與台奴僕侍衞之用，本不成名辭，後乃用作職名。實則是一種賤役。）及俸餉外，一切不能過問。又禁止與朝士交往，向外官需索，甚至於上三旗和下五旗及各旗屬人私相往來，都要查出治罪。從此宗室衣帛食粟，養尊處優，隔絕氣類，學行能力都不長進，成一種匏瓜的樣兒了。天子一人擅威福之柄，極主權之尊，居然達到專制政體的最高峯，這是政治上的一種進步，由封建而進爲君權，雖然變更了祖制，但也能安定國本，必爲祖宗所贊許，假使不如此，則恃功驕盈的親貴，你爭我奪，怎麼能談到政治？又怎麼不鬧出亂子呢？清朝所以能享國之久，雍正帝實有莫大之關係。他又把議政的制度除去，設一個軍機處，完全由君主集權，即內閣爲歷代政府領袖的精神，也一掃無餘。可是他用那些

人來分職共治呢？却仍不外乎士大夫階級了。

古語說：「人主獨貴者其政平，不獨貴者則階級起。」封建制度的破壞，即由於獨貴而無階級，清朝的皇室王公，最初是自然的封建，後來有名無實，並未影響到中國的社會，而中國社會的士大夫階級，反能利用傳統的治權，和異族共天下，這也是中國文化的奇蹟。其淵源應追溯到唐代，從武后以文章選士，玄宗遂凝成科舉為全國人民出仕唯一之正途。這和六朝的門閥制度，魏周唐初的「關中本位政策」，迥然不同。（可參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清承明朝之後，雖制義仍用八股，而科舉為正途出身，和唐宋以來是一樣的。於是乎讀書人以做官為職業，儼然形成一種統治的士大夫階級，養成重文輕武的風習，使盔甃積功的武夫竟莫敢誰何！清代有對於文武生童待遇不平等的笑話，而鮑超以出死入生積功至一品提督反不如一個翰林學政尊貴的故事，就可想見中國社會的情形了。雖取士的內容，有應該改革的地方，如康雍乾三朝，都曾有人提議廢八股，改策論，終因清人束縛才智，牢籠士子的私心而不得行（康熙時黃璣，雍正時張廷玉，乾隆時鄂爾泰，三個人都主張維持舊制，鄂並有非不知八股為無用，特以牢籠人才，舍此莫屬的話。）然而取士的方式，畢竟是一種良好的制度，使有志上進的人，都可得一條出路，發展他們的政治慾，「學優則仕」「經世致用」，不以文章為點綴之品，而以「文章華國」為敲門磚。「宰相必用讀書人」成了傳統的觀念，「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成了一般的思想。「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們既有取得治權的正當方法，又何必冒

險來攘奪呢？

「天下英才，入吾彀中」，君主固可以太平無事；而「窗下十年，熬得人上」，一般文人也有了歸宿，在道理上講原來是不錯的。因爲只有智識纔能領導社會，用文化統治總比用武力統治好。古語說：「文可長治，武難久行。」文化統治要尙禮尙法，武力統治則恃威恃權，禮法有道理可循，威權感情用事，中國四千年來的傳統精神，是偏重於前者的。淸人適應中國社會的環境，維持科舉的制度，纔能控制漢人的情感，把滿人融化進去，毫無跡象。要不然的話，民族革命絕不會到二百六七十年以後纔得成功了。科舉制度以鄉試會試殿試爲三步驟，其實只有兩階：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在各直省鄉試，中式者爲舉人。辰戌丑未年在京師禮部會試，中式者曰貢士，天子親策於太和殿，曰殿試。分一二三等，叫做三甲：一甲只三人：俗稱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均不拘名額。舉人得候選內閣中書，各省教職，及大挑知縣。進士一甲一名授修撰，二三名授編修，二三甲再朝考選用庶吉士，都是翰林院官。餘則爲京官主事中書教習，外官知州推官知縣等。翰林爲什麽說是「淸華之選」？因爲他們接近內廷，可以替皇帝辦文墨，充考官，有不次之擢，容易爬上來。而京官外官，三年考績，一二等或卓異者，加級紀錄，或赴京引見，即予升轉。讀書人不但有事做，而且作大官也很快，只要你肯努力，確實有軌道可循的。譬如伊繼善以雍正元年成進士，四年纔由庶吉士（頗似現在的研究生）散館（三年學習期滿，考試畢業的意思）授編修。

（正七品頗似現在的助理研究員）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年遷侍講，（從五品頗似研究員）郎中，（正五品等於現在各部的司長）不久赴廣東查案，署按察使。（正三品頗似現在的高等法院院長或監察使）六年授內侍讀學士，署江蘇巡撫。（從二品即現在的省政府主席）七年署河道總督。（正二品頗似現在的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九年署兩江總督。（二品頗似現在的司令長官）此後叠任封疆，留京就作尚書。（一品即今部長）不到十年，就可以大用了。這算是「特別快車」，即令是平常的「通車」，只要不受處分，如被劾劣等；不遇阻礙，如丁憂守制；大約二十年，總可以位極人臣。我們繙一繙清代的名人傳，或宰輔錄，縉紳錄之類，有幾個達官不是科舉出身？這制度值得我們贊揚，國父列考試爲五權之一，不是很合國情麼？

統治階級的政府官吏，有內外之分，就是中央官和地方官：中央以內閣爲全國行政之總機關，設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冠以三殿（保和，文華，武英。）三閣，（文淵，東，體仁。）之名，襄贊君主，督率百僚，是政府的領袖，略如古之宰輔。但軍機處成立後，實權已爲所奪，不過職位仍極尊貴罷了。以下有學士，侍讀學士，侍讀，中書等官。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分理全國庶政，以尚書滿漢各一人掌之，內除戶部分十六司，刑部十八司外，餘均分四司，有郎中，員外郎，筆帖式等官。此外都察院司糾察諫言，頗似現在的監察院。有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給事中、監事御史、經歷、都事、科道等官。大理寺平反刑獄，頗似現在的最高法院。有寺卿、少卿、寺丞、評事等官。理藩院掌藩屬政令，設官同各部，頗似現在的蒙藏委員會。翰

林院頗像現在的研究院，制誥文史，以備顧問，有掌院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典簿，及庶吉士等。國子監頗像現在的大學，掌成均教育。有祭酒、司業、監丞、博士、典簿、助教、學正、學錄等。欽天監察天文，定氣朔，頗像現在的氣象局。有監正監副、五官正、靈台郎、監候、挈壺、司晨、主簿等。通政司，轉達內外奏章，有通政使、副使、參議、經歷、知事等。帝室的官廳，尚有內務府、詹事府、宗人府、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等。地方則十八省各有總督，（管二省或三省）巡撫、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學政，（或提學道）分掌兵政財刑教育之事。下分三級：曰道，設道員；曰府，設知府；曰縣，設知縣。直隸州廳與府同，州廳與縣同。各有僚屬。府州縣衙，又各有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學官，以掌地方教育，京師就是太學——國子監。這都是士大夫的迴翔之地，也就是他們施展懷抱的目的物了。

一般人讀書雖有官學義學或書院，但是很少，所以多就私塾從師，由州縣小考錄為童生。冊送學政，按臨科試，擇優入學，稱附學生員，俗稱之為秀才。本學教官，月科季考，冊報學政，歲考取優者食餼於官，曰廩膳生員，等於現在的官費生。次者為增廣生員，皆有定額。兩試優等，或食餼年久者，學政覆考送部廷試，在國子監肄業，稱貢生、監生，等於現在的大學生。凡生員都可以應鄉試，不是生員，就沒有報考的資格。中鄉試副榜者，可以升為貢生。或諸生有功者，亦可升入太學，或有功官員的子弟，也有奉旨特許為監生的。歲科考，及鄉會試

的制度，稱爲「掄才大典」，都非常嚴格。如舞弊被發覺，雖大臣也要論罪，重則正法，輕則遣戍。但清朝有時爲財政困難，或特殊的河工，兵事，急賑，往往賣官鬻爵，不論什麼人都可拿錢來買一個資格，從道員以下到雜佐，稱爲「捐班」。不能入學的，也可捐一個監生，去應鄉試。但生貢舉進的正途，三品以上的大官，是不能捐的。士子在入學以後，就可以穿藍袍，戴銀雀帽，免徭役，見官不跪，榮耀鄉里。若是能博得舉人進士的頭銜，眞所謂：「不浹辰而聞天下，四方觀聽，希其風采。」（見通典沈既濟語）到處受人尊敬，官吏餽贈儀，親友送厚禮，好像和尙「食方萬家」了。怎能不讓人醉心呢？王鳴盛的父親，每試不利，及其子貴爲光祿寺卿，已獲封銜，猶頂戴扶杖去考，督學乃其子同年，離座勸之，他說：「大丈夫奮志科名，當自得之，若藉兒輩福，遐日暴，我甚恥之。」這樣老而彌篤的精神，足見科舉的魔力如何了。

治學出仕，本來爲的是「明道救世」，但科舉做官却變爲士大夫階級的噉飯之地了。清朝的俸祿很薄：一品官每歲俸銀一百八十兩，至五品遞減二十五兩，爲八十兩。六品六十兩。七品四十五兩。八品四十兩。九品只三十餘兩。京官每銀一兩搭厥米五斗。乾隆二年以後加倍給與恩俸。若是自甘粗糲，僅糊一口，大約還不成問題，但中國是宗法社會，一個人做官，不曉得有多少親戚朋友同鄉作寄生蟲，區區薪俸，何能維持？只有靠「陋規」「賄賂」來調劑了。（康熙四十一年劉子章請裁節外官家口疏云：「臣見外在官員，除攜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

多至數百人甚至千餘人者，其赴任離任則有車馬盤纏之費，在任則有衣食家養之費，而本官已不勝其苦。當其入境出境，驛遞則有人夫迎送之苦，州縣則有中伙供應之苦，在任則行戶有官價市買之苦，小民有柴炭力役之苦，而地方更不勝其累。即本官蒞任之初，亦常思清廉自矢，仰報國恩，而居之數月，千百名口，嗷嗷待哺，不得已取之所屬以供之，一次滑手，漸至再三，久之則率以爲常而不顧，而素無操守者，又不知巧取何如，於是地方之官民大困矣。……伏祈嚴飭裁節，制爲定數：凡官員家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則督撫止帶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縣十五人。」就以這種限制而論，其數目也相當可觀了。）凡是經手錢糧的官吏，其陋規弊端甚多。如戶部（即財政部）奏銷有「部費」，一個書吏庫丁；都可腰纏累累。而河工、軍需、城工、賑恤諸事，則「講分頭」、題官、議敍、調缺以及辦理刑名諸事，則有「打點」「照應」「招呼」「斡旋」諸名目。所以吏兵工刑四部，也有相當的辦法，最可憐的是禮部。有人以富（戶）貴（吏）威（刑）武（兵）貧（禮）賤（工）六字擬六部，而戶最富禮獨貧。其餘翰林御史等文學建言之官，儲才養望之地，只有收門生的「贄敬」，賴學差的「棚規」，以及同年同鄉作外官的「冰炭敬」和「別敬」。倘使門生飛黃騰達，對老師特別照顧，做了幾年的外差，當過幾次的主考，一生還吃用不盡！如果清廉自守，則自然苦不堪言了，居官湫隘，少衣無車，借債度日，指差賒欠，見之於詩歌小說者甚多。但京官另有一種額外發財的機會，就是派往外省查案，盤費、供應、公費、程儀、規禮都是照例的，受賄還不在

內，所以出去一趟，往往可撈若干萬回來！這些錢都出在地方官身上，地方官那得如許的便費？其弊不問可知了。一個州縣官，每年幾十兩銀子的收入，用幾個管「刑名」「錢穀」「書記」「掛號」「徵比」的幕友，每人就得送束修數百兩至一二千兩，又沒有辦公費，怎麼辦呢？在錢糧上生法子加火耗，康熙帝說過：『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若纖毫無所取給，則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爲生？如州縣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但事實上火耗有加至一錢以上到四五錢的。雍正帝整飭吏治，令火耗歸公，給官吏養廉，總督多至一二萬兩，知縣也有二千兩上下，京官尙書侍郎三五千兩，其餘的作爲辦公費，把貪廉立出一個標準，又執嚴法以繩之，相當收到了政治清明的效果。然而州縣仍不夠用，又巧立「平餘」諸名色，而雜項陋規，逐年產生，彼此不同，數目很大。加以吏役爲爪牙，紳士作四股，無薪無俸，不得不勒索百姓，魚肉鄉里，積弊有不堪言者。所以俗語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依當時的糧價每石米約一兩上下，可以有十萬石米，值現在國幣約十萬萬元，眞是可觀。這還是廉吏，貪吏更不用說了；這還是知府，道員兩司督撫更不用說了。一般行政官尙如此，經手錢糧的關吏、鹽使、漕運、河督，更不用說了。因爲層層剝削，層層報効，所以互相包庇，互相容隱，新任索例規，替舊任彌虧空；上司索供應，替下屬隱罪惡。總而言之，都是薪俸不足「養廉」，貪污成了「陋規」。顧亭林說：『今日貪取之心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無以贍其家也。』這眞是非常痛心的話！以貪污爲政治之常經，一切政治成

績，還要問麼？「陞官發財」既爲士大夫階級「操奇計贏」之職業，所以有人拿錢捐官做，而仕途益濫，政治就更加汚濁了。倘若讀書未達，不得爲官，便去作紳士、書吏、幕友，也還是一套玩意兒。最倒霉的是作學官及塾師，吳鼐詩：「說起窮來眞是窮，一年餬口仗生童。」傅芝堂自嘲聯語：「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所以社會上稱之爲「豆腐官」，蓋謂只能吃豆腐也。鄭燮詩：「教書原來是下流，傍人門戶過春秋，半飢半飽淸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所以寒酸的教書匠，常常爲一般人取笑的資料。讀書高高在何處？然而一旦「靑雲直上」，就不免「得意忘形」了。儒林外史所描寫諷刺的，已可見一斑。「有官皆貪，無紳不劣」。是行政制度上造成的積因。不貪者：行無車馬（如陳瑸），死無殮資，（如于成龍）往往以此賈禍。（如王應辰及紅樓夢上之賈政）不劣者，務農經商，謝絕公門，大都不問外事。我們要知道：科舉制度雖是不錯，然而政治上的積弊，數百年來，始終是一樣的，這不應該澈底加以改革麼？

第二節　城鄉社會之組織

中國政治社會的組織，雖有其優良之特點，如科舉考績等制度，然而任事者多屬貪官汚吏，所以法治精神逐漸消失，一般都注重「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論。政治毫無積極的建設性質，只有消極的淸廉主義。岳武穆說：『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可

見宋朝已構成這樣的政治形態。推而上之，至於北宋王安石的變法，「欲大有爲以賞澤斯民」，還不免被司馬光一般人的「無爲贊」打擊下去；推而下之，至於康熙帝的盛治，還要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雍正帝倒是一個有爲之主，給養廉銀以維持生活，定辦公費以嚴禁攤派，所以「雍正時人人可爲清官」。（孫嘉淦語）如果他的政策能貫徹下去，中國政治的素質，或者可以變換一下，走入法治的道路。可惜他執政的時間較短，而乾隆帝又不能善承父業，以致仍回復原來的狀態，做官不必以能只需要廉。人民對於官吏，不希望他們「興利除弊」，只希望他們「兩袖清風」。除完糧與訟而外，最好是和官吏全無干係。中國社會基於這種消極的政治觀念，所以政府和人民截然爲兩事，國家和宗族也是不相調協的。人民以爲國家就是政府，故無愛國心；宗族是身命所託，故「保家先於保國」。如此，人民可以獲得很大的自由，政府也樂得太平無事。那末，人民自身究竟怎樣來維繫呢？那就全靠以宗法爲背景的鄉治了。

西洋是以市府積成的國家，中國是以宗族積成的國家，故西洋社會組織極緊湊，中國社會組織頗散漫，這也是商業國家和農業國家的必然結果。中國社會由宗族而聚爲鄉村，因爲生產事業的便利，各自成爲部落，借宗法的關係來實行「鄉自治」。城市不過是政府設治的地方，或工商業類聚的地方，在政治組織以外，仍屬自治的性質。政府對於城鄉自治的事業，雖有干涉之權，卻少干涉之實，法令規定，也都是因利就便而已。此種制度，從周秦以來，就有很好

的規模，年代久遠，變化頗多，但大體仍不甚懸殊。鄉村自治和保甲政策，在古代是同一淵源，到後來變成了兩種體制，而保甲時廢時興，有的地方行，有的地方不行。清代重視保甲，常頒法令，督促實行，幾乎和鄉治聯爲一體了。鄉的名稱，各處也不一致，玆例舉如下：

「鄉」、「里」、「區」、「社」、「坊」、「鎮」、「鋪」、「廂」、「集」、「圖」、「都」、「保」、「總」、「村」、「莊」、「營」、「圩」、「甲」、「牌」。

其有特殊情形之組織者，如「寨」「堡」「團」「卡房」等，彼此大小範圍，實未易判辨。大概都是「家」——「戶」或「人」的組合體，爲我國最下層社會的自治單位。其首領皆爲一鄉之耆紳，或一族之長老，公選而出，照例由地方政府承認的。否則，就是隨便叫一個人出首應官，實際上還另有主持者。名稱叫做：「某長」——如鄉、里、區、社、坊、鎮、鋪、廂、集、圖、都、保、村、圩、甲、卡、等；或「某頭」——如總、莊、牌等；或「某正」——如里、保等；或「某主」——如寨、等；或「某董」——如區、堡、團等；或「某總」——如營等。也有叫做「地方」的。因習慣相沿的關係，其組織之原則和情形大略如下：

（一）農村裏的各家，互相聯合，村設一長，間有合數村設一長，或一村設數長的。

（二）村長等是由族長兼任的居多。因爲一般農村多聚族而居，其族長不特有行政權，且有處決訴訟及私事之權。

(三)村之大小，多則百餘家，少則三五家，普通總是二三十家，依自然地勢，相依相集。

(四)村名隨一族之姓氏，或地主之姓氏。倘一村有數姓者，以大族之姓氏爲名，也有因地得名的。

(五)村與村鄉與鄉間都可以聯合編制，大約鄉鎮比較村莊大，堡寨比較鄉鎮大，其首領多爲有聲譽之智識份子及在鄉軍人。或者是取合議制。

鄉村自治所辦的事項，範圍很廣，無所不包，儼然像一個小國家。梁任公在中國文化史鄉治章中說：『鄉治之善者，往往與官府不相聞問，肅然自行其政教。其強有力者且能自全於亂世，盜賊汚吏，莫敢誰何！例如吾粵之花縣，在明末蓋爲番禺縣甌脫地，流賊起，其民築堡砦自衞，淸師入粵，固守不肯剃髮，不許官吏入境。每年應納官課，以上下兩忙前，輩齊置諸境上，吏臨境則交割焉。一切訟獄，皆自處理，帖然相安，直至康熙二十一年始納土示服，清廷特爲置縣曰花縣，斯可謂鄉自治之極效也已。』小注說：『此事官書不載，蓋有明遺老二人如田疇者爲之計劃主持。』其實這類的堡寨，在清初很多，四明山寨之王翊，卽爲最著者。河南登封之李際遇，汝寧之沈萬登，劉洪起，舞陽之李好，許州之韓甲第，湖北襄城之劉鉉等，也都是結寨自保的豪傑，但最後亦必「納土示服」。這是變亂時的特殊情形，並非平時一般的鄉治。平時一般的鄉治，以宗祠爲基礎的最多，梁先生縷述其鄉「茶坑」的自治情形很詳，大概

是本保會議曰「上祠堂」，聯保會議曰「上廟」，祠堂有値理，保長只應官。耆老會議以春秋二季行之，子弟一切罪行，皆可處理。自衛有鄉團，濬河出人工，娛樂則放燈，打醮，演戲，讀書則在祠堂設幾個蒙館。還有類似信用合作社的「江南會」，類似消費合作社的集體買賣。這雖是淸末的情形，但必爲相傳的舊規，國內倘所在多有，惟以南方各省，組織較爲嚴密，北方因種族經幾次的混合，就不免淡淡了，可是保甲和鄉約，乃似一似二的制度，淸廷實行保甲政策，遍於全國，始於順治，初爲總甲制，繼爲里甲制，皆十戶一甲，十甲一總，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在鄉曰里。康熙四十七年申令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戶給紙牌一張，「出則明注所往，入則稽其所來」，「無事遞相稽查，有事互相救應」。造册呈報，以稽戶口。乾隆二十二年，因爲『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乃日久玩生，類以市井無賴之徒承充保甲長』。諭令『士民公舉誠實識字及有身家之人充之，其一切戶婚、田土、催糧、拘犯等事，另設「地方」一名承值，至巡更看栅等役，民間以次輪充』。由此可見保甲最初的目的，正如嘉慶會典所謂：『稽其犯令作慝而報焉』。只是消極的偵察工作，所以自好者不爲，由市井無賴濫充。但「以士大夫治其鄉之事爲職，以民供事於官爲役」，（見皇朝文獻通考）以及「自城市達於鄉村，使相董率，遵約法，察姦宄，勸徵行，善則相共，罪則相及，以保安息之政」（見大淸會典）的制度，同時又在推行着。究竟是保甲還是鄉治呢？蓋淸廷視保甲爲鄉治，人民以鄉治括保甲，即梁任公所謂：『保長以應官，身分甚卑，不得列席耆老會議』者也。「地

方」也是一樣的。清人論保甲者很多，皆頗含混不清，其實如呂氏藍田鄉約，（宋呂大臨大防兄弟）的四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則保甲已在其中。清廷對鄉治取放任態度，對保甲取厲行政策，其微意蓋在防制漢人的反動。所以每朔望必宣講聖諭廣訓，（順治頒六條康熙增十六條）最注意者是「各安生理，無作非爲」！不知鄉村的農民，却借此掩護以實行地方自治。後來「教亂」擴大到五省，非營兵保甲所能辦，纔有應運而興的堡寨、碉樓、鄉勇、團練出來，退而自保，進以圖功，清廷反賴它來勘亂。此雖爲保甲之變體，然保甲名存而實亡了。可是鄉村自治的社會組織，始終都在維持着。其於中國全民族之生存及發展，有極重大的關係，以自然互助的精神，作簡單合理的組織，爲宗法之蛻餘，乃鄉黨之遺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見孟子）「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見管子）而政治組織在上邊不管如何因革損益，下邊的社會組織總是「百變不離其宗」，確實有它的好處，——雖然壞處也有。自清末受東西洋的影響，行「官辦的自治」，所謂「代大匠斲必傷其手」，固有精神，也就漸漸喪失了。

至於城市，在中國古代是農民「秋冬入保」（見公羊傳何註）的地方，其後職業漸分，始爲官吏工商所集居，而有「國」與「野」的區別。野擴大爲鄉村，國衍變爲城市。國原文作或，外加囗者，乃表示垣壁保聚的意思，所以城市也就混爲一名了。城市必爲行政官廳所在地，其設施大都屬於政治組織，至於城廂保甲也和鄉村差不多，不過沒有鄉村自治的範圍

大，性質較單純罷了。城市最大的是皇帝所都的京城，有外城、內城、皇城、紫禁城四圍。其次是各省督撫將軍所駐的省城，周圍也是幾十里，將軍是鎮壓漢人的駐防官，在內另築旗營。再次就是縣城了，道員知府都在大州縣設治，京城省城也一樣的設縣治民，可說全國都是以州縣爲單位的。高級官吏駐守某縣，則某縣就成爲「附郭」的首縣。若單純的商業城市，在清初只有廣州，廈門（泉州）寧波（明州）上海四處，後三處時開時禁，惟廣州在康熙二十二年以後，常爲對外貿易的唯一門戶。『番船來粵者，歲以二十餘柁爲率，至則勞以牛酒，牙行主之，所謂「十三行」是也。』（見廣東通志）上海本圖華亭，舊名華亭海，原有上下二海浦，上海浦也就是黃浦，宋已名市，元更置縣。道光以後，遂爲國內第一市場。「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兩個城市，是宜於享樂的風景區，工商業還說不上，普通縣城裏，總有個巡檢司，（等於現在的警察局）「掌緝捕盜賊盤詰姦宄」，「凡縣內津關要隘，並設置之」。省城有督撫提標的城守營、綠旗兵、和都統……城守衞防守衙的八旗兵。京城有兵衞之步軍營，巡捕營，步軍統領及兵馬指揮使等，都是維持治安的。人民仍有城廂保甲之組織，不過城市的官吏越多越大，則自治的權力就越少越小了。所謂「天子脚下」或「輦轂之下」，簡直沒有人民活動的餘地。然而工商業的集團，和變相的宗法集團，則城市愈大，就愈容易發榮滋長。譬如同行公會和同鄉會館，無地無之，他們的組織雖不甚健全，但頗有互助的精神，這是一種極單純極自然的團結。而同行公議或同業組合，卻很像西洋的基爾特(Gild)。只是同鄉會館太多了，

却仟宗法以外，加上鄉土觀念，形成國人牢不可破的封建思想，其原意是在外的旅客互助，到後來反回轉本鄉「割據」「自封」。清制：官吏迴避本籍，頗有全國統一的精神，民國以後反被破壞無餘。但某人治某之說，又不是眞正的人民自治，這對於中國前進的社會，阻礙殊大，眞是「匪夷所思」了。

第三節　人口與土地

社會組成的份子是人民，農業經濟的資源是土地，此二者乃中華民族生息之主要條件，資產僅居於附帶的地位，這和西洋以商業資本爲主要條件，而側重財富的情形不同。我國號稱地大物博人衆，其實物產並不如俄美兩國完備，土地究有多大？人口究有幾許？因爲統計數字不完全精確，必須要我們檢討。以人口而論，清代本有編審制度，由里甲三年或五年一編造，遞上至布政司，爲黃册，年六十和十六歲以下者不列。因爲徵丁銀（輕則一分重有至八九兩者）的原故，自然有逃戶、避差、或數丁納一的毛病，可見這時人口沒有正確的數目。康熙帝爲明瞭人口實數起見，纔以五十一年的丁册爲額，將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時攤丁銀入地畝，而編審之制，形同虛設。乾隆以後，僅賴保甲册報，「竟有不及實數什之二三者」；且有「應城一縣，每歲只報滋生八口，應山棗陽只報二十餘口及五六七口」的笑話。（均見東華錄乾隆四十年諭旨）清廷因此三令五申，人民既沒有丁多糧重的顧慮，又加以婦女老弱賤民蛋戶，

通統計算在內，數目總大致不差。茲先簡表如下：

年份	口數	附註
順治八年	一〇六三、三三二六口	（王氏東華錄紀戶口始此年）
十年	一三九一、六五九八口	（九年反多五百餘萬口）
十八年	一九一三、七六五二口	（文獻通考則爲二一〇六萬餘口）
康熙十年	一九四〇、七五八七口	
二十年	一七二三、五三六八口	
三十年	二〇三六、五三六八口	
四十年	二〇四一、一一六三口	
五十年	二四六二、一三二四口	（通考石渠餘記均同惟癸巳類稿少列四十五萬餘口）
六十年	二九一四、八三五九口	（惟通考爲二七三五、五四六二口）
	滋生人丁四六、七八五〇口	
雍正四年	二五六六、〇九八〇口	
	滋生人丁八六、〇七一〇口	
十二年	二六四一、七九三二口	
	滋生人丁九三、七五三〇口	
乾隆六年	一四三四一、一五五九口	（東華錄謂此年編審天下戶口舉共大小男婦數）

十年	一、六九一、二一二七口
二十年	一、八五六一、二八八一口
二十七年	二、〇〇四七、二四六一口
三十五年	二、一三六一、三一六三口
四十年	二、六四五六、一三五五口
五十年	二、八八八六、三九七四口
五十五年	三、〇一四八、七一一五口
五十九年	三、一三二八、一七九五口
六十年	二、九六九六、八九六八口
嘉慶元年	二、七五六六、二〇四四口
八年	三、〇二二五、〇六七三口
十三年	三、五〇二九、一七二四口
二十年	三、二六五七、四八九五口
二十四年	三、〇一二六、〇五四五口
道光元年	三、五五五四、〇八二五口
十年	三、九四七八、四六八一口

十五年　四、〇一七六、七〇五三口
二十年　四、一二八一、四八二八口

依上表，在康熙末葉，我國人口不過三千萬人，這數目自然有少無多，因爲當時還抽丁銀，而且婦女老弱都不在內。乾隆晚葉已超過三萬萬，這時因爲丁銀沒有了，又統計男婦老弱，所以突然增加了十倍。道光中葉已超過四萬萬，四五十年間加三分之一，這也是當然的。到現在又過了一百多年，還說是四萬萬七千萬，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於是乎有消極論者以食鹽消費量爲比率，說中國人口多不過二三萬萬。超過者皆誇大之辭。然而王慶雲說：『各省册報民數，固不能無一舛漏，大抵有少開無多報。』又說：『不數十年輒自倍以登，此可驗之一鄉而知天下者。』（見石渠餘記）我們若用馬爾塞人口論（Malthus' Theory of population）的比例級數增加率來計算，可知王氏的話實在不錯。清代乾嘉以後的册報，似乎並未誇張，而且還有少開。我們怎麼知道呢？因爲戶數總比較精確些，以戶數與口數對照來看：乾隆十八年統計十八省及盛京共三八八四、五三五四戶，若照「八口之家」來計算，至少有三萬萬以上的人口，照「五口之家」來計算，至少也有二萬萬以上的人口，可是官書只列一萬多萬，相差甚遠，難道一戶只平均兩個半人麼？中國是大家庭制度，絕少無妻子而「自立門戶」者，可見人口數目，止「有少開，而無多報」。所以乾隆四十年諭旨說：「不及實數什之二三」。若加以三倍來概算，則至少在三萬萬以上了。到四十年以後，纔列出這個數目來，還能算多麼？不過

以道光末的四萬一千多萬和現在的四萬七千多萬來比，未免又相形見絀了。我是贊成積極論的，但不敢說一定在十萬萬以上，只是大體上仍相信清代的會計錄而已。可是咸豐以後，就有些靠不住了。譬如咸豐元年是四萬萬三千多萬，二年就減少一萬萬，到同治二年又減少一萬萬，不過十三年光景，人口減去了一半，雖然中間有太平天國及捻囘諸亂，也未免駭人聽聞！況且元年至二年，太平軍剛纔起義，還未出廣西湖南二省，怎能減削一萬萬呢？這都可見册報有缺無全，未必隨意捏造。總而言之，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國的人口已有四萬萬以上了。

再以土地而論：我國在清初只本部十八省及盛京（即今之東三省）是農業繁殖的區域，其餘藩部，如蒙古青海為游牧社會，新疆西藏為半耕半牧，都不算數。其已墾升科之田，大略如下：

	乾隆十八年奏銷册	嘉慶十七年奏銷册
直隸	六五、七一九一頃八九畝	七四、一四三四頃七一畝
山東	九一、一〇五四・〇七	九八、四七二八・四六
山西	三二、九五八六・二一	五五、二六七二・五三
河南	七二、二八二〇・三六	七二、一一四五・九二
江蘇	六八、九八八四・四五	七二、〇八九四・八六
安徽	三三、八一二〇・九三	四一、四三六八・七五

江西	四七、九二〇七・六二	四七、二七四一・〇七
福建	一二、八二七〇・八七	一三、六五三六・六二
浙江	四五、九七八七・七〇	四六、六〇〇三・六九
湖北	五六、六九一三・四九	六〇、五一八五・五六
湖南	三一、二二八七・九八	三一、五八一五・九六
陝西	二五、二三七一・〇三	三〇、六七七五・二二
甘肅	一七、七八三一・三三	二三、六八四一・三五
四川	四五、九一四六・六七	四六、五四七一・三四
廣東	三二、八八三二・九三	三二、〇三四八・三五
廣西	八、七四〇〇・六〇	八、九七六〇・四三
雲南	六、九四九九・八〇	九、三一五一・二六
貴州	二、五六九一・七六	二、七六六〇・〇七
奉天	二、五二四三・二一	二、一三〇六・九〇
吉林		一、四九二二・五一
黑龍江		八一六・〇〇
共計	七〇八、〇九五一・〇一	七七〇、八五八六・八六

據上表在乾隆初葉各項田地僅七百零八萬九百五十一頃有餘，到嘉慶中葉增加六十二萬七千六百三十九頃有餘，道光以後則有減無增。而乾隆以前却有增有減：

順治十七年	五一九·四〇三八·三〇	（田地山蕩）
	二·二六四二箇	（哇地）
康熙三十年	五九三·二六八四·二七	
康熙六十年	七三五·六四五〇·五九	
雍正元年	八九〇·一八七九·六二	
雍正十二年	八九〇·一三八七·二四	

由此更可看出列朝的政績，當以雍正時代爲最著。上較康熙，下較乾隆，都多出約二百萬頃。自然是因政治嚴明的關係，漏稅免科的田土就少多了。然而仍不見得是墾地的眞實數，恐怕相差還甚遠，我們看清初人的估計，就可知道：

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千里，有田五百四十萬頃。（十里百倍百里萬倍千里百萬倍）依王制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去三分之一，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其非五穀之棉花蔬果菱荷藥餌等類，再除四分之一，亦實有二百七十萬頃。十五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量，不過方四千里，今姑以方三千里科算，爲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田二千四百三十萬頃），糧二千四百三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

兩。（按什一之稅，畝徵一斗，頃徵十石，九分折色，每石銀四錢，一分徵本色，合如上數。）然各直省現徵額賦之數，不及三分之一，則水利不修之弊也。（抽著清代通史引）

以上係順治年間戶部大臣的奏疏語，固然因水利不修，田園荒蕪，旱潦成災，墾地未必能足數，但亦可知官方册報必有不實不盡之處，即以雍正元年為例：實徵銀三千零二十二萬餘兩，米豆麥四百十二萬餘石，當時的糧價，每石米不過值七八錢，最多是一兩，（漕米折徵普通是每石一兩）姑以一兩計，則實徵三四三四萬石或兩。以是年田地八九〇萬頃計，就應該有八千九百萬石或兩，然實收不過三分之一強，可見不僅田土有逃稅的毛病，即徵則也有問題，實際平均每畝只徵得四分，即每頃四兩，所以人民都認為清朝糧賦很輕，其中逋欠和官吏的中飽，也在所難免了。我們再看清末總稅務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的估計：

今假以清國土地為縱橫各四千里，（新疆蒙古西藏東三省不在內）則其面積合計為一千六百萬方哩。每方哩之地，假定有田五百畝，則合計所有之田，為八十萬萬畝，若每畝地租，酌抽銅錢二百文，而以錢二千值銀一兩，則每十畝得銀一兩，即八萬萬矣。縱令年有豐歉，地有山林水地之分，不能一律計算，即以半數計之，亦不下四萬萬兩。（見清國地租稅法改革意見書）

這種推算雖還不如清初戶部的推算來得切實，但可以相互對照：以方四千里除三分之一計

算，應有田地五十七萬六千萬畝。（卽五千七百萬頃）清中葉以後田地數，只合到八分之一。難道這七分都受天災水利的影響嗎？況且以四萬萬人口，耕種七百萬頃（七萬萬畝）田地，平均每人只一畝七分，年收不過一石七斗，何能餬一人之口呢？可見清代奏銷册的田數毫不確實，而富力之蘊藏，決不只於如是。我們若把人口和土地就以上兩種推算來對照一下，大約每人平均可佔十五畝左右，如果能「地盡其利」，每年收入除完糧納稅外，一個人的衣食溫飽之資是不成問題的。但最近耕地只十三萬九千七百六十四萬畝，（民國三十年統計）每人平均還不到三畝，又只佔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八，卽此可知我國所以患貧的原故，而吏治、經界、開墾、增產、和水利諸問題，都是農業經濟的基本要務了。

第四節　人民的生活及習俗

就以上所述，可知我國自然的富力和人口的密度，以及社會組織能力，政治文化天才，論人論地，都是世界上大有可爲的優秀民族，就只因消極的民族哲學，地域的封建思想，阻礙了前進。而異族統制的私心，官吏貪黷的風氣，逼得人民「靠天吃飯」，一般的生活，眞是窮苦不堪。那有什麼人生樂趣呢？儒林外史記述當時士人的狀況說：

『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每年館金十二兩，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尚家代飯。……俺前日聽說：「荀家炒了些麵筋、豆腐干，送在庵裏，又送了幾囘饅頭火燒。」（第二

回）范進謝了房主人，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路，連夜回來，拜見母親，家裏住着一間草屋，一廈披子，門外是個茅草棚，正屋母親住着，妻子住披房裏。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着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胡屠戶又道：「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孩兒也吃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猪油可曾吃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第三回）馬二先生望着湖沿上接連着幾個酒店，掛着透味的羊肉，櫃台上盤子裏盛着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着餛飩，蒸籠上蒸着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裏嚥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吃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的「處片」嚼嚼，到覺有滋些味！……馬二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儘興一吃。（第十四回）當時就把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又借了明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合起來就娶了親。……又做了兩年，積攢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在祁家傍邊尋了四間屋，搬進去住。只雇了一個小小廝，虞博士到館去了，這小小廝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米油鹽小菜之類，回家與娘子度日。娘子生兒育女，身子又多病，館錢不能買醫藥，每日只吃三頓白粥，後來身子也就漸漸結實起來。』（第三十六回）

觀此可知一般以筆耕舌耨爲生活的讀書人之苦況，一年十幾兩銀子的束脩，還要養家，只可住草房，吃白飯了。有田的大地主，自然的比較好些，但這種人並不多，一般的農村十分之

九是小自耕農，佃戶及長短工，每年收入也和教師相差無幾，甚至於還不如，生活自然更苦了。紅樓夢描寫繁華世家，也常反映出農民的苦況，如『劉姥姥道：「這樣螃蟹，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工人以手藝勞力所得，雖無一定，每日平均起來，大約不過幾分銀子。（以木瓦匠而論：順治中每工二十八文，道光中，八十四文，平均五六十文，折銀五六分，多則七八分。）商店中的夥計，每年一二十千文，每日也只合幾分。林則徐說：『人生日用飲食所需，若以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大約一人有銀四五分即可過一日，若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總而言之：佔中國最大多數的士農工商四種人，一年的生活費，多不過二十兩銀子，每飯只合一二分，雖是物價低廉，也還買不到一斤肉，兩升米。如巢林筆談云：『順治二年會親戚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而猪羊雞鴨甚賤，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而當時糧價：糙米每石六七錢，（見經世文編陵世儀漕兌揭）普通米七八錢，（見同書尹繼善籌劃漕事疏）老米一千二百文，（熙朝紀政紀糶篇）以銀價合一兩三四錢。平均一石米價在一兩左右，每天也只有幾升米錢！何況一個人的消費並不只於食米呢？家無担石之儲，人鮮溫飽之計，一般生活程度的簡陋，已可想見了。至於特別瘠苦的地方，服食粗糲，菜根樹皮，都用以充饑，遇着荒亂的時候，還有吃土沙的飢民，啗敵肉的丐兵，眞是慘不忍聞的非人生活啊！

可是少數的官吏富賈和地主，卻極盡繁華豪奢之能事，如鈕琇觚賸云：

江南泰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天下。季自滄葦以御史回籍後，尤稱豪侈。其居繞牆數里，中有複道迴巡，健兒執鈴析者共六十人，月糧以外，每夕犒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康熙九年，霖雨連旬，恐雜氣侵澆，命典衣者曝裘於庭，張而擊之，紫貂、青狐、銀鼠、金豹、猞猁猻之屬，脫毛積地，厚三寸許。家有女樂三部，悉稱音姿妙選。開讌賓誕，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繡袍錦靴，一妓之飾，千金具焉。及笄之後，散配僮僕與民家子，而嬌憨之態，未能盡除，日至高春，晨睡方起，即索飲人參龍眼等湯，梳盥甫畢，已向午矣。製食必以精庖爲之，乃始下箸，食後輒按牙歌曲，或吹洞簫一闋，又復理晚粧，尋夜宴，故凡娶季氏家姬者，絕無聲色之娛，但有伺候之煩，經營之瘁也。

又禮親王嘯亭續錄云：

京師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瑰麗，遊十日未竟。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然二族喜交士大夫爲干進之階，故屢爲言官彈劾，不及祝氏退藏也。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之人呼爲郝善人。純廟（乾隆帝）常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王公近侍及輿儓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云。

從以上兩段紀載，就可知富紳大賈士豪的奢侈情形，要是和權奸朝貴來比，仍屬小巫大巫。和珅在當政時，每晨以珠作食，謂可心竅靈明，過目即記，然一粒重者價二十萬，輕者或一萬，至輕者亦八千，珠之舊者與已穿孔者不中用，一時海上之人，都不憚風濤去採珠，所以

價值最昂。我們一看他家被抄的單子，只金碗碟四千多件，金匣盂一百二十個，金面盆五十三個，赤金五百八十萬兩，沙金二百餘萬兩，貂皮衣一千四百十七件，貂蟒袍褂八十五件，其平日享受的豪奢，比皇帝還要加若干倍。（宮內御膳房年耗二萬餘兩）。至於河員鹽政的積弊之深，用費之汰，更是人所習知。譬如駐清江浦的南河總督，歲修經費四五百萬，用於河工者不過十之二三，餘皆納賄，酬應，饋贈，分肥。一席之宴，恆歷數日。熊蹯、鵝掌、駝峯、猴腦之製，所費不貲。乾隆時兩淮鹽政衙門，由鹽商每日供應一百二十兩。而鹽商競尚奢靡，無論婚喪嫁娶之事，凡宮室飲食衣服輿馬之所費，輒數十萬金。這樣貧富不均的現象，相沿數百年，爲什麼沒有造成西洋那樣的貴賤階級，和社會革命呢？其中頗有一種道理：因爲那些人的錢，大半是「官久自富」或經商得來的，而做官則人人有權利，只要你能獲得科舉的資格，昨天是窮漢，今天卽可爲達官，因此都以富貴爲嚮往之目的，而不以富貴爲攻擊之對象。可是這種富貴極靠不住的，它既由於不正當的朘削而來，得之易失之亦易，一旦被議，家敗人亡，或習於奢靡，坐吃山空，不到幾十年，往往豪富可以變爲赤貧或乞丐，小偸。譬如乾隆時阿勒渾做過總督，窮極奢侈，罷官後不數年，成爲乞丐，到友人家去偸東西。又如「銀錢堆滿十三行」的行商伍氏，在道光間富甲天下，不多年也就式微了。此種例子，不勝枚舉。俗語說：『十年河東轉河西，莫笑窮人穿破衣！』梅溪叢話云：『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歷冬夏而常青。好花如富貴，祇可看三日，富貴如好花，亦不過三十年。』這都是說富貴貧

賤的變遷很快，所以不能形成對立的階級。我們若把旗人的生計，再略一敍述，就更可以明瞭了。

旗人是清朝的宗族，和一半的漢軍，都係從龍功臣，在政治上自然佔有特殊地位。入關以後，一馬甲（正兵）每月給銀三兩，護軍（衞兵）每月給銀四兩，皆每年給米二十四石。七歲以上，就有全份口糧，六歲以下爲半口。且於京城按旗分地，賞給房屋，又於近京五百里內，撥給地畝。（照官階分配，壯丁大約三十畝。）這樣的生活，總比一般漢人優裕多了。只因他們養尊處優，安享奢靡，不過十餘年，就「窮困日甚」。（見陳之遴滿洲兵民生計疏）康熙間曾發一千二百萬帑金賑濟他們，雍正乾隆間除賞賜外，曾兩次替他們贖回典賣出去的田地，然而總無效果。爲什麼弄得這樣窮困呢？據雍正帝說：『相染成風，未改其靡費之習，賞銀一及兵丁之手，亦不過妄用於飲食，不及十日，悉爲烏有。』又說：『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儲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闔家匱乏，凍餒交迫，；乃以美食鮮衣之故也。』乾隆帝也說：『八旗爲國家根本，從前敦崇儉樸，迨承平日久，漸即侈靡。且生齒日繁，不務本計，但知坐耗財米，罔知節儉，惟知鮮衣美食，蕩費貲財，相習成風，全不知悔，旗人貧乏，率由於此！』這原因說得很明白，不是和漢人富貴之不能長享，是一樣的道理麼？從前有人說：『國有四民，功令獨旗人不得經商逐利，故貧困至此！』王慶雲

在熙朝紀政中痛駁此議，謂『旗人不善謀生，又悍僕豪奴衰民駔儈導之縱暴以爲利，故屢煩朝廷之禁約。……大抵旗人狃於揮霍，炫於鮮衣美食，經商逐利，不待禁而不能』。從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以節儉爲美德，是具有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之深意。但人情好逸惡勞，有錢的儘量享受，勢必至於破落而後已，這也是社會上盈虛消長的道理。其原因還由於我們的農業社會生產量有限，分配就不能太偏，消費就不能過分，否則「一曝十寒」，自然就有一種剋制調劑的力量。要不然的話，像旗人「每飯食肉」，又何至於傾家蕩產呢？所以我們現在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必須加緊生產建設，幷改革政治的貪汚制度，使一般人都能平均享受，即令我們的人口繁殖太快，大約仍可自給自足的。

至於一般人的生活狀況，南北習俗，微有不同，乾隆元年的諭旨說：

朕聞晉豫民俗，多從儉樸，而戶有蓋藏。惟江蘇兩浙之地，俗尙侈靡，往往家無斗儲，而被服必極華鮮，飯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間，茶坊酒肆，星列棊置，少年無知，遊蕩失業，彼處地狹民稠，方以衣食難充爲慮，何堪習俗如此？民生安得不愈艱難！

爲什麼南北有這種差別？因爲東南是財富之區，西北是瘠苦之地，清初戶部計國富，就說：『古來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南之蘇松常鎭，浙江之嘉湖等府，漢唐以前，不過一澤國耳。自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闢，遂爲財賦之藪。故明初年，見東南之賦，足以供用，於是惟知東南之利，而不謀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日窮。迨及季世，盜賊叢生

矣！」其所謂「謀不及西北」者，就是指「水利不修」的意思，南北財富之轉移，固因氣候土壤的原故，實亦由於「水利不修」，因此西北纔時苦「旱澇成災」，「饑饉洊至」了。南方謀生較易，所以養成紛華靡麗的習慣，北方謀生較難，所以養成儉樸粗陋的習慣，然而從小處看，南方也有災荒，北方也有富室，不過比較起來，南豐北歉，南奢北儉罷了。總之，全中國都不外一個窮字，富人究竟是極少數。茲再從衣食住行四事，略一敍說。

（一）衣　清代農家許着綢紗絹布，商家只許着絹布，仍舊是重農賤商的意思。然而一般的區別，是有「功名」（生員以上及官吏通稱）的人，許如式製綢衫，平民則終身着「布衣」。大率南人尙華，（康熙時吳下謠云：「男兒着條紅圍領，女兒倒要包網巾，貧兒打扮富兒形，爹娘凍餓，豈不寒心？」可見蘇州一帶重衣履，雖窮人也打扮，是不管家計的。）北人尙樸，婦女尙華，男子尙樸。順治四年定官民服制，採金元之遺，削髮垂辮，箭衣小袖，深鞋緊襪，較之明代衣寬四尺，袖寬二尺，襪皆大統，鞋必淺面，就大不相同了。但婦女幼童釋道優伶却還襲用明制。官員着靑色貢緞「外褂」，（前後開叉）算是禮服，胸背各補綴黼黻一方（惟親郡王用圓形），稱爲補服，俗名補子。文官繡鳥，武官繡獸，隨品級而異：

	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八品	九品
文官	仙鶴	錦雞	孔雀	雲雀	白鷳	鷺鷥	鸂鶒	鵪鶉	練鳥
武官	麒麟	獅子	豹	虎	熊	彪	犀	牛	海馬

凡遇慶典，官皆百服「蟒袍」，（一品至三品九蟒五爪，四品至六品八蟒五爪，文官七品至末入流，武官六品七品五蟒五爪，均不拘顏色。）謂之花衣期。「馬褂」本爲行裝軍服，乾隆以後，始漸爲一般人所用，而黃馬褂原係侍衞點綴之品，後乃以賞有功，殊覺可笑。帽子則幼童亦戴着，頗異於古二十而冠之制。不過普通都是素冠，氈帽，或便帽。（卽小帽，六瓣合縫，綴以簷，如箭，取六合一統之意，創於明太祖，俗名西瓜皮帽），官員禮帽：冬曰「暖帽」，夏曰「涼帽」，暖帽以氊氊或紫貂海龍製之，涼帽以青絨或稻草製之，均綴紅色之纓。「頂子」則視品級而別其質色：

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八品	九品
紅寶石	花紅珊瑚	亮藍寶石	暗藍寶石	亮白水晶	暗白硨磲	素金	花金	花銀

俗稱禮帽曰大帽子，帽後飾孔雀翎，普通皆一眼，多者雙眼三眼，初惟貝子冠三眼，公冠雙眼，康熙帝特賜施琅，遂開酬庸之例。後來滿洲五品以上官和護衞，及漢員有軍功者，都可賞戴，再後則援例捐納，就非常的濫了。這都是清代特殊的服飾，在民間隨時隨地都有小的變化，或尚寬，或尚窄，或長，或短，但無損於大形。五顏六色，各有好尚，惟不得用皇室獨佔的金黃色和龍飾。婦女因纏足之故，所着弓鞋，高低尖端，朱竹坨詞：『湖菱烏角，渚蓮紅瓣，不比幫兒遠瘦，拈來直是小舦船。』頗能形容盡致。旗女天足，鞋皆馬蹄底。飾物則五品

以上官，得挂「朝珠」。宗室繫「黃帶子」，覺羅繫「紅帶子」。一般人僅只結「腰巾」，帶「荷包」而已。

（二）食　南人食米，有飯粥之分，北人食麥，有餑餅之異，苗人嗜蕎，千里攜帶，蒙人食肉，取之六畜，藏人半耕半牧，嗜糌粑及酥油茶，回人略同漢人，而惟禁食豬。（可蘭經云：「豕汚不可食」，一般傳說，皆係謠言。）這是各族大概的情形，因爲地域產品的關係，所以生活的主食品，也不能一樣。魚肉菜蔬之類，大都佐食品，視貧富水陸而供需不同，宴客重山珍海錯，平民雜高粱紅薯。惟吾國烹調之術極精，食品的種類亦廣，非歐美人所能及。配合離奇，千變萬化，一肴登筵，別具風味。其見之於食單者，有八百餘種，歐美尚不及半。富人又以此爲「講究」，所以能在世界上佔第一位。但是團坐合食，味重肴豐，頗不宜於衛生。張英說：『禮曰：「居山不以魚鱉爲禮，居澤不以麋鹿爲禮」食地之所產，則滋味鮮而物力省，近人每以珍錯爲奇，不知雞豚魚蝦，本有至味，內則所載，養老八珍，皆尋常羊豕，特烹炮異耳。腥葷雜進，既爲傷生侈費，亦乖頤養之道，所當深戒者也。』（見所著飯有十二合說）茶爲普通飲料，上流人烹茶有法，（如馮賓岕茶牋）品茶有等，（如武夷茶有花香，小種，名種，奇種四等；品茶有香清甘活四等。）而一般平民則等於「驢飲」。（見紅樓夢）茶葉輸入歐洲，把英國人嗜酒凶暴的風氣漸漸變爲彬彬「君子」，這是飲茶的好處，所以自來就佔我國出口貨的大宗。至於酒的種類也很多，大別不外南酒（如女貞花雕紹興竹葉青等），燒酒，

（如高粱燒麻姑酒等），藥酒等（如五加皮蓮花白茵陳露等）。也有葡萄酒，麥酒，米酒，果酒等類，而蒙古則飲奶子酒，三投酒。黃星周說：『古云：「酒以成禮」，又云：「酒以合歡」，既以禮爲名，則必無傖野之禮，以歡爲主，則必無愁苦之歎矣！若角鬬紛爭，攘臂讙呶，可謂禮乎？虐令苛嬈，兢兢求過，可謂歡乎？』（見酒社芻言）可見清初已有貪杯中物，而拇拳叫號者。「酒令」之行，更爲普遍，雖有雅俗之別，但士大夫猜拳令行也和市井無異。

（三）住　南有天井，北有院落，房皆四合，覆以瓦草。門前有照壁，官四品以上者，始得成八字形。有功名者，始許用開嘴獸頭，鎮於屋脊兩端，門側立石獅，旗桿。又南方多以竹木編壁，外附以泥，北方則多用磚石土坯，但亦有穴居野處者，謂之窰洞。自豫以北，室多火坑，日知錄說：『北人以土爲牀，而室其下以發火，謂之坑，古書不載，舊唐書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卽今之土坑。』是明清間已有之。清末章炳麟謂北方文化日就鄙野之一因，以其無德智體育之可言，不爲無見。然而南方廁所和家屋相連，糞坑到處皆是，亦頗令人生厭。至於宮殿苑囿，樓台亭榭，則因人因地而殊制，不是一般人所能享的，所以不多說了。

（四）行　「南人使船，北人使馬」，古語有之，因爲南方多湖沼河流，北方多平原大漠，所以南方的街道逼窄，北方的路途寬廣。但旅行上的困難，南北都是一樣的。交通工具，既十分簡陋，旅舍飯館，亦汚穢不堪，且有剪徑之「暴客」，圖財之「黑店」，眞是「行不得也哥哥」。因此商賈遊宦，挾巨貲以行者，往往聘「鏢師」保護；京城並設有鏢行。但綠林中人頗

重義氣，有「替天行道救富濟貧」之思想，大概也是梁山泊的遺風。而遊俠之士，扶善鋤惡，左右其間，旅客常有因禍得福者，如兒女英雄傳所描寫之安公子，雖是小說家言，但似此一類的事情，見諸名家記載者還多，未必全屬虛構。交通路線，自京師達於各處分四路：東北至盛京吉黑，東路至魯寧皖贛粵及蘇浙閩。中路至河南，一達兩湖廣西，一達雲貴，西路至山西以達陝甘川，沿路設有「驛站」，司郵遞，由州縣及驛丞掌之，有驛夫驛馬驛車驛船。「原爲驛遞重要公文而設」，後來「擅行輕動，即無關緊要，往往插羽飛驛，轉形紛擾」。成就爲一種弊政了。交通工具陸路只車轎兩種：京官之轎，與夫四人，俗謂四轎，飾以藍呢。乾隆以後，劉統勳始乘馬車，紀曉嵐始乘騾車，杜紫綸（詔）始乘驢車，都是因爲省費的原故，幔幃也極樸素，而顛播殊苦。外官督撫學政，有乘八轎的，圍以綠呢。亦有製爲馬輿，騾轎者，則快而且穩，可以坐臥。秦朝釪誌：「一枕軟輿蝴蝶夢」，即詠此。車有騾馬牛驢馭使之不同，而用人推挽者，多單輪車。皆習鑿齒謂諸葛亮之木牛流馬即單輪車，可行於崎嶇之山地，今四川之雞公車，亦由象形而得名，大約就是木牛的遺製吧！美國人說中國的「車輛」四千年來無變化，這并不算過火的話。水路只有簡單的帆船，但必須在一葦可通的地方。後來曾國藩練水師，「欲爲艨艟大艦，皆不能旋運。」可見造船術也退步了。交通既如此困難，所以文化的溝通和進步，受了它很大的限制。

總而言之，中國因爲是農業的社會，承數千年祖宗之遺規，安居樂業，自給自足，已成靜

止之狀態，不知隨時改良，惟務安貧守舊，一切都很少進化。有時反在無意中加以阻撓破壞，以致良風美俗，廣士衆民，漸漸造成窮苦固陋的樣子，眞是令人痛心！這都由於文化未得發揚光大，領導者牽拘於世俗之傳統，不能把學問用之於「經世」的原故。海通以後，西洋人以科學凌駕中國，我們顯然是落伍了！社會掀起很大的波瀾，舊的無法保存，新的未能建設，我們老是徘徊在渡頭，民生日益憔悴，整整又耽誤了幾十年。

第五章　民族革命之新對象

第一節　英人請訂平等邦交

清人入主將二百年，在嘉慶道光的時候，已漸失其統制之能力，社會上亦露出衰頽的氣象，民族革命的偉業，正好乘機推動，不料西洋帝國主義狂瀾，却像「海鯨波山」一般的湧進來了！這是十九世紀的初期，正當世界潮流劇變的時代，中國怎能不受它的影響呢？原來歐洲海洋文化的社會，就具有帝國主義的素質，自從工業革命，憲政運動以後，民族主義勃興，列強都想向外發展，新大陸便成了他們逐鹿的地方。美國自命為新大陸的主人翁，怎肯讓他們在臥榻之旁來鼾睡呢？果然於一八二三年發表門羅主義(Monore Docrine)宣言書，對那些野心國家下逐客令。可是他們的侵略，正方興未艾，接着就向澳非亞三洲進攻，澳非土人，無力抵抗，自不消說，不久都變成白人的領土了。亞洲近東的土耳其，這時正日漸衰落，阿剌伯波斯阿富汗也被迫屈服，失却了獨立的能力，文明古國的印度，早就被英國蠶食殆盡，魔手觸及尼泊爾緬甸，只賸下「神祕的中國」一塊肥肉，他們四面八方的包圍來了！門戶首先被英國打開，我們已處在人家的饞吻之下，還大做其「天朝」的迷夢呢！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地位，是和我們平等的。西洋人雖在二百年以前，就到了中國，通商，傳教，輸入科學，我們總把他們當作朝鮮人，安南人，琉球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滿不在乎，（乾隆二十四年新柱等諭英吉利各番商云：「內地貨物，爾等需用甚多，爾等外洋物件，天朝都是可有可無的。爾等安靜守法，在此貿易，亦不驅逐，若不來貿易，亦不招徠，倘不遵禁令，是自取咎戾了」。）他們要來，就得以藩屬自居，向「天朝」朝貢。中國根本不明白那時的世界情形，更不知道什麼是外交了。以為外國都是蠻夷之邦，沒有禮樂教化，和他們往來，有什麼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大皇帝許他們貿易，不過施恩羈縻而已。如果他們不遵守天朝體制，立刻就停止貿易，以示懲創，他們要乞恩就範，自然也即恢復貿易，以示撫綏了。這種自大的態度，曾經對付過葡萄牙荷蘭及俄國，那時因為中國的國威尚盛，歐洲本土還有許多問題，列強並峙的局面尚未形成，遠征的力量當然不很大，他們只得勉強將就，以達貿易之目的，彼此卻也相安無事。

中國對國際貿易，本也有「五口通商」——廣州、廈門、寧波、雲台、和蒙古邊境的恰克圖，前四處是海港，和西洋各國交通，後一處是陸路，和俄羅斯交通。但西洋人到雲台貿易的很少，在廣州貿易的極多，廈門寧波兩地，來去不常，（廈門自乾隆十二年以後，即無番船再來；寧波有數十年番船不至，夷館亦圮廢）乾隆二十二，始專限廣州一口，和恰克圖一城。俄國商船二艘，在嘉慶十年曾到過廣州貿易，清廷嚴飭駁回，因為向例是只許他們在恰克圖通市的。

那時的通商制度也特別：廣州一口，外國人也不能自由，最初是五六月進口，九十月歸國，後來限定夏秋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十三行」的「夷館」，和十三行的行總，安議貨價，買賣完了，就必須到澳門去過冬。十三行本來是政府許可的牙行，清初已相沿成爲固定的名稱，並不限於十三家。康熙五十九年，纔有公行的組織，以後由他們專攬對外貿易，並且替政府辦外交，官吏的命令，和外商的呈文，都由行總傳遞。外國人不得和官吏直接交涉，不得僱用僕婦及八個以上的華人，不准坐轎，和攜帶武器，——後來這三項都很通融。不能進城和隨使出游，逢八（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可由通事領導往河南的「花地」遊覽。外國婦女（夷婦）不得到廣州，只能住澳門，以防「縱跡之漸」。「天朝史書」不准攜帶出洋，此外書籍無禁。可向通事買辦學中國話，不必另僱教師。這一些限制，外國人當然不滿意，但以其爲中國向來的定章，祇好容忍。他們最不滿意的是海關勒索及行商措償的情弊。中國的海關，那時是自主的，稅則原來定的很輕，大約不過值百抽四五，因爲有關稅「稽而不征」的遺訓，政府從來未看重那筆收入。稅關只是調劑官員的一個肥缺，而粵海關更居第一位，監督大多是內務府所派的旗人，每年陋規總有二三百萬之譜。一隻船的正稅不過一千一百一十兩，「官禮」「繳送」等類常需三倍左右，都算「應徵」之項，關口勒索，尚不在內。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卻保守祕密，以便上下其手。外國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乾隆二十年，英商洪任輝試往寧波貿易，情形甚好，外商有轉趨浙海之勢，旋奉旨封閉。二十四年再

往，就被迫返棹，北趨天津，向京師控訴，清廷特派欽差新柱等查辦，以「國體攸繫」，將監督李永標革職查抄。又因洪任輝違例越洋，押赴澳門圈禁三年。這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操縱中國對外貿易，他們在外商中佔了領袖的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的變爲機械製造，海外市場在他們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況且他們又已掌握着印度作根據地，以後往東亞發展更容易；因此他們認爲中國的自大態度和通商限制，都有損於他們的國威，不利於商業的發展，就開始向中國交涉了。

中西原無邦交可言，彼此更沒有互派的使節，因爲相隔甚遠，交通也不方便，來往都用的是帆船，那時蘇彝士運河尚未開鑿，須繞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也需三個月，所以商業並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茶絲及其他奢侈品。（如刺繡象牙古董等類）我們的農業經濟是頗足自給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因此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是很大的出超。我們的規定是以貨易貨，中國金銀不許流出外洋，只許西洋的「番銀」流進來作交易，在這種情形下，邦交原是可以不必有的。然而在英國人總覺得自己是世界大國，海上霸王，受了我們的種種限制，並且在中國的待遇還不如沒落的葡萄牙，早就怨恨不平了。他們以爲在華通商的困難，都是廣東地方官吏作出來的，蒙蔽了北京皇帝，如果能和清廷直接交涉，必定願意改革，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特派馬戛爾尼 (Lord Macartney) 及斯當東 (George Staunton) 爲正副使節來華，行商具稟，以補祝八旬萬壽爲詞。（是年帝八十三歲）

乾隆帝非常高興，派員在天津海口接送入京，覲見於熱河行宮，賞賚優渥。只因馬戛爾尼要求表示英國和中國的平等地位，不肯行三跪九叩禮，他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都拒絕了。這次使節，馬戛爾尼是很費苦心的，乘坐頭等獅子號兵船，並帶衛隊，選擇最上等的禮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家。英政府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不失國體。馬戛爾尼對於行跪拜禮的條件，是中國派同等資格的官員向英王畫像行跪拜禮，中國並未採納，他只行了英國的屈一膝禮。回北京以後，他就提出說帖，要求：（一）互派使節，自己並願常住北京。（二）請允英船在舟山寧波天津經商，（三）請仿從前俄羅斯例，在北京設一商館。（四）希望中國在舟山附近劃給一個小島，以便英商居住及貯貨。(五)請聽英商在廣州自由往來，不加禁止。（六）請寬減稅律。（七）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稅則，因爲向來聽官吏隨意估價，外商不知道中國規定的內容。當時和珅爲首相，外表上應酬很周到，但避免談判，僅以乾隆帝賜給英皇的兩道敕書：「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令其齎回復命。馬戛爾尼的和平交涉，算是完全失敗了。可是他和隨員們的筆記，把中國的內情，暴露於世界，帝國主義者獲得「知彼」的報告，更要作進一步的企圖了。

十八世紀末年到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崙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但又恐澳門爲法人所佔，曾兩次派兵艦窺伺，又直抵廣州，氣焰張甚。中國照例以封艙停市困之。外商怨謗，始責葡人納款犒師而退。等到戰事完了，英國遂派第二次的使節，

——亞墨哈斯(Amherst)來華，想解決在廣東商業上的糾紛，其目的大致與第一次相同。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由天津入京，又因不肯行跪拜禮，為迎接官吏所尼，致嘉慶帝已御殿受朝，而使臣不至，嚴旨斥逐回國。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也沒有受到馬戛爾尼那樣的待遇，對我感情，當然更不好。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但因當時獨攬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究竟是站在商業上的立場，折衝其間，惟利是圖。及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公司專利期滿，來華者皆散商，而英政府特派律勞卑(William Jonn Napier)為駐華貿易監督，達衛(John Francis Davis)羅便臣(Ce rge Best Bobinson)副之。律勞卑以政府派員，逕來廣州，必欲直接與兩廣總督對等往來。自然是有違成例，總督盧坤令行商逼其退去，他就命軍艦突入虎門，破壞防兵，進駐黃浦，陸戰隊入廣州，準備用武力來和中國對抗了。不久，律勞卑病死，形勢暫緩，英國的監督及商人，雖然一時仍安於現狀，但暗中都上書英王，謂非訴諸武力，不能獲得平等的待遇，打破中國自大的觀念。美國領事也報告其政府說：「中英兩國遲早必將開戰」。這就是鴉片戰爭的主要原因。

第二節　帝國主義闖進了中國

說起鴉片來，眞是我們最痛心，而英國人最不名譽的事情。前節曾提到我們的出口貨，以茶絲為大宗。英國人本來嗜酒，性情暴躁，廢時失業，自改飲茶之後，始漸養成彬彬君子的態

度，國勢亦蓬勃日上。（說見英人所著華英通商事略，載香港雜誌遐邇貫珍。）可是英國人販運來華的貨物，大半是鴉片煙，把中國人的思想和身體，都弄得敗壞不堪，政治軍事也就愈趨愈下了。鴉片係拉丁及英語 Opium 之譯音，我國亦稱阿芙蓉，乃阿拉伯語 Afyun 之譯音。由罌粟之汁液製成，用作藥劑。唐時已輸入中國、「雞蘇水」「鶯粟湯」之名，曾見於蘇東坡及弟子由詩中，宋人是服食作補品的。用槍管灼火吸食之法，創自印度及爪哇土人，明末始由台灣傳入漳泉廈門，自此以後，中國人沾染了吸食的惡習，流毒乃至於無窮。雍正七年，清廷定販賣吸食之禁令，而一般人猶以為「鴉片」是藥材，和害人的「鴉片煙」不同。（見硃批諭旨閩撫劉世明奏。）所以鴉片輸入，仍照藥材納稅。但乾隆三十一年以前，每年輸入多不過二百箱，每箱約百斤，三十一年以後，增加至千箱，大約都來自波斯印度土耳其等地，由葡萄牙商人販運的居多。及乾隆三十八年，英商纔覺得這是最有利的商品，開始販賣，在印度獎勵種植，由東印度公司統制運銷。於是乎大土(Benga Opium)有二種：一曰公班，亦稱烏土，產自印度 Patna，一曰剌班亦稱姑泥，產於印度 Benares 源源而來。乾隆末年，輸入將近二千箱，嘉慶初年，就增加到四千箱，十六年，竟多至於五千箱了。嘉慶道光二帝對於鴉片都很痛心，嘉慶元年即下令禁止入口，道光元年又嚴申禁令。但英人設貨棧於澳門，以躉船泊零丁洋，有「快蟹」（一曰扒龍）為之包運，有「窯口」為之包銷。水師巡船，月受規銀，賣放走私，查禁愈嚴，而輸入之額，反有加無已。道光十五年，乃增至三萬箱，價值約二千餘萬元。

（許乃濟奏稱烏土爲上，每箱約價洋銀八百元，平均售價在七百元左右。）合紋銀約一千五百餘萬兩，這實在是一個很嚴重的經濟問題，當時全國上下都認爲國計民生的大患；何況換回來的又是些有害無益的毒品呢！因此道光帝對於禁煙就下了最大的決心。

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在廣州作官很久，對鴉片輸入的情形甚爲明瞭，他覺得禁烟絕不能實行，因爲『雖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所以他主張：『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祇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庶足以杜漏巵而裕國計。』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𡎴、海關監督文祥都贊成他的辦法，并奏擬章程九條，謂宜「聽令內地栽種，有所抵制」。這一派的議論，都是針對着當時的實情而言的。但是反對派更爲得勢，朱嶟許球都請嚴厲禁絕，尤以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的奏疏，爲禁烟問題正式打開了序幕。他說：

> 以中國有用之財，塡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於吸食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請准給一年期限戒煙，雖至大之癮未有不漸斷者，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典，無不平允。

道光帝令各省督撫「各抒己見，妥籌章程」，他們雖都贊成禁煙，總覺得黃爵滋的辦法太激烈，說是販賣者害及多人，其罪應重於吸食，廣州是鴉片煙的總進口，查禁應該從廣州下手。惟獨湖廣總督林則徐完全贊成黃爵滋的主張，並建議實施辦法，先從兩湖實行。他說：『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與思及此，能無股慄！』道光帝知道林則徐是最「認眞」的大員，特召來京，面授機宜，命以欽差大臣，馳赴廣州査辦。並諭鄧廷楨：「合力同心，除中國大患之源。」廷楨貽書則徐說：「所不同心者有如海。」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則徐行抵廣州。略事佈置，卽曉諭外商說：「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國人：(一)「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二)出具甘結：「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卽正法。」外國人最初不知道林則徐的品格，以爲他不過和其他的中國官僚一樣，可以要價還價的，因此他們就觀望，就講價。殊不知林則徐是一個清廉剛正的人物，在政界聲望最好。他抱有極大的决心，「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斷無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十日，英人尙不肯繳煙。林就下令，斷絕交通，停止貿易，派兵圍守商館，撤出爲外商服役的中國人，並不許賣糧食給他們。當時在十三行商館裏住有約三百五十個外國人，連英國商業監督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內，他們自然受了相當的苦，煮飯，洗

碗，打掃，都要自己動手，但是預儲的糧食不少，行商又秘密接濟。義律原想妥協，林則徐堅持他的要求。是時英國在中國洋面只有兩隻小兵船，且無法到廣州，義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但是他不命令英商把煙交給林則徐，而教英商把煙交給他，並且他以監督的資格出給收據。一轉手之間，英商的鴉片變爲大英帝國的鴉片，本來是商務的交涉，就變爲兩國政府的交涉了。

義律於十四日稟請交出二萬二百八十三箱，三月二十九日則徐親至虎門驗收，至四月六日收淸，（西書言九日始畢）反溢出一千袋有餘，共二百三十七萬餘斤。就在海灘挖池焚燬，五月十五日，全數銷盡。「外人之來觀者，詳記其事，深讚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則徐大功告成，道光帝也高興極了，親批其奏摺說：『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淸廷調他任兩江總督，他不去，乃與廷楨互調。他要澈底禁煙，就是使外商具結以後不再作鴉片買賣，美國商船，首先照辦，惟無「人卽正法」之嚴厲詞句而已。義律却不願英商具結，全體都退至澳門並禁止英船入口，報告本國政府，靜待訓令。林則徐因爲他們旣不願貿易，就斷絕一切食物的接濟，令澳門政府，強迫出境。義律和英商寄居船上，屢率印度派來之兵船二隻，向九龍及穿鼻攻擊，索取食物，勾結漢奸，阻止英船入口，與我水師衝突，兩方互有勝負。鴉片戰爭，在實際上已經開始了。虎門防務，自經則徐整頓以後，略有起色。但水師勢力薄弱，亦未敢出洋攻擊，僅召募漁艇蛋戶，燒燬「濟夷匪船」，並對於海口一帶，嚴加防備。

英政府接到義律的報告，最初還持和平政策，因爲國內的名士，多以鴉片貿易爲汚辱英國國旗，責政府應協同中國嚴禁，不應援助奸商。後來知道在事實上已經開戰，英女王維多利亞(Victoria)特向國會演說，亟謀保障之法。這時英國的工業發達，提倡自由貿易，有尋找海外市場的必要，而英國外相巴馬斯統(Palmerston)陸相馬蒿烈(Macaulay) 都是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國主義者。他們那肯放過這一個侵略的機會呢？何況英國對我自大自尊的態度，及種種通商的限制，早已不滿，想和我們算一次總賬呢？因爲他們極力主戰，獲得國會九票多數的同意，就派全權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和海軍司令伯麥(John Erdon Bremer)統率戰艦十六艘，武裝汽船四艘，運輸艦一艘，輸送船二十七隻，共大礮五百四十門，軍器完備之戰士四千人，在道光二十六年六月間，就到了中國海面。他們奉政府的命令，向北方活動，並不攻擊肇事的廣州，僅派四艘兵艦封鎖海口，大部的主力艦去佔領定海，駛到大沽口。這不過是一種攻寇攻心的戰略，當時人都解釋說英國怕林則徐。林則徐沒有機會和英國人一決勝負，固然保全了他的令名，而國事也就不堪聞了。

清廷始終是一些糊塗蟲，不明白彼此的形勢，不懂得攻守的戰略，一聽說定海失守，就嚇得手忙脚亂。上面調兵，兵非素練，下面請餉，餉非素籌。道光帝又是省儉慣了的人，最怕花錢，從前批示林則徐說：『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誡卿等不可畏葸。』現在却責備他：『不但終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懿律等至大沽，直隸總督琦

善就派人和他們交涉，他們把英外相致中國宰相書交出，仍然是英國預定的計劃。這封信前半是批評林則徐的話，說他如何虐待英僑，凌辱英吏，後半提出英國的要求：（一）賠償貨價，（指已繳之鴉片言）（二）中英官吏平等相待。（三）索一島或數島爲英商根據地。（四）索還商欠。（五）賠償軍費。若不允所求，勢必戰爭云云。後琦善調查他們的軍備，知道英國的船堅礮利，遠在我國之上。所謂大海及長江的天險，已爲外人所據，這仗是打不得的。所以他就決計「撫夷」。在沽河南岸搭帳會議，三天毫無結果。及得清廷指示，乃告訴英國人說：『林則徐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廣東，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欽派大臣，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他總覺得英國人是來告御狀請求皇帝伸冤的。英國人以爲清廷既允商議，也和英政府「必須賠償不爲復仇而戰爭」的宗旨相合，就回到廣東去交涉了。道光帝認爲琦善的本領不小，憑三寸之舌，竟能說退英國的海陸軍，遠勝於林則徐孟浪多事。於是令各省軍隊概歸原防，「以節糜費」。派琦善去代林則徐作兩廣總督。

琦善於十月到廣州，纔知道不是怎麼一回事。英人不但要求賠款開港，並且要求割讓香港。他都不敢答應，只有拖延時日，英國人不耐煩，遂於十二月初開火了。大角沙角失陷，琦善遂與義律訂立草約，許割讓香港，賠款六百萬元，幷給英國平等待遇。他說：『地勢既無要可扼，軍械則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示羈縻。』道光帝原以爲他能辦「夷務」，只許仍舊通商了結，到了這時纔知道他「無能不堪之至」！罵他：

『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是何肺肝？』被人恐嚇，爲此遺臭萬年之舉！』又說：『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於是調兵遣將，一意主戰，琦善眞是狼狽極了。不久，虎門及各礮台均失守。提督關天培戰死。清廷命將琦善押解來京，查抄家產。可惜所派弈山隆文諸旗人，又都不中用。楊芳雖是個名將，但亦「束手無策」。且有收糞桶穢物，以爲厭勝的笑話。而「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啾，全無紀律」。（臬司王廷蘭函語）果然一接仗，潰的潰，降的降，也有戰死不逃不降者，不得已遂爲城下之盟，暫定休戰條約，含混上奏。清廷以爲「妥洽無事」，方作善後處理，追論歷任督撫罪，將林則徐鄧廷楨遣戍伊犂。而英國政府尚不滿意懿律所訂的草約，將他撤職，另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爲代表，並令臥烏古（Hugh Cough）率印度駐軍來華。中國若不答應全部要求，就不停戰。二十一年七月，英軍佔領廈門，八月佔領定海鎮海，欽差大臣裕謙戰死。清廷又命些不中用的滿人弈經文蔚特依順耆英伊里布等赴浙江辦理軍務，而耆英伊里布又都是怕事主和的人。二十二年五月，英軍攻入吳淞口，提督王化成戰死，兩江總督牛鑑遁。六月破鎮江，欲以控扼長江，斷絕漕運。七月，英軍攻至南京，聲言架砲轟城，清廷知道沒有辦法再抵抗，只得接受英國人的要求，成立南京條約。自此英國幾十年的希望，終達到了目的，而帝國主義的魔手，插進了中國，我們開始要受壓迫了。

鴉片戰爭的失敗，根本是由於我們的智識落伍。軍隊和軍器都不如人，當然也是頂重要的

原因。琦善說過：英國的汽船「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他們的礮位之下，「沒有石磨盤，中具機軸，只須移轉磨盤，砲即隨其所向」。我們山海關的砲，尚是「前明遺物，勉強蒸洗可用」。任軍事者「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而林則徐在遣戍途中，曾致書友人，說得更明白：

彼之大砲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砲不能及彼，彼砲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放砲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砲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砲，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即遠調百萬貔貅，恐祇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余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而已。第一要大砲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所以則徐在廣東禁烟的時候，就竭力買外國砲，買外國船。並請以粵海關稅收「製砲造船」。「必求極利極堅」，「以逆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同時他派人刺探英人的消息，翻譯外國的書報刊物。他知道「船砲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爲長久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他曾經密陳夷情夷務說：『與其交鋒於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如誘擒於內地，逆夷更無能爲！』『議者以爲內地船礮非外夷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情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可見他並未諱言外人的船堅礮利，而

掉以輕心，只是顧慮誅求無厭的夷情，要行內地誘擒的戰略，這見解都不能說沒有道理。他說廣東「各處口隘，防堵加嚴，逆夷似無可乘之隙。」也是頗有分寸的話。他對於世界大勢，雖不甚澈底明瞭，却由於時代使然，無可責備。他自己曾下過一番相當的功夫，把所譯外人的「四洲志」交給了魏源（默深）。魏據以作「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並且要「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謂以夷攻夷；以守為款，而後外夷範我馳驅，是為以夷款夷」。這都是林則徐的意見。當時曾望顏奏請封關禁海，他力陳不可，說：『英吉利在外國，最稱強悍，諸夷中惟米利堅佛蘭西足與抗衡，然亦忌而憚之，其他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貿易斷後，他國皆頗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間相睽，以彼此之離心，各輸誠而內向。若概與之絕，則觖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他的世界眼光和外交政策，都似非當時人所能及，而躊械主守的辦法，更不是琦善耆英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琦善耆英伊里布等只見到外國的船堅礮利，便失却了自信心，畏難苟安，敷衍了事，那能當得起外交家的責任？他們的奏摺雖說：「夷情反復無常，海防不可稍疏。」但他們防在何處？王廷蘭（廣東布政使）致曾望顏的信說：『琦相來粵，先存一不敢戰之心，畏之如虎，賊破虎門烏涌，急撤獵得礮台之兵，賊至二沙尾，急撤省河礮台之兵，以為我不撤兵，兵必為彼所敗，所以始退收兵入城，以為講和地步。開門揖盜，百喙難辭。』接着他說了許多打仗的情

形，都是「兵將捲礮而走」。「提庫中之國帑，惟有傷心；樹城上之白旗，能無髮指」！「皆係實情，無一虛誑」。無怪乎粵人檄討英人說：『爾自謂船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而入。』其實林則徐也自謂「拆韓束手」，不見得敵過英國的大礮。但他抱着「苟利國家生死以之敢因禍福避趨之」和「餘生豈惜投豺虎，羣策當思制犬羊」（雲左山房詩鈔卷六）的態度，絕不至於「開門揖盜」，總比琦善一般人要高一籌了。左宗棠輓林則徐上聯云：「附公者不皆君子，間公者必皆小人，憂國如家，二百餘年遺直在！」其言殊可玩味。假使以他為「禍首罪魁」，「讒間一時，騰謗無已」，必有人指天誓日，「不得不大聲疾　，拯人饕竊者」！（曾賓光遺事識餘）可見隱藏在人心中的是非，絕不是憑幾封奏疏，就能論定的。則徐亦自知「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白頭到此同休戚，（指與鄧廷楨）青史憑誰定是非？」但他以「時事之難，運數之奇，有不獨關乎一身休咎者，」只好「南望側身，嘆喟欲絕」（文鈔遊龍門香山寺記）了。後來耆英伊里布主持和議，法國兵船來調解，他們疑為「英人奸細」，並以問璞鼎查，豈非笑話？虎門條約和中美中法條約，他們隨便承認了「關稅協定」和「領事裁判權」，還以為方便省事，外交成功，這樣子的智識，能說他們比林則徐高明麼？當時主戰派及主和派，對外交的智識都差不多，不過主戰的全是漢人，如王鼎林則徐裕謙等，主和的全是滿人，如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等。漢人無權，具有士大夫的驕矜習氣，所以唱高調，但究竟是勁骨亮節，雖然也一樣僨事；滿人主

政，仍係看家婆怕事的心理，所以能下氣，但究竟是體輭心怯，雖然「欲了天下事」。咸豐帝即位，硃筆宣示穆彰阿耆英的罪狀說：「偽言熒惑，」「其心陰險，」「數言夷如何可畏，如何必應事周旋，」「貽誤國家，厥罪惟均。」而則徐死後，謚曰「文忠」，悼祭之文有云：「林則徐平素辦事認眞，不避嫌怨」「荷中禁鳴騶之寵，宣嚴疆遠馭之威，雖控制偶疏，難辭薄罰；而宣防永固，用贊成功。」朝廷賞罰和輿論是非相趨一致，在道理上還有什麽可議？我們不能僅以和戰二字定功罪，更不應作原情誅心之論，以爲林則徐有兩重人格。劉韻珂說得好：『兵無鬬志，民有亂心，戰亦敗，和亦敗，然戰之敗敗於無人，和之敗敗於失策。』我們能歸咎於那一個人嗎？姚默深說：『夷寇之役，首尾三載，糜帑七千萬，中外朋議，非戰即款，非款即戰，從未有專議守者，何哉！且其戰也，不戰於可戰之日，而偏戰於不可戰之日；其款也，不款於可款之時，而專款於必不可款之時；其守也，不守於可守之地，而皆守於不可守不必守之地。粵東不議守而專款，是浪款也；弈山不籌守而即戰，是浪戰也；顏伯燾裕謙牛鑑不擇地而守，是浪守也。誠能擇地利，守內河，堅垣壘，練精卒，備火攻，設奇伏，如林鄧之守虎門廈門，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能以守爲戰，以守爲款。以守爲戰，則豈特我兵可用，即佛蘭西美利堅皆可用，以外敵攻外敵也。豈特義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漢奸攻逆敵也。以守爲款，則我無讐於彼：彼有求於我，力持鴉片之禁，關其口，奪其氣，聽各國不得貿易之夷，居間調停，皆將曲彼而直我，怒彼而匿我，匪特煙價可不給，而鴉片亦可永禁其不來！且

可省出犒賞數千百萬金，為購洋艘洋礮練水戰火戰之用，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惟太上能先時，惟智者能不失時，又其次者，過時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補過於來時。』這完全是代表林則徐的意見，他何嘗又想用「中國的古法」，自信是「百戰百勝的」呢？他雖非「太上先時」的人，總求「智者能不失時」。但後來人過時而不悔，悔而不能改，那就不是林則徐的責任了。總而言之，我們的智識太落伍，不僅當時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就是事後論事的士大夫也還看不清楚，琦善耆英諸人，自然是更不足責的。

第三節　不平等條約的造成

鴉片戰爭失敗是必然的，無可避免的，假使我們能夠取得勝利的話，那末根本上就不應該有這一次戰爭。因為我們禁煙的理由，非常正大，英國人無法反對，只要我們採取相當合理的手段。英國人要「平等」通商，我們也無法反對，只要當時有一點世界的知識。所以我們說鴉片戰爭，英人說通商戰爭。戰爭以後，他們的目的達到了，我們反倒開了煙禁，聽其自然，流毒中國，一直到現在，我們的智力體力，還都受了很大的影響，這纔是我們的大失敗。然而一次失敗還不夠，接連又來第二次，可見我們的社會，如何麻木不仁，我們的人才，如何昏庸不堪了。但其中也有一個很大的機括，就是沒有讓主「動」的人，身當戰局，無怪乎士大夫階級不服輸，一般輿論也不服輸，他們覺得失敗都是奸臣誤國，如南宋秦檜一樣。倘使林則徐始終

用事，結果雖亦不免失敗，但究竟可以多給我們一些教訓，或不至再有葉名琛一流人物出來胡鬧，惹禍辱國。從前我們不肯給人家平等待遇，以後外國也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了。所以雖說是歷史誤人，亦由於人謀不臧，然而歸結起來，都是智識問題和政治問題。我們無需埋怨古人，「喪失民族二十年的光陰」，實際上喪失了三百年，——如果從明淸之際西學輸入就算起，至少也有一百年，——因爲咸同以後，自強維新諸運動就算解決中國的問題了麼？現在只希望眞正能把民族的癥結認識淸楚，不要再爲歷史所誤，也不要再製造誤人的歷史。

英法聯軍之役，是我們受到外人的第二次教訓，也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餘波，被我們自己掀爲狂瀾了。南京條約以後，開五口通商，四口都是曾經通過商的地方，只有福州是新開，淸廷本欲換給泉州，但耆英等未敢提出。英人入城建埠，發生一點小問題，不久也就解決了。而廣州與外人通商最久，已有好幾百年，似乎應該和外人相安無事，毫無問題，却不料問題特多，與外人感情最壞。此中原因複雜：第一、英國在廣東受了多年的壓迫，怨氣很深，等到他們打勝了，他們覺得出氣的日子到了。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原諒中國人因受戰爭的痛苦而對他們自然不滿意，自然帶幾分仇視。一有衝突，齊官壓民，小題大做。第二、廣東地方官商，因廣州在戰前是唯一通商口岸，都有發大財的機會。江南一帶茶絲由陸路運廣，經十三行賣給外國人，據外人估計，伍家怡和行有財產八千多萬，富甲天下。南京條約以後，外人直接到江浙去買茶絲，所以上海日盛一日，廣州則日形衰落，不但官商的財源減耗，就是一般勞工也受

到很大的影響，因此都恨外國人。第三、廣東人的民族觀念很強，性情剛毅，不怕勢力。林則徐禁煙時，他們因「身家既失，怨讟遂興」。（鄧廷楨語）所以「逆夷滋事，豈但漢奸引導，實亦百姓使然」。「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行，則前轍不能覆蹈」。（王廷蘭語）及至英人兵臨城下，淫掠滋擾，他們纔感覺着外國人可惡，就鳴鑼揭竿，遂有三元里「平英團」之事。官吏不能妥善處置，以平民憤，反壓抑人民以順夷情，於是粵人操戈仇英仇官，乃係當然的事了。

廣州人仇英的表現是趁外國人出遊，鄉民乘其不意，就把他們殺了。耆英爲總督，知道這事情不對，很嚴厲的執行法律，殺人者處死，一般人都罵他是洋奴，說他賣國媚外。人民爲自衞計，早就有義勇團練的組織，這時士紳和民衆都堅執「夷人不許入城，爲天朝二百年來例禁」。他們的理由，是「民居稠密，良莠不齊，往往倚主陵客，遇事興波」。因爲有兩三次英印人溷入，被民衆驅毆出來了。但實際還是一種心理作用，他們把城裏看作神聖之地，倘使外夷進去，好像與尊嚴有損。英國人本來在城外十三行作買賣，不進去又有什麼關係？他們也是爭意氣，以爲「入城則榮，不入城則辱」，好像與體面有關。耆英調停其間，費盡苦心，不料雙方愈鬧愈起勁。道光二十七年耆英一方面受英人的威脅，允許於二年後准其入城，希望在兩年內，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一方面受輿論的攻擊，感覺着在廣東的地位一天一天地困難，運動內調。淸廷以徐廣縉陞任兩廣總督，葉名琛陞任廣東巡撫。這兩個人都是天生的一對虛驕

自用的怪物。受士大夫階級的傳統觀念很深，而名琛尤爲頑固。道光帝又告訴他們說：

疆寄重在民心，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至於便通參酌，是在該督撫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實結民情，以羈縻辦夷務，方爲不負委任。

因此更增加了他們的自信心。道光二十九年，英人以兩年後入城之約到了期，香港總督文翰(Bonham)遂乘兵艦入內河，提出要求。廣縉暗中召集各鄉團練，在兩岸齊聲吶喊，英人吃了一驚。廣縉乘「單舸前往，告以衆怒不可犯」。英人這時不願與中國決裂，所以只聲明保留條約權利，並沒有別的舉動。徐葉及一般人都認爲這是我們的大勝利。清廷接到他們的報告說：『居民則以工人，舖戶則以伙伴，擇其強壯，挨戶註册，共團勇至十餘萬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衞。明處不見荷戈持戟之人，暗中盡皆折衝禦侮之士，衆志成城，堅逾金石，用能內戢士匪，外讋猾夷』。道光帝高興極了，以爲「不折一兵，不發一矢，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因用硃筆批示：「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所以封廣縉一等子爵，名琛一等男爵，風示天下。又特旨獎勵廣州民衆：

我粵東百姓素稱饒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

從此以後，廣州人便得意洋洋，自以爲「我十萬有勇知方之衆」，「洋鬼子」還不容易對

付！徐葉也覺得「民心可用」，格外的夜郎自大，瞧不起外國人了。

咸豐元年，徐廣縉調任湖廣，去打太平天國去了。葉名琛陞任總督，在廣東負外交重責，他更以「雪大恥尊國體」自命。對於外人的態度，異常傲慢，每次接到交涉的文書，略批數字，有時竟不回答。可是他的能力，不過如此，一切國際關係，外交情勢，他是毫無所知。又迷信乩語，以沙盤占休咎。他不但不能繼承林則徐「先事籌維船砲」的策略，簡直也沒有徐廣縉「英人所繫戀者，惟在貿易，則所以鈐制之者，亦惟在貿易」的見解了。他妄以爲「虛聲恫喝，乃夷人之慣技」，「惟有靜以待動」，彼自「勢絀力窮」。而清廷對他，亦信任太過，總覺他「久任海疆，操縱得宜」，「智深勇著，所奏甚當」。這樣的把他捧上天去，自然他就忘其所以了。四年，英法諸國，以原訂條約，有十二年變通的條文，派使要求「修約」。英國自然更要「一體均霑」了。他們感覺已得的權利不夠，希望加開口岸，「由長江直至漢口，設立碼頭」。華北的天津也要開埠，更要派公使駐北京。此外還希望中國地方官不拒絕與外國公使領事往來，最後要求減輕關稅並廢除釐金。這些要求，除最後一項外，並沒有什麼嚴重的性質。但是咸豐年間的中國人看法恰恰相反。當時中國沒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兩廣總督辦（除對俄由理藩院或黑龍江大吏外）葉名琛的對付方法，就是不接見外人，不和外人交涉。美英法代表，知道無法進行，都跑到上海去見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怡良勸他們回廣東去找葉名琛。吉爾杭阿却以「任其跋涉風濤，久無成議，該夷心未愜服，終恐

別滋事端」，「莫如將計就計，欽派重臣，議訂章程，允其所請」。他走很明白大體的，他知道「章程既有十二年變通之文」，「勢將無法制止」。可惜咸豐帝仍然是「虛憍之氣」，反予一頓申斥。後來英美代表又跑到大沽，提出修約說帖十八點，咸豐帝大爲震怒，諭旨說：『均屬荒謬已極，必須逐層指駁，京師爲輦轂重地，天津與畿輔毗連，該夷酋欲派人駐紮貿易，尤爲狂妄。』他總以爲外人駐京居心叵測，好像與國體有關。竟忘記了從前俄羅斯館的例子。而對於減免稅收，反倒覺得可以通融。這樣使外人感覺無處申訴，要修改條約，只有憑藉武力了。

咸豐六年九月，亞羅船事件發生。這事件的本身並不嚴重，船是中國人所有，所捕之盜，也都是中國人。只因它在香港註册，懸一面英國旗，所以給英國人一種口實。香港總督包冷(Bowring)和英領事巴夏禮(H. S. Pares)就舉兵攻入廣州，想迫葉名琛改約，名琛「始終堅持，不爲所脅」，以爲「彼技窮行自服矣」。果然英國人因爲未得政府的命令，加以印度發生亂事，急須赴援，不久便退去。他就報捷說：『防剿英夷，水陸獲勝，現在夷情窮蹙』。清廷覺得這正可把「進城」「換約」兩件事「一律斬斷葛籐」。御史韓錦雲更說：『夷情叵測，當以威懾，攻破省城，亦不能守，以我之百，攻彼之一，勢無不勝。』他們並沒有想到號稱十萬「有勇知方」的民團，對於一千個「夷兵」，卻「畏敵火器，未能力戰」。只是英軍退去以後，不分皂白把十三行的夷館，一概都燒燬了。英國人看見機會到來，報請政府決戰，他們的

議會沒有通過。首相巴馬斯統因把議會解散改選，始獲多數同意。英政府又煽動法美俄諸國，共同出兵。美俄無意和中國開戰，只各派大使要求改訂商約。惟有法帝拿破崙第三是個野心家，遂借口廣西西林法國傳教士被殺棄，我國處理不當。於是和英國聯合，派兵東來。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冬天，英法聯軍首先進攻廣州。致葉名琛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以內獻城。名琛依然置之不理，也不設備。於是城陷就被虜了。廣州人嘲笑他說：「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後來被押送印度，死在喀爾喀塔。巡撫柏貴出來作英法的傀儡，維持地方治安。從此廣州爲英法軍占領三年。英法俄美四國大使聯合致書中國首相，請派全權代表，到上海會議，清廷遞讓他們去和兩廣總督及黑龍江辦事大臣去交涉。他們以爲清廷沒有談判的誠意。咸豐八年三月聯軍遂北趨大沽，攻破砲台。清廷迫不得已，始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爲代表，接受英法全部的要求，訂立天津條約。同時和美俄也一樣的訂立了。但清廷對於北京駐使及長江通商等款，始終不肯答應，特令桂良等於上海議訂通商章程時設法挽回，並願以全免關稅爲交換條件，桂良等知道這事徒惹反感，未便提出。天津條約和通商稅則總算議定了。這時清廷爲亡羊補牢計，特派名將僧格林沁到大沽設防。咸豐九年五月，英法各國代表又到大沽，預備進京去換天津條約的批准證書。桂良及直督均遣人告以大沽正在設防，請改由北塘口登陸。他們原怕中國有意爲難，隨帶相當的海軍，看見海河堵塞，就憤憤不平，派船拔取防禦設備，並開砲轟擊。我們兩岸的砲台，

出其不意，同時還擊，英法軍艦無法前進，陸戰隊亦陷入泥淖中，死傷甚多。他們衹有退回上海，等國內增派援軍，清廷以爲這次「操全勝之算」，「爲二十餘年未有之快事」。有人建議：「待其窮蹙，取前議而更張之，以免其覬覦之心。」咸豐帝批說：「但不知能辦到此地步否？」可見清廷的處境，實在對和戰都無把握，並不因大沽之役而抱樂觀。爲什麼呢？因爲咸豐九、十年間正是清廷和太平天國內戰最緊急的時候。曾國藩被困祁門，蘇州被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江浙官吏和上海士紳，都想借英法的援助來對付太平軍，因此向清廷再三請求撫夷。清廷惟恐示弱於人，不允請求外兵援助。然而對於英法的實力，也相當明白，所以反願意承認天津條約。大沽口戰事，我們的解釋是很有理由的：倘使英法代表的眞意在進京換約，何必隨帶重兵？海河既爲中國地方，自有設防之權，其意並非仇外，或者是防禦太平軍，爲什麼代表不從北塘上岸，由陸路進京？我們根據這種理論去宣傳，頗生效力。英法並不堅持要雪恥報復。但他們又有賠償損失及條約以外的要求。而咸豐帝纔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的諭旨。兩方重以兵戎相見，就可知帝國主義者壓迫的威風了。

咸豐十年六月，英法聯軍抵大沽，鑒於前次的失敗，移向北塘登岸。襲大沽砲台的後路。我們的礮穴外向，不能反擊。僧格林沁纔深悔「縱敵登岸」之非計，退守通州張家灣。七月十日，天津失陷。清廷仍派桂良往津議和，英法格外的要求全答應了。但到簽字的時候，他們因爲桂良沒有全權代表的證書，頗疑交涉爲中國緩兵之計，所以又決裂了。英法的軍隊直向北京

推進。淸廷改派怡親王載垣爲欽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條件又講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禮在簽字之前聲明，英使到北京後，必須向中國皇帝面遞國書。這是國際間應行的禮節，但那時人都認爲「國體所存，萬難允許」。因提出相對的條件，『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可允行』。淸廷明知道這事辦不到，不過借此想讓他們放棄而遞國書的要求。「不値因禮節而決裂」。巴夏禮不但「固執前說」，反要求撤退僧格林沁的駐軍。載垣便把巴夏禮等一般交涉的人員，全都扣押起來。於是淸廷下宣戰之諭，而英法軍隊也就進攻北京了。

咸豐帝原想「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可是他接到僧格林沁和勝保敗退的消息，就不顧羣臣「堅守京師」之請，而逃避到熱河去了。特派恭親王奕訢留守北京，「便宜行事，督辦和局」。奕訢是咸豐帝的親弟，這時只二十八歲，當然毫無新知識，他曾竭力反對長江通商，並提議捕拿巴夏禮等，這時也接受大命，進退猶豫，十分爲難。及巴夏禮釋放，英法軍焚掠圓明園。奕訢知道除議和以外，毫無其他辦法，只得毅然決然承認了英法的要求，與訂北京條約。九月十一二日兩約互換，英法退軍，我們各賠八百萬兩的軍費，並租借九龍與英國。天津條約當然也全部承認了，這是一部不平等條約的縮影。

我們若把鴉片戰爭以後的南京條約、虎門條約、中美條約、中法條約、和英法聯軍以後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匯合起來看：就可以知道前四約只是不平等條約的濫觴，後幾約可算是不

等條約的大成。我們的國際地位，在咸豐以前尙和外國是平等的，在咸豐以後，我們受帝國主義的鈐制而變爲低等了。南京條約是外國人和我們爭平等的結果，虎門及美法諸約和它是一個系統，雖有不平等的條款，如協定關稅及領事裁判權等，但全由於我們的無識而自動放棄。因爲我們對於關稅向不重視，協定以後，反倒覺得「有嬴無絀」。領事裁判，在唐律就有「諸化外人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的規定，明律始改爲「化外人並擬律處斷」。然習慣相沿，政府仍以「各治其民」爲息事寧人之道，如中俄恰克圖條約，就是最顯著的例子。英美諸國，自然也受到一樣的待遇了，不過我們仍有訊斷之權，在廣東外國人犯法，常常是由我國地方官處理的。倘使我們對於這兩點，能作互惠的要求，那還有什麽不平等呢？無奈耆英一般人不懂得國際法，就隨便的放棄了。及天津條約訂立，外國人纔有意把已得的特權，變爲條約的義務，我們既懵然不懂而且也無法要求互惠了。從此不特外國人犯法，我們不能過問，就是「不軌之徒，干犯國紀，竄身夷館，即屬長城」。我們的法律，簡直因此失去了效力。關稅協定，僅以值百抽五爲率，且非至十年限滿，外人同意，不能修改。又加以「子口稅」的規定，外國人享受免釐販運的特權，洋貨既可以暢銷內地，土貨亦可經洋商之手而免去重徵。我們的工商業受到此種壓迫，簡直不能翻身，只好替外國人作「買辦」了。況且上海在通商後，劃洋涇浜以北爲外人住宅區，經過「小刀會」之亂，他們派兵自守，中國人受其保護，就形成了租界的管理權。外國人代收關稅，和海關由英人掌握，也起源於此。其餘如內河航行，利益均霑，都是由

外人的壓迫和我們的無識而造成，從此我們是受宰割的綿羊，，而民族革命運動自然就要以帝國主義爲新的對象了。

在英法聯軍之役中，我們除去受外人壓迫而訂立不平等條約以外，還有更痛心的事情。就是俄國人的政治侵略。它是帝國主義中的最大一環，在西北東北幾千里的邊境上虎視眈眈，乘我們無暇北顧的時候，假意要好，代作調人，奕訢受了他們的甘言誘惑，借他們的保護纔敢出面和英法交涉，事後這漁人得到極大的利益，把我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百數十萬方里的土地，囊歸己有。他們不僅和英法「利益均霑」，可以在沿海各口岸貿易，並且在新疆也開闢了商埠，又得到海參威以爲太平洋艦隊的根據地。俄國雖然是工業落後的國家，但在十九世紀中葉，近代產業資本主義，業已相當的發達，它參加國際的活動，向中國來侵略，自是當然。不過它沒有和中國正式衝突過，而中國受它的宰割和影響却最大。這是因爲他們的手段高明，還是我們的應付拙劣呢？帝國主義四面張網來包圍我們，一紙條約來束縛我們，造成百年悲慘的命運，發揚民族革命的偉蹟，正需要我們自力更生，努力奮鬪！

第四節　民族自覺之先導

西洋各國在十九世紀中，已完全具備了近代國家的規模。它們有科學文化、機械生產、和民族國家三種性質。我們還是中古式的宗法社會，習八股制藝，靠天時手工，過着窮苦散漫的

生活，人家用槍礮打仗，汽輪運輸，有紀律嚴明裝備完好的軍隊；我們用弓矢交鋒，牛馬運輸，有形同烏合衣食兩缺的士兵：在這相形見絀的情況之下，我們的失敗是當然的。不過失敗還不要緊，只要我們能知道失敗的原因，「迎頭趕上」，加緊建設，所謂「悔而能改」，「以夷制夷」。我們的土地人力都是大有可爲的，又何難在國際舞台上爭取光榮的地位？可惜歷史的形成太久，傳統的遺毒太深，舊社會的根株，一下子不易拔除淨盡，新事業的嫩苗，多少年不能培養長成。直至現在，我們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還不敢說澈底明瞭，齊心改造，何況前清時代的人物呢？我們研究歷史，應該知道歷史的漸變性，對舊社會不宜「揠苗助長」；但也應該知道人力的優越性，對新事業不容錯過機會。中國文化的優點何在？劣點何在？西洋科學的優點何在？劣點何在？我們應該先研究清楚，使維新而不流於形式主義，維舊而不至於「開倒車」。這仍非從歷史中尋求不可。簡括言之，中國文化是「相對論」「辯證法」的中庸之道，是「明道救世」「守先待後」的經世之學，以大同爲理想之社會，以三世爲達成之階梯，原來是很好的。秦漢以後的訓詁考據，宋唐以後的詞藝性理，都走入歧途，看來把中庸誤解爲鄉愿，經世誤解爲功利，中國文化的精神已亡，而社會政治經濟也就停滯不進，日幾於腐爛不堪的田地了。但是在明清之際，我們和歐洲文化開始接觸，朝廷大臣，多持歡迎西洋科學的態度，倘使能繼續下去，那必定可以和它們並駕齊驅。爲什麼雍乾以後，反倒深閉固拒，故步自封，那樣的驕虛自大呢？我覺得這有幾種原因：（一）滿清以異族入主，在雍乾時代，造成

了君主無上的權威，爲歷代帝王所不及。他們向外國人擺架子，更可以對中國人顯威風。(二)帝國主義在南洋中亞一帶的經營，使中國人存了戒心，怕步印度呂宋之後塵。(三)那時人毫無世界知識，他們不明白國際的變局，西力東漸是無法阻止的，只有「以敵之長技而制敵」。(四)漢唐注疏之學復興，中國士大夫「發思古之幽情」，不啻置身漢唐盛世，忘記宋明以來因社會孱弱而遭受的外患了。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鴉片的流毒，我們的身體精神，都因此有很大的退步，而經濟的困難，民生的憔悴，也相因而來。越是貧弱頹惰的人，心理就越頑固。因此民族喪失了二百年的光陰。鴉片戰後，我們仍不能接受西洋的教訓，而亟圖維新自強，固然是我們的守舊性太重，這「業」所積，由來已漸；而外國人敲骨吸髓的朘削和毒化，自亦不能辭咎。英法聯軍之役以後，纔稍稍有點覺悟，企圖維新自強，二十年的光陰，又白白的躭誤了。我們不要責備古人，只要把當時日本維新的事實作一個比較，就可以知道日本的文化沒有基礎，很容易接受外來的新知識，我們的文化基礎厚，漏洞也很多，所以不容易接受外來的新知識，這和一個人的靑年時代，或老年時代一樣。我們如何纔能「化腐朽而爲神奇」呢？似應將民族文化加以改造，擋住帝國主義的外緣，創出自立更生的內力，雙管齊下，纔能挽救中國的命運。國民革命就是適應這種時代要求，和世界潮流而產生的，它繼承民族革命二百多年的偉業，包括維新運動七八十年的成績，在歷史上看，是不容我們絲毫懷疑的。

我們的民族革命原爲反抗滿淸的統制，及至西洋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革命遇到新的

對象，不特意義要變更，而且方法也要變更，所以民族革命就進而爲國民革命了。維新運動雖然是「改革論」，不是「革命論」。但也是對抗帝國主義的一種民族自覺運動，它是使民族革命「變質」「變量」的先驅，而爲國民革命之另外一環，倘使沒有它來適應歷史的漸變性，則國民革命如何能「突變」呢？因此我們應該把它們的演變，交代一番。

無論如何我國的維新運動總是由於外力壓迫隨着時代而產生的。鴉片戰爭以前，中西文化雖早有接觸，但是我們還不受外力壓迫，一切都由我們自主。鴉片戰爭以後，我們的弱點暴露，力量不如人，要抵抗侵略，就必須格外想辦法。林則徐就是第一個先覺悟的人。他在廣東翻譯外國的書報，把材料送給了魏源。他雖未大聲疾呼，提倡改革，但我們要原諒他是六十歲以上的人；魏源在海國圖志裏所說的話，大半都是他的見解。他們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爲什麼我們反倒落後呢？魏源曾說過，

『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機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無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人心之積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刀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煙販煙之莠民。……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去僞，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蓄之，網臨淵而結之，毋憑

河，毋畫餅，則人才之虛患祛其一。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傳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這種心理建設，文化改革的議論，到現在都還有極大的價值。我們雖痛心改革之不早，而尤痛心改革之不實。只憑幾個人提倡就行了麼？所以我們雖有海國圖志，卻無「明治維新」！林則徐在告病家居的時候，有人問他西洋的事情，他說：「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這時俄國和我們幾十年沒有交涉，他已周知俄國終必東下南向的情形，其世界眼光比較後來弈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一般人都高明多了，他臨死還呼「星斗南」，（即中國）始終以國事爲念。何嘗有怕清議指責的心理呢？在道光咸豐年間具有新思想的人，多半是受了他的影響。魏源首開其端緒，固不用說，卽徐繼畬作瀛寰志略，是在福建任巡撫的時候，何秋濤作朔方備乘，又是他的同鄉晚輩，他們雖頗采外人的材料，而實受林文忠的啓發。不過那時的新知識是地理學，以爲地理學可以破除拘囿的陋習，所提倡的是海防論，以爲外人來自海上，能防海則外力可以不至。他們究心於天下大勢和海疆失事之由，均從此着眼。除魏徐何三人外，尚有嚴如熤洋防輯要，李光建海防新編，桂文燦海防要覽，徐金銳防海事宜等，這可以說是「海防時期」。

英法聯軍之役以後，弈訢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纔深深的感覺外國的「船堅礮利」，大胆主張「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又以製造爲先」，於是有各種的「洋務論」出來。他們既在

京內外竭力提倡，社會上也漸漸認識了。這可以說是「洋務時期」。甲午中日之戰，我們的「船堅礮利」，並不亞於日本，其結果是失敗了，這是什麼原故呢？可見只講「洋務」還不行，西人所長不僅在乎工藝，尙有他種學術，於是洋務論一變而爲「時務論」。康有爲梁啓超一般人纔提倡變法維新，這可以說是「維新時期」。在清代晚葉的維新運動，大約可以分做三個時期。海防時期是接受新知識的濫觴，它的事業，只有少數在野的學者提倡研究地理之學。洋務時期是維新事業的正式啓幕，京朝親貴，地方大吏，都很熱心提倡，惟僅限於製器練兵之說，純屬應用科學。維新時期不僅要變朝廷的大法，而且向民間作普遍宣傳，使人人都感覺有改革之必要。這運動對於近代社會有很大的影響，但亦僅注重政治法律而已。以上三個時期是逐漸進步的，他們雖爲中國開風氣之先，究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因爲他們都不是眞正瞭解西洋文化的人，仍有「治其標而未探其源」的毛病；但我們要原諒他們的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他們確已爲民族解放盡到最大的努力，只是認識不夠，魄力不足，所以幾十年維新運動的成績，不過爾爾。民國以後的「新文化運動」，也是接承維新運動而起的，比較對西洋文化瞭解深一層，他們介紹文藝哲學和經濟學，主張「全盤西化論」。以「科學」「民主」爲口號，原來是不錯的。可惜後來他們轉變了方向，一派向右轉爲「新漢學」，一派向左轉爲「唯物論」，這因爲他們對於西洋文化的來源，和中國社會的背景究竟認識不甚清楚。不過從海防論起，到新文化運動止，在維新運動史上總都有他們光榮的地位，著有許多的勞績，因爲他們替民族革命

及國民革命作了，「驅除難」的工作，歷史的漸變性也可由它們來證明。國父領導革命，繼承先民，他的三民主義，是集中國文化和世界思潮之大成，對科學主張「迎頭趕上」，對民族主張「心理建設」。這是維新運動以來精確不移的新方案。我們要抵抗帝國主義，自力更生，捨此莫由。它兼有改造舊社會和推進新事業的兩種功能，拿「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來調和西洋「狂」的文化和中國「狷」的文化。他不僅集維新運動之長而去其短，並且集近代國家之長而去其短，要徹底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研究近代史，若不把這些源流因果關係認識清楚，徒作表面觀察，枝節議論，眩惑耳目，迷亂道路，所謂「愛之適以害之」，那是最可痛惜的。我們在這個大時代的降臨之初，外國人的壓迫之始，追念民族自覺的新猷，益感國民革命的重任，不能不先提綱挈領，略作說明，以後再分章詳述它們的事蹟和成就。

第六章　民族革命之壯瀾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之背景

中國民族革命的洪流，起伏約二百年，到了太平天國纔發爲洶湧的波濤，演出驚天動地的事業。對於反清運動作初步之結束，對於國民革命作先機之啓示，在時代上是革命對象交替的關頭，在社會上是新舊思想轉變的樞紐。它的意義非常重大，它的影響相當長遠，我們應該避除一切成見，極客觀的寫出它在近代史上的地位。

爲什麼這壯瀾產生在道咸年間？其中有幾種原因：一是帝國主義者闖進了中國，滔滔白禍，使人民感覺着將來的壓迫，「患無已時」，遂發出一種自覺的反抗運動。三元里平英團，及佛山團防之事，都在這時的廣州出現。廣東和外人接觸最早，感受亦最深切，所以他們首先有這種民族自覺。而粵省大吏，不善領導，反加以壓迫，他們把官吏看作洋奴，揭帖鬨鬧，竟至撫可如何，英國人也存了戒心。於是有「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民諺。「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則浸浸乎玩大府於股掌間矣」。（粵氛紀事語）人民在鴉片戰爭時，已看透了一輩「嘖呶紛擾，掠取財物，望見夷船，捲包而遁」的士兵。對於清廷統治力就懷着輕視的

心理，他們覺得一方面要抵抗外力，一方面要改建政府，這種革命心理的造成，自然使兩廣一帶變爲革命的策源地了。二是中國舊社會的循環套，總是一治一亂。因爲我們的祖先，對於「富」「庶」之道，沒有十分講求，不知發揮經世的學術，來維持均衡，只有受自然淘汰率的支配了。大亂之後，人口減少，有荒可墾，田產敷用，人民安居樂業，生活程度也略爲提高，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後來人口一天多似一天，荒地一天減少一天，土壤不知改良，水利不知興修，生產力減弱，消耗力增強，生活程度就得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有燒香拜佛，嗟嘆自己的命運不好，士大夫階級和政府當局很少明白其中的道理。縱有少數人「負經世之志」，亦無「經世」之力，只好聽天災人禍自然演化。所以我國有「三十年一小亂，一百年一大亂」的俗語。一遇荒年，土匪蜂起，民不聊生，於是小亂變爲大亂。等到相爭相斫以後，人口自然減少，就「亂極思治」了。清代在康雍乾三朝是盛治時代，嘉慶以後，幾乎無日無內亂，五省內的白蓮教之亂，西北的回亂，西南的苗猺之亂，以及東南沿海的海盜，擾攘多年，而人口增加，還是很急劇。道光二十一年，已達四萬餘萬，較之乾隆初增加三倍，嘉慶初增加半倍。墾田不但未增加，反倒減少，循環套到了最低點，天然淘汰的時候就降臨了。三是人口和土地的分配問題。前章說過以中國的疆土，養四萬萬的人口，本來不成問題，但是在分配方面，一般老百姓那樣的窮苦不堪，土豪富商貪吏，又那樣的奢靡無度，相形之下，未免太不平均了。雖然那些人不能「長保富貴」，可是豪強兼併的情勢，總不能免除。乾隆十三年湖南巡

撫楊錫紱奏說：

臣謂（米價騰貴）由於田歸富戶者：蓋國初地餘於人，則地價賤；承平以後，地足養人，則地價平；承平既久，人餘於地，則地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者，今至七八兩，向日七八兩者，今至一二十兩。貧而後賣，既賣無力復買，富而後買，既買可不復賣。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每歲收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來接濟。而富戶登場之後，非得善價不肯輕售，實操糧價低昂之權。夫一物也，一人市之，價必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則一時頓長矣。十人出售，價不能求多也；一人獨售，則任其高勒矣。如此米穀安得不貴乎？

當時有主張限田者，如漕運總督顧琮即屬一例。他請限制每戶不得過三十頃。可見擁有三十頃以上的地主必很多，在乾隆時已經如此，何況嘉慶以後？道光時章謙在備荒通論裏，估計一個佃農的生活：「耕田二十畝，以中年約之，畝得米二石，還田主租息一石，所存僅二十石。一畝之田，罱斛有費，播種有費，僱募有費，祈賽有費，牛力有費，約而計之，率需錢千。」加以春耕時的高利貸，秋收後而賤價糶，所餘無幾，往往不夠一年的衣食。而豪富之家，「席豐厚，樂驕逸，詠謳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要和大多數食貧之家「樂歲不免饑寒，凶歲塡溝壑」的非人生活來作社會對照，不革命還有什麼辦法？四是官吏的瀆職，并不因人民生活的窮苦而稍緩，反因社會的困難，而貪黷更甚。清代以利祿誘惑士大夫階

級，原欲製造「漢奸」，壓製反側，結果是「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柏梘山房文集書後）「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無敢議其非。」（郭嵩燾語）況且政府以賣官鬻爵來培植貪污，以薄俸陋規來驅使貪污，社會上又以「書中自有黃金屋」來獎勵貪污，於是中國整個成了自私自利的貪污世界。王命岳在懲貪議中說：

臣聞治理必先懲貪，懲貪必先旌廉。議者謂小吏之不廉，大吏導之也，至大吏之不法又誰導之？臣於是不能爲在內部臣諱也。蓋其一能鬻朝廷之爵，而使天下無廉吏：其一能賣朝廷之法，而使天下之貞良無所勸，污黷無所懲也。夫天下無廉吏，而又善者無所勸，惡者無所懲也，幾何不縱千百虎狼於天下，而吮盡天下之蒼生哉？

士大夫階級是統治者，他們當官作吏，生活總要比一般人高貴些。（除士人中的教書先生是清貧的）林則徐是清廉的官吏，他一生作過幾十年的督撫，死後只有幾萬兩的遺產。他說：「食貧之人，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可是他的家信說他兒子在北京做官，一月有八十兩銀子，還極「清苦。」這固然由於中國的大家庭制度和宗法社會，寄食的人太多，但官宦人家的排場，也可以略窺一二。因此「操臨民之業者皆大贏」。（我佛山人傳中語）不管就地位上和生活上打算，自然是一種極好的職業。所以人都拚命向官場裏鑽營。官吏一天一天的加多，民生就日益痛苦，這豈但是「千百虎狼」，簡直是遍地虎狼，天下蒼生，受其吮吸，憔悴

呻吟，到了不能再忍的時候，只有相率揭竿了。五是對外國際貿易，本來是「出超」，因鴉片輸入一變而爲「入超」。從道光七年至十三年，大約有三千七百萬兩以上的紋銀出口。道光十八年，一年就輸出一千多萬兩。（檢視當時的貿易統計表可知）由於金融的外溢，發生銀貴錢賤的現象。嘉慶以前，每兩易錢約一千文，道光初就換到一千一二百文，十八年換到一千六百文，二十五年換到二千至二千二三百文。民間用錢作交易的媒介，而納糧只要銀子。以錢折銀，「朝廷日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一般傭工的收入是錢，折銀就只合一半了。「流亡之衆，逋賦之多，實由於此」。中國老百姓內受官吏富豪的壓迫剝削，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再加以水旱天災，流離顛沛，與其朝不保夕作逃亡的生活，何如挺而走險作掠奪生活呢？

綜上五因：（一）民族自覺，（二）治亂循環，（三）豪強兼併，（四）官吏榨朘，（五）金融外溢，都是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這時的政治腐敗如此，法制已有名無實，道德也部份的失其維繫力。再加以西洋勢力的壓迫，我們無法抵抗，眞成了內外交侵的情勢。民族革命運動遇到這樣的時代和環境，自然要突飛猛進了。

第二節　太平天國之前驅

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洪秀全是民族革命的承啓人物。官私記載都說他是朱九濤或洪德元的弟

子，接續他們的勢力而起的。朱洪的事蹟無可攷，但總是天地會的首領。道光末年在廣東起義，很像後來的洪大全。天地會黨人假託朱姓洪姓是二百年來的老套，就是洪大全也是一個託名，他原來姓焦。我們根據中外史料和當時的事實，不妨如此假定。因爲湖南兩廣的地方官，拏獲會黨，都供有朱九濤，爲廣東老萬山會首，張添佐改名亦松子，亦稱徐先生，廣東雖有老萬山而遠在洋外，乃會黨「開山堂」的名稱，並非實指其地。先生是會黨對軍師的稱呼，乃第二首領。法人卡勒與伊凡合著的中國叛黨起源志 (Callerg et Ivan: L'isurrection en Chine Depuisson Origine Jusqua la Puise de Nankin 1853) 描述天德皇帝的事蹟頗詳，有張添佐爲軍師，彼自稱崇禎帝的十一世孫。天德即洪大全，他旣自稱明後，必有一個朱姓的名字，大約即朱九濤。不然，以一個舉世轟傳的會首，爲什麼官方查不出人來？賽尙阿擒獲洪大全的奏摺說：『上年湖南撫臣所稟永安城中有朱九濤李丹其人，該犯口操楚音，恐其改名隱匿。又傳聞洪秀全入永安後，曾邀來天德王入住城中。又聞賊中有一湖南和尙，與洪秀全技倆相等。』這推論大致不錯。洪大全在衡州時確曾當過和尙。「大凡會匪姓名，隨時更易，預圖趨避。即使姓名得實，又有隱語暗號，且多冒稱朱姓，爲前明後裔，並間有假稱洪武字樣者，更可藉此爲煽惑之由。」（咸豐元年徐廣縉葉名琛奏語）至於洪德元洪大全聲音本極相近，或也是一個託名被人傳寫錯誤的。我們所以要首先說明這一點，就是爲的要知道洪秀全早年出身於天地會。雖然以後他自己不承認，但他的民族革命思想，以及太平天國的制度，都由天地會而來。他是

一個繼承者。

然而直接承襲天地會的勢力，首舉革命義旗，爲當時黨人所擁戴，結果被洪秀全陷害的，就是天德皇帝洪大全。據法人所記：他曾在廣州北門，貼過賞單，購粵督徐廣縉的首級，署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可見天德的稱號，在道光二十九年已竟建立，尙早於洪秀全金田起義一年。不過他們沒有固定的地方，只憑散漫的會黨，雖然聲勢不小，而實力確屬有限。魏源在聖武記裏說：

楚粵邊郡，奸民爲天地會締黨插約，橫行鄉曲，小剽掠，大擅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吏不敢問。而彬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黨與漫三省，逋逃數聚，論者謂邊防隱患，在苗猺之右。

魏氏所謂「在苗猺之右」的「邊防隱患」，果然在道光末年爆發了。因爲天地會的潛勢力散佈在南方楚粵一帶，所以湖南兩廣成了革命的策源地。新寧李沅發，首舉義旗，攻城戕官，但不一年即被擒。陳正成在廈門設三合支部，被拷掠而死，其黨黃威到咸豐三年纔起事，猶稱奉「大明天德皇帝」的詔旨來征廈。兩廣一帶，蜂起雲湧更不必說：如大頭羊（即張釗），大鯉魚（田芳），羅大綱（均在大黃江口，賊情彙纂言羅爲揭陽海盜。）顏品瑤，顏品寶，蘇礙三（高廉一帶），李士青（欽州），張家福，鍾亞春（慶遠），陳亞癸，陳東興，山豬箭（柳州），劉官方，梁亞九（武宣），區振祖（象州），謝江殿（潯州），張嘉祥（高要人，

在貴縣爲盜魁，擁衆萬人，以劫富濟貧爲號召，有「扶弱鋤強張嘉祥」之謠。按察使勞崇光招撫之，改名國樑，後隨向榮追擊太平軍，爲江南大營總統。）以及湖南竄來的雷再浩等，不下數十股，大都和天地會有關係。他們藉着官虐民怨的情況來號召遠近，作「反清復明」的事業。只因會黨的組織是平等的，彼此不相統屬，各自稱王建號，所以散漫而無力，洪大全知道這樣不能成事，乃自稱爲「天德皇帝」，假託明裔，想成立「統一陣綫」。可惜廣東有葉名琛那怪物，在作巡撫總督，他對付外國人不行，對付革命黨卻有辦法。他下令對會黨「格殺無論」，當時死者有十幾萬人。他還自誇的說：「若將屠毀村鎮包括在內，當四倍於此。」（見葉名琛浮海記（Yeh's Portrait）經過這一次大屠殺，會黨在廣東漸漸不能立足，多半都投到洪秀全的太平軍中，而天德皇帝本人，也就成爲秀全的上賓了。我們看洪大全自己的供詞：

我是湖南衡山縣人，年三十歲，屢次應試，考官屈我的才；我心中憤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數年前遊方到廣東，遂與花縣人洪秀全馮雲山認識。洪秀全與我不是同宗。他與馮雲山皆知文墨，屢試不售，也有大志。先曾來往廣東廣西，結拜無賴等，設立天地會名目。馮雲山在廣西拜會也有好幾年。凡拜會的人，總誘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後來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學有妖術，能與鬼說秀，遂同馮雲山編出天父天兄及耶穌等項名目，稱爲天兄降凡。事問天父，就知趨向。生時就爲坐小天堂，就被人殺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會內之人。故此入會者固結不解。這是數年前的作用，我盡知的。我是道

光三十年十二月間等他們勢力已大，我才來廣西會洪秀全的。那時他們到處造反，又將曾名改為上帝會，洪秀全就叫(我)為賢弟，尊我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請教於我。他自稱太平王。我叫洪秀全為大哥，其餘所有手下的人，皆稱我同洪秀全為萬歲。我叫馮雲山等呼名字。去年閏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我同洪秀全於初七日才坐轎進城的，止有我兩人住在衙門正屋，稱為朝門。其餘的人皆不在裏頭住。歷次打仗，有時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請教我的。我心內不以洪秀全為是，常說這區區一點地方不算什麼，那有許多稱王的？且他仗妖術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勢子，將來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稱我萬歲，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實我的志願，安邦定士，比他高多了。他的妖術行為，古來從無成事的。且洪秀全耽於女色，有三十六個女人，我要聽其自敗，那時就是我的天下了。近因四路接濟不通，官兵圍攻，不能安居，因想起從前廣東會內的人不少，梧州會內人也不少，就起心逃竄。我同蕭朝貴帶有一千多人，五更時走的，被官兵追上，蕭朝貴不肯聽我令，致被打敗，將我拿住了。至於本姓，實不姓洪，因洪秀全認為兄弟，就改為洪大全的。(見故宮博物院軍機處檔案咸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賽尚阿奏摺附單)

這供詞曾見之於邸抄，被譯載於叛黨起源志中。雖然還有「不實不盡之處」，但所述太平初起的事跡，都很正確，必非滿清將領所能偽造！可是當時人都以為「賊衆竄出，無可如何，

不得不張皇裝點，藉壯國威，並以稍掩己過」。（陳壇疏語）因此清廷不相信賽尙阿的話，「壘與薄懲」，轉說洪大全「原非首要之匪」。然而當時把他押解赴京，（解官爲郎中聯芳員外郎丁守存）沿途督撫都有奏摺，刑部更有「廣西逆首洪大全押解到部」的專摺。爲什麼那樣鄭重其事？清廷自相矛盾，隨便的把大全殺了，足見他們對於太平天國的認識太有限，却不料引起後來對於洪大全這個人有無的懷疑，眞正奇怪極了。洪秀全最初和大全「結拜天地會」，後來「恐怕人心不固」，纔編出天父天兄，「將會名改爲上帝會」。他所以能尊洪大全爲天德王，和他「同稱萬歲」，必然洪大全有他自己的身份和實力。他號稱爲「天德皇帝」，得天地會黨人的擁戴，洪秀全在天地會最初還不如他的地位高，所以當時天地會的文告中，都說：「封洪秀全爲太平王。」（見太平天國詔諭）洪秀全雖未必受他人之封，然而在天地會的傳說和系統中，皇帝是姓朱的，被洪大全先假託去了。洪秀全早年假借天地會，起事利用天地會，後來又反對天地會，在他發布的書籍中，都可證明。其原因據說是他主張反清而不復明，內心卻恐怕自己當不成皇帝，所以「必當另建新朝」。洪大全在廣東失敗以後，寄人籬下，雖被洪秀全優禮，亦頗有紆尊降貴之感。他不願稱萬歲，「自居先生之位」，「叫洪秀全爲大哥」，不過爲養晦待時之計。漫說洪秀全不疑心他，就是楊秀清蕭朝貴一般從龍功臣，又何能甘居其下，而奉此別派之首領乎？天地會和上帝會的思想分離，不僅是「神道設教」的偶像不同，實亦由此「兩頭政治」之勢力衝突，所以天地會黨人「不久輒散去」。（見中國祕密社會史）只

有林鳳祥羅大綱始終未去，而「蕭朝貴不聽我令」，洪大全終於被擒了。賊情彙纂說：『楊秀清忌其才，又惡其說，遂囚之。』平定粵匪紀略說：『或曰秀清囚之而逸出被獲也。』我們看賽尚阿的奏摺，也說，『其被獲時頭戴風帽，身穿袍服，自行鎖紐。』他爲什麼「自行鎖紐」？供詞中未曾明言，但在他的題詞裏，可以看出一點消息：

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綰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虎口」「賊徒」都不是指太平軍麼？秀全「多有請教」，所以一般人說太平軍的制度是大全手訂的，他是「謀主」，（清廷也說洪大全即逆首洪秀全之謀主）似非無根之譚。詞中謂「運籌工」蓋即大全自詡之詞。「漫將金鎖綰飛鴻」則顯有被囚之事，不能爲俘獲解說。除非我們能證明這首詞是假造的。但咸同間人，未必有如此之好事者。大概洪秀全馮雲山是天地會的舊黨，對他還有相當的禮貌，楊秀清蕭朝貴是上帝會的信徒，對他就不大客氣了。楊蕭有意陷害他，是可信的，目的在假手敵人以清黨。從此天地會和上帝會完全分離，彼此都諱言兩方合作的源流，大有「各行其是」「醜不外揚」之意。但是天地會爲太平軍作了除難的工作，而洪秀全反數典忘祖，肆意詆排，失去一般老革命黨的同情和協助，也是他後來失敗的一大原因。

附帶還有一個遺像的問題，不得不略爲說明：近人書中所載之洪秀全像，完全是不對的。

此像初見於法人的叛黨志，署名「天德」，謂係天德皇帝到處發布，以題示明朝衣冠者。年貌都和洪大全相合。假如是洪秀全，就必戴風帽，有鬍鬚，是一個四十歲以上「面闊高顴」的人；而決非穿戴明朝衣冠，三十左右，面貌清秀的人，那無疑的是洪大全的像了。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興亡

洪秀全是廣東花縣官祿㘵人。生於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即西歷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他先世是潮嘉一帶的「客家」。客家原是中原漢族避異族之亂南遷的。他們保持着強固的民族思想，因聚居山地，有堅毅勇敢勤苦耐勞的性格，常和「本地人」發生衝突，甚至械鬬。他父親名鏡揚，是鄉村裏的「堡尊」，因累世業農，家境頗苦。他自幼就入村塾讀書，聰慧異常，成績優異，塾師父老都很稱贊他，期許他。十八歲始輟學，作村塾教師。他四次到廣州去應試，四次都失敗了，始終未得「青一衿」（秀才），心中十分怨恨。但道光十六年第二次應試時，在街頭上遇着基督教傳教士梁發宣講，贈以宣傳小册名「勸世良言」。次年，他第三次失敗，精神受了很大的打擊，沮喪回家，大病四十多天。病中夢見各種幻象：一老人「遣天使接天王升天，命誅妖，復差天王降凡救人。」又硃書：「天王大道君王全」，他覺得這是「受天之命」，要做人王，因改名秀全。（他原名仁坤，小字火秀）並作詩一首說：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展爪似嫌雲

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

在這詩裏可以看出他的氣概不凡。其態度亦有顯著的變化：他從前活潑詼諧，病後則端莊嚴肅，儼然判若兩人，因爲他既有帝王思想，自然摹擬帝王的風度了。不過這只是他的一種妄念。其實他受了士大夫傳統的遺毒，仍想靑雲得路，榮耀鄉里，在幾年的教讀生活以後，他最後又到廣州應試。（道光二十三年）結果依然失敗。於是纔由愛慕而生怨恨，蓄志作排滿革命的事業。這正是鴉片戰後，廣州人排外抗官氣焰高張的時候。他曾和弟洪仁玕說：

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奴，誠足爲恥爲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爲煙土，收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爲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向伊黎省或烏隆江或吉林爲奴爲隸乎？（見英傑歸眞）

仁玕後來說他：「論時勢則慷慨激昂，獨恨中國無人，盡爲韃妖奴隸所惑矣！」「與言及此，未嘗不拍案三嘆也！」他痛心中國幾千萬金銀「化爲煙土」，可見他受了鴉片戰爭的影響。他痛心五萬萬華人，受制于數百萬「滿洲狗」，可見他受了民族革命的影響。他和天地會黨人聯絡，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授徒蓮家塘李家，始翻讀勸世良言，乃恍然大悟，夢中之老人，就是天父皇上帝。從此他的民族革命意識裏，又籠罩一層宗教思想，把勸世良言作爲新奇的「天書」，以牽強附會他的幻夢。自信是天父的第二子，耶穌爲天兄。奉命誅妖，拯救天

下。憧憬於天堂永生之快樂，創出一種「惟從上帝」的新宗教。因自施洗禮，並將家中偶像及塾中孔子牌位除去。逢人宣傳，言者不多，不久就爲村中父老所反對而失業了。乃不得不和最初結合的同志馮雲山——也是一個考試失敗而心懷不平者，去到廣西另找活動的地方。

道光二十四年，秀全往貴縣賜谷村約十月，苦心傳道，僅得信徒百餘人，頗覺失望，仍回花縣。但馮雲山早已獨往桂平縣紫荊山，雜在燒炭工人裏面，宣傳新教。三年間居然得到三千多信徒，遂組織「拜上帝會」。秀全家居設帳，苦行冥索，也形成了一套革命理論，他說：『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爲界，猶如父親分家產於兒輩，各人當尊重父親之遺囑，各自保管其所得之產業，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耶？』他認爲天父一家，分居萬國，各治其族，各享其樂，彼此應互助互愛，不應互爭互奪。以宗教爲出發點，欲實旋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甚至於社會革命，頗近於理想的大同世界，這道理原來是不錯的。可惜他的知識太淺薄，所倡之基督教，是個不倫不類的東西。他只知利用基督教的皮毛名辭，（雖然他在道光二十七年到廣州見美教士羅孝全(Rev.I.J. Roberts 但未受洗禮。）骨子裏仍是白蓮教假託神權號召愚衆的一套把戲。他讀過一些中國書，腦筋受儒家思想的支配，但他「學書未成」，對中國文化還沒有深切的瞭解，又因屢試不第，遷怒詩書，假耶教不拜偶像之說，揭棄孔孟，這和李自成的丞相牛金星因殿試不中，到處濫殺進士是一樣的心理。他既迷信上帝，教人「信實有福」，「無災無難」，「撒手時天堂易上」；「叛逆有哭」，「蛇虎傷人」，「盡頭

處地獄難逃」。說人生是「小天堂」，死後昇「大天堂」，孔佛道三教都是妖魔。其實他們自弄玄虛，「學有妖術」，楊秀淸假借「天父降凡」，蕭朝貴假借「天兄降凡」，亂說「鬼話」。這樣一知半解，不中不西，迂腐荒謬的宗教思想，無怪乎引起眞讀中國書的曾國藩，和信仰基督教的洋人反對而失敗了。

他第二次到廣西和馮雲山相會，在道光二十七年。這時拜上帝會的勢力，已蔓延廣西東南各縣。燒炭工頭楊秀淸、蕭朝貴、富豪石達開、韋昌輝、地主曾玉珍、山民胡以晃、鑛工秦日綱等，都加入了他們的組織。隱奉秀全爲領袖、教主。他們的勢力旣大，到處搗毀廟宇，地方士紳當然視爲「邪教」「會匪」，馮雲山被捕入獄。桂平知縣以爲是天主教，不願干涉。僅將其遞解回籍。他把押送的差人說服了，一同逃到紫荊山。秀全因運動營救雲山赴廣東，雲山亦追蹤回花縣，二人密謀策劃。道光二十九年，他們重回紫荊山。這時兩廣的天地會黨人，業已到處起事，土匪乘機騷動，官吏置若罔聞，老百姓已感覺極大的不安。再加以饑民挨戶搶糧，紳商團練自衛，貧富階級的對立，土客械鬬的紛擾，都顯示着大命革爆發的前夕，整個的舊社會已走向崩潰的道路了。洪秀全馮雲山在這種環境之下，豈有不加緊訓練組織的？果然機會一到——上帝會信徒被官兵壓迫而反抗情緒最熱烈的時候，他們就在金田村高擧「太平天國」革命的義旗。這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値秀全三十八歲的壽辰。

咸豐元年（卽太平天國辛開元年）閏八月初一日，太平軍攻破永安（蒙山縣）。秀全自稱天

王，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清督師賽尙阿圍之。二年春，秀全等突圍，進攻桂林，未克，改圖湖南。過蓑衣渡，馮雲山戰死，蕭朝貴攻長沙，亦陣亡，他倆一文一武，是洪秀全最得力而且最忠實的高級幹部，他們的死對於太平軍的損失很大。秀全圍長沙，清兵追蹤雲集，堅強抵抗，乃向湘江下流進展。在岳州得到吳三桂留下來的軍械，並掠奪五千多隻帆船，實力補充以後，就直逼武漢。他雖打下了漢陽武昌，並未留兵防守，設官立治。他採取錢江的建議，咸豐三年正月，一直向長江下游進攻，沿途攻破九江、安慶、蕪湖。二月九日，打破南京，就定都於此，名曰「天京」。他們從金田起事至此，爲時不過二年兩個月，便以疾風迅雷之勢席捲了東南。初起不過一萬多人。到南京就有幾百萬人，（賊情彙纂統計男丁一百八十萬，婦女共三十餘萬。太平天國野史統計伍卒聽使共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人，合各官卒使總共三百零八萬五千二十一人。）何以能這樣的順利呢？其原因大約有三種。

（一）宗教的誘惑　當時一般的民衆，正陷於天災人禍水深火熱之中，在饑饉死亡線上爭扎，洪秀全以未來的福音，麻醉了他們的慘痛，使他們憧憬於「天堂」永生的快樂，去跟着「打江山」。這和白蓮教是一樣的具有煽惑的作用。及其勢已成，則裹脅更易。李秀成供狀說：『天王常在深山內密藏，敎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貧苦之家，積多結成聚衆。』可見其最初的

信徒只有一些貧農。而楊秀清所領導的桂平平隘山燒炭工人，秦日綱所領導的貴縣北山里的礦工，都是他的基本羣衆，大多數爲被排受苦的客家人。後來在長江一帶加入的，仍是農村裏的貧民。曾國藩致其弟書說：『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並陷，遂靡然以爲天傾地坼，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蓄髮助戰，希圖當軍帥旅帥以訛索其鄉人，擄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我軍爲之震駭。』胡林翼的奏疏也說：『皖省賊匪因年荒糧盡，裹脅飢民數十萬。』所以有人說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是貧農的革命。楊秀清蕭朝貴發布的檄文，都指責「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清人「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的罪惡結果。而自謂「體上天好生之德，痌瘝在抱，行仁義之師，胞與爲懷」；那一個不願意「常生有路，得享天福」，而甘願「受其（滿洲）淫污惡毒」，「幇妖變鬼」呢？因此就「蓄髮助戰」了。

（二）民族的思想　漢人受壓迫約二百年，民族思想早已潛滋暗長，一旦遇着春雷驚蟄，焉有不茁茁旺盛的道理？洪秀全雖代表貧農階級起來革命，可是他本身不見得是沒有飯吃的，而韋昌輝、石達開、胡以晃等却遠稱富有之家。可見他們的革命，不僅是受生活的壓迫，尚有民族意識在內。天地會黨人到處響應，多半是這種原因。我們看楊蕭的奉天討胡檄，就知道他們特別注重這一點：

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

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尚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氛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汚，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汚，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眞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淸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徵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攄公憤以前驅。

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務期肅清胡氛，以享太平之樂。

他們對於一般民衆的宣傳，是敷陳基督教義，解決生活；對於士大夫階級的宣傳，是闡發民族大義，報仇雪恥。技術相當的巧妙，自可引起漢人的義憤激愾，以從事於革命了。

（三）軍事的組織　太平天國的軍事組織，是摹仿中國的古法（周禮及司馬法），以軍爲單位，下分五師、五旅、五卒、四兩、五伍，共士卒一萬人，伍長二千五百人，兩司馬五百人，卒長一百二十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師帥五人。合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一切制度都以此爲基礎。他們曾經過相當的訓練，尤其在精神方面。所以紀律比較的嚴明，戰鬪比較的勇敢，富有新興的朝氣，不怕犧牲。就是他們的敵人曾國藩也很佩服的。賊情彙纂詆毀太平天國「百事妄誕」，而獨稱贊其『隊伍之制，條目井井，雖時有損益，於初制終無改移，蓋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爲足恃也』。又說：『蔓延數省，未見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愆於法，有以啓之。』可見他們的軍事組織比較當時的官軍高明多了。官軍分兩種：卽八旗和綠營：八旗的戰鬪力早隨着滿人的養尊處優而喪失了，綠營的腐敗，在嘉慶時亦已完全暴露，所以白蓮教的平定，還仗着鄉勇之力。道光以後，更不用說。士兵無衣無食，（很低的餉糧也爲官長所剝削）自謀生計，沒有紀律，沒有訓練，擾民有餘，打仗則簡直談不到。這怎麼能和太平軍抵抗呢？

此外太平軍的公產制度，禁止財物私有，平等制度，上下都稱兄弟，也是使一般窮苦老百姓欣欣嚮往之一種原因。可是他們沒有軍略，沒有能抓着士大夫階級，而一切制度，在高級人員方面，又不能以身作則，所以仍不免失敗了。

洪秀全到南京以後，派軍西征北伐，連檣江上，陳師河朔，聲威振於全國，影響達於世界，可謂盛極一時。但是得地不能據守，沒有一定的疆域，長江的軍事要點，上游則武漢旋得旋失，下游則上海始終未佔。（咸豐三年小刀會劉麗川佔領上海約一年半，秀全不加援助，卒失敗。）甚至清軍的江南大營，逼圍南京，江北大營，雄視揚州，對江的浦口，江浦，都不能長期保守；而又不全軍北進，力爭畿輔，林李孤軍無援，卒被殲滅，在軍事上可以說是完無策略。這已經注定了他的命運。咸豐六年又起了很大的內訌，更予以致命之打擊。以後尚能支持八年，完全因為後起的兩個良將：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陳玉成，他們雖然一方面利用大股的捻匪作為聲援，把湘軍名將李續賓圍殲三河，一方掃蕩江浙皖贛，把江南大營的總統張國樑逼死丹陽，但仍是狂飈式的破壞工作，只有牽制的力量，全無建國的企圖，結果陳玉成被捻匪騙執，李秀成自蘇州回京，也就一籌莫展了。曾國藩說他們「奔命各處，實有日就衰落之勢」，大致是不錯的。所以他們在十五年間，為民族革命開一朵燦爛的奇花，但並未結下果實，就被暴風雨摧殘了。

他們的內訌，也是當然的，無可避免的，因為洪秀全的智識太差，沒有駕馭羣雄的本領。

他的朋友洪大全，謀士馮雲山，勇將蕭朝貴皆戰死，更使他失去了靈魂。楊秀清是一個機詐自尊的人，權術有餘，才德不足，秀全使他獨掌大權，其他各王均須受其節制。天王稱萬歲，東王稱九千歲，西王八千歲，南王七千歲，北王六千歲，翼王五千歲。奏事時，東王立在陛下，其餘則跪在陛下，並須到東王府請安議事，跪呼千歲。這和初起時結盟同宗的意義，已經不合，而秀清儼然是副領袖，怎能不使其他諸王忿恨呢？況且秀全自到南京以後，深居宮中，大過其皇帝之癮。務求享樂，不問朝政，一切委之楊秀清，一方則威權下移，一方則恣睢日甚。賊情彙纂說：

夫首逆數人，起自草莽結盟，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機發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勢。今踞江寧，為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聲色貨利，往日倚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痲痹不仁之象。賊之敗亡，可燭照而數計矣。

「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果然天王疑心楊秀清要取而代之，陰族韋昌輝以計殺秀清，石達開心懷不平，昌輝又把他的眷屬殺了，專橫一如東王。秀全眼見去一楊秀清，又來一楊秀清，乃下令殺北王。欲聯絡翼王，而翼王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遂別樹一幟，縱橫江南，最後入川，亦為駱秉章所擒。天王遭此內訌，疑忌外臣，寵用胞親，政治混亂，而羣衆從此解體了。

他崇拜上帝，最初是一種神權的假借，後來簡直變成瘋狂的迷信，我們從他的宣傳品中。隨處都可以看見。李秀成供狀說：『天王自失東王北王之後，不知謀慮，不問政事，一味只知靠天。上帝教原是起兵時第一着。但是既立江山之後，總有許多軍民制度，一切愛民的政治。天王迷信過深，竟謂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將政事辦好，可笑安福王等不思開導，反多附和，從此天王實認天是眞權眞力，其他一事不管。後來人心也亂了，糧食也盡了，還是只講天話，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直至殉國，只守此心，信道可謂極篤，然國破家亡者，皆此之由也。』李秀成向他報告「圍城糧絕，衆心解體」。他說：「朕奉天父天兄命下凡作九洲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爾畏死，去留任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助，自有人扶助，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國藩）乎？』天京絕糧，他下令教人食甜露，說是天食。辛酉十一年，詔改太平天國爲上帝天國，但並未實行。如此荒唐可笑，焉得而不失敗呢？

其實他只是一個三家村學究，智識是低級的、落伍的，他的思想，大半受祕密社會的影響，他的政制完全是封建的殘留。他褒封諸王，獎勵功臣，皆是「累代世襲」，規定稱謂，制作禮儀，「不得潛分干名」。己則帝制自爲，官則羊頭濫封，封建意識，非常濃厚，個人主義，盡量發揮，自稱爲上帝之子，國宗皆特殊階級。他們禁止私有財產，一切都歸入「聖庫」，日用按照規定的數目支領，但是高級人員却不受限制，積聚貨斂，窮奢極侈。他們很嚴格的禁止男女混雜，夫妻會合，說是：『創業之初，必有國而後有家，先公而後及私……不憚目前之

勞，必享將來之福。』『太平一統，那時天父開恩，論功封賞，使一般兄弟，室家相慶，夫婦和諧，猗歟休哉！千萬年之功業在此，千萬年之福祿亦在此。』但是高級人員，徵歌選色，廣蓄姬妾，秀全在永安，就有三十六個女人，以後更不必說了。這怎麼能使他們的下級幹部心服呢？「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作法，依舊是社會官僚的遺習，可見他們並無建設新國家新社會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蔭子的幻夢，沒有一定的方向，徒多矛盾事實，偶竊偏隅，意驕志滿，「那能成大事」？

一般貧農革命的性質，都是信仰異端，想謀本身的福利，這和統治階級的士大夫立於相反的地位，必定要遭他們的敵視。倘使革命領導者能向士大夫階級謀妥協，或許可以建立新政權，但貧農本身的利益，自然就要犧牲了。只有藉人口的減少來調劑現狀。洪秀全不但信仰異端，並且是中國所未有的異端，不但不向士大夫階級謀妥協，並且竭力向他們進攻。他本身如果健全的話，未嘗不可與舊社會一決雌雄，可惜他本身缺陷甚多，如何能和根深蒂固的舊社會相敵呢？王闓運說過：『洪寇勢大，非稍用智略不定。今之曾李，少勝洪陳，因收其功，亦非天幸。後之論者，未識幾人知此？』這話說得很對，曾國藩是翰林出身，其教育程度，比洪秀全高得多，等於一個大學教授和小學學生，何況他又是幾千年舊社會的代表人物呢？他的「討粵檄文」攻擊洪秀全說：

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

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汚其宮室，殘其身首，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神鬼所共憤，欲一雪此恨於冥冥之中者也。

曾國藩以禮義名教來激發士大夫，以忠臣廟宇來激發鄉農，他領導這兩種人反對洪秀全，絕不談民族問題，只擁護中國文化，大多數中國人當然同情他。清初的天主教，就因不拜祖先一事而遭禁止，何況洪秀全要澈底宗教革命？宗教革命還不要緊，為什麼連孔孟都排棄，中國書都不許讀？這樣倒行逆施，無怪乎他失敗了。後來他纔明白這種道理，將中國的典訓，增入宣傳品中，太平詔書所加特多，並託為天父降凡說：「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眞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士果備而習焉，則煥乎有文，斐然成章。」（見士階條例勸戒士子文）可惜時間太晚，湘軍的勢力，業經起來。其實他們的思想，多半還是中國的舊思想，只襲取基督教的外貌，反掩蔽了正當的民族主義，這是他們的最大失策。我們看當時人對他們的批評：

著書之人本生長於中國，所習見習聞者，皆中國孔孟之理。乃後入耶穌教，故所言猶是儒理。其實耶穌之道，愛人如己，與儒家不甚相遠，惟不敬鬼神一節稍異耳。（見拙著太平詔書跋）

據傳說左宗棠在長沙曾勸過洪秀全，教他放棄基督教，標幟中國孔孟之教，他沒有聽從。

後來左宗棠也是他的一大勁敵。可是洪秀全對於中國的社會背景認識不清楚，對於天地會的歷史背景，也認識不清楚，然而他本人完全受了這兩種背景的影響，一切受它們的支配。卻口口聲聲反對它們，豈非自討苦吃？曾國藩代表中國社會，領導士農階級，運用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四面包圍，漸逼漸緊。同治三年，他弟弟曾國荃攻克南京，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就此亡了。

第四節　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

洪秀全失敗了，但太平天國的革命精神，對於後來影響卻非常之大。第一就民族革命來講：他們承襲天地會的思想，雖沒有把滿清打倒，然而政權轉移於漢人手中，「反清」的目的，可謂已達到了一半，因為道光以前，中樞部院的長官雖漢滿兼用，而實權完全操之滿人，地方大吏旗人約占十分之八，清廷對於漢人，防閑很嚴。尤其是出征的將帥，漢人從無居之者。咸同以來清室舊臣，牽延失機，功效毫無，遂不得不重用曾國藩等以平亂，於是把命運寄託在湘淮軍身上，自然喪失了統治的能力，將相要職，就全屬漢人了。曾國藩總督兩江，節制四省，長江一帶，歸其掌握，當時湘軍一系人物：「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郭嵩燾與曾沅浦書語）淮軍代興，其勢力亦與相埒。所以同光間的封疆大吏，多半是所謂「中興將帥」。中樞自文祥引沈桂芬入掌軍機，漢人政權漸漸抬頭，其後孫毓汶、徐用儀、李

鴻藻、翁同龢等亦頗能握政府實權。從前滿人統治的局面，就變爲漢人統制的局面了，這不是太平天國的影響麽？民族革命在實際上已有相當的成功。南京攻克以後，曾國藩爲避嫌遠謗計，把湘軍解散，使之各歸田伍，那些百戰餘生的將士，那裏遠肯耕地？「憤鬱悠沮」，「謀生無路」，相率都加入會黨。（官場現形記說「所有前頭打長毛得過保舉的人一齊歇了下來，謀生無路。很有些提鎮副參，個個弄到窮極不堪，便拿了飭知獎扎沿門兜賣。這時只要有人出上百十吊錢，便可得個一二品功名，亦要算得不值錢了。」中國祕密社會史說：「平定粵匪以後，湘軍撤營，窮於衣食之途，從而組織各團體，於是哥老會始盛。除有仍爲水陸軍將弁者外，餘則皆以賭博盜刼爲業。」）他們本來是軍人，仍舊和軍人聯爲一氣的，所以「民族主義更流傳到軍隊」。據說江南提督楊金龍即哥老會首領，左宗棠曾國荃都有被迫爲「大龍頭」（哥老會的頭目）之事。（見　國父民族主義第三講及清稗類鈔會黨類）可見太平天國雖亡，而民族革命的勢力，反因此而大增。後來辛亥革命能利用會黨及新軍，都由於這種關係。國父十三歲，「聞太平天國某老遺兵講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許，革命動機於是萌芽」。（見年譜）他的思想淵源，和革命實力，大概是襲洪秀全的餘緒。我們看陳少白的講演錄，就可以知道。不過洪秀全只影響到滿人的政權，而　國父更推翻了牠的帝制。「反淸」運動，至辛亥纔算完成。

第二就政治革命來講：太平天國的成就似乎不很大，但已經含有民權主義的要求了。他們

規定男女一律平等，參加革命工作，解放奴婢，禁絕娼妓。考試有女科，任職有女官，上下一體以兄弟姊妹稱呼，異姓同屬國宗，而且鄉官由於民選：「令各州縣造戶册，卽於鄉里公舉軍帥旅帥，議定書册。」這都可以表現民主政治的精神。有人說他是受西洋思想的影響，其實這是受天地會兄弟一家祕密拜盟的影響，以後他信仰基督教，總用「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的教義來敷說能了。然而洪秀全的帝王思想和階級觀念，卻非常濃厚。他自以爲天之驕子，國宗是特殊階級，「內外強健將兵，不得僭分干名」。「凡諸王駕出，侯丞相轎出，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迴避或不跪道傍者，斬首不留；凡指揮檢點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之命」。又規定上下等級的稱呼：如王世子稱幼主萬歲，王長女稱天長金。東世子稱東嗣君千歲，女稱東金，妻稱王娘，西南諸王類此。丞相至軍帥皆稱大人，子稱公子，女稱玉，妻稱貴嬪，貴姬、貴嬙、均加稱貞人。師帥至兩司馬，皆稱善人，子稱將子，女稱雪，妻稱貴娴，貴婕、貴姑、貴娌、均加稱夫人。這種儀節禮制，還是封建社會的殘餘思想，那能談得上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潮？他雖提倡男女平權，但他和他的高級幹部極盡玩弄女子之能事，不讓人家的夫婦團聚，不顧世間的情理和諧，怎樣建設新的國家？他的世界知識，政治天才，委實太差，只是偶然的爲民主政治留下一點影子而已。

第三就社會革命來講，太平天國的確有好多的貢獻和主張，值得我們贊許。國父說：「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而沒有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

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民族主義第四講）可見太平天國的經濟制度，就是一種共產制度。他們在天朝田畝制度中，規劃出這個理想的社會：辦法是先分田爲九等，然後照人口分田，不論男婦，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十五歲以下減半，好醜田平均配給。人民除耕耘外，還要樹桑養蠶，織布縫衣，養雞養豬，每年的收穫，除留足用度外，餘則歸國庫。銀錢亦然，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給錢一千，穀一百斤，不得多用。陶冶木石等匠，農隙治事。社會組織完全照軍事的編制，以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設一軍帥。二十五家「設國庫一、禮拜堂一」。由兩司馬來主持一切軍政民政司法之事，平日教育兒童，星期日作牧師，「講道理」。每家「出一人爲兵」，有警則殺敵捕賊，無事則耕田奉上。鰥寡孤獨廢疾，則頒國庫以養。每一「軍管區」內，設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旅帥兼攝。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頗有分工合作之意。有材能者，每年由兩司馬選舉依次上聞。三年一黜陟，各官互相保陞奏貶，以剔上下相蒙之弊。這是一個「共有共享」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洪秀全在八十年以前，就有社會革命的事實表現出來，爲什麼能有這樣進步的思想呢？我們從社會背景上看：洪秀全代表貧農階級的，中國社會在嘉慶以後，人口和土地的不均平，已成很嚴重的問題。他們目擊身受，知道一般貧農最大的痛苦，是耕者不能有其田。所以他們要迎合羣衆的心理，來創建一個「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的理想社會。至於他的思想來源，似乎出於基督教，如天情道理書所

說：

萬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未始不同。我們蒙天父生養以來，異體同形，異地同氣，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者深沐天恩，共成一家，兄弟姊妹，皆是同胞，共一亾爺所生，何分爾我？何分異同？有衣同衣，有食同食。

他的原道醒世訓也發揮此義，而天朝田畝制度更說：「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煖。」這是他自己的解說，不是很顯然的由於基督教義涵有原始的共產制麼？但我們就他的制度來看，則完全摹仿周官，其標榜以禮運大同為依歸。可見他仍是受儒家學說的影響，而以相傳的三代井田，和漢代以後的王田均田制度作背景的。況且他採用天地會秘密結社的許多隱語詩句，而天地會的誓詞中，也有「到乃內兄弟家下，逢飯吃飯，逢粥吃粥」，以及「科甲銀錢」「患難相扶」諸條。革命黨在秘密工作時間，總有通財仗義之誼。足證他的思想來源是很複雜的，大約以中國固有的思想成份居多。他既代表一般貧農階級來解決社會問題，不專從貧農本身的事實立論，偏向宗教上尋根據，古書中找辦法。似乎他創造的本領有限，所以實行的決心也就很淡了。據賊情彙纂說，他們曾出示：「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貲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以為口食。」但「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恐怕沒收土地為公有更不容易了。可是社會組織卻照他頒布的制度由鄉里公舉。彙纂說：『無恥之徒，不學之輩，

妄希榮顯，趨之如鶩。謹飭之士，爲衆共推，委曲維持，不能自脫。而士著生計，絲粟難隱，悉爲逃民，並得稽察，賊之牢籠人士，聯絡方域，計蓋無踰於此者。』是見軍事化的鄉官選舉制是很有效的推行於民間。至於軍隊方面，則完全執行公有制度，一切「盡繳聖庫，不得私藏」。衣食所需，皆向各典官衙取給。如千字詔所謂「庫滿珍珠，倉儲菽粟，億兆供求，臣僚輯睦」。甚至食肉也有限制，天王每日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半斤，其下無與。而「諸匠營及各典官，使被爲百工技藝，各有所歸，各效其職能」，「各儲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內亂以後，聖庫的制度，似乎已有名無實，各官均蓄有私財，百工技藝，也不嚴格的歸諸匠營了。這種共產制度雖因政治的不安定，實行僅有短短幾年，但爲古今哲人所夢想以求者。更給歐洲共產主義以不少的鼓勵。我們　國父的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一項，也是受了它的影響。太平天國在世界革命史上，自然是有它相當的地位。

太平天國滅亡了，我們不應該以成敗論人，用「長毛賊」三字把它的革命精神一筆抹殺。就近代民族革命的立場論，它無疑的是一個承先啓後的重要階段，爲民族革命作初步的結果，爲國民革命開嶄新的道路。倘若它成功了，至少可以縮短民族革命的時間，保存後來爲國民革命而犧牲的大量人材，用在建設方面。我們的民族復興，或者要早實現若干年。它的失敗，證明中國舊社會的潛勢力是不可侮的，除非革命領袖在道德上學識上都完無缺陷，纔能夠「斡旋氣運」，「旋轉乾坤」。

第七章　曾國藩與李鴻章

第一節　曾國藩之經世學與湘軍

曾國藩是滿清命運的挽回者，李鴻章是晚清命運的支持者：二人關係清末五十年的大局，以後推翻清室，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也是受他們的影響。他們是科舉出身的人物，代表士大夫階級，打倒了異教的領袖洪秀全。對於民族的革命可說是罪人，但他們在無形中轉移了滿人的政權，功過亦足相抵。況且以他們的時代和所受的教育，只有使他們那樣做。我們不宜責備賢者，究竟他們是中國第一流的人才。曾國藩尤其是近代偉大的人物：他不僅要救滿清，而且要救中國，不僅維持我國的舊文化，而且提倡科學的新事業，他的思想見解，超越當時的士大夫階級。——李鴻章是他的得意門生。否則他們不會有那樣的成就。但是他們產生在中國舊社會環境，壓迫他們不能達到救中國的目的，他們不能負失敗的責任，我們應當平心靜氣的原諒他們。

曾國藩是一個農家子，生於湖南湘鄉，比洪秀全大兩歲。他祖父「磐石決壞，講求農事，飲豕養魚，排難解紛」。他父親「積苦力學，不遂大施，發憤教子，指畫耳提」。祖父「氣象

尊嚴，凜然難犯」，父親「屏氣踧踖，愉色如初」。可見他稟受的遺傳性是有剛有柔的，一切要從艱難困苦中奮鬬出來。他二十八歲成進士（道光十八年），選入翰林，「方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及從唐鑑倭仁遊，「專以義理之學相勗」，「始致力於宋學」。每日必爲日課，痛劾責。如壬寅十月初八日記云：

何丹谿來久談，語多不誠。午正會客一次，語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與人辦公送禮，俗冗瑣雜可厭，心亦隨之紛亂，尤可恥也。燈後，何子貞來，急欲談詩。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復得爲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已矣。謹記於此，使良友均知吾病根所在。與子貞談久，躬不百一而言之不作。又議人短，頃刻之間過惡叢生，皆自好譽之念發出。

十一月初八日記云：

醒早沾戀，明知大惡而姑蹈之，平旦之氣安在，眞禽獸矣！要此日課册何用？無日課豈不墮壞更甚乎？尙靦顏與正人君子講學，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讀旅卦，飯後讀巽卦，一無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甚麽？丹黃幾十葉書，如勉強當差相似，是何爲者？平生只爲不靜，斷送幾十年光陰，立志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尙浮躁如此耶？

他的課程是「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

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完全用理學愼獨的工夫。在修養上他收到很大的效益。但他的學問，並不是純粹理學。唐鑑告訴他說：「經世卽在義理內」，他似乎不以爲然，他要把經世學從當時人所謂義理詞章考據三途中另闢一門，他說：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聞。

他解釋經世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後來又標出禮學的名目，就是史學和政治學二者綜合起來的。在他的聖哲畫像記中可以看出他的意思。他推崇馬班的「經世之典」，和杜馬的「經世之大法」，而謂：『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樂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他的微旨是什麼？就是要繼顧秦之後來講經世的禮學。所以李鴻章說：「公爲學研究義

理，精通訓詁，為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為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至一室米鹽，無不條而禮之。』（曾文正公神道碑）郭嵩燾也說：『公始為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典禮。以為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世，事無他禮而已矣。』（曾文正公墓誌銘）可見他們所謂經綸萬彙的禮學。就是經世之典的史學和政治學。他不滿於漢學的支離破碎，欲以綜合的經世學來改造舊的社會文化。所以他說：『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賅，原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淩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復夏弢甫書）從他的治學方法和態度中，都可以證明他不是純粹的理學家，而是一個經世學家。他要「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舍經世的禮學而無由。因為經世的禮學，纔是孔子的修齊治平一貫之大道。考據詞章義理都不免偏於一隅了。中國文化彼他們割裂誤解，堆砌蹈虛，無裨實際。以致遺毒流傳，社會停滯腐化，而猶日事於漢宋頓漸之爭。他洞悉癥結，標榜經世，在學術上先有一番改造，然後纔能有他的偉大事功。

他的事業可分兩方面：一是平定太平天國，一是提倡自強運動。其根基都建在他所編練的

湘軍。湘軍原來是地方的團練。在咸豐初年，各處亂事蔓延，官兵不但不能打仗，連鄉下的土匪都不能對付，只知私鬬搶掠。如湘軍志所說：『兵妒勇益甚，所屯則私鬬，戰敗固不救，反陷之。潮勇橫恣能遺，歸乃益盜掠，公奸良民婦衢市，所至焚殺，愚民以爲官兵不如寇，則倡僞議，謀通賊，及結盟拜會相梃起矣。』金和秋蟪吟館詩鈔兵問道：

可知汝身在，身在心死久！烟床鴆毒甘，博局梟采負，帳下畜村童，路上調村婦，村民米與衣，結隊惡聲取。縱免將軍誅，可告汝家否？

當時官軍的腐敗情形，在金氏詩中，描寫倘多，最妙的是有一隊赴援東壩的官兵：「一九日行自此，將五十里也」。又有兩軍因強姦而互鬨的官兵，「從來攻城時，未見今日武。」清廷也知道官兵不中用，遂獎勵人民自辦團練，「堅守鄉里，以免土匪乘機搶掠」。可是各省的團練有名無實，只有曾國藩在湖南督辦的團練，特別出色。這是爲什麼呢？

因爲在軍隊素質上，曾國藩不要遊卒滑弁，只擇「鄉民壯健樸實者，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日有一日之效」。這些人原來是民間自衞的武力，有切身利害的關係，沒沾染官場的惡習，保持着我國農民固有的勇敢和誠實，所以比較容易訓練。這是湘軍的第一特點。在編制上，湘軍以五百人爲一營，營分四哨，哨分八隊，有劈山礮，擡鎗，小槍，刀矛諸隊，合親兵六隊，共三十八隊，每隊正勇十名或十二名，什長伙勇各一名。數營設統領一員。水師每營二百八十八人，快蟹長龍船各一，三板船八，有槳、櫓、舵，頭篙、砲手、艙長等。旣有固定的

組織，較之綠營將帥「莫知營制」，自然好得多了。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在訓練上，他們一日閱所部軍，訓練有法」。分「營兵月六日合操」，尤其注重精神教育，他以維護名教倫常作軍隊的精神基礎，營官都是兵的導師，所以能訓練成功一個有主義的軍隊，人人爲主義而奮鬭。國藩所謂：「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偉哉多士，夾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是也。這是湘軍的第三特點。在官佐上，他以「營將積敝不可用，純用書生爲營官。率皆生童，以忠誠相期獎」。所謂「概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而後可以言戰也」。書生雖然未經行陣，但他們是孔孟忠實的信徒，國藩忠實的同志，能「爭奮搏」，大有「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的精神。這是湘軍的第四特點。在糧餉上，國藩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規定每月陸勇發餉四兩二錢，水勇發餉三兩六錢，比綠營的餉額加一倍。他知道綠營待遇太薄，又不按時發放，是不能打仗的。後來因錢多銀少，行對放之法，以銀錢各半搭發，然而折合一兩率多給五百文，（市值每兩一千五百文，糧台發二千文）暗作津貼，所以每出征必先籌辦糧台。這是湘軍的第五特點。在人事上，他利同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以加強軍隊的團結力。所選官佐幾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鄉人。（中興將帥別傳湖南有八十七人，湘鄉居其半。）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召兵，所以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因此他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別濃厚。這是湘軍的第六特點。但最重要的，還是曾國藩的領袖人格和他引用人才的方法。他平生所致力的是經世學，經

世就是古人所說的「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中國古代政教不分，官師合一，所以領袖必須兼備「聖」「王」雙層資格，有聖人之「體」，然後纔能爲士者之「用」。倘有體而不得其用，如孔子，亦可稱爲「素王」，這是經世學的最高目的。秦漢以後，政教分離，精神領袖和事業領袖，就不必兼備於一身。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的具體條件，注重事業者，又往往忽略精神的基礎條件，難得兩種領袖同時合作，因此社會也就不能平均發展，而經世更被人誤解爲功利主義了。曾國藩發聖王經世之義蘊，具雙層領袖之資格，他的人格修養，道德學問，都有特殊的造詣，乃發之爲「汗馬勳名，問牛相業」，確屬有體有用。當時人稱他爲「聖相」，他可以當之而無愧。其何以能達到這種境界？因爲他確實認識經世學的目的是「明道救世」，要明道救世，必須先有「公誠之心」。國藩即以此二字感召同僚，改革社會，他的精神教育是他終身事業的基礎。他覺得政治的改造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造。而精神改造又必須先有一二人出來倡導，他說：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先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黨徒

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原才）

他實實在在作到了轉移習俗，陶鑄人才的事業。他「飽閱京洛風塵」，痛恨當時的官場：「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輭熟和同之象」，他就「慷慨激烈軒爽」，「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在他辦團練時，「純用重典，以鋤強暴，卽良民有安生之日，雖得殘忍嚴酷之名，所不敢辭」。自稱欲著「挺經」，言其剛也。後來奪情再出，一以柔道行之。嘗曰：『吾以禹墨爲體，老莊爲用』。可知他的剛柔互濟之道，是中庸而非鄉愿，是經世而非功利。他最初經過許多的困苦艱難，滿漢大臣，官僚官兵，都嫉妒他，排斥他，他總是逃避，但絕不妥協。他兩次失敗自殺，都被部下救起，但毫不灰心。卒以一二人心之所嚮，造成了黨徒蔚起的人才。他時時牒府縣，託朋友，「招致賢俊」，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皆以曾公可與言事。而國藩逢鄉里士來謁，輒温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斟酌施行，卽不可行，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幼與之抗禮，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中興人才，皆出其門」。他羅致一般人才在幕府中，軍事政治道學名士，無所不有，每日同食論道，加以長期的觀察和訓練，用當其才，不循所私。如李元度失徽州，則奏劾之；李鴻章才氣不羈，則折磨之；左宗棠性剛行峻，則譽揚之。他保荐左宗棠率楚勇，援浙江，李

鴻章練淮軍，援江蘇；卒成大功。然而左李在幕府中不過舉人進士的資格，能一躍而任疆圻。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一些理學家皆由苦戰得功名，用人之道不同，但一以「公誠之心」處之。左宗棠常常罵他，後來甚至於絕交。但他說：『左公謀劃精密，遠出國藩與胡宮保之上』，薦其「取勢甚遠，審機甚微」，「才可獨當一面」。左宗棠西征，他二人雖不通音問，但「爲籌的餉，不遺餘力，又選部下之健者以助之」。這是何等的風度！他薦在籍道員沈葆楨任江西巡撫，李左任江浙，李續宜調安徽，(原授彭玉麟，彭力辭)清廷命他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節制四省。照事理上看這是當然的。但他一再奏辭說：『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其實左是他的朋友，既薦其「才可獨當一面」，而又節制之，非特不易相處，且亦無此力量。事業專注纔能成功，貪多不做，最易僨事，我們應引以爲鑑。清廷說他「悃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實在他的用心處人，爲學治事，都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說是理想人物。以他的人格學識和駕馭人才的方法來和洪秀全比，不知要高出若干倍，洪秀全怎末能不失敗呢？

第二節　曾國藩與自強運動

曾國藩維持了滿清，維護了舊文化，但滿清和舊文化都不能救中國，所以他進一步提倡自強運動，要購買試造西洋的輪船槍礮，以「夷器制夷」。他說：

輪船之速，洋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

於是「購買外洋器物，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就成為當當時維新的一種趨向，叫做「洋務」。這是甲午以前所通用的名詞，凡奏摺公文論說條陳均用之。其意大約指關於洋人的事務而言。所謂洋人的事務者，如製槍礮，設船廠，遣留學，立學校，無一不是為辦海防而設，即所謂以「夷器制夷」是也。不過以前只有海防的理論，這時始有洋務的事實，此種覺悟，完全是由西洋的壓迫而來。英法聯軍之役，曾國藩雖未身當其衝，但西洋人的勢力，已深入長江，而國藩方負督師之責，在長江一帶作戰，他豈有不受影響的。據薛福成說胡林翼在安慶有這樣一段故事：

> 楚軍圍安慶，胡文忠親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難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飈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太平必滅，文忠業已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敬銘向在文忠幕府，每與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林翼是湘軍中的「蕭何」，他巡撫湖北，治軍籌餉，為國藩後援，與官文（湖廣總督）交

驕，推美讓功，披肝瀝膽，延攬人才，調和諸將，在中興名臣實居首功。他的資格比國藩入翰林還早二年，然而謹事國藩，護持國藩，以屬禮自居。國藩嘗說：『林翼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他對於國事的憂慮，不在乎太平軍，而在乎「洋人之勢方熾」，因爲外國人用輪船私運軍火糧食賣給太平軍，往來長江，深入無阻，給他的印象最深。林翼如此，國藩更不用說了。國藩自始就注重水師，以爲在長江一帶作戰，水上的優勢很能決定陸上的優勢。在衡州湘潭造船，仿閩越船制，「以意爲之，屢改乃成」。及克安慶，正值北京議和的時候，「陰陰有爭雄海上之志」。設內軍機所，試造一小輪船，而「行駛遲頓，不甚得法」。同治二年，遂派第一個留學美國回來的容閎（廣東人，字純甫，著有西學東漸記）出洋購買機器，足見他對於西洋機械的注重。然而發自強運動的端緒者，則係當時所謂識時務之大臣，如奕訢文祥等。他們從英法聯軍的經驗，得了許多教訓，確切認識西洋的軍器和練兵的方法，遠在我們之上。當時有名的大將如僧格林沁勝保在京津和外人交鋒，都致慘敗，便是最明顯的例子。西洋人願意賣軍器給我們，而且願意把製造軍器，及訓練軍隊的方法教給我們，可見西洋人不是以前所想像的「狼子野心，不守信義」。英法按約撤兵，交還首都及廣州，足證外人也守信義。我們自應謹守條約，徐圖自強。自強之道，據他們說：

　　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現在撫議雖成，而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上海等處應如何設法僱用洋

人，製造教導，請飭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其天津通商之處，如或可以設法照辦，亦擬籌款辦理。

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造為先。自洋人搆釁以來，至今數十年矣，迨咸豐年間，內患外侮，一時并至，豈盡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耳。外洋如英法諸國，說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堅礮利，以橫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堅，與礮之何以利，則置焉弗講，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祕有技巧，不肯輕以授人，遂無從窺其門徑。……現在江浙尚在用兵，託名學製以剿賊，亦可不露痕跡，此誠不可失之機會也。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製，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撓阻，此又勢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軍威大振，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祕。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

這時內外一致，講求自強，就成了一種運動，而曾國藩實負籌維之責。因為他是兩江總督，上海是他管轄的通商口岸，最便和外國人接洽。他保舉李鴻章到上海編練淮軍，鴻章與外人往來最多，部下還有英國軍官戈登 (Gordon) 統帶的常勝軍。所以他認識西洋文化亦比較深切。他曾數次致書國藩說：

薛公（煥）每以洋酋宜疏不宜親相規，而鴻章之營則無日不有洋人過從，實苦煩擾，

然因此氣脈通貫，遂無敢播弄脅持之者。……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人所能及。……洋酋僉云，該兩國君主，禁炸彈入中國。英酋前與鴻章辦常勝軍事，云不令伊國派員會帶，即將外洋火器取回，恐此軍亦歸無用。蓋常勝軍粗立戰功，僅賴幾件砲火，其勇並非精強也。鴻章惟深以中國兵器遠遜外洋爲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祕法，期有增益。……若駐上海久，而不能忞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鴻章現僱洋人數名，分給各營教習。又募外國匠人，由香港購辦造砲器具。又託英法提督各代購大砲數尊，自本國寄來，大約今年（同治二年）底可漸集事。每思外國兵丁口糧貴而人數少，至多以一萬人爲率，即當大敵。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功效，實由於槍砲窳濫。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砲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祕巧，槍砲輪船漸能致用，遂與英法相爭雄長。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仍祈師門一倡率之！

李鴻章請曾國藩倡率「自強運動」，他們就在同治四年創設江南製造總局於上海虹口，容閎所購的機器，亦歸併此局。這是中國維新事業的第一幕。雖然以前奕訢文祥曾奏請在天津訓練新軍，託總稅務司赫德購買砲艦，設立同文館於北京，鴻章亦設廣方言館於上海，但只是前奏工作，自製造局成立，始正式輸入西洋的工藝之學，並翻譯外國書籍。次年，左宗棠復奏設

福建造船廠於馬尾。並附設船政學堂，延英法人爲教習，這和製造局是自強運動的兩大事業，其端皆發於曾國藩而左李成之。外國人爲甚麼這樣樂意幫助中國？實際上還不是爲他們自己作買賣。戈登是清廷的命官，他一面帶常勝軍打仗，一面又替英國人賣槍砲，和太平軍勾結，「明攻暗助」，眞正好笑。（參看拙著李鴻章蘇州殺降文告考釋）李鴻章也明知道英法人不肯把最精的槍砲賣給中國，教給中國，但就是普通的槍砲中國也沒有，所以他要「學得西人一二祕法期有增益」，從實際中求「祕巧」。他以後代替曾國藩支持晚清的政局，最大原因，就是他的淮軍用新式軍器，他和外國人相處最久，能辦外交。換言之，就是他長於洋務。他剿平流寇式的捻匪，辦結了天津的教案。這兩件事都是曾國藩試作而未成功的。尤其是後者，國藩備受當時人的責難。因爲天津謠傳外國人利用教民，迷拐人口，「挖眼剖心，採生配藥」。民衆憤恨，將天主堂焚燬，把法國領事打死，大局幾乎決裂。曾國藩爲顧全大局，請治禍首，一般人說他「偏護洋人」，至呼爲「賣國賊」。他自己更引咎說：「內慚神明，外愧清議」。清廷亦責其拘泥，令鴻章往辦，抵津未久，即報結案。當時人都覺得鴻章的本領大，其實是普法戰爭剛起來，法人無暇顧及此小事，李鴻章碰到了好機會，因此聲價頓增。國藩年齒就衰，不二年就病故於江南任所了。諡曰「文正」。他一生的事業，都從經世學出來的：一方面要革新，那就是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份，一方面又要守舊，那就是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革新守舊，同時進行，所謂「有體有用」之學。這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若徒然恢復舊禮

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還不能打破民族的大難關。因爲我們絕不能「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來抵抗帝國主義的機械侵略。同時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也不能救國家救民族。因爲「用兵在人不在器」，「精神重於物質」；何況腐化的舊官僚根本就不能舉辦事業呢？雙方兼顧的中庸之道，經世之學，至今還值得我們服膺。曾文正這種偉大的眼光，其實還是中國文化的正宗，只有　國父纔發揚爲具體的三民主義。李鴻章雖接承他的事業，但應付環境，捉襟見肘，不免貌合神離了。

第三節　湘淮軍代與之關係

李鴻章繼續曾國藩的事業，淮軍代替湘軍而興起，在近代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對中國的全局，頗有關係。淮軍和外人接觸最早，改用新式武器，比「暮氣已深」的湘軍戰鬪力強，這一點是淮軍的特長；但湘軍如不解散，依舊可以倣效的。李鴻章「師事國藩近三十年」，平生治軍持事，榮悴顯晦，不易常度，都得力於國藩的陶冶。而智術機警，識時善變，勇於任事，不畏艱險，血氣比較高強。不像曾國藩兢兢業業，守知足知止之戒，懷急流勇退之心，常帶有消極的性質。他嘗說國藩晚年求退爲無益之請，受國大任，死而後已。（見清史稿）左宗棠時常罵國藩僞道學，這是國藩所最痛心的。我們看國藩一生公誠任事，毫無虛僞的表現，其所以受宗棠的批評，就因爲他的修養較深，謹愼太過，勇氣似乎稍差了。他垂死之日，還要說：

『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赧！』這是國藩「學爲聖賢」的謙冲之德，在國藩是很自然的，但一般人看起來，以他的學問事業，還能說「老大徒傷」麼？左宗棠幼年題家塾聯語：「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晚年以諸葛亮自比，並說：「今亮或勝於古亮」。他自己解釋道：『作語自夸，不免慚赧，然志趣固不妨高也。安得以德薄能鮮，謂子弟不可學老夫少年之狂哉？』這和曾國藩的性情態度，迥然不同，所以後來二人交惡。然亦「內相傾服」，絕未以私害公。曾謂左「西陲之任，天下第一」。「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左輓曾「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李鴻章的「志大才高」，有類於左；「勁氣內斂」，受教於曾。但他的道德學問都不如國藩，又好用權術，頗具私心，因生出許多的流弊。

湘軍是代替綠營而興的，綠營雖極端腐敗，不能打仗，但它也有一種好處：「官皆選補，兵皆土著」，遣將調發，權操兵部，是國家的統一的軍隊。湘軍原係私人招募的軍隊，「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湘軍志）所以指揮訓練，都很靈活，「能用人之死力」。但兵士祇知道直接的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軍隊就變成私人的勢力了。湘軍原來有三派：一是江忠源的楚軍。忠源初募鄉勇五百人，率赴廣西，獨能搏戰。後扼截蓑衣渡，助守長沙，轉戰江西安徽，均有殊勳，授安徽巡撫，殉難廬

州，其弟忠濟忠信忠義等統之，楚軍遂弱。然「一門忠烈」，爲湘軍開風氣之先。二是羅澤南（羅山）的湘軍。澤南以諸生講學，宗法程朱，倡率生徒，辦理團練，轉戰湖南北江西，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佐曾國藩胡林翼立功。湘軍將領，大半是他的弟子。而李續賓李續宜王鑫蔣益澧劉騰鴻等尤爲傑出。及澤南戰死武昌，續賓戰死三河，安慶既克，軍始不振，然始終是湘軍的中堅。三是王鑫的楚軍，鑫與文正同縣，澤南弟子，其營制不用國藩成法，自成一隊，左宗棠常左右之。鑫死王開化張運蘭分統其衆，所謂「老湘營」是也。宗棠援浙，即用其力。自募五千人，亦參用鑫遺制，號楚軍。後劉松山接統，從文正剿捻，又隨宗棠西征，開至三十餘營，立功邊陲，爲湘軍之後勁。這三派都和曾國藩有統屬的關係，但不盡惟國藩之馬首是瞻。他們之間，只以道義相維繫，可去可留，雖有獨樹一幟的志願，而無割據自雄的企圖。即如國藩的弟弟國荃所帶的湘軍，有時也不盡聽國藩號令。但金陵攻克後，國藩要解散就解散了。到了李鴻章的淮軍就大不相同了。曾國藩嘗向李鴻章說：

淮勇各軍既歸敝處統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者，批令徑由敝處核奪，則號令一切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募，或休息假歸，皆敝處徑自主持。如有不妥，請閣下密函見告。自問衰年氣弱，但恐失之過寬，斷無失之過嚴，常存爲父爲師之心腸，或責之，或激之，無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昔麻衣道者論易云：「學者當於羲皇心

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根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王樸山李希菴楊厚菴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駱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闢乾坤之志，多在台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制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

淮軍本是湘軍的支派，用湘軍的營制，國藩並派湘軍郭松林等三營改歸編制，以資觀摩。何以後來國藩尙不能指揮如意，而不得不請鴻章兄弟出來幫忙？他說：『區區微忱，非強賢昆仲以所難，實見捻匪非淮勇不能滅，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可見李鴻章開始就把淮軍造成他私人的勢力。與湘軍「自立門戶」，國藩「擴然大公」的精神，迥然不同。所以湘軍雖是私有軍隊的起源，而淮軍纔構成私有軍隊的形態。後來袁世凱以淮軍子弟，傳其衣鉢，就變爲淸末民初時代的北洋軍閥。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貽禍不淺。

但這事於湘淮軍的將領之出身很有關係。湘軍將領，幾全係儒生。雖有少數出身行伍的大將，如搭齊布多隆阿鮑超劉松山等，但在曾胡左的駕馭之中，不能「自立門戶」。能「自立門戶」的羅王李楊，大半都是理學家，只楊岳斌（載福）一人是行伍，而專領水師，與彭玉麟共事。彭是一個純粹的學者，節行均高，岳斌受他們的薰染，早非武人氣概了。他們帶勇都守國藩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待弁勇如待子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所以湘軍是含有儒教色彩的軍隊，他們以維護名教爲主義，衞鄉衞國，必忠必信。將領都沒有功名富貴的念頭，曾國藩把高爵厚賞「都看作粃糠塵垢」，固不用說；彭玉麟始終

不肯做官，辭安徽巡撫，兵部侍郎，漕運總督，兩江總督，乃至兵部尚書。有人勸他「抗旨鳴高，開功臣驕蹇之漸。」他說：

臣素無室家之樂，安逸之志，治軍十餘年未嘗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受傷積勞，未嘗請一日之假，終年風濤矢石之中，未嘗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誠以親服未終，出從戎旅，既難免不孝之罪，豈復爲身家之圖？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關係風俗之盛衰，臣之從戎，志滅賊也，賊已滅而不歸，近於貪位；長江既設提鎮，責有攸司，臣猶在軍，近於戀權；改易初心，貪戀權位，則前此辭官，疑於作僞；三年之制，賢愚所同，軍事已終，仍不補行終制，涉於忘親：四者有一焉，皆足傷風敗俗。夫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退無義，伏維皇上中興大業，正宜扶樹名教，整肅綱紀，以振起人心。臣豈敢稍犯不韙，以傷朝廷之雅化？

彭玉麟眞不愧爲湘軍表率的人物，國藩忠實的同志。羅李王雖以節烈早死，而勵志清苦與玉麟同，都只有事業心而無功名心。淮軍的將領，只有一個潘鼎新是舉人。其餘程學啓是降將，劉銘傳是鹽梟，周盛波周盛傳張樹珊是團練，吳長慶是守備，開始就以「鼎」「銘」「慶」「樹」「盛」「開」（程）「松」諸字名軍，私人的色彩，非常濃厚。李鴻章以翰苑薦至大帥，這些人都是投効而來，所以容易節制。湘軍將領各自召募成營，國藩僅以在籍侍郎憑道義相號召，常居客寄地位，頗似一種道義上之領袖，而非軍制上之統帥，故湘軍各有「自闢

乾坤之志」，而淮軍只有在鴻章「脚根下盤旋」了。那里是鴻章「善於制馭出藍勝藍」的原故呢？況且淮軍將領，都出身微賤，根本談不上學術，豈能有羅李王彭的氣概？以他們來代替湘軍支撐大局，無怪乎袁世凱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而可傳淮軍之緒。這不能不說是國家的不幸。

我們再看湘淮軍餉制，更大有不同。湘軍初賴湖南接濟，及胡林翼巡撫湖北，理財籌餉，不遺餘力，大致全靠着釐金。釐金者，自咸豐二年，雷以諴治軍揚州。用錢江議試行於仙女鎮，值百抽一，行商曰活釐，坐賈曰板釐，即通過稅與貿易稅。那時清廷正苦錢糧減少，庫藏竭蹶，捐輸緩不濟急，軍興數載，兵餉無着。咸豐四年，始逐漸推行於各省，湘軍全靠這筆收入來維持。因爲清廷指定「悉數解充兵餉，不准地方擅自挪移」，所以軍權財權合一，而帶兵將帥，又往往因尋實方便，兼理民政，打破了軍民財三權分立的局面，爲後來地方政權擴大之張本。按照清朝的制度，總督治軍，巡撫理民，布政使管財，三方互相牽制，誰也沒有擁兵自重與朝廷對抗的資格。不料太平天國的內亂以後，湘淮軍開私有軍隊的先例，而釐金又生出「與虎添翼」的結果，以致清末疆吏，在亂時可以獨立自保，這纔造成軍閥割據的形勢。不過一件事在開始時「機括甚微」，曾國藩已炳有「外重內輕」之慮。胡林翼公忠體國，志在平亂，他收入的釐金，用庫平而發湘平，每百兩有三兩六錢贏餘，積少成多，另儲備撥。所以發放之法，每兩多給錢五百文，藉以津貼，不虞匱乏。又除月計食用外，餘則分哨記註，存於公所。或因事

裁革，或有故假歸，核其所存，酌付川貲，別由糧台給一印票，査後路給清。這有三種利益：一、營哨官不能私侵暗蝕，二、兵勇不能任意開銷，出營流落；三、回籍餘貲，尙可營生。原來湘軍初出征時，只有陸軍十三營，水師十營，不過一萬多人，加以員弁丁夫共一萬七千人。國藩最初的計劃很周密，精神紀律均好，後來擴充到幾十萬人，（曾國荃初統吉軍，即有二萬八千人）自然人數多，份子就複雜，軍紀也退化了。國藩自承「暮氣已深」，又恐遭時謗，遂毅然遣散很多。大概林翼死後，湘軍的餉制也不像從前那樣充裕和嚴密了。所以失業流落的人，都加入會黨。淮軍勇無宿儲，官多揮霍，歲支九關（次數之謂），餘月爲欠餉。裁撤時，酌發三五關不等，或歷年過久，通計成數報效，爲本籍增文武學額，士卒却也能相安。因爲他們餉項匱乏，每接仗克城，「人人有獲」。「金銀寶，堆案數尺」，所以遇發餉，多寡不較。各軍克城，封存太平軍的囤米，據爲私有。而李鴻章反出示收買，成爲例案。所以淮軍將領往往以此致富。這樣的紀律，這樣的貪私，要和彭玉麟捐養廉給軍餉，散公費佐義舉的作風一比較，簡直判若天淵了。其實李鴻章本人就不廉潔，所以淮軍的風氣很壞。況且他又有些貪戀權位，不能進退淡如，而曾國藩的精神教育，可謂掃地無餘。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出自李文忠門下者，則比較不醕。可見社會風俗的盛衰，眞正繫於「居高明之地」的士大夫「一二人之心之所嚮」了。

此外還有知人善任一事：曾國藩不循私情，不計恩怨，破能拔擢眞才，不愧一時領袖。李

鴻章却不然，我們看他諫阻國藩奏劾李元度之事，（元度與國藩曾同患難，李卽以是爲言，而曾未聽，因此就離開國藩的幕府有一年。）就知道二人的作風不同。後來李居當路，凡四十年，自視太高，與其故裨將，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布滿津要，委以巨任，不問其才之可用與否。又好以利祿驅衆，亮節之士，多不樂爲用。（見淸史稿）所以沒有培植什麼人才出來。這是他緩急莫持，貽誤事機的最大原因。而且他的同鄉觀念很重，光緒元年，他到北京入覲，候鄉試恩科發榜，安徽竟無一人，他就怏怏口出怨言。曾國藩雖亦利用鄉土觀念，但只是爲打仗團結，絕非植黨擊援，他命李鴻章淮留軍以平捻，把自己的湘軍撤了，又重用搭齊布（滿人）多隆阿（蒙古人）鮑超（四川人）李孟羣（河南人）褚汝航（廣東人）及保薦沈葆楨（福建人）等，都可以見出他的襟懷。李鴻章重視部屬鄉里，纔造成袁世凱段祺瑞的北洋系，爲中國軍隊添封建割據之觀念，爲中國社會長貪汚徇私之風習。倘以湘軍人物當他的地位，必不至於如此。這一種關係國運的轉變，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第四節　李鴻章及自強運動

李鴻章雖然替中國遺留下驕橫自私的軍閥，造成了很壞的風氣，但他支持晚淸的政局，身任交外的要衝，其眼光毅力，都值得我們佩服。他的世界知識，國事見解，比較一般人高，他是推行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他練淮軍，要用洋槍，辦交涉，要顧現實。同治初年，他「深以

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爲恥」，請曾國藩倡率自強運動，開辦上海製造局，立廣方言館。同光間的維新事業，幾乎全由他創設的。茲先擇要列表於下：

同治元年　李鴻章設西洋砲局三所。同時北京總衙門設立同文館。

同治二年　李鴻章立廣方言館於上海，同時廣東亦設立。

同治四年　曾李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附設譯書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設造船廠於福州，附設船政學堂。

同治九年　李鴻章就崇厚原設天津機器製造局擴充整頓。

同治十一年　曾李選派學生赴美留學，每年三十人；以陳蘭彬爲正委員，容閎爲副委員，經副一切，此議原由容閎發動。

同　年　李鴻章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　李鴻章籌辦鐵甲兵船。

同　年　沈葆楨派福建造船廠學生隨監督法人日意格赴法留學。

光緒二年　李鴻章派軍官卞長勝等七人隨教習李勵協赴德學陸軍。

同　年　沈葆楨李鴻章選派閩廠前後學堂學生，及藝徒三十名赴英法學習海軍與製造。

光緒三年　李鴻章設開平礦務局。

光緖四年　左宗棠設甘肅織呢總局。
光緖六年　李鴻章設水師學堂於天津，設電報局，請修鐵路。
光緖七年　李鴻章奏派船政前學堂學生八名後學堂學生二名，出洋留學。
光緖八年　李鴻章築旅順軍港，議設上海機器布廠。
光緖十年　李鴻章續選前堂學生十三名，藝徒四名，分赴英法德學習製造，後堂學生九名，專赴英國學習駕駛。
光緖十一年　李鴻章設天津武備學堂。
光緖十三年　李鴻章開辦黑龍江漠河金礦。
光緖十四年　李鴻章設立北洋海軍。
光緖十六年　張之洞創設大冶礦廠與漢陽兵工廠。
光緖十七年　李鴻章設倫章造紙廠於上海。
光緖十八年　李鴻章成立上海織布局，次年設機器紡織總房。
光緖十九年　張之洞設湖北織布紡紗製蔴繅絲四局，及針釘廠毡呢廠。
光緖二十年　湖北設聚昌盛昌火柴公司，多屬官股。

這些新工業的建設，大半偏於軍事方面，因爲他們的動機在海防，海防需要新式的設備，那就是國防近代化的意思。然國防近代化的條件很多，第一需要近代化的軍器，所以有機器製

造局及兵工廠的設立。第二必須有技術人才去使用製造，所以有學堂的設立，及派遣學生軍官出洋留學。第三近代化的軍隊必須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要設船廠及電報局，並建築鐵路。第四新式國防比舊式的費用增多，以中古式的生產來担負近代的國防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經營運輸事業，創立織布紡紗製呢造紙諸廠來挽回利權，開煤礦金礦來增加收入。他們一步一步的向前進，事先並無整個的計劃，只知道機器是新工業的原動力。如御史曾秉哲說：『方今之務，以海防爲最要。泰西各國，凡織布疋，製軍械，造戰艦，皆用機器，故日增富強。』以爲中國利用機器就行了。殊不知西洋的機器是有它的文化基礎的。李鴻章於此，似乎比一般人的認識更深切。他在同治三年寫給奕訢文祥的信說：

鴻章竊以爲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土士大夫沈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爲奇技淫巧，以爲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爲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爲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爲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砲。去年英人虛聲恫喝，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爲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

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幷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尙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爲名，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爲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則或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爲富貴功名之鵠的，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鴻章認定中國要自強，非學西洋的科學機械不可，要學西洋的科學機械，非變更科舉取士之法不可。他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觀，放棄章句小楷之積習，以科學製造懸爲富貴功名之鵠的。「上求魚，臣乾谷，苟榮利之所在，豈有不竭力研求，窮日夜之力以期至於精通而後止乎」？他已覺看出日本維新的歷史意義，（這時明治尙未即位，日人已趨向維新了）人家能「發憤爲雄」，我們必「皇然變計」，否則，區區小國，亦將「分西人之利藪」，共同來侵略中國。他實在是一個有眼光的政治家，對時代認識最清楚。他並且再三的說這是「中國二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我們適應這變局，必須趕快的變法，纔能自立於世界之上。左宗棠也和他有同樣的見解，在奏設福建造船廠時說：

東洋日本，遣人赴英法學其文學，究其象數，以爲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亦必有

成……彼此同以大海爲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爲本，藝事爲末，外國以藝事爲重，義理爲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

左宗棠比喻：「人操舟而我結筏，人跨駿而我騎驢」，一針見血，我們必然要落伍了。他們都是自強運動的領袖人物，大聲疾呼，要趕上西洋的科學。可惜他們還不甚澈底，所以自強運動雖比海防運動進一步，但始終未能達到救國家救民族的目的。

爲什麽他們不能澈底呢？因爲他們都出身中國的舊社會，對外國的知識有限，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雖然他們知道尊重科學，但他們還不知道科學的理論和歷史背景，雖然他們也知道中西文化所習不同，不能「舍精遺粗」，但他們沒有科學機械的常識，更不曉得文化政治經濟一切都要配合起來，全盤計劃，纔能生效。「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是不中用的。日本維新所派遣西洋的留學生，不僅學科學機械，而尤重政治法律教育各種制度，因此它的改革是普遍的，是全體一致的。這一點郭嵩燾於光緒初年出使英國，業已看出來，寫信給李鴻章特別請他注意。在中國有些學者如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也曾說過改革當先從內政始。但李鴻章不敢說這

種話。卽如他要變更取士之法，後來也不再主張了。這是他的時代環境使然，我們應該原諒他。我們若仔細研究一下領袖人物的態度和社會情形就可以知道。卽如曾國藩在太平天國以後態度反趨於消極了，似乎他覺得滿淸已不可救藥，中國復興的希望很難在當時實現。傳說彭玉麟曾以「東南半壁無主」來試探他，在根深蒂固的舊禮教，君臣之分已定的舊社會環境下，他敢作革命的事業麼？卽令他敢作，也未必能成功。我們看他處理天津教案，受社會詆毀，就是很好的例子。左宗棠才氣縱橫，輕視朝廷，但「咫尺天威」也就不敢大言了。戈登曾勸李鴻章「中國今日如此情形，終不可立於往後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權以大加整頓耳」。鴻章對於舊社會的改革，稍稍致力，尚不免遭謗挨罵，憂讒畏譏，他能作一個造時勢的英雄麼？梁任公對他的批評極好：

> 史家之論霍光，惜其不學無術。吾以爲李鴻章所以不能爲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際，而惟彌縫補苴，偸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民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世界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李鴻章晚年之著著失敗，皆由於是。雖然，此亦何足深責。彼李鴻章固非能造時勢者也。凡人生於一社會之中，每爲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習俗義理所困，而不能自拔，固不能爲李鴻章一人咎也。而況乎其所遭遇，又並

其所志而不能盡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

李鴻章沒有能識世界進化的原理，也沒有能體會曾國藩的經世之禮學，「不學無術」是當然的。但我們要原諒他爲「數千年的思想習俗所困」，而不能「盡行其志」。他所處的環境，實在太頑固閉塞了。譬如鐵路，同治二年英人即請修上海至蘇州一段，李氏不許。同治十三年，英人創修淞滬鐵路，反於光緒二年，買回掘毀。爲什麼呢？因爲一般人相信修鐵路就破壞了風水。所以光緒六年李鴻章與劉銘傳奏請建築，到了光緒二十年，還只築成天津至昌黎之津榆鐵道。又譬如科學，同治五年，奕訢文祥，奏請在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班，招收正途出身人員作學生，他們以爲：

中國所當學者，不止輪船鎗砲一事，即以輪船鎗砲而論，雇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求以徹其原，法既明而用將在我。蓋一則權宜之策，一則久遠之謀。……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憤爲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爲恥，而獨以學其人爲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他們的理由雖極正當，而北京的官吏，反對者十居八九。大學士倭仁是守舊派的代表，就說：

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奉夷

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卽使敎者誠敎，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奕訢文祥等很憤慨的奏駁他說：『該大學士旣以此舉爲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爲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竭其檮昧，悉心商辦。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等詞，謂可折衝尊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但當時的士大夫都相信倭仁的話，而以下喬遷谷爲恥，無一人肯入館者。清廷故意派倭仁在總理衙門行走，幷兼管同文館事。倭仁中途故墜馬，以足疾請退。其頑固如此。他是當時有名的理學家，與曾國藩交誼甚篤，國藩頗受他的影響，但他二人的見識不同，這也是理學和經世學的不同處。士大夫這樣，一般社會更不用說了。郭嵩燾是當時最開明的一個學者，他佐軍幕、辦外交、使英法、倡新政，都有超時代的見解，比奕訢文祥李鴻章諸人更澈底，更認識得清楚。他以爲獨自尊大是南宋衰弱時理學家提倡出來的，西洋可學的東西，不只機械，還有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他主張擴充留學生所習的項目，但士大夫罵他是漢奸，「湖南人至恥與爲伍」。（見王闓運日記）曾國藩的兒子紀澤，在外國很久，才能眼光，都和嵩燾相等，而國際聲譽尤高，他曾運用外交，把伊犂收回來，是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國立志要推行維新事業，使全民族近代化，但也和嵩燾一樣的遭遇時人反對，沒有機會作事。一則隱居從事著作，一則

不久憤懣而死。像這樣的人才，疵許李鴻章等都未推爲大用，這不能不說是他們的責任。自強運動之所以未奏大效，質言之，就因爲他們的學識不夠。他們只能做一方面的事，而不能盱衡全局，有體有用。然而他們畢竟是中國維新事業的創行者，雖未達到自強之目的，却不得謂之失敗。在歷史上，不要說李鴻章，即疵許文祥之主持朝局，公忠體國，引用漢人，倡道洋務，都是有相當地位的。

第八章　西方帝國主義之壓迫

第一節　同光年間之政治

清廷經過太平天國以後，號稱同治中興。其時內有奕訢文祥等主持朝政，外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鎮撫嚴疆，似乎景象一新，頗足有爲。自強運動，維新建設，他們大胆的向前推進，使國防逐漸近代化，想在國際生活中找新出路，原來是不錯的。可惜他們只知道學西洋的科學，而不知道「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曾記澤語）還以爲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立國精神都是好的。其實他們的事業，就受了這舊制度和舊精神的阻礙。我們試分析一下當時的朝政，就可以明白了。咸豐帝在位十一年，內亂外患，紛至沓來，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他「以醇酒婦人自戕」，死於熱河。遺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等八人爲贊襄政務王大臣。同治帝是一個不滿五歲的小孩子，他生母慈禧太后二十七歲，嫡母慈安太后二十五歲，載垣等自不重視他們。可是慈禧很有權術，居然聯絡在京的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於回京後把載垣等三人拿辦處死，於是太后「垂簾聽政」。主權操在兩個婦人手中，而慈安又老實不管事，一切由慈禧裁決。清末五十年的政治，實際上完全由西太后統制的。頤和園

長詞所謂：「提挈嗣皇綏舊服，萬幾從此出宮闈，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殊絕。六王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先，迅掃欃槍回日月，八荒重睹中興年」。及「五十年間天下母，後來無繼前無偶」。皆紀實也。照說奕訢是咸豐的親弟，又負擁戴之功，人望所歸，宜可大有作爲。無如有母后臨朝，就必有宦官弄柄，安得海浸浸用事，導后娛樂，「演戲一日，費至千金」。御史以是爲言，慈禧反說：『本朝垂戒至嚴，不許其乘間進言，太監亂政之事，已成歷史陳迹。』然而同治四年能去奕訢的議政王號，固以慈禧把持專斷的私慾，也是安得海從中譖間的。後來安得海出京招搖，被山東巡撫丁寶楨「執而殺之」。奕訢旣與西后有隙，頗與東后相結，暗中贊成其事，大失慈禧的歡心。幸而慈禧的歷練還不深，不能不依重他。文祥是他很好的助手，辦事認眞，十分廉潔，極盡孝道，又引用沈桂芬李鴻藻等入軍機。但同治八年以後，文祥卽多病請假。奕訢原缺乏魄力，所以不能大行其志。同治帝十二年始親政。次年，因微行出痘而死，只十九歲。沒有繼嗣，慈禧利於幼主可以攬權，選定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其母爲慈禧妹）纔四歲的小孩子作皇帝，年號光緒。他所以不爲同治立後，因爲他不願作尊而不親的太皇太后，自己要垂簾聽政。光緒二年文祥病卒，七年桂芬去世，慈安太后亦崩。（野史說是慈禧逼死的）慈禧的威權擴大，奕訢的勢力日孤，十年，軍機五大臣，（奕訢、寶鋆、景廉、李鴻藻、翁同龢。）同時能出。代之者爲禮親王世鐸及孫毓汶張之萬等，都毫無作爲，而毓汶尤仰滿人鼻息。自此滿人政權又漸抬頭，慈禧更寵用宦官李蓮英等，貪汚昏庸，卒釀亂

階。總而言之，慈禧是一個驕矜的貴婦，她沒有政治家的眼光，思想又極頑固，在英法聯軍入京時，她慫恿咸豐帝下詔殺巴夏禮，以示不屈，詔至時而巴已釋，她深以議和爲恥。這與奕訢委屈求全，徐圖自強的意見，根本不合，怎能希望她實行新政呢？

然而西太后也不是一個平常的婦人，她有堅毅的能力，靈活的手腕，知識不夠，是受了時代教育的限制，我們不願過分的責備她。其實奕訢李鴻章一般的知識又夠麼？她維持滿清的統治權，始終依賴曾左李等勘定大亂，佐治中興，不因無識的滿漢人之排觝而移其信任之心，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事，所以奕訢文祥的自強事業，常挾疆臣以自重，而成內外通力合作之局。不過這種任用漢人的政策，其端發之於文慶。他是咸豐朝的宰輔重臣。嘗說：『欲辦天下事，當重用漢人，彼皆從田間來，知民間疾苦，熟諳情僞。豈若吾輩未出國門一步，懵然於大計者乎？』他主張破除滿漢的界限，不拘資地用人。曾國藩辦團練的時候，大學士祁寯藻就說：『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若不是文慶從中護持，恐怕曾國藩不得大用，而局面還不定成個什麼樣子。文慶卒後，肅順當權，更推行這種政策，他網羅許多的人才，（郭嵩燾尹耕雲王闓運都入其門）懲戶部的積弊，對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均推服備至。左宗棠受樊燮的攀誣，幾乎不保，幸而肅順爲之解脫，始獲重用。大學士彭蘊章還以曾國藩權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爲言。祁和彭都是當時有聲望的漢人學者，其識見尚不如文祥肅順，可見猜忌同僚，向主子獻媚的舊思想之爲害了。[illegible]

禧以爭權殺載垣端華肅順，時人目為「咸豐三姦」，其實這三人何嘗是姦佞？而肅順「贊劃軍事，所見實出在廷諸臣上，削平寇亂，於此肇基」。（清史稿傳語）他們對清室很有功勞。慈禧沿用了他們重用漢人的政策，所以終有「同治中興」的盛況。——雖然這盛況是由幾千萬人的白骨或赤血換來的。據東華錄載道光三十年和咸豐元年人口都超過四萬萬，（尚有二三省未經册報）至同治四年太平軍完全消滅，只有人口二萬萬餘萬。豈不是減少了一半？這數目未必確實，因為那一年有直隸江蘇安徽浙江福建陝西甘肅廣西雲南貴州巴里坤烏魯木齊十二省處未經册報。但就十五年間戰死、屠僇、飢饉、流亡、癘疫種種的慘劇來估計，大約幾千萬人口的損失是不成問題的。（彭玉麟詩「屈指國殤三百萬，功成回憶轉心傷」。此指湖南一省人而言，合他省計之，當不止十倍於此也。）所以當時大江南北，到處「亂草沒人，家家皆有餓殍，僵屍。一片荒涼之狀，積尸臭穢之氣，大亂之世，凋喪如此，實耳不忍聞」。甚至以人肉為食，而且叫賣，「每斤三十文，後增至百二十文」。（見曾文正公日記）眞是「底事洪辛浩劫成，大江南北慘難名；橫屍華屋多人臘，食血荒郊盡犬精」！（彭玉麟詩）然而亂事一平，人口減少，田畝地荒，招集流亡，墾植至易，為時不過幾年，而「復睹平世：子遺之家，倉有粟，廚有肉，甕有酒，各醉飽以樂昇平，幾於道不拾遺，戶不夜閉」（見鈍夫書牘）了。所謂同治中興時代，還不是循自然淘汰的定率，為中國歷史循環的老套麼？那里有一點政治的關係呢？況且「從古功成志滿，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奄寺即有乘此喜而貢其諂媚矣；左右即有因

此專而肆其褻蔽矣；容悅之臣，卽有迎此喜而工其諛佞矣；屏逐之奸，卽有窺此專而巧其夤緣矣。諂媚貢則柄暗竊，褻蔽肆則權下移，諛佞工則主志惑，夤緣巧則宵小升。於是受蠱惑，塞聰明，惡忠諫，遠老成，從前戒懼之念，一專敗之，後此侈肆之行，一專開之。方且矜予知，樂莫違，一人肆於上，羣小媚於下，流毒蒼生，貽禍社稷，皆因一念之由專而驕也」。（侍郎吳廷棟疏語）慈禧和同治都是由專而驕，以敗壞天下事者，這還是由於中國舊政治制度的關係。因爲專制卽令「開明」，也不能適應近代世界潮流，救國家，救民族，何況又不能開明，以國事付諸一二婦孺之喜怒嗎？我們看英國在維多利亞女皇時代怎麽樣！所以後來國民革命要推翻滿淸，建立民國，乃從歷史的經驗得來。

再就國防建設而言，李鴻章最注意的是海軍。他從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作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共二十四年，是那個時代的中心人物。因爲他的淮軍是全國最得力的軍隊，而他又勇於任事，最能對付外人，一切國際交涉，由他辦理。國防建設，全在他手裏，他看清楚中國的大患是日本，要防備日本，必需有海軍。倘使中國海軍能戰勝日本，就可以保護朝鮮，爲中國北部的外藩。同治十三年他請分外海五軍，因經費支絀不果行。光緒初年，海疆日亟，始設北洋水師，大治海軍，乃立海軍衙門於北京，以醇親王奕譞爲督辦，鴻章爲會辦。訂購德英鐵甲快船。經費又從那里來呢？中央的財政，早因多年用兵，庫藏告竭，毫無辦法，只有令各省協濟。各省封建思想都很深，不願出錢合作。協助

的數目務求其少，認定了以後，又不按期十足發款。十四年，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爲提督，林泰曾劉步蟾爲左右翼總兵。有鐵甲艦二、快船七、加魚雷艇等大小共二十八艘。在這個時候，光緒帝快要成年親政，他和他的父親奕譞怕西太后不願把政權交出來，乃定計改修頤和園，一則表示光緒對西太后的孝敬，一則使西太后耽於遊樂就不干政了。修園的費用很大，無法籌措，奕譞和李鴻章商量，動用海軍經費。李鴻章不敢得罪他們，祇好照辦。從此海軍沒有添購過一隻新船。王國維頤和園長詞，有云：「聯翩方召升朝右，北門獨付元臣手，因治樓船鑿漢地，別營臺沼追文囿。」已慨乎言之矣！況且海軍衙門是新興的事業，著名的「肥缺」，雖然各省協款不足額，而經手的銀錢還不少，發財的機會更大。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船上的砲比日本的大，但砲彈不夠，並且彈子所裝的不盡是火藥。官吏與外商狼狽爲奸，私人發了財，國事就敗壞了！這些事情，若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是不易發生的。奕訢李鴻章等的自強政策，所以不能貫澈到底，一半由於他們的知識魄力不夠，一半也由於社會政治的阻障太大。但他們費盡苦心，出來提倡，爲新事業推進一步，已有相當的成績，却不料後來發生很大的反動，——戊戌政變和庚子拳亂，國事就更不堪問了。

第二節　帝國主義之性質

在同治以前，列強實行帝國主義的，僅英俄法三國。英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國家，全世

界都銷它的製造品。我們的門戶，被它打開以後，廉價的棉製品侵佔了中國的市場，武力壓迫的結果，我們的海關不能自主，內亂影響所及，上海租界的權力擴張，我們已成帝國主義的次殖民地。俄國侵奪了東北廣大的疆土，又向西北來進展，法國和英國聯合侵略，更向西南屬國去蠶食。我們的邊境日削，主權日喪。在這個時期裏，德意志統一了，意大利統一了，美國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獨立運動消滅，恢復而又加強它的統一了。那是民族主義在西洋大成功的時候。這些國家統一以後，隨着國內的建設和經濟的發展，使它們也逐漸工業化，資本化了。到了相當的程度，就向國外發展。所以同治以後，帝國主義又加上美德意三國。競爭者多了，競爭就愈利害。國際上除了政治勢力競爭以外，又有新起的熱烈的經濟競爭。況且這時的東方帝國主義——日本也興起來了，它距離我們最近，步武列強，首向中國實行所謂「大陸政策」。我們已在帝國主義者四面包圍之中，所以光緒年間處境的困難，遠在道光咸豐年間之上。

帝國主義是我們民族革命的新對象，從道咸以後，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我們應該瞭解它的眞實性質：它是西方海洋文化的產品，本帶有掠奪的性質，和遊牧文化相似。因爲互相劫掠不利，纔形成交換物品的商業。因爲商業注重財富觀念，纔產生出近代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有關係的，關係可以說有三層：第一、資本主義的國家貪圖在外國投資，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息。譬如英美兩國的資本多了，資本家在國內能獲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可是如果把資本投在中國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達到百分之七以上，所以英美資本家競向未

開發的國家投資。接受外國資本，也不一定就有害。譬如美國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的建設大部份是利用英資舉辦的，結果英國的資本固然得了好處，而美國開闢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處更多。我們的平漢路原是借比國資本建築的，後來按期還本付息，那條鐵路就變爲我們的了，比國資本家得了好處，我們得了更大的好處，所以國父雖反對帝國主義，却贊成利用外資來建設。但是有些資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壓力去獲得投資的機會，還有政治野心家要利用資本來擴充政治勢力，譬如清末的四國大借款及中東鐵路的建築就是很好的例子。凡是國際投資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所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連繫，要看它們投資的作用和條件如何。第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是商品的推銷。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利用機械製造，工廠規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愈厚，困難在乎市場。各國競爭市場，原可以專憑「價廉物美」，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壓迫。但在十九世紀末年，國際貿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國不但提高本國的關稅，並且提高屬地的關稅。這樣一來，商業的發展，隨着政權的發展，爭市場等於爭屬地。被壓迫的國家，一旦喪失關稅自主，就永無發展工業的可能。雖然國際貿易的大部份還是中等國家間之貿易，如英對美德法日諸國的貿易額，遠過於對其他屬地的貿易額，英國的屬地最多，尚且如此，別國更不用說了。但他們以一部份的商品，侵佔了某國的市場，某國就成了它們的「次殖民地」。第三、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原料的尋求。世界上沒有一國不靠外來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國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別的國家所需來的原料

更多。日本及義大利是最窮的：煤鐵棉油四種根本原料，它們都缺乏。德國較好，但仍不出棉花和石油。那麼一國的工廠雖多，倘若沒有原料，就會完全沒有辦法。所以帝國主義者因爲要找工業的原料，就大事侵略，使「次殖民地」的出口稅減輕，可以得到廉價的原料，然後使成本減輕，纔能以廉價的製成品向市場競爭。雖然出賣原料的國家，不一定是受壓迫者，如美國的出口貨中，以石油和棉花爲大宗，日德義都從美國購買這種原料；但它們絕不能向美國行帝國主義。可是，像我們這樣貧弱而富於原料的國家，就不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了。總之，資本主義可以變爲帝國主義，也可以不變爲帝國主義。未開發的國家，容易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壓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自己的富源，利用國際的通商來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資本主義如同水一樣：水可以資灌溉，可以便交通，也可以泛濫成災，要看人怎樣對付吧了。

同時我們不要把帝國主義看得過於簡單，以爲世界上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帝國主義了，資本主義的侵略大概偏於經濟方面，而以政治文化爲附庸，美國在一八九八年佔領非律賓以後，就是這樣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有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三種性質：可以同時並進，也可以分途發展。譬如俄國在帝政時代，資本主義並未發達。而政治的野心特熾，它可以借法國的款子轉借中國，來實行侵略。中國以前也是帝國主義者，「萬國來朝」，「四夷賓服」，但我們從不派兵駐防，或干涉它們的內政，對於經濟方面，不但不剝削它們，還扶助它們，簡直是得不償失，這是爲什麼呢？就爲的讓它們「遠慕聲教，傾心嚮化」。這可以說是文化的帝國主義。

游牧民族和商業民族都有征服觀念，更可以實行帝國主義，而「商業民族就是新的游牧民族」，（見德人斯賓格勒所著歐洲之沒落一書）所以帝國主義的色彩，尤爲濃厚。但中古的亞剌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國主義。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家以武力強迫外國接受他們的平等自由，大行其革命的帝國主義。因此我們知道：歷史上各種政體，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種社會經濟制度，封建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都有實行帝國主義的可能。我們所受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五花八門，無所不有，所以我們的國難特別嚴重。

同光間的士大夫完全不瞭解時代的危險及國際關係的運用。他們只知道故步自封，破壞李鴻章諸人提倡的自強運動；同時他們又夜郎自大，對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不能權衡輕重，應付得宜。若照他們的主張，幾無日不與外國打仗，雖然他們也有他們的理由，可是僨事的時候居多。

在壓力和反動力互相激盪的時候，我們的內部，又偏偏多事。太平天國雖平，而捻回之亂仍蔓延〤省，浸及邊疆。捻匪原是北方教匪的一種，「鄉人行儺逐疫，揑紙然脂，爲龍戲，謂之拜捻。不逞之徒，聚捻成隊，明火執仗，公肆仇殺焚掠，俗呼爲捻子」。其後捻子益多，因以一聚爲一捻，或數人，或數十人。始自山東之兗沂曹濟，蔓延於河南之南汝光歸，安徽之潁亳壽，江蘇之淮徐海，湖北之襄棗鍾隨。及太平軍據江南，遣軍北伐，捻匪的聲勢，便格外浩

大，張洛行起蒙城，李兆受起霍邱，尤為其中渠魁。太平軍北伐失敗，李秀成就利用他們來牽制清軍。袁甲三僧格林沁勝保等先後奉命進勦，雖把張洛行擊死，李兆受招降（改名世忠），而苗沛霖以練總操縱其間，叛服無常，勢仍猖獗。他驅執英王陳玉成，卒為其部下所殺。然太平軍亡後，扶王陳得才遵王賴文光，都和捻匪相合，馳突陝鄂豫魯諸省，僧格林沁以宿將窮追敗死。清廷命曾國藩督勦，國藩建「長圍圈制」之策，在徐州、臨淮、濟寧、周家口設四鎮防守，躡尾追而攔擊，勦捻總算有方略。因為國藩所用的是淮軍，淮軍非李鴻章不能統帶，遂薦李鴻章自代，鴻章師其意為「守黃防運，蹙捻膠東」之計，並用堅壁清野的兵法。後來左宗棠也奉命督師，湘淮軍會勦，到同治六年，纔把東捻（任柱賴文光）打平。七年，纔把西捻打平（張總愚）。可是這時西南西北的回亂正熾，左宗棠期以五年平定陝甘，回軍督勦，用屯田的策略，三路出兵。八年，陝西全平，進兵甘肅。九年克金積堡，北路寧夏一帶肅清。十一年，平河州西寧，南路亦定。宗棠進駐蘭州。十二年破肅州，陝甘回亂全平。回亂的原因，本由於漢回雜處，以宗教的關係，不免常有小衝突。官吏未能持平善處，積怨既深，乘機爆發。最初起事的，是咸豐六年，雲南大理杜文秀建平南國，稱總統兵馬大元帥，有追蹤洪楊革命的意思，規模擬於王者。（宮門聯語：「天生英雄，扭轉中原世界；地出豪傑，奪回胡兒乾坤。」三和殿聯語：「按三尺劍以開基，重見漢高世業；著一戎衣而戡亂，依然周武功勛。」其志可知。）佔領五十餘城，復派藍大順藍二順擾及川陝。後藍為多隆阿所勦滅，多亦戰死盩厔。文

秀関昆明二年餘，卒爲滇撫岑毓英所敗。同治十一年，飲藥自殺，首尾凡十八年。雖然內部亂事完全底定了，而回民因罹禍甚慘，甘回白彥虎率衆逃到新疆，和新疆的回亂連在一起，這正逢帝國主義者虎視眈眈，俄人遂乘機侵佔伊犂，引起嚴重的國際交涉，邊境從此多事了。

第三節　西北邊境之侵削

新疆自乾隆年間收歸版圖，至道光初有張格爾之變。清廷遣長齡楊芬等平定之。八年，張格爾被擒，獻俘京師。同治三年，因陝甘回亂的影響，新疆南北路回民並起爲亂：妥明據北路烏魯木齊，稱清眞王。張格爾之子蘇格偕浩罕將軍阿古柏據喀什噶爾。同治六年，布蘇格爲阿古柏所逼走，遂代作南路領袖，稱畢條勒特汗。阿古柏本來是一個舞童，豐姿秀美，跳舞玲瓏，夤緣得法，做了浩罕國的將軍。他統一了新疆，訓練新式軍隊，購買新式槍砲，很有縱橫捭闔的手段，奉土耳其爲上國，和中亞許多回教國聲氣相通，又聯絡英國，敷衍俄國，與訂通商條約。這時英國從印度向西北發展，俄國從裏海向東南開拓，印度庫斯山(Hindukush Mts)一帶就成了兩國勢力的交點。它們都想利用回亂，排除中國的勢力，作他們侵略的口實，俄國首先佔據了伊犂，英國也代阿古柏請求册封。我們如果向新疆進攻，軍費就成了很大的問題。並且交通不便，民族複雜，面積甚大，再加以英俄的關係，在在都有困難，成敗毫無把握。清廷方面究竟怎麼辦

呢？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辯論：左宗棠奉督辦新疆軍務之命，他主張進攻，奏說：

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隔有蒙古。徙薪宜遠，曲突宜先。……臣一介書生，位極人臣，今年已六十有五，何敢妄貪天功！惟伊犁既歸俄有，阿古柏又據喀什噶爾，若置之不問，必有日蹙百里之勢，後患何堪設想！

李鴻章在北洋負海防外交的責任，又値日本窺伺台灣的時候，他主張放棄，理由是：「新疆自歸中國版圖，無論開闢之難，既承平無事之時，歲需兵費三百餘萬，費內地人民無數之脂膏，徒收數千里無用之曠地，已爲不値，是失之無損，得之反有害，即可恢復，亦不過一無窮無了之地而已。且海防爲中國腹心。密邇京師，一旦有事，京師動搖，邊塞猶中國之肢體，縱新疆不守，亦難危及京師。」他注意沿海各省，因爲沿海各省，是中國的精華。而且中國的大敵是日本，日本在維新以後，一心一意的謀我，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西洋各國彼此互相牽制，向外發展不限於遠東，相隔又遠，用兵不能隨便。與其經營新疆，勞費而無把握，「師老財病，慮生他變」；莫如集中物力人力來建設海防，開發腹地。倘若腹地強盛起來，邊省及藩部自然就有辦法了。他二人的主張，各有理由；左的識見宏遠，議論激昂，比較來得動聽；李則顧及現實，先其所急，似乎更覺合理。但李鴻章的眞正意見是這樣的：「俄鷹瞵於北，英虎視於西，土耳其波斯通其西，危機潛伏，即勉強收復，今昔異勢，將來亦斷難久守。而喀什回

會新受土耳其之封，並與俄英立約通商，已與各大國勾通一氣，不獨伊犁爲俄久踞已也。揆度形勢，俄先蠶食，英必分其利，皆不願中國得志於西方。而論及中國目前力量，勢不能專顧西域」。他總覺得英俄土必助回以抗我。殊不知俄英兩國在新疆也是衝突的，阿古柏的外交，是聯英拒俄，土耳其更有何力量？況且新疆是我們的領土，焉能隨便放棄？平定內亂和對外戰爭究竟是兩回事，不能混爲一談！他未免太持重了。其實省下幾個錢，也未必能用於海防建設，以後的海軍經費怎麼樣？他注意防備日本，但甲午仍不免於敗績！他口口聲聲「振興中國，必須統天下之全局，通盤合籌，而後定計」。新疆能說不在「天下全局」之內，而必須放棄，纔算統籌麽？他的主張失敗是當然的，因爲這像是「顧頭不顧尾」的政策。我們並非事後以成敗論人，而左宗棠畢竟是近代了不起的人物，我們不應該說他行險僥倖，以免使進取的事業家灰心！

左宗棠意氣之豪，佈置之密，是他成功的最大因素。他預籌軍餉，國庫沒有錢，祇好借洋款，兩次共借一千萬兩，大半是英國匯豐銀行的。採運糧食，設哈密鎮西兩局，一年就積存約四千萬斤。而俄國更由索桑諾爾代運廉價的糧食五百萬斤。可見在實際上英俄人反爲我幫忙，這恐怕出於李鴻章的意料之外吧！宗棠用「剿撫兼施，糧運兼籌」的策略，光緒二年六月，劉錦棠（劉松山侄）就率湘軍直抵烏魯木齊，白彥虎遁。又三月而北路肅清。光緒三年三月，進軍南路，十餘日，即克達坂、托克遜、吐魯番三城。阿古柏知事不可爲，乃服毒死。其子伯克

胡里仍在喀什噶稱汗。駐華英公使威妥瑪（Wade Thomas）更代爲遊說，請立爲保護國。宗棠奏駁說：『安集延非無立足之地，何待英人別爲立國？即欲別爲立國，則割英境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示私恩？……英人陰圖爲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強我新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許？我愈示弱，彼愈逞強，勢將伊於胡底？臣勉效駑駘，不顧目前成敗利鈍。英使如論回事，請向肅州大營，臣自有以折之也。』這是何等氣概！英人方纔啞口無言了。九月劉錦棠長驅直入，所過回城，多開門請撫，因爲阿古柏最殘暴，浩罕人姦淫回民婦女，誅求無厭，故回民不服，歡迎清軍，大有徯后來蘇之意。所以在兩個月內就把南疆完全收復了。白彥虎伯克胡里之衆，退入俄境。其時浩罕已爲俄所滅，惟安集延尚在，俄助其汗及殘回內犯，亦爲我軍大敗遁去。新疆全部底定，只有伊犂的問題了。

原來俄人佔據伊犂，是它趁火打刧的慣技。它在咸豐年間趁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軍，強佔了我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地方，共三十萬方英里。現在俄國的阿穆爾省及東海濱省，包括海參威在內，就是那次搶奪過去的。同治十年，它看見阿古柏戰敗妥明，勢力已達吐魯番，乃爲先發制人之計，突然將伊犂佔領，以便對回疆作包圍之形勢。清廷向駐華俄使提出抗議，俄使答復說：『清廷威令，久不行於此地，載諸約章之通商，往往不能如約保護。今伊犂之吉爾吉斯人賊掠邊境防，禦無策，不得已始佔領之。然在俄國蓋未嘗思吞此地也。故欲待清國之威令，能行於此方，度可以保國境之安全時，然後退還。』在俄人的意思，以爲中

國一定沒有力量平定新疆，俄國可以永久佔據伊犁，並可壓迫阿古柏，蠶食全疆。（俄人並曾聲言代收復烏魯木齊，派兵往襲，爲徐學功所敗，遂不復進。）誰知左宗棠大兵一到，回亂完全削平。自然出於俄人意料之外了。清廷根據以前俄國的覆文，要求退還。俄人無所藉口，只得堅索保守的費用，因循推託。光緒四年，清廷派崇厚爲全權大使，到俄國去交涉。崇厚只曉得伊犁兩個字，其餘一概不問，乃訂龐躍陸條約（Treaty of Livadia）只收回一座空城，把四面的沃壤險要，盡行割讓，並允許許多重要的通商權利，又償款五百萬盧布。此約傳至北京，一時朝野沸騰。清廷不肯批准條約，並議處崇厚死刑。青年言論家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等，初露頭角，主張備戰，博得一般士大夫階級之同情。俄國政府亦大怒，聲言交涉決裂，令遠東艦隊故作聲勢，從海參威開到日本洋面。其實西北利亞總督已告俄使，謂軍力不敵左宗棠，要求讓步。左宗棠的見解是：『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不止，此可爲歎惜痛恨者矣！』他主張「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以求勝」。換句話說，就是先用外交來解決，而以武力爲後盾，且有長期抗戰的意思。這見解不能算錯。尤其是他說過就分兵三路，準備進取伊犁，自己先到哈密，舁櫬以行，誓不生還。耄年壯氣，令人興奮。但李鴻章原不贊成用兵新疆，更何敢與俄人開釁？他又不敢冒天下之不韙，公開講和，只好使用手段，把戈登請來。清廷以爲戈登帶過常勝軍，在打太平天國時，立功不少，都很信任他，就問他的意見如何？他說：『中國如要對俄作戰，應先預備

三件事：、一遷都西安；二、長期抗戰，至少十年；三、滿人放棄政權，因爲長期抗戰中，滿人政權一定不能維持。倘使三件事作不到而冒昧打仗，簡直就是瘋子。』清廷聽了戈登的話，始決心求和。特召左宗棠入京備顧問，以和緩戰機，並派駐英公使曾紀澤赴俄商改條約。

曾紀澤是我國當時最瞭解國際形勢的外交家，他不主張打仗，他說：『俄人之堅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亂民所可同日而語，伊犂本中國之地，中國以兵力收回舊疆，於俄未有所損，而兵戎一起，後患方長。俄人恃其詐力，與泰西各國，爭爲雄長，水師之利，推廣至於東方。是其意不過欲藉伊犂以啓釁端，而所以擾我者，固在東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陸。一旦有急，尤屬防不勝防。』他請先赦崇厚罪以緩和俄人感情，然後赴俄運用外交手腕，經幾十次辯論，纔挽回了大部份的土地及通商權利，但償款加到九百萬盧布。他是根據國際公法，條約未奉政府批准，不能算正式成立去交涉的。英國駐俄大使稱贊他說：『憑外交從俄國取回它已佔領的土地，曾侯（襲其父國藩爵）要算第一人。』他自己却說：『此次俄人輕棄已得之權利，全由俄土戰後，財殫力竭，其君臣雅不欲再啓釁端，故得從容商改，和平了結。誠恐議者以爲俄羅斯如此強大，尚不難遣一介之使，馳一紙之書，取已成之約而更改之，執此以例其餘，則中西交涉，更無難了之事。斯言一出，將必有承其弊者。』這種不矜不伐，操心慮患的態度，眞不愧爲曾文正公之子！可惜他以後竟未得大用！這是誰的過失呢？從此清廷纔知道邊防的重要，把新疆改爲行省。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南方面又發生問題了。

第四節　西南藩屬之喪失

中國雖然也是帝國主義者，有很多的屬邦；如緬甸、暹羅、安南、琉球、朝鮮、尼泊爾等，可是我們對屬國祇有好處，沒有壞處，僅僅希望他們來朝貢，並不去干涉他們的內政和外交，更沒有殖民通商的經濟政策。這些屬國對中國的關係也很淺，不過按期納貢，新王即位請求冊封。倘使國內有變亂，還可請中國援助，事後中國並不要絲毫報酬，所以我們對屬地是有給與而無獲得，屬地對我們是只擁戴而不仇恨。我們的祖先何以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第一、因爲中國文化的關係：古代聖王，都以「平天下」爲最後目的，「大同」爲理想境界；雖然不易達到，總想求得一個外形，從前是「積德累仁」，使「四夷傾心嚮化」；後來是「耀武宣威」使屬國點綴朝儀，似乎有些傳播文化的作用。第二、因爲國防外線的關係：如光緒七年翰林院學士周德潤說：『臣聞天子守在四夷，此誠慮遠憂深之計。古來敵國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則已無及矣；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及矣。我朝幅員廣闊，龍沙雁海，盡列藩封。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謂河山帶礪，與國同休戚者哉？』觀此可知屬國是代我們守門戶的。不過這兩種作用，到近代都變了。西洋各國船堅砲利，可以直攻我們的沿海，打進我們的京城，國防外線簡直沒有用處。而我們受人家的侵略，自顧不暇，還有同化屬國，保護屬國的力量麼？倘使那時人能看透

此點，和蘇聯革命初年，毅然決然放棄帝俄的屬國一樣；或者不至於貪虛名而受實禍了。

光緒初年，列強專以侵奪我們的屬國為事。日本滅琉球，是乘機巧取；英國併緬甸，還要假猩猩的准緬甸朝貢中國；法國侵暹羅，使暹羅變法自強。藏邊三小國——不丹、尼泊爾、哲孟雄，早為英人囊中之物。我們都無暇過問，只有安南朝鮮的問題，卻引起了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因為安南朝鮮和中國的關係，比一般的屬國不同，年遠情切，唇亡齒寒。今先述安南之事。法人侵安南，在康乾時代就下手了。咸豐八年，法西(西班牙)聯軍進攻安南。同治元年，訂西貢條約，迫割邊和、嘉定、定祥、三州及崑道爾拏島與法。同治六年，法又襲取永隆、安江、和仙三州。下交趾完全為法人佔領。法國人因為湄公河不適航運，又把目光轉移到北部的紅河。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法兵攻陷河內。安南無力抵抗，祇得向劉永福乞援。說起劉永福來，真是我國的民族英雄。他原在廣西天地會黨人吳亢清(自號延齡國主)部下，後來會黨失勢，他就率衆入安南，立中和團黑旗軍，代平白苗之亂，受越王官職，據保勝，拓地七百餘方里，儼然為「北圻長城」。黑旗軍攻河內，法人出戰，永福冒死衝鋒，斬首數百，殺其少佐葛爾勒(Francis Carnier)(劉永福歷史草作駙馬安鄴)法人見軍事不利，即誘安南結和親條約，認安南為獨立國，外交須受法國監督。(一八七四年)清廷抗議無效，也沒作積極的干涉，從此便把安南斷送了。光緒六年，法國依約在安南通商，海口設置兵備。曾紀澤在俄京，致書法國外相，申言中國對於安南，有完全的宗主權。並且聲明和親條約，中國不能承認。八

年，法海軍大佐李威利（Henri Riviere）率兵至河內，欲攻安南，安南王急召劉永福禦之。九年，永福以三千人逆戰於紙橋，大敗法兵，斬李威利。其右營管帶楊著恩（智仁）亦陣亡。（先是永福戒著恩：「戰洋人不可急」。著恩曰：「見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雖死，願任先鋒！」）法政府乃命駐暹羅領事赫曼爾（Harmand）爲東京理事官，陸軍少將波歐（Bouet）急赴東京，指揮軍事。他們因爲安南全靠黑旗兵保護，所以一面派兵出河內攻山西，牽制黑旗兵；一面由海防攻順化，直逼其首都。雖山西方面完全失敗，而順化方面，要塞盡破。安南政府大懼，立刻向法人求和。乃締結保護條約，以越南爲法之保護國，並逼令永福退軍山西。這時中國朝野都主張以武力援助安南。張佩綸、陳寶琛、張之洞諸人特別激烈。清廷派雲貴總督岑毓英，兩廣總督張樹聲，辦理邊防，統率大軍入安南，彭玉麟做欽差大臣，總理廣東軍務，籌防海口。並授劉永福記名提督，令其進圖河內。李鴻章始終要集中力量，籌備海防，並且深知自己的實力不如法國，不敢輕於一試。奕訢贊成李鴻章的意見，言官交章論劾。西太后一方面怕輿論的指責，一方面又怕引起戰爭。反而借詞說奕訢委靡因循，把軍機五大臣全都黜了。當時曾紀澤再向法國政府抗議，聲明：『越南服屬中國，已二百餘年，冊封貢獻，克盡以小事大之禮，普天下皆知。同治年間，越南北境一帶，盜賊潛滋，我中國特命出師，爲之驅除盜賊，所用兵餉，不下數百萬，原爲保護屬國起見，亦普天下所共知。』法國政府覺乾脆的回答道：『法國之保護安南，並非今日起，在一八七四年已然，現惟重堅舊約而已。』曾紀澤看見法國

態度強硬，爲斡旋和平起見，特別讓步，主張：「東京秩序，歸中國恢復，法國撤退東京之兵！至紅河通航之件，中國政府必竭力副法國之希望。」那知法國政府，不承認中國對東京有發言權，直接拒絕。交涉至此，外交上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曾紀澤立刻電告淸廷，力主一戰。並致書李鴻章說：

某居西洋五年，經營此事亦逾三載，明窺暗察，以爲必須禦之以剛者，厥有數端：法人之性，欺輭怕硬，雖夸大而喜功，實躁急而畏難，輕於發端，怠於持久。吾華備戰愈顯，則了事愈易，備戰過遲，法人既已獲利，則吐出較難。一也。法人之夙志，非徒併越，而特藉以越爲根基耳。粵邊之煤礦，滇中之金礦，無不垂涎，此間人之著作，多可爲證，然則吾輕讓屬國，即是自撤藩籬。二也。壽昌江經海防入海，海口有島名倍達蹦，爲東方船埠，法人欲建爲水師總埠，吾華後患，何可勝言？三也。英人垂涎於西藏，俄人垂涎於高麗，皆視我因應越事以爲進止。琉球無甚關係，不爭可也；東京乃臥榻之側，亦不聞問，豈不召各國弱小者之姍笑，強梁者之覬覦乎？四也。我之懼法，不在陸而在水，不在滇粵一帶，而在沿海各口；然英德俄美已訂私約，倘華法鬧仗，四國雖旁觀不助，然不許法人封禁通商海口，亦不許輕擾各埠。如此則法人逞志甚難。知難則易退，我示以不讓，正所以速其退也。五也。法之本國，朋黨相競，政出多門，非各黨同心，斷難成大功於數萬里之外，而各黨冰炭參商，絕少齊心之日。六也。法人於西洋無一友邦，內顧多憂，則遠謀易

餒。七也。我若謹慎太過，則人視我之國，不如馬達加斯小邦，視我官兵，不如劉永福奔寇之子遺也。此辱何可暫忍？八也。

這封信對於當時的情形，分析得十分清楚，曾紀澤主張強硬交涉，「以速其退」，「備戰愈顯，了事愈易」。可是李鴻章知道中國兵不能打仗的，岑毓英到了安南，節節敗退，奏稱：「糧藥紛孤，退守邊境。」所以他堅持和議政策。光緒十年五月，以廣東稅務司德人德璀林(Detring)的調停，與法國海軍艦長福祿諾(Fournier)會議於天津，訂立中法媾和草約。承認法國與安南的條約，撤退中國在安南的軍隊，這個協定，似乎法國應該躊躇滿志了。不料法國人在諒山，強迫廣西駐軍，立時撤退。因此發生了衝突，互有殺傷。駐軍法使巴特納(Patennotre)更進一步要求清廷賠償兵費一千萬鎊，後減至三百二十萬鎊，發出最後通牒，迫我答復。我國士大夫階級，本來不滿意李鴻章的和約，都一致主戰。然而清廷仍相信李鴻章的話，以為法國決不毀約開戰，所以舉措不定，沒有表示顯明的態度。七月初六日，法將孤拔(Courbe)借口諒山事件率海軍攻福州船廠，這時主持防務的，就是主戰派的激烈份子張佩綸，他是個文人，不懂軍事，因奏劾李鴻章出名，清廷故意派他去作船政大臣，結果他一聽砲聲就逃跑了。我們大小十一艘兵船，倉卒應戰，被打壞九艘，自鑿沉二艘。左宗棠苦心創辦的船廠也燬毀了。清廷忍無可忍，纔發表宣戰的上諭。但軍事方面毫無計劃，陸路各軍，亦不能「迅速前進」。孤拔移軍東向，佔據基隆，宣佈封鎖台灣。幸而劉銘傳守台南，法兵難以擴展。孤

拔北上經營的策略，法政府也未予採納，不久他就死在澎湖了。這時兩方面都不願戰事擴大，暗中進行和議。光緒十一年二月，法軍由諒山進攻鎮南關，我軍皆潰退，適廣西提督馮子材及總兵王孝祺來援，獨當中路前敵。子材年近七十，短衣草履，帕首持矛，揮軍應戰，大敗法人，乘勝於十三日克復諒山。李鴻章覺得「倘借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要求」。「否則又兵連禍結」。曾紀澤也說：「此時議和，尚覺體面」，原來法國和英國有埃及問題的衝突，又因禁運米案遭英美的抗議，國際形勢，頗爲不利，所以它始終是「不宣而戰」。是月十九日（一八八五年四月四日）遂在巴黎成立草約，以遵守天津協定爲原則。中國代表卻是一個海關職員英人金登幹，由總稅務司赫德派去的。清廷即下令諸軍停止戰事，退還邊境，將士大都扼腕憤恨，彭玉麟張之洞也發憤力爭。但已成定局，不能更改。四月二十七日，李鴻章與法使會於天津，訂立中法媾和條約，大旨以天津巴黎兩草約爲基礎。而安南從此正式讓給法國了。英美人說：『這戰爭雙方均未得到光榮的勝利。』（見遠東國際關係一書）我們的邊疆藩屬，被帝國主義者蠶食殆盡，然而伊犂索回已失之土地，諒山幾得陸軍之勝利，尙屬差強人意，猶爲西洋各國所「敬重」。及日本帝國主義強大起來，中國纔「江河日下」了。

第九章　東方帝國主義之壓迫

第一節　修好與侵略

日本和我國的關係，在古代是若斷若續的。他們要侵略中國，從豐臣秀吉起，到了明治維新以後，纔有所謂大陸政策。九十年前，日本還是閉關自守的時代。荷蘭人勸幕府開港通商，他們沒有答應。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美總統斐爾摩（Fillmore）派艦隊長培理(Perry)攜帶國書駛入江戶，要求通商。這樣纔打開了日本的門戶。當時日本的人民，也和中國人一樣的排外，稱外國船爲「黑船」。因爲商約是江戶幕府訂立的，復集矢於幕府，於是有「尊王攘夷」之說，有「王政復古」之事，幕府把大權歸還給天皇。這是一八六七年，正值明治天皇即位，明治天皇是個有作爲的人，他注重維新事業，用新黨來管理政治，歷史上稱爲明治維新。可是在明治以前，日本的藩侯，業已派留學生到歐美，利用西洋的船砲，訓練新式的軍隊了。留學回國的新人物，更進而改革法制，廢除封建，聘用客卿，從事近代化的建設。不久又把國體改爲君主立憲，召集國會，頒訂憲法，採仿西洋的文物，摹擬德國的制度，國勢日臻強盛。但是它的土地，只有區區幾個島嶼，隨着新工業產品的激增，人口一天天的繁殖，不免發生向

外侵略的野心，加以日人秉性尚武，自然就變爲新進的東方帝國主義者了。維新以後，他們有所謂「南進政策」，要向太平洋的海島去發展，有「大陸政策」，要向中國的沿海來侵略。最使他們垂涎的地方是台灣、福建、朝鮮、和東三省，在明治以前，日本諸侯島津齊彬就發表過這種意見。他說：『英法既得志於清，勢將轉向而東，以今日之形勢論，宜先命將出師，取清國之一省，而置根基於亞東大陸之上，內以增日本之勢力，外以昭武勇於宇內。夫清國沿海諸地，關係於日本國防者，惟福州爲最，取而代之，於國防有莫大之利焉。』明治以後，當然更加積極了。不過日本的外交，向來是雙管齊下的：即一面修好，一面侵略。同治十年，日本派伊達宗城爲正使，與李鴻章會議於天津，訂修好條規，及通商章程。這個條約是平等互惠的，和西洋各國的不平等條約不同。但日本人非常佻皮，他們總要求和西洋各國的條約一樣。李鴻章說道：『西洋各國，此國商民至彼國，悉遵該國規矩禁令，遇有訴訟事件，即由地方官持平審辦，領事等官，不得擅專。中國與西國換約之初，多因勉強成交，又不深悉歐洲習俗，致受誆騙，約已換定，無可如何！每見領事官作威作福，心實不甘。』本來領事裁判權和關稅協定，都是他們不諳國際法隨便讓去的，怎末能再受日本人的「誆騙」呢？所以我國堅持彼此均享有領事裁判權及關稅協定。理由非常正大：「日本與中國相去較近，非但貴國市舶絡繹前來，即中國賈帆亦聯翩東渡，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故措詞均用綜括，以昭平允」。日本沒有法子要求了，祇好互換。但換約的大使，他們的外務卿副島種臣自請前來，是有特殊作

用的。一則他要以大使的資格，首班請覲，顯出日本的國際地位；一則他要朦混總理衙門，游說各國公使，對台灣的事體不加干涉。果然在他回國以後，日本就向台灣進兵了。這是它開始向中國侵略的一種嘗試。因爲當時琉球的帆船，遭颶風飄至台灣，爲生番刼殺五十四人。旣而日本小田縣民四人也飄到遭害。日本人正好藉詞侵略台灣，遂於十三年派西鄉從道率陸海軍前去征討。熟番望風投降，生番竭力抵抗。清廷聽見這個消息，連忙下令沈葆楨率精兵萬人入台，督促日軍退出。日本因爲英美駐日公使有違言，乃派大久保利通來北京交涉，結果經英使威妥瑪調停，付給撫卹銀十萬兩，修道建房費四十萬兩了事。這一次日本雖未達到侵占台灣的目的，但他們還張燈結綵，慶祝勝利。似乎有一種格外的收穫，就因和約第一條說：「日本此次征台灣，係保民義舉，中國不認爲不是。」這不是已經默認琉球爲日本的屬地了麼？原來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七二年）起隸屬於中國，歷五百餘年，按期進貢，未曾中斷。但在明萬歷三十年（一六〇二年）日本人把它隸屬於薩摩藩，擄其國王，監督他們的財政。從此琉球成了兩屬，好像一個女子許嫁兩個男人，幸而這兩個男人未曾遇面，所以這種奇怪現像竟安靜無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到同治十一年，日本借口台灣事件，向琉球行果決處分，夷爲藩屬，通告各國，代辦他們的外交。後來更進一步催促琉球改換年號，不再入貢中國。琉球王覺得對中國世修貢職，謹奉正朔，不便擅自更改，因此堅決回絕了日本，同時知道日本必不肯干休，立刻遣使向中國告急。恰巧我國內有新疆回亂，外有伊犂交涉，形勢十分緊急。雖然左

宗黨主張：「寧讓俄人一步於伊犂，不可不出全力制日本於琉球」，無奈自顧不暇，只得完全放棄。光緒五年，日本派軍艦數艘，前去琉球，廢了琉球王，改爲沖繩縣，琉球從此滅亡。事後中國力爭不得，只好作爲懸案，適美總統格蘭脫(Grant)漫遊東亞，調停兩方，遂把琉球斷送給日本。然而日本的野心，並不止此，它還要侵略朝鮮台灣，中日兩國的衝突，依然無法避免的。李鴻章早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並且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那一國的新軍備進步得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爲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後纔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以武力收復新疆，反對爲伊犂問題與俄國開戰，反對爲安南問題與法國打仗，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爲擴充海軍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自從台灣琉球問題暴露了日本的野心，一般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這時也知道應該戒備了。日本既能滅琉球，就能滅朝鮮，琉球或可不爭，朝鮮則勢在必爭，所以他們都注意籌劃如何保存朝鮮。因爲朝鮮的地位在我們的國防上，極其重要，它可以作敵人陸軍侵略我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作敵人海軍侵略我山東河北的根據地。反過來看，朝鮮在日本的國防上，地位也很要緊。朝鮮在我們手裏，日本尙覺不安，一旦被俄國和英國所佔，那時日本所感的威脅就更大了。所以朝鮮也是日本必爭之地。因此引起了甲午戰爭。

第二節　朝鮮之交涉

朝鮮和中國的關係，大約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自從周初分封箕子於朝鮮，便隸屬中國版圖，做東方唯一屏藩。清朝未入關以前，就征服朝鮮，冊爲屬國了。同治初年，朝鮮國王李熙年幼，他的生父李是應攝政，號稱大院君。大院君是個十分守舊的人，他屢次殺傷教士，堅不欲與外人通商。朝鮮和日本，因爲鄰國關係，素常交好通商，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對韓外交，由對馬島的諸侯執行，維新以後，大權歸日皇，所以日韓交涉也改由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厭惡日本的維新，因而拒絕與日本往來。並規定「與日本交涉者處死刑」。副島種臣來聘時，曾經責問過中國，總理衙門的回答說：『中國對於高麗，雖與冊封及正朔，然其內政與和戰，皆高麗自主，與中國無關係。』這雖是實在的情形，但無形中已把宗主權放棄了。日本國內舊諸侯武士們提倡「征韓論」。除了打破日韓外交的僵局外，還有四個動機：(一)可以洗刷豐臣秀吉失敗的恥辱。(二)可以防制歐洲列強，如英俄，使不得植勢力於距日最近之地。(三)和中國爭奪朝鮮，可以表示日本是東亞的強國。(四)征韓能爲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謀出路。並引起國民一致對外，使息止對於政府的譏評。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即日本明治八年)日本軍艦雲揚號因測量朝鮮沿海和中國牛莊等處，經月尾島，停泊江華灣。日兵乘坐小艇，上溯漢江。朝鮮砲台守兵望見，連忙開礮轟擊。雲揚艦立刻應戰，攻破砲台，奪得永宗城，捷報達到東京，主張征韓者更有所藉口。當時日本的政治領袖如岩倉，大久保，伊藤，井上諸人，原反對征韓，他們以爲維新事業未達到相當程度以前，不應輕舉妄動的貪圖向外發展。但是在「江華島事件」

發生以後，他們覺得無法壓制輿論，不能不有所舉措。於是一面派黑田清隆及井上馨率艦隊到朝鮮去交涉通商友好條約；一面派森有禮來北京試探中國的態度，並避免中國的阻抗。

森有禮和我們的外交當局大起辯論。我方始終堅持朝鮮是我們屬國，如日本侵略朝鮮，就是對中國的不友誼，中國不能坐視。森有禮則說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是有名無實的，因為中國在朝鮮不負任何責任，既不負責任，就沒權利。可是黑田和井上在朝鮮的交涉成功了，他們所訂的江華條約，承認朝鮮是獨立自主的國家，開埠通商，這就是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應該抗議並且設法糾正，但是日本和朝鮮雖都把條約送給中國，北京沒有向日本提出抗議，也沒有責備朝鮮不守本分，中國實為傳統的觀念所誤。照中國的傳統觀念，只要朝鮮承認中國為宗主就夠了。第三國的承認與否是無關宏旨的。在光緒初年，中國在朝鮮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韓條約了。

日韓訂約過後，中日就發生琉球的衝突，我們也隨便的容忍了。但是朝鮮的問題，李鴻章自始就特別注意。他認定日本對朝鮮有領土野心，西洋各國對朝鮮祇圖通商和傳教，在這種形勢之下，英美法各國在朝鮮的權利愈多，它們就愈要反對日本的侵略。光緒五年李鴻章寫給朝鮮要人裕元的信說得很清楚：

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與泰西各國次第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為謀，廢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不可無以備之！然

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慮其不足，以統與泰西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

無耐守舊黨並不覺悟，等到光緒七年李昰應完全失勢，新黨以外戚閔氏爲中心，組織新政府，訓練新式軍隊，次年纔由中國介紹，與英美德法各國訂通商條約。不久他們又發生了內亂。李昰應鼓動兵變，誅戮閔族要人，圍攻日本使館，公使花房義質逃回本國，陸軍中尉掘本被殺。（朝鮮聘他來訓練新軍的）李鴻章因丁憂在籍，詔促速返。署直隸總督張樹聲採鴻章幕僚薛福成的建議，立派軍艦三艘抵仁川，又派吳長慶率所部淮軍直入朝鮮京城，平定內亂：一則表示中國的宗主權，一則防備日本。吳長慶誘李昰應議事，遽揮隊擁之登輪，逕至天津，羈押保定，把亂黨驅散。日兵後來，無所藉口，只得脅迫朝鮮訂濟物浦條約，除賠款謝罪外，又許日本駐兵京城，護衛公使館。這樣中日兩國都有軍隊駐在朝鮮京都，形成對峙之勢。

中國在漢城的勝利，使許多人輕敵。張謇主張索性把朝鮮滅了，張佩綸和鄧承修主張李鴻章在煙台設大本營，調集海陸軍隊，須備向日本宣戰。張說：「日本外無良將，內無謀臣，師船不耐風濤，官兵未經戰陣。」鄧說：「彼之敢於悍然不顧者，非不知中國之大也，非不知中國之富且強也，所恃者中國之畏事耳，中國之重發難端耳。」這些人未免看事太容易，李鴻章看的比較清楚。他說：

彼自變法以來，壹意媚事西人，無非欲竊其緒餘，以爲自雄之術。今年遣參政伊藤博

文，赴歐洲考察民政，復遣有棲川親王赴俄，又分遣使赴意大利，駐奥匈帝國，冠蓋聯翩，相望於道。其注意在樹交植黨，西人亦樂其傾心親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護。該國洋債既多，設有危急，西人爲自保財利起見，或且隱助而護持之。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樂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里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第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志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昔年戶部撥南北洋海防經費，每歲共四百萬兩，無如指撥之時，非盡有著之款，統計各省關所解南北洋防費，約僅及原撥四分之一。可否請旨敕下戶部總理衙門將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費，核明實數，務足原撥四百萬兩之數。如此則五年之後，南北洋水師兩枝，當可有成。

這次辯論終止以後，越南問題又起來了。張佩綸鄧承修諸人忽然忘記了日本，大事運動與法國開戰。中法戰爭一起，日本的機會就到了。這時朝鮮的政局，已形成兩黨對壘之勢。一面是開化黨，其領袖卽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諸人，後盾是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這一派是親日的，想借日本之勢力以圖獨立的。對面有事大黨，領袖卽閔泳翊，金允植，伊泰駿諸人，後盾是中國駐韓的慶軍前敵營務處幫辦袁世凱。（中國駐韓商務官爲陳樹棠）這一派是聯華的，想托庇於我們的保護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國壓迫。漢城的軍隊，有中國的駐防軍與袁世凱所代練的朝鮮軍，對方有日本使館的衞隊及日本軍官代練的朝鮮軍。在中法戰爭未起以前，開化黨

不能抬頭，既起以後，竹添就大活動起來，說中國自顧不暇，那能顧朝鮮。於是洪英植諸人乃決計大舉。光緒十年（甲申）十月十七夜，洪英植在郵便局設宴請外交團及朝鮮要人，各國代表都到，惟獨竹添稱病不至。忽報鄰屋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亂了。閔泳翊出門，被預先埋伏的兵士所傷，金玉均等跑進王宮，肻稱中國兵變，強迫國王移居。並召竹添帶日兵進宮保衞。竹添這時不但無病，且親率隊伍入宮，國王到了開化黨的手裏以後，下詔召事上黨領袖，他們一進宮就被殺了。於是宣佈獨立，派開化黨人組閣。十九日袁世凱帶兵進宮，朝鮮衞兵做內應，雙方夾擊日軍，竹添見不能抵抗，於是撤退。王宮及國王又到了袁世凱手裏。洪英植被亂兵所殺，金玉均隨着竹添逃到仁川，後投日本。政權統歸事上黨及袁世凱，開化黨完全打散了。袁世凱本在吳長慶的部下，吳氏移防金州，他被留在朝鮮代練新軍。這時年尚不滿三十，忽當大事，因電報不通，無法請示，祇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的負起責任，制止對方陰謀，李鴻章從此看重他，派他作「總理朝鮮通商交涉事宜」的全權代表。

竹添是個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沒有違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超過了它所定的範圍。事變以後，國際輿論，大都不以為然。日本政府只得召回竹添，和朝鮮訂韓城條約，賠償金十三萬元。光緒十一年，又派伊藤博文來中國，與李鴻章訂天津協定，雙方皆撤退朝鮮駐軍，但將來韓國有事，兩國均得出兵，惟事先須行文知照，事定卽行撤退。從此日本對朝鮮也和我們有同等的權利了。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正是英俄兩國因爲阿富汗的問題，幾致開戰。它們的衝突，波及遠東。英國爲預防俄國海軍從海參威南下，忽然佔領朝鮮南端之巨文島。俄國遂謀佔領朝鮮東北的永興灣。朝鮮人看見日本不可靠，有與俄國暗通，求俄國保護者。在這種形勢之下，英國感覺危險，日本更怕英俄在朝鮮得勢，都慫恿中國在朝鮮行積極政策。英國覺得朝鮮在中國手裏與英國全無損害，倘到俄國手裏，則不利於英甚大。日本也覺得朝鮮在中國手裏，它將來還有法子奪取，一旦到了俄國手裏，簡直是日本的致命傷。不過這種積極政策，李是應也曾經建議過，李鴻章並未採納，他的態度似乎是保守的。我們看他寫給洪鈞的信說：

朝鮮最弱國，爲東方全局所關，英俄兩雄，尤若視爲輕重。英懼俄佔據朝鮮海口，經略太平洋，故力勸我收回朝鮮，非助中而仇韓，實忌俄也。俄懼英之說行，則中英之交益密，將合而拒俄，是黑海之盟，復見於東方也，故屢請我立約，兩不侵佔，非防中而助韓，實忌英也。兩雄相忌之際，中國正可擇使而行。今用英之說，則力有未能，而俄先不能無事；用俄之說，則彼此樂於無事，且聲明永不侵佔，而英亦或可勉從。前年索還巨文島時，曾與俄署使拉得仁晤議中俄互送照會，彼此約定，永遠不佔朝鮮土地，旋因彼於照會內，不肯明言是我屬邦，中旨未允。今之所言，自是重申前說。今日事勢與前更殊，韓日趨於危亡，岌岌不可終日，盡人皆知，逼處大國惟有一俄，彼求訂立專條。永不侵佔，自屬有益無損。

又寫給袁世凱的信說：

韓事日就敗壞，不易挽回，執事在彼三年，苦心調劑，隨宜補救，非止一端，局外或不深知，鄙人豈不洞察？所以迭奉箴規者，特慮神鋒太雋，亦呂侯戒元遜十思之義也。近讀來示，深穩有識度，進而益邃，至爲快忭。德尼論朝鮮事一篇，荒謬絕倫，尤集矢於執事，其詆罔之詞，原不足辨，而於執事持大體，得衆心處，自不能掩，各國亦多不直其邪說也。

德尼（O. N. Denng）是李鴻章薦給朝鮮的美國顧問，他和袁世凱爭權，乃著朝鮮論(China and Corea)一書，力詆袁氏，鴻章信中所說指此。袁世凱當時頗爲灰心，屢次求調，李鴻章更勸勉他說：

目前情勢，操縱兩難。橫覽人才，亦無以易執事，非漫爲勉留也。韓王之錮蔽，似已無可挽回，目前除却持大端不苛小六字別無辦法。所望平心靜氣，愈加講求交涉之宜，維持一分卽補救一分，將來局面，或有變遷，或有十分穩當可代之人，自當時時留心，終不使執事久居危疑之地也。嘗論執事現在所處地位，終軍之使南越也，而其事寄則班超之護西域也。終童之失在輕銳，定遠在西三十年，將行告任尙，亦惟以嚴急淸察爲戒，而歸於簡易持大綱，任笑其平平，終以僨事。可知定遠三十年中，深沈含宏蓋不少矣，其語深遠可味。今亦願執事爲定遠之平平，無爲任君之察察而已。

從這幾封信裏可以看出李鴻章對於朝鮮的政策是消極的，只要維持宗主的體面就夠了。袁世凱少年氣盛，他要把握朝鮮的財政、郵進、海關。朝鮮派公使到各國去，事先未向中國商量，袁世凱一面阻止，一面請示辦法，李鴻章回復道：『韓國公使至任地之時，必先至中國公使館，由中國公使介紹訪問駐在國之政府，而後韓國公使，得任便訪問。又駐在國宮殿內之祝賀公席饗宴等，韓國公使必坐中國公使之下坐。有重要事件時，韓國公使必問中國公使意見，以養成宗屬之誼。』然而朴定陽到美國，沒有遵守這些條件。中國責問朝鮮，把他免職。這時我們在朝鮮實行宗屬政策，威權地位都提高了。日本最初怕英俄插手，所以不加牽制，後來看見中國的勢力膨賬，不免起了嫉妒的心思。李鴻章始終感覺着對朝鮮「操縱兩難」，對列強連日本在內，都不敢得罪，徘徊瞻顧，毫無主見，及事機既迫，仍然持重因循，着着落後，這是他失敗的最大原因。

第三節　中日甲午之戰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這是甲午戰爭的直接起因。本來朝鮮自甲申亂後，政權復歸舊黨，舊黨又分事清事俄兩派，鬪爭很烈，國事日非。當時民間有歌謠說：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肴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

可見政治腐敗人民怨恨的情形。東學黨就利用這種民不聊生的時候，揭竿而起。他們以東學相號召，排斥西教，刺取儒佛老之說，雜以迷信。用「明人倫，誅汚吏，匡政府之秕政，救生靈於塗炭」作標語。一般排外守舊痛心虐政的人，都相率加入。崔時亨爲領袖，陷據金羅慶尙兩道，韓兵往討，迭次失利。袁世凱促韓廷向中國乞援，李鴻章並未考慮到可能引起的影響，遽以爲「上國體面，未便固却」，遂派葉志超聶士成率一千五百人往朝鮮，並按照天津條約通知日本。日本原來惟恐朝鮮不亂，一方面派浪人內田良平等組織「天佑俠團」，往助東學黨，使他們的勢力蔓延；一方面由駐韓代使杉村及駐京領事荒山，極力慫恿袁世凱李鴻章出兵平亂，故意設此圈套，以爲侵略朝鮮之口實。果然我兵方到牙山，日本駐韓公使大島圭介也率兵到漢城了。亂黨聽說中日大兵前來，完全逃散。其實他們造亂的地方，離漢城尙遠，該處並無日本僑民。日本在幾天內，就派來七千多人，列陣於仁川漢城間，韓廷屢次阻止，知道它「包藏禍心，危在呼吸」。只好希望中國兵先撤回。李鴻章卽電令葉志超準備撤退，並照會日本，同時撤兵。無奈日本正決心挑釁，不但不撤，反稍有增加，「在軍事上取待先發制人」的優勢。可是韓亂旣平，他們所謂保護僑民便無所借口了，各國又多不以日本之出兵爲然。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乃商量用一種外交的手段，轉換形勢，忽提出由中日兩國派出共同委員，改革朝鮮內政。換句話說，就是共管朝鮮。非有結果，決不撤兵，如中國不贊成，日本就以獨力來擔任。據陸奧宗光說：『余假此好題目，非欲調和已破裂之中日兩國關

係，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機，一變陰天，使降驟雨，或得快晴耳。時日本政府的狡猾和野心，已昭然若揭。可憐清廷和李鴻章却蒙在鼓裏，毫無察覺。

中國不答應日本的改革朝鮮內政方案，自有正當之理由，但這些理由對入室露刃的強盜來講是沒有一點效果的。清廷和李鴻章還只用口舌與公文來和日本爭辯，堅持非先撤兵不可，實際是中了日本人的詭計。當時英國駐華公使頗熱心努力於善意的調停，總理衙門毫無識見，未能應付得宜，致英國退處於中立的地位。俄使喀西尼向李鴻章說：「俄已勸令日本與中國商同撤兵，如日不遵，恐須用壓服之法。」於不知喀西尼雖願意幫忙，俄政府是不願插手的，李鴻章誤信此言，上了大當。過了幾天，杳無消息，鴻章雖亦覺得壓服是空言，但總以「俄廷曾電該使調處，必有收場」。甚至於俄使已表示「只能以友誼力勸日撤兵，未使用兵力強勒日人。」鴻章還希望英法德美出來調處。並說「兩國交涉，全憑理論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力戒牙山弁兵，勿與計較。葉志超電陳二策：上策速派大軍由北來，與葉兵相呼應，免致進兵無路；中策速派商輪將牙山駐兵撤回，秋後再圖大舉。謂若守此不動，徒見韓人受困於日，絕望於我，軍士露處受病，殊爲可慮。鴻章以上策「似須緩辦」，中策又慮「示弱」。結果不特遺誤戎機，並且予日人以從容佈置之時間。總而言之，他始終不願和日本打仗，但他對日本的要求，又不肯讓步，這種軍事消極，外交積極的辦法，實在是莫明其妙。

這時中國和日本的輿論，都十分激烈，一意主戰。翰林院學士文廷式對於李鴻章的依賴調

停，軍事觀望，頗多指陳。他說：『倭人無故忽用重兵，名爲保商，實圖朝鮮，人人共知。而中國之辦法，尙無定見，北洋之調兵，亦趦趄不前，坐失事機，天下事尙可問乎？李鴻章立功之始，藉資洋人，故終以洋人爲可恃，而於中國治法本源，不甚留意，故一有變端，徬徨而罔知所措，必然之理也。』禮部侍郎志銳更說：『李鴻章與譯署大臣主持此事，一味因循玩誤，輒藉口於釁端不自我開，希圖敷衍了事。我若急治軍旅，力敵勢均，猶冀彼有所憚，不敢猝發，是示以必戰之勢，轉可爲弭釁之端；不然，則我退而彼進，只求無釁不可得也。該大臣等專恃外國公使從中調處，以圖退兵之計。事起之初，則賴俄使；俄使不成，復望英使；英使不成，又將誰易？既無可恃之勢，又無可假之權，全憑口舌折衝，雖英俄各使遊辯壽張，果能化弱爲強，強日人以就我範圍乎？敵情本有虛實，邊患更有重輕，壯我之氣，而後可以講和，充我之力，而後無妨言戰。勢無可緩，計不必疑！』像這一類奏摺，都不得謂之無識見。惜乎主持朝政的人，都是些闒茸不負責任之流，清廷諭令各大臣會議決定，仍是一面備戰，一面和商。

日本壓迫朝鮮，改革內政，韓王不得已，設了一個校正廳，派申正熙等任改革委員，與日使協議。日使更向朝鮮提出哀的美敦書，迫使中國軍隊出境，並宣佈廢棄中韓間一切條約，限三日內答覆。這時袁世凱覺得「坐視脅陵，具何面目」，請准回國，經手事交唐紹儀代辦，幾天前已離韓回津。韓王手足無措，只得以「將來請中國政府核辦」含糊致覆。大島圭介遂於六

月二十一日，率兵直入韓宮，擄韓王，擁大院君主持國政。原來大院君因羈保定，早已放返，袁世凱本要利用他抵制閔族的，實際未能作到，而大院君怨恨中國，反被日本人利用，因成立所謂「日韓同盟」，矯詔「不再入貢中國」，並託日兵驅逐在牙山之華軍。中日戰爭就這樣的啟幕了。李鴻章在袁世凱回來以後，纔知道韓事急迫，我軍孤懸牙山，非添派援兵不足應變，乃派陸軍由遼東至平壤，並雇英商船運兵赴牙山，由海軍護衛。二十一二日因日軍正演「迫宮」一幕，我軍安然登陸。二十三日，日軍艦忽襲擊我軍艦於牙山口外之豐島。「廣乙」受創坐礁，「濟遠」逃回旅順，「操江」被擄而去。英船載兵的「高陞」號被擊沉，士兵九百餘人，全遭覆沒。這是甲午第一戰。二十六日，日軍逼牙山，我軍迎戰於成歡，以一當五，（我只五營，日兵萬餘人）不支敗退，仍繞道逃到平壤。志超捏報獲勝，清廷迭諭獎賞，朝野喜慰，眞是一幕滑稽的悲劇。於是清廷通告各國，日爲戎首。七月一日，兩國同時正式宣戰。

李鴻章最注意海軍，南北洋艦隊，業經成立六年，雖未添造新船，但北洋艦隊就有鐵甲艦二艘，巡洋艦八艘，礮船十二艘，和水雷船六隻。比日本的海軍噸數高，他們佔世界海軍第十一位，我們是第八位。我們的主力艦定遠和鎭遠各七千三百餘噸。日本頂大的戰艦不過四千噸。但我們的船「質重行緩」，最快的每時僅行十五六海里。日本的船都是後造的，每時可行十九至二十三海里。它船上的砲，也比我們的多，而且放的快。我們的艦隊編制不齊，日本的配合則比較適用。所以兩國海軍在質量上雖相差不遠，在效率上我們不如敵人。李鴻章也深知道一些

迥懸殊，利鈍立見」，「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因此「但令遊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未可「馳逐大洋」。不料八月十八日，日本艦隊乘我海軍全隊護送陸軍到大東溝正要開回旅順的時候，突來攻擊，海軍提督丁汝昌，本是騎兵將領，未習海軍，他爲人忠厚，頗有氣節，曾經大敵，疊著戰功。李鴻章早就改派他帶水師，並「歷赴西洋，藉資閱歷」，以爲他情形熟悉，靠他來作個領導的將官。他以定遠爲坐艦，艦長是劉步蟾。劉爲英國海軍學校的畢業生，學科成績，確屬上等。而且頗識沙士比亞的戲劇，饒有所謂儒將的風度。丁自認不如劉，所以實際由劉任總指揮。他們一發現敵艦的縷烟，就決定排人字陣式，由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先，充戰鬬之主力。等到兩軍相望，劉忽下令把人字陣完全倒置，定遠鎮遠居後，兩翼的弱小船隻反居先。劉實膽怯，倒置的原故想圖自全。這樣一來，陣線亂了，小船的人員都心慌了，而且日艦得乘機先攻我們的弱點了。我們的戰略既先失敗，同時在戰術方面，我們也不及人。定遠艦上的總砲手英人泰萊爾（W. F. Tyler）看見劉步蟾變更陣勢，知道形勢不好。他先吩咐砲手不要太遠就放砲，不要亂放砲，因爲砲彈不多，必命中而後發。吩咐以後，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邊，預備幫提督指揮作戰，但二人言語不通，只好比手勢交談。劉步蟾忽令開砲，轟然一聲，把望台震塌了，二人都墜落受傷。黃海之戰，就此開始。鏖戰凡五小時，敵人砲彈的準確，遠在我們之上。結果我五艦被擊沉，餘均受傷，日艦損失不很大，我們失敗了。但丁汝昌與疾督戰，劉步蟾進退指揮，倘博得西人的讚嘆。「致遠」管帶鄧世昌，欲擒日艦最快的

吉野以俱沈，中其魚雷，奮擲自沉，死事最烈。方柏謙率「濟遠」脫逃，奉令正法，遺臭千古。自經此敗，我海軍聚守於威海衞，不敢再和日人交鋒。後來日陸軍由成山角登陸，擾攻威海後路，海軍從前面夾攻。我尙有戰艦十餘艘，匿不敢出，被圍劉公島，官兵皆嘖噪乞命，劉步蟾丁汝昌先後仰藥自殺，餘艦降敵。李鴻章多年慘淡經營的海軍，乃掃地以盡了。

海戰失敗的那一天，正是我陸軍由平壤撤退到安州的時候。我軍入韓者，原有葉志超的蘆防六營，衞汝貴的盛軍十三營，左寶貴的奉軍六營，豐陞阿的盛軍六營，馬玉崐的毅軍四營，共三十五營，以二十九營一萬四千人守平壤，葉志超總統各軍，置酒高會，漫無佈置。而日軍以三四萬來攻，焉得不敗？幸而左寶貴守牡丹台，壯烈殉國，馬玉崐守大同江，肉搏血戰，猶不得謂前敵無人，若都像衞汝貴臨陣先逃，葉志超樹旗乞憐，那還成什麼話！李鴻章二十餘年所練的新兵，只這水陸兩戰，就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以後望風披靡，簡直不堪再戰了。最可恨的：是旅順經營十六年，靡帑數千萬，有堅固的砲台，充足的軍實，將近三十營的守兵，偏讓日人從花園港登陸，不加過問。守旅順的營務處總辦龔照璵，未見敵人，即先逃走。敵入旅順，屠僇四日，全城僅賸下三十六人，滅絕人理。當時美國報紙說：「日本國爲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淮軍的聲威，從此算完了。清廷又想到湘軍，派劉坤一以欽差大臣駐山海關，而「紙上談兵一味吹牛」的湘撫吳大澂率新募的湘軍二十餘營出關，未能守一牛莊，見敵即潰。遼東危殆，畿疆動搖，清廷不得不屈膝求和了。

這時一般輿論對李鴻章當然不諒解，羣言繁興，謗書紛紛，都說李鴻章昏庸誤國，甚至說他媚日賣國，御史安維峻且請殺李鴻章以謝天下。其實李鴻章負不了這許多責任。朝臣中如翁同龢李鴻藻等，一意主戰，痛哭流涕，但毫無辦法，只能掣李鴻章的肘。譬如海軍，李鴻章說：『自光緒十四年未增一船，丁汝昌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臣當躬任其咎。』在甲午戰前，李鴻章大閱海軍，英人曾建議：「必添購快船兩艘，方能備日制勝。」因介紹二艦售中國。翁同龢長戶部，藉口款絀，加以阻撓，後來這兩隻船爲日本購去，其一就是打沉我船最多的「吉野」。戰事起後，鴻章請撥二百萬購船，還有人說：「不知其意何居？」翁同龢說：「海軍乃生息之款，一時未能遽提。」然而這一年慈禧要做六十大壽，修理頤和園，京城內外，蹕道所經，到處都有「點景」，所費何祇千萬？大半還是海軍的經費！戶部及南書房的人員都請停工，長麟說：『工匠人多，失業滋事。』翁同龢不得不敷衍的解釋道：『停工指以後尋常工程，其業經辦者不停。』翁同龢訴說部庫空虛。慈禧許發內帑二百萬兩，他就趕忙的掩飾道：『請暫緩，等需用時再說吧！』如此逢迎，眞無心肝！光緒帝雖已親政，但大事仍出自慈禧，帝后兩黨，已顯然有了暗潮。帝初主戰，而慈禧主和，欲從速了事，以便「大開慶祝」，「廣納貢獻」。光緒帝不敢「拂意太過，於孝有虧」。任聽她撤書房，廢二妃，罷志銳，（瑾瑜二妃之兄）因爲他們都是主戰的。像這像的政府大臣，簡直視國事如兒戲，還要同外國打仗，無怪乎李鴻章發牢騷說：『中外論者皆輕視東洋小國，而臣久歷

患難，略知時務，稔倭之蓄謀與中國爲難，一意治兵，專師西法，傾其國帑，購製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未能撒手舉辦，遂覺稍形見絀。』但李鴻章爲什麼不早力爭痛陳？卽令清廷讓他「撒手舉辦」，他用的人能實心任事麼？他沒有不可爲而爲的精神，先存着一種敗戰的心理，不作準備，不肯犧牲，依賴外人，苟且了事，這是他的過失。可是他說：「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確係實情。梁任公說：『當時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實亦近之。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爲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者乎？卽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雖敗亦豪哉！』後來清廷宣佈批准和約的苦衷：『瀋陽爲陵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況二十年來，慈闈頤養，備極尊崇，設使徒御有驚，藐躬何堪自問？』只顧念幾根枯骨，一個老婦，那裏知道有國家民族和億萬羣衆？再說日本人打仗雖出蓄謀，亦極愼重，明治天皇親到廣島督師，宿將謀臣，全體動員，我們的帝后還天天受賀聽戲，疆吏打電報，說空話，朝臣「欺蒙」，「塞責」，「唯阿取容」，大家無可奈何，奏請起用恭親王奕訢督師，他未出都門一步，只主張議和。前敵將領，彼此不相下，沒有一個眞正的統帥。李鴻章雖然是個統帥，亦謂：「緩不濟急，寡不敵衆，鞭長莫及，毫無把握。」那時全國民衆，沒有幾個人知道和外國人打仗。而我們當局往來的密電，日本人全用錢買了去，牒報非常靈通。可是日本人的事情，我們絲毫不知。上下內外如此，焉得不敗！但李鴻章以古稀垂暮之年，（七

十四歲）馬關議和，被狙一擊，忍辱受窘，濺血報國，也有可以相當原諒的地方。

第四節　戰敗之影響——瓜分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是甲午戰爭的結果，朝鮮放棄，不用說了，我們還要割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賠款二萬萬兩，增開商埠，准日本人自由住居營業，外國人所享有的一切特權，日本都「利益均霑」。從此東方帝國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並駕齊驅，虎視眈眈，我們的國勢阽危，已達極點了。歐美人在戰前對我們尚有相當之重視，似仍不失為東亞大國，日本雖進步很快，在他們看起來，不過是能自立的小國，無關世界大局。戰後的態度，却完全相反了。中國好像不可救藥的「病夫」，日本變為東亞的強國。這一次的戰爭，對於我民族的關係，可說非常重大。再說國際間從來是不論理不講情的，「個人有道德，國家無道德」，已是西洋人的成語。所以國家利害相同的就結合為盟友，利益衝突的，就變成了敵國。李鴻章不懂得這「強梁世界」的外交，還保持着「禮義之邦」的觀念，把國際看作私人的關係一樣，妄想各國「秉公說理」，加以援助，如何能不失敗？各國的外交家都是精於打算盤的，西方帝國主義原想在遠東大大的發展，但甲午以前，沒有極積推動，一則因為它們忙於瓜分非洲；二則因為他們互相牽制，各不相下；三則因為遠東尚有中國和日本兩個獨立國家，具有相當抵抗能力。在中日戰爭進行的時候，李鴻章雖千方百計的請求它們援助，它們總是抱隔岸觀火的態

度，嚴守中立。它們覺得中國愈敗，愈需要它們援助，而且愈願意出代價。同時它們又覺得日本雖打勝仗，戰爭總要削減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裏，中日戰爭，無論誰勝誰敗，實是兩敗俱傷的，反坐收漁人之利。所以他們不援助我們於未敗之前。

等到馬關條約一簽字，俄德法三國就聯合起來，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主動是俄國，德法不過附和。當時俄國正提修西北利亞鐵路，對東北及朝鮮，垂涎已久，眼看日本的勢力伸張到大陸，它如何甘心呢？俄國的財政部長威特(Witte)是具有權謀的野心家，遠東政策由他決定。他要趁機會向中國表示恩惠，以達到「和平」侵略的目的。法國原與俄國同盟，對抗德奧意三國，俄要法幫忙，法不敢拒絕，何況法國也有野心家想向遠東發展呢？德國和法國是世仇，為什麼竟與俄法取一致行動？他的打算更妙：(一)借此與俄國接近，以離間俄法的關係；(二)推動俄國向遠東發展，在歐洲就不會多事；(三)防止日人佔據中國的富源，又可以向我們索取報酬。這是三國干涉還遼的真實動機。他們在交換意見的時候，要求英國共同參加，英國本來對中國戰爭非常關心，曾運動過由列強干涉，因沒有強硬的決心而罷。這時它不願作武力冒險，以得罪新興的日本，助長遠東敵國的成功，所以表示消極。三國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一方面它們向我們表示同情，說條約太無理，它們要援助我們挽回失地的一部份。在我們那時正痛恨日本的情緒之下，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並且希望三國把遼東台灣一齊挽回過來；一方面它們向日本提出所謂友誼的勸告，說日本佔領遼東，不利於遠東和平，要它放

棄，同時更作軍事行動的準備，以示決心。日本在戰後那敢抵抗三國？只好接受它們的勸告，把遼東還給中國，索取三千萬的代價。我們覺得遼東不只值三千萬兩，所以對於三國的援助，自是十分感激。但二萬三千萬兩的賠款，中國如何能擔負。俄國又幫我們從法俄銀行借款一萬萬兩，年息四釐，數目之大，利息之低，誠使我們受寵若驚，俄國眞是我們的好朋友，於是許多要人，都主張聯俄制日。

三國干涉還遼之次年，即一八九六年五月俄皇尼古拉斯二世行加冕典禮。清廷已命王之春往賀，帝俄政府向我表示，當中俄兩國特別要好的時候，中國應該派頭等大使作代表，才算給朋友面子，王之春位望太輕，難於接待。乃改派李鴻章前往。俄國非常高興，準備隆重招待，並派一個親王乘專輪迎接於樸塞（Port Said）。俄皇命威特負交涉之責，威特深知中國人的心理，所以和李鴻章談判的時候，首言日本可惡可畏，這是李鴻章願意聽的話，也是全國人士願意聽的話。這種心理進攻既然順利，威特乃進一步陳言俄國對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說當中日戰爭之際，俄國本想參加，但因交通不便，俄軍未到而中日戰爭就完了。以後中國如要俄國給與有力的援助，中國必須許俄國修築鐵路橫貫東三省。原來俄國的西北利亞鐵路方修至外貝加爾（Tranbaikalia），路綫發生了問題，如果繞黑龍江的北岸以達海參威，路線太長，工程太困難。威特主張通過我們的東三省，路線可縮短五百餘俄里。工程既易，土地亦肥沃。所以俄國援助中國，就是爲的要借地築路。他們在還遼以後，曾經向我國表示，並派

人赴東北查勘路線。我們覺得「後患甚大」，主張由中國自造，與俄路相接。李鴻章當然還是這種答覆。威特說中國人力財力不足，倘自造則十年尚不能成，將緩不濟急。如中國拒絕俄國的好意，俄國就不能再助中國了。這一句話把李鴻章嚇服了。於是他與威特簽訂祕約，俄許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中國許俄建築中東鐵路。

中俄密約是李鴻章終身的大錯。其實不能全責備他一人。俄國向我們送秋波，彼此早就「心心相印」了，李鴻章不過是牽線的人。即翁同龢是向來反對李鴻章的，他任軍機大臣，經手辦理密件，在他的日記裏，並未露出絲毫抗爭的意思，可見朝臣多以聯俄爲是。但俄國既把中日問題捲入世界漩渦，李鴻章又引狼入室，開門揖盜，以後瓜分之禍，及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九一八國難都是那個祕密引出來的。俄國何嘗想援助中國？不過想利用中東鐵路來作「和平」侵略的工具能了。他們覺得要發展遠東的勢力，必須有一個完善的軍港和商港，海參威太偏北，冬季結冰，不便航行，如要找一個不凍港，非向東北及朝鮮方面進行不可，日本佔領遼東，就是他們絕大的障礙，所以他們認爲干涉還遼是一舉兩得的最好機會。我們對國際智識太幼稚，不能利用列強的均勢去因應措置，只好任聽俄國的擺佈了。

李鴻章離開俄國以後，就去聘問英法德美諸國，各國對他都很拉攏，希望在他身上檢些便宜。德國本已取得天津漢口兩處租界，以爲代索遼東的報酬，但它並不滿足。俄國有「借地築路」之議，它馬上就要求「借地泊船」。李鴻章在柏林沒有答應。駐華德公使乃直接向北京總

理衙門提出，並指明索借膠州灣。我們怕列強紛紛效尤，自然是婉辭拒絕。光緒二十三年德皇訪俄，和俄國成立一種默契，就藉口山東鉅野有德教士二人被害，忽然將膠州灣佔領，中國迫不得已，只好在二十四年二月和德國訂租借條約，以九十九年爲期，並把山東的築路權和採礦權都讓給它。從此山東就算德國的利益範圍了。中國的瓜分之禍，以這次交涉爲起點，接着俄國租旅順大連，還要修南滿鐵路，東三省成了它的勢力範圍。英國租借威海衞和九龍並保持長江流域的優勢權利，法國租借廣州灣，並要求兩廣雲南的優越權利。日本指定福建爲其勢力範圍，不准讓租與他國。除義大利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門灣，我們沒有答應，其餘都照辦了。這就是所謂「瓜分」。俄國和中國是同盟國，密約訂立不到二年，它和德國就先動手來宰割，我們費了三千萬兩贖回的遼東，原來是爲它準備的，這還不算，簡直整個的東北都被它囊括以去，俄國還說，它是中國惟一的好朋友！當它強佔旅大時，清廷尚以俄國來援助我們，維持均勢，供濟它軍艦的用煤。等到慢慢回過味來，已竟晚了！於是又有人主張「聯日制俄」，並且有人主張請伊藤博文作中國的首相，實行變法。「病急亂投醫」，眞可爲晚清的外交寫照。本來李鴻章的外交政策，是道光年間的新人物所謂「以夷攻夷」，但那個夷人能被我們利用？結果是帝國主義「協以謀我」，愈鬧愈糟了：這時列強「磨刀霍霍」，中國「已成俎上之肉」。幸而美國把菲律濱佔領，它的勢力伸張到遠東來，對中國這個若大的市場，不能置而不問。於是他們的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向英德俄法日義六國，徵得同意，宣言各國在中國已取得的權利，

從此不相衝突，不管那一國範圍內的商港，都有同等的工商業利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門戶開放主義。因此我們纔「苟延殘喘」的免掉了瓜分之禍。但是帝國主義的慢性蠶食，使中國經濟更瀕於絕境。我們的民族革命益發「任重道遠」了。

第十章　民族自覺與國民革命

第一節　戊戌百日維新

鴉片戰爭後的海防運動，英法聯軍後的自強運動，都未能挽回中國的厄運，而甲午之戰，我們堂堂大國被小小的日本打敗了，割地賠款，更肇瓜分之禍，這種奇恥大痛，還不應該促起民族的覺悟麽？一般人感覺到國家的危險，都有翻然改革的意思，但不曉得怎樣做法。士大夫是比較有智識的，自然居於領導地位，他們想西洋之所長，既在科學技藝，日本摹仿了，驟致富強，我們也摹仿了，爲什麽反不見效果？於是進一步想到政治法律是國家的重要條件，倘若組織不健全，卽使具備近代化的國防，也沒有多大用處，何況舊制度根本就不能舉辦新事業呢？所以要救國非改制變法不可，於是甲午以後，「洋務論」一變而爲「時務論」，雖仍以自強爲目的，實則是一種民族自覺的維新運動，康有爲梁啓超就是這個時代所產生的代表人物。

康有爲是廣東南海縣人，生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比　國父大八歲，比梁啓超大十五歲。他家好幾代都是讀書人，具有士大夫階級的傳統。他的學問思想得力於同縣朱次琦（九江）的教訓最大。有爲從光緒元年（十八歲）受業於禮山草堂，到七年次琦卒，又獨學於其鄉

之西樵山者四年，這十幾年功夫，他除預備科舉的制義外，特別注重中國政治制度的沿革及經世之學。因爲朱次琦講學，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爲綱，以義理、考據、經世、詞章爲目，而其精神所貫注，完全在「經世」之學，和曾國藩的見解是一樣的。有爲雖不懂任何外國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沒有到過外國，但他到過香港，上海，看見洋人管理地方行政的整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覺得這種優美的行政，必有其文化和思想的根源。可惜當時國內還沒有討論西洋政治經濟的書籍，只有江南製造局及教會所譯的初級天文、地理、格致、兵法、醫樂、及耶穌教經典一類的書籍，有爲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取而讀之，「能舉一反三，因小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闢一境界」。後來他講學雖仍依禮山草堂的綱目，而「以孔佛宋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可見他對於西學的注重。不過他的學問成就，歸結還是一個今文學家。今古文學在東漢時就有爭論，鄭許以後，採爲經學之正統，西漢經說，漸就湮沒。到了清朝中葉經學鼎盛的時候，範圍狹小，不免貽餖飣補苴之譏，一般才智之士，頗不饜其所爲，遂有莊存與(字方耕陽湖人)一派的公羊學家出來，不求訓詁名物之末，專求所謂「微言大義」。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繼之，始大張其軍，自珍尤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嶔崎磊落，睥睨一世，」風尚所趨，倖爲「龔學」。魏源著海國圖志，開新學之端緒，爲今文學家生色不少。他們不但在經學中「自闢領域」，而且關懷國事，注重政治，考究輿地，主張革新，把今文學和經世學簡直融成一片了。湘人王闓運掌教成都，不「畢摹乎古」，

「取今事與古事比附」，其弟子廖平闡今文家法，號稱「蜀學」。有爲受了廖平的影響，綜合諸家，集今文學之大成。遂著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二書，以爲他的理論根據。他說古文經傳都是劉歆僞造的，想把孔子的微言大義湮亂了，纔好佐莽篡漢。他認爲孔子眞正是一個改革家，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乃孔子理想所構成，未必實有其事，周秦諸子，「罔不改制」，「罔不託古」。孔子的微言大義，只有在公羊傳裏可以看出來。公羊講「通三統」，那就是說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不相沿襲，各代都因時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又講「張三世」，那就是說「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好像「專制」「立憲」「共和」三種政體，愈改而愈進的。他又以三世之義說禮運，「小康」爲昇平世，「大同」爲太平世。「大同書」就是他心目中的「烏託邦」。他的學說。雖自有相當之價值，但他的作用，無非想抓住孔子作爲他的招牌，以便鎮壓反對變法的士大夫。因爲他知道士大夫是守舊的，總以爲法制是先聖先賢列祖列宗所遺留，歷代相傳，絕不可加以變更。康有爲認爲不先打破這個思想的難關，變法就無從下手。所以他發揮今文學家的改制之說，以構成整個思想體系。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抓住孔子，自然就不成問題了。後來他以孔子爲「教主」，爲「素王」，都由摹仿西洋，比附基督，注重經世，雜引讖緯而來。

康有爲的救國熱忱，仍受了先九江的影響，九江在道咸年間國難嚴重的時候，即有「王度無中外，思言有歲年，一方苞糵挺，六月羽書傳，敢以烽爲戲，須明國有權！盤疆光舊物，不

擬勒燕然」若干首感事詩，又有「弱冠請纓男子志，愁從燈下看純鈎」之句。又說：「世難方殷，靡知所底，頃鷁之歎，詩雅以嗟。竊惟自古泯棼之會，玄黃戎馬之秋，天命民彝，必不可以一朝絕，則宜有所寄，寄斯鉅者，惟在修學好古之儒』。（復王菉友書）愛國救世之心，溢於言表。有爲從九江學有根柢以後，曾徧遊南北，入京師，謁翁同龢，極陳時局艱危，請變法圖自強，並建議以朝鮮爲萬國公地。（駐韓德使曾建議各國互保朝鮮李鴻章未採納）同龢以爲多事，不替他代奏，獨曾紀澤贊成他的意見，餘皆目爲狂。他在光緒十六年講學於廣州長興里，這是一生事業的起點。時梁啓超（任公新會人）陳千秋（通甫南海人）同學於學海堂，謁之大服，遂執業爲弟子。次年始設館廣府學宮之仰高祠，顏曰「萬木草堂」。他的兩部大著——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卽在是年完成，梁陳負校勘分纂的責任，幫忙不少。他們除著述講學外，「每談及國事杌隉，民生憔悴，輒慷慨欷歔，或至流涕」。他的弟子「受其教則振蕩怵惕，懍然於匹夫之責，而不敢放棄暇逸。每出則舉所聞以語親戚朋舊，強聒而不舍，流俗駭怪，指目之曰康黨」。他們也居之不疑，頗有東林復社的神氣。啓超於十五年，中式舉人，尙早於有爲五年，他們入京會試，正是中日戰爭的時候，有爲聯合公車數千人上書中變法之請。明年有爲成進士，（乙未）授工部主事。馬關條約成，他們又聯合公車上書，諫阻和議。翁同龢雖說他的僞經考是「說經家一野狐」，但亦稍與計事。有爲論議縱橫，波瀾極壯，創辦「中外公報」，提倡新學。又立強學會於京師，主張變法自強。同時張之洞陳寶箴倡行新政於江

南湖廣，黃遵憲爲之助。遵憲又引梁啓超主上海時務報筆政，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宣傳變法維新，風氣傾動南北。及膠澳事起，瓜分之禍日亟，有爲又立保國會，大聲宣講，他說：『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實吾輩甘爲之賣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發憤，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吾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實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這種民族自覺的革新運動，一時瀰漫全國，聲勢非常浩大，附和的人很不少，好像全國的輿論都擁護他們。有爲凡七上書，給事中高燮曾極佩服他，疏請光緒帝召見。光緒帝本來憤外難日迫，也想革新庶政，努力救國，看到康有爲的上書，非常感動。因此決心改革，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四日下詔定國是，翁同龢李端棻張百熙徐致靖都先後疏薦有爲啓超，才可大用，帝特旨召見，非常賞識，命有爲在總理衙門行走，啓超辦理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又以陳寶箴薦擢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四人爲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一直到八月初的「政變」，他們輔助光緒帝行了百日的維新。

在這「百日維新」之時，他們推行了不少的新政，詔書不下一百幾十起，最重要的是（一）廢八股取士之制，改試時務策論。換句話說：就是以後讀書人要做官，不能崇虛文，必須崇實學。（二）各省府廳州縣設立高等中小學堂，以爲培植實學人才的地方。（三）調整行政機構，裁汰閒散衙署，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以及與總督同城

的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不甚治河的河督、不辦運務的糧道、向無鹽場的鹽道。其餘應裁各職，令詳議以聞。同時添設一個農工商總局。好像現在的農林部和經濟部，以便實行經濟建設。（四）軍營改新法操演，獎勵新機器新軍器的製造。除此以外，有爲還有很多的建議，如制度局，好像現在的設計局，如民政局，好像現在的參議會，又要設十二局，以行新政，並有遷都、改稅、裁釐、定律、設警察、練鄉兵、重俸祿、經營邊疆等事，大都是早就應該辦的。但維新的政令，愈是「雷厲風行」，而守舊的臣僚和士子，愈覺得飯碗要打破，前功要盡棄，更拚命的反對他們。康有爲只抓住一個光緒皇帝，以爲君權既伸，何事不成！殊不知這皇帝從小孩子就扶養在慈禧手裏，「積威既久，視如獅虎，戰戰兢兢，膽爲之破」。原是一個怯懦無能的人，安能望其獨斷獨行，如秦始皇唐玄宗一樣！他的求治之心雖然急切，但實權仍在頤和園，事必請命而行。舊黨本多太后之人，就包圍慈禧，請求保全，收回成命。慈禧也不滿意光緒，遂有廢立之意。光緒帝覺得位置危險，因密諭楊銳等：

> 近日朕仰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進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惟朕權力不及，若強行之，朕位且不能保。爾等詳悉籌議，必如何而後能進用英達，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即具奏候朕審擇，不勝焦慮之至！

光緒早就命康有爲往上海，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有爲遲遲不行，反與譚嗣

同等密謀結託袁世凱。袁世凱這時在天津小站練兵，光緒帝破格特賞侍郎，嗣同勸世凱率兵入京，緩急爲助。世凱覺得他們不容易成功，反向直隸總督榮祿告密。榮祿是舊黨的魁首，嘗說：『讓他們亂鬧幾個月，等罪惡貫盈好了。』這時看見機會已到，遂入京上變。八月初六日，慈禧自頤和園回宮，光緒戰慄俯伏，惟有涕泣，慈禧戟指頓足，申申而詈，要賜以鴆酒。大學士王文韶及近支王公等跪求，纔命幽禁瀛台，假稱皇帝有病，太后三次臨朝，把所有的新政，完全打消，仍舊回復原狀。康有爲於二日前經光緒帝密詔促行，尚在途中，後逃海外，梁啓超逃往日本。軍機四「新參」。——楊、劉、譚、林、和御史楊深秀，有爲弟康廣仁，先後被執，同日處死，這就是所謂「戊戌六君子」。所有贊助維新的內外大臣，都一概罷黜獲罪。只有湖廣總督張之洞是維新運動中的緩進派，他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勸學篇」去勸導國民，提倡忠君，又握有實權，舊黨無法搖撼他，尚爲新事業保留一線生機。康梁變法的失敗，更證明了今文學家也不能「經世致用」，中國學術已到沒落的時候，要救國家救民族，非借重西洋文化不可，因此纔有民國以後的新文化運動。

第二節　民族自覺運動之橫流

士大夫階級所領導的民族自覺運動失敗了，國運阽危，更形顯著，一般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政治侵略和經濟侵略並不認識它的嚴重性，只看見到處設立教堂，宣傳天主耶穌，排斥我們

固有的宗教，總覺得是一種邪教異端。加以信「洋教」的人，既「不拜祖先」「不敬神佛」，不參加祭賽廟會，反仗了洋人的勢力欺壓平民。洋人借領事裁判權的威風，動輒函告領事公使，和北京總理衙門交涉，地方官往往以此獲罪，以致「官怕洋鬼」遇事不能持平辦理。老百姓憤恨不平，就聚衆向教堂尋衅，結果因爲國際的關係，人民仍不免吃大虧。從同治九年天津教案以後，這種事時常不斷的發生，愈積愈多，民間仇教的心理就愈甚，總有爆發的那一天！但人民的知識是有限的，他們不知道怎樣去解決這種糾紛，又怕外國人的槍礮利害，更以爲我們的官吏士紳都是漢奸洋奴，爲虎作倀。假使有人說，我們有鬼神保佑，能叫洋人的槍礮無用，一下就可以把洋人殺盡，復興中國。而當權守舊的士大夫不僅不干涉，反從而附和之，提倡之，許多迷信的愚民，能不與高彩烈如瘋如狂的參加活動麽？——庚子年間的義和團就是這樣起來的。雖然他們的行動極端幼稚可笑，愚昧堪憐，但他們的用心是愛國的，自救的，也可以說是一種民族自覺運動，不過不是革命的正軌，而是反動的橫流罷了！

義和拳原是白蓮教的支派，其始以八卦分門，練習拳棒，聚衆斂錢，也稱大刀會。後來借口仇教，益神其說，詭言鬼神附體，作法念咒，可禦槍砲，其實是一種魔術。初在山東北部活動，巡撫李秉衡毓賢先後鼓勵他們，稱爲義民，改拳爲團。因此他們就以「扶淸滅洋」爲口號，到處焚掠，和洋人教民爲難。法國爲保護教民，屢有責言，淸廷乃調毓賢撫晉，以袁世凱作山東巡撫，世凱派兵痛剿，拳匪勢衰，在山東不能立足，都逃入河北。這是光緒二十六年（庚

子）春天的事。直隸總督裕祿，不惟不制止，反而表示歡迎，義和團在河北就大爲得勢了。一股蔓延於滄州靜海一帶，係坎字拳，設壇獨流鎮，舟子張德成、遊勇曹福田爲首。一股蔓延於深冀二州，係乾字拳，佔據涿州城，沒有著名的首領，僅稱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屢次焚燬電線鐵路，脅民仇教，公然刼殺，稱洋人爲大毛子，教士教民爲二毛子、三毛子，凡攜帶洋貨，或與新事業有關的人，不管是不是教民，都稱爲二毛子，甚至於他們所要搶殺的或稍示懷疑的，均以奸細二毛子呼之，簡直是毫無理性的一種暴動。毓賢偏向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大學士剛毅徐桐等大事鼓吹，說拳民如何忠勇可恃。載漪等正怨恨洋人，無法出氣，趕忙向慈禧太后介紹。於是剛毅引乾字拳入京師，廟宇府第，徧設壇場，出入宮禁，任意焚掠。而裕祿復招曹張二匪首至天津，待以上賓之禮，並爲保奏，因此京津就成拳匪的世界了。

西太后和載漪等所以崇信拳匪，出此下策，就因爲戊戌政變時外國人都偏袒光緒帝和維新派。康有爲梁啓超逃難海外，受外國人保護，清廷屢索不得。他們又發起保皇會，刊行報紙，極力詆毀慈禧，鼓動擁護光緒。這樣西太后和一般頑固份子就恨起洋人來了。慈禧要廢光緒，立載漪的兒子溥儁作大阿哥，剛毅、崇綺、徐桐、啓秀諸人都想在新主子手下操權，盡力慫恿。可是中外輿論不服，兩江總督劉坤一首先抗疏力爭，西太后覺得只要外國公使能入賀就可以實行廢立了，不料外國公使一致不滿意，反而正言相規，於是西太后和頑固派更加痛恨洋人。載漪眼看着當不成「天子父」，尤其惱火。這一羣冥頑不靈的怪物，本無知識，一聽說義和團挾

有神術，可以扶清滅洋，焉有不想利用的？他們以爲「數十萬義兵，不期而集，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正可「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經過四次的御前會議，雖光緒帝痛哭流涕，說人心不可恃，啓釁足亡國；徐景澄袁昶等以死力爭，而慈禧仍從載漪的主張，於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一日）下詔向各國宣戰。

這時北京有董福祥的甘軍，他們幫助拳匪，一同焚掠，頑固派認爲福祥，能殺洋人」，「必强中國」，加以獎譽。慈禧命他們和拳匪攻打東交民巷，「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日夜礮聲不絕」。攻打了一個多月，始終未攻破。那時八國公使館的衞兵，合起來也不過四百多人。甚至天主教的北堂僅有法意水兵四十人守衞，董軍和拳匪兩個月也未能攻破，只是在未宣戰以前，董軍殺死一個日本書記生。載漪的神虎營兵把德國公使克林德（Kettler）殺了，都是乘其不備纔幹出來的。徐桐崇綺聽見德使被戕，非常的高興，說是「夷酋誅，中國强矣」。剛毅奉命統率拳民，日坐城樓觀戰，說「使館一破，洋鬼子就全滅了」！可是使館老攻不破，軍民死傷甚多。於是啓秀薦五台山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還有翰林院編修王龍文上疏力薦「三賢」，所謂三賢，就是一個和尙，一個盜魁，一個狂夫。他們又獻決水灌城之策。御史徐道焜並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海口，夷船當盡沒。殊不知八國聯軍早就把大沽佔領，六月間更將天津攻破了。聶士成爲淮軍後起名將，曾剿拳匪，受他們的牽制，力戰而死。裕祿李秉衡兵潰，相繼自殺。七月二十一日聯軍到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倉卒出走，由懷來宣化繞山西

逃至西安。又讓李鴻章出來收拾時局。

李鴻章自從中日戰爭以後，爲輿論所不滿，引咎罷職，光緒二十五年始出署兩廣總督。拳匪亂時，他和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屢疏諫止，無奈西太后一味搪塞，總說保護外人，不欲構釁，但又以亂民「挾騎虎之勢，剿撫兩難」，要他們諒解。他們對宣戰以後的詔旨都置之不理，劉張且與各國領事結東南保護條約，不受拳亂的影響。清廷在聯軍逼近北京的時候，不得已只好調李鴻章督直，兼偕慶親王奕劻任議和全權大臣，折衝了幾個月，纔與各國訂立辛丑條約。條約劃押不久，李鴻章就積勞病故了。辛丑條約除懲辦禍首及道歉外，更有三個嚴重的條款：第一、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釐，合計總數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三萬餘兩。俄國佔百分之二十九，德國佔百分之二十，法國佔百分之十六強，英國佔百分之十一強，日本美國各佔百分之七強，意大利佔百分之六弱，比奧荷各佔百分之四弱。這樣大的數目我們如何能擔負得起？海關鹽稅既因擔保關係，都操在外國人手裏，而各省分別攤派，地方也受到經濟的壓迫，中央財政幾有破產之勢，以後只好借債度日了。第二。許各國擴大公使館的界限，不准中國人居住，並得駐兵保護。從此東交民巷儼然變成外國的地方了。第三、拆毀天津城垣及大沽礮台，承認各國自北京至山海關的鐵路沿線駐兵。我們的國防完全喪失，獨立國的體面簡直也就沒有了。後來日本隨意增兵平津，實行侵略，總藉口辛丑條約，所以辛丑條約乃是我國的致命傷，帝國主義壓迫我們，可謂已達極點。經濟上的損失和權利上的損失且不用說，而

精神上我民族喪失了自信力，逐漸造成懼外媚外的心理，一切都覺得外國好，邯鄲學步，東施效颦，似是而非，為社會改造，民族復興，更增加了不少的障礙。譬如教育制度，其始摹仿日本，其繼摹仿德國，最後又摹仿美國法國英國，只有形式的機械主義，毫無民族的文化基礎，以致學校養成的人材，淺聞浮慕，固陋偏執，矜持一技之長，殊鮮通達之見，忘本逐末，削足適履，政治經濟，皆受其弊。近年來又看人家有以民族自尊而自強者，不免矯揉塗飾，大開倒車，這和義和團的愚忠蠢行，仍是一樣的反動。然而義和團代表全民族的反抗精神，多少還給外國人一些畏懼，（赫德說：拳匪是外人壓迫出來的。德國福蘭克教授說：列強不敢瓜分中國，此役頗有影響。）——雖是代價付的太大了。倘使我們的士大夫不求明通的治理，只憑直接的感覺，卑者自棄，驕者自封，那我們能得到什麼結果呢？總之，當局的人物，一舉一動，都關係國家民族的命運，不可不特別愼重。慈禧載漪剛毅毓賢諸人，眞所謂死有餘辜了。

辛丑條約，已竟夠嚴重了，此外還有更嚴重的東三省問題。俄國老早就向我東北侵略，竟趁拳亂的時機，派兵把全東三省佔領。辛丑和議以後，俄兵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種特殊權利。清廷在大體上算答應了，各國聽說，都表示反對，尤以日本最為激烈。因為日本正在經營朝鮮，把東北看作它的「生命線」，倘使為俄人所據，則朝鮮亦將不保，英美更恐引起遠東糾紛，妨害它們的利益。因此中俄「滿洲密約」未得成功。但李鴻章仍抱親俄反日的政策，主張一部份接受俄國的要求，劉坤一張之洞竭力反對，幸而李鴻章不久死了，不然東三省在那時就

要送給俄國。日本英國看形勢不好，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一月締結同盟條約，美國雖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國當時的輿論，非常激昂，一致反對俄國。京師大學堂的教授上書政府，建議加入英日同盟，變為中英日三國集團來對付俄國。俄國看見國際形勢不利，除將俄法同盟的範圍擴大，包括到遠東問題藉以抵制外，只好和中國訂立條約，分三期（每期六個月）撤退俄國東三省的軍隊。光緒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撤兵的期限滿了，俄國不但不撤兵，反把第一期已撤退的兵又調回來。更向中國提出許多要求，想把東三省變成它的保護地。日本如何能甘心？馬上直接出來和它交涉，提出滿韓交換的條件。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兩國交涉破裂，在我們的國土上——遼東打起仗來了。

日本首先封鎖旅順，把俄國的海參威艦隊解決，三十一年奉天大會戰，又把俄國幾十萬陸軍打敗。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繞好望角安南而到對馬海峽，也被擊潰了。日俄戰爭，就此告終，俄國雖吃了敗仗，日本亦筋疲力盡。美國出來調停，兩國議和，把「南滿」的鐵路及旅大軍港，讓給日本，俄國仍保有北滿的鐵路及已得權利，日俄形成對峙之勢，雖仍承認我國在東北主權，但實際是它們的禁臠了。尤其日本以區區三島，在十年間，戰勝東西兩大帝國，插足大陸，野心愈熾，成了世界列強之一，居然以東亞霸主自命，更進一步要打破歐美均勢，鯨吞中國，演成唯一暴力侵略的帝國主義，我民族革命的對象，又要轉變了。

第三節　民族復興新方案

我們的民族革命在道光以前，只要把所謂異族的滿清政權推翻就夠了，他們的文化勢力根本不及我們，反逐漸被我們同化。但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大變局，影響到了東方，列強以科學機械的力量，壓迫我們，使我們幾次受到打擊。民族革命遇到文化勢力強大的帝國主義爲新對象，其困難更百倍於往昔。這時一般只注意如何挽救國家的危亡，對於滿清政權的問題反而淡然了。鴉片戰爭後的海防運動，英法聯軍後的自強運動，甲午戰爭後的變法運動，都是民族自覺自救的方案。可惜這些方案既不澈底，又不認眞的實行，其失敗是當然的。不過它們也有一種好處，就是爲民族革命做了驅除韃的工作，使人民的新知識，慢慢增加，社會的舊勢力，慢慢減少，形成歷史漸變的趨勢，新思潮就更容易推進。所以庚子拳亂的大反動以後，頑固勢力的中心人物，如慈禧太后等也不得不講求維新了。但民族復興的偉業，豈是「膠柱鼓瑟」的滿清政府所能夠擔負的？加之日俄戰爭以後，世人都認爲立憲戰勝專制，而有立憲政體的要求，清廷既不能適應變局，仍守鈐制家奴之政策，一味敷衍，於是國人對於滿清的政治改革感覺絕望，方纔注意　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倡的國民革命運動。

國民革命仍是接承民族革命而來的，不過它更進一步，「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當變更。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卽皆負革命之責任」。換句話說，就

是民族革命以外還有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革命的主體，從少數的「英雄」，變為全體的國民。爲什麼在一種革命尙未成功的時候，又加上兩種革命呢？我們看 國父說：

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其他施維於小己大羣之間，而成爲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於人爲既往之陳迹，或於我爲方來之大患，要爲繕吾羣所有事，則不可不并時而弛張之！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發現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覩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民報發刊詞）

國父說明三民主義，在世界思潮和歷史演變上的必然性。也就是國民革命必須包括民族政治社會三種革命的理由。歐洲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各民族割據其地，慢慢的養成各別的語言、文字、風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國家。但在各國之內，王室專制，平民沒有

參政權，以致民衆受壓迫的痛苦。十八世紀末年，十九世紀初年，歐人乃舉行民權的革命。又因歐美在十九世紀以來，科學發達，工業進步，社會貧富不均，仍感覺極大的不安，故有社會革命的醞釀，其勢所趨，二十世紀一定是社會革命的擅場時代。世界上只有這三種思潮在激盪，歷史上也只有這三種革命在演進。我們還是一步一趨的跟上去，永遠作個落後的國家呢？還是「迎頭趕上」「畢其功於一役」，而建設成最文明進步的新中國呢？無疑的是後者勝於前者。

但西洋經過幾百年的奮鬪而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才得實現，民生主義尚且未實現，以落伍的中國，外受列強的壓迫，內又佈滿封建的思想，三民主義如何能同時推行呢？況且以社會進化的原則，一下子跳越兩個階段是不可能的，中國在工業未發達，資本主義未造成以前，似難實現民權主義，更談不到民生主義了。「一次革命論」豈不是偏於理想麼？有許多人直到現在還這樣的批評三民主義。其實　國父對於這些地方早已顧慮到了，他規定一種革命方略，作爲他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在同盟會宣言的下半段說明革命應分軍法、約法、憲法、三時期，就是以後所謂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必須循序推進，纔可以充分解決實行上的困難。軍政是破壞時期，訓政是過渡時期，憲政是建設完成的時期，各有意義：以軍法「內輯族人，外禦寇仇」，注重民族革命；約法「建設自治，促進民權」，注重政治革命；憲法「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注重社會革命。雖然三民主義是有它的一貫性，並不能嚴格的分開，在重點上略有參差，在處分上略有次序，仍算是「畢功一役」，而自然的可以替代歐美社會演進的三種過程，

也就不至有躐等之疑了。以社會進化的原則而論，總是愈變愈快，後來居上，我們爲什麼不能用幾十年的光陰來做他們幾百年的事業？又爲什麼不能「曲突徙薪」「防患未然」，在工業初起的時候，就爲全民謀「福祉」，以「塞經濟革命之源」呢？倘使說歐美發達了幾百年的社會，不易「迎頭趕上」，除非我們走錯了路徑，在事實和道理上都是講不過去的。所以 國父「於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鑒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爲革命方略」。「革命主義必有待於革命方略，而後得以完全貫徹也」。不過一般人都認爲軍政憲政時期是當然的，頗不瞭解訓政時期的必要， 國父說過：

革命有非常之破壞，則不可無非常之建設，蓋際此非常之時，必須非常之建設，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與國更始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試觀法國革命以後，大亂相尋，國體五更，八十年後，而共和之局乃定。其故何也？法雖爲歐先進文化之邦，人民聰明奮厲，且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權之鼓吹，又模範美國之先例，猶不能由革命一躍而幾於共和憲政之治者，以彼之國體，向爲君主專制，而其政治向爲中央集權，無新天地爲之地盤，無自治爲之基礎也。我中國缺憾之點，玆與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識，政治之能力，更遠不如法國，此予所以創一過渡時期爲之補救也。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以訓導人民，實行地方自治。惜當時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張，而祇採予約法之名，以定臨時約法，以爲共和之治，反以予之方略計劃爲難行，抑何不思之甚耶？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汚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汚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汚，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訓政時期在以縣為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託始，主權在民之規定，始不至成為空文也，於此忽之，其弊不可勝言！

國父的革命方略，特別注重訓政時期，「以為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他在民元所以讓位於袁世凱，就因黨人對革命方略，「置而不議」，「格而不行」。尤其忽視訓政，釀成種種流弊。這是他十分「太惜痛恨」的，我們應該時時囘省。三民主義是建國的綱領，革命方略是建國的程序，固然不錯，但究竟怎麼樣來推行呢？ 國父更著有「建國方略」，藉作實際推進之準繩，首重心理建設，以「孫文學說」來改造民族的精神，繼為社會建設，以「民權初步」來訓練民權的行使，歸究物質建設，以「實業計劃」來奠定民生的基礎。主義和方略配合起來，真是一個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面面都顧到的、救國家救民族的新方案。

這個方案無疑的是我民族復興的唯一途徑，比較「海防」「自強」「變法」諸運動自然要高明萬倍。因為他是融合古今中外的學說，而以世界文化為背景的。何以 國父能有這種偉大的思想呢？他是先知先覺，自不消說，實則他一方面受了長期的科學訓練，對歐美社會有正確

的認識；一方面又受了民族革命的影響，對中國社會有澈底的瞭解。他從十四歲（光緒五年西歷一八七九年）隨長兄德彰赴檀香山，入教會學校，十七歲回國，十八歲入香港皇家學校，都畢業了。二十歲入廣州博濟醫學校。二十二歲轉入香港英人所設立的醫學專科，在這裏讀書六年，於光緒十八年畢業（二十七歲）。前後受了英美人的科學教育凡十四年，以後漫遊歐美兩三次，和外國人接觸最久，他對於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識，非常深刻，李鴻章康有爲諸人當然不及他了。但他並不迷信西洋，以爲凡洋皆好，科學的思想和方法，他完全接受運用，而於經濟及選舉所發生的流弊，他能洞見幾先，比較得失，以參綜中國的治理。他的中國學問，據他自己說：「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二十八歲）未嘗離學，雖未能爲八股以博科名，工詞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可見他對於國學的造詣，除無用的八股章句以外，並不在李鴻章康有爲以下。我們看他寫給李鴻章的信，就可以證明，他說：「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即此可知他對於我國古代的文化，是如何的領會，把古今中外的文化精神貫通爲一，所以纔有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我們再看他的講演說：

> 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譬如黃老的政治學說，就是無政府主義，列子所說華胥氏之國，其人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從前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

斯主義，馬克斯主義不是眞共產主義，蒲魯東巴古甯所主張的才是眞正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有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

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爲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

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譬如科學，迎頭趕上去，十年之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幷駕齊驅。

國父的思想很明顯的還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但因他受了科學的訓練，「明乎世界之趨勢」，遂以歐美的學說來充實它的內容，使之系統化、具體化，不徒託諸空言，而能見諸實際。這和一般村夫子「說唐虞，道古風」，而大開倒車者絕對不同。他有孔子的「中庸」「一貫」的精神，所以三民主義在歐美是隨時代而偏執的，互相衝突的，倘若依照中國文化的精神，中庸辯證的道理，（易經）——「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矛盾統一律）「執兩而用其

中於民」，（對立一致律）「時措之宜也」。（質量變化律）就可以貫通為 國父的三民主義。這才是宇宙間的眞理。不過歐美人是不曾懂得的，因爲他們的辯證法還是偏執的。（唯心或唯物）恐怕中國人也不容易懂得，因爲近人所能瞭解的中國文化和中庸之道，不是它的原義而早就變質了。 國父以恢復舊有文化相號召，同時又說迎頭趕上科學，似矛盾而實非矛盾，即中庸相反相成之理。蓋非迎頭趕上科學，不能建設近代國家，不能完成三民主義，也不能恢復固有文化。三民主義原有其一貫性和連環性，代表了近代國家的二種條件：——國防民族化，政治民主化，產業民生化——而三者都是以科學爲基礎的。即以純粹的學術立場而論，科學重歸納，（Inductive Science）正可和以往中國重演繹的理學配合而成一致，使中庸文化的精神復活。然後纔能與西洋文化合流，造成一種世界的新文化，以促進大同之盛治。三民主義的最後目的也就在此。所以說它是「救國救民救濟全世界人類之無上要義」。

國父自稱繼承古聖王的道統，這完全是不錯的。他的精神，就是孔子的精神。孔子歿後，七十子之徒，都不能傳其學，漢宋以後，尤覺乖違。 國父以禮運大同爲理想的境界，以大學八目爲聖王的治法，以公羊三世爲推進的階梯，以中庸執兩爲哲理的根樣，而三民主義的形式和內容却是參照西洋的成規。雖 國父自述「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民族），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民權），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民生）」。但總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了。不過他的思想淵

源雖是孔子，而國民革命運動，却仍受太平天國的影響。 國父十三歲聽遺老講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許。年譜及陳少白的講演錄都曾提及。他從事革命的第一個同志鄭士良，就是三合會首領。他的民族主義反復解說「洪門」，謂「余將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他又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 國父所謂之共產主義，乃洪秀全的「共產事實」，不是俄國的「馬克斯主義」，看上引講演自知。所以說：『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只是民權主義， 國父說：『洪秀全當時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洪秀全雖僅有不完全的二民主義，但他也是以大同爲依歸的，可見 國父上承民族革命，下開國民革命，其思想行動確有線索可尋，惟益發揚光大，更臻完美而已。因此纔造成三百年一貫的民族革命之奇蹟。

第四節　國民革命之初步成功

國父四十年的革命事業，可分作兩個時期：第一期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第二期打倒軍閥，建立統一的國民政府。自從光緒十一年（乙酉）從事革命運動，到宣統三年（辛亥），經過二十七年的努力，纔有初步的成功。當他在廣州博濟醫學校讀書的時候，因爲受了中法戰爭的刺激，始毅然有革命之志。同志僅三五人，只作革命的鼓吹。光緒十八年香港醫科畢業，設局廣州、澳門，始介鄭士良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開始作革命運動。甲午之戰，給 國父的刺

激更大，他覺得有機可乘，遂赴檀香山，以革命主義立黨，組織興中會。（興中會創立的年代有兩說：一光緒十九年在澳門，一光緒二十年在檀香山，蓋前者爲發起，後者爲正式組織也。）宣言祇說政府腐敗，國家危急，愛國志士，應該集合起來，講求富强之學，以振興中華，並未提到革命。雖是那樣的和平，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耳」。二十一年回國，欲襲取廣州爲根據地，不幸事泄失敗，從香港逃日本。次年復至檀島，轉赴英美，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歐美的政俗。在倫敦被中國公使館的職員誘拘，想解回治罪。幸而得到他的教師援助，始脫於險。然從此孫逸仙之名，乃爲舉世所共知。光緒二十三四年，他遊歷歐洲，研究有得，始創爲革命的三民主義。及庚子拳亂，清廷昏弱，益形暴露，長江一帶及閩粵會黨，全和興中會合作，革命黨的勢力纔擴大。 國父從日本回粵被阻，而鄭士良奉命在惠州舉事，聲威頗壯，仍以無援失敗，但青天白日旗飄揚於國土自此役始。這時一般人對於滿清的信念動搖，士大夫遊學外國者日衆，尤以到日本去的人數激增。他們對於革命黨均一變其往日謾罵之態度，而日趨接近，宣傳比較容易多了。光緒二十七年， 國父在日本，與保皇黨梁啓超過，勸他們和革命黨合作，啓超欣然從之，事爲康有爲所聞，貽書斥責。啓超不敢顯背其師，兩黨乃分道揚鑣。 國父往來日本安南間作革命的策動，三十年又赴檀香山美洲。三十一年（乙巳）再至歐洲，留比法德各國華僑學生入會者漸多。夏間復回日本，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規定黨綱口號，十七省籍的留學生加盟者數百人。這是我民族初次有一個公開的革命團體， 國父正式以領袖的資格，向

全世界發表他的三民主義救國方案。以後他對於所擬的方案雖尚有不少的補充，但大綱算是確定了，自此國人纔有一致努力奮鬭的目標。

當時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和國內的憲政運動派互相呼應，在海外也有一部分華僑擁護，聲勢頗爲不小。梁啓超愛國而博學，所主辦的新民叢報，風行一時，他的文字明晰暢達，「筆鋒帶有感情」，常和同盟會的民報，作政體辯論的文章，他反對打倒滿清，反對共和政體，他要維持清室實行君主立憲。他的理由，是中國人民程度不夠，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內亂和軍閥的割據。他引中國的歷史爲證明說：中國每換一次朝代必有長期的內亂，在閉關自守的時代，這種情形，尚不一定要亡國，現在列強虎視，一不小心，就可以召亡國之禍。民國以來的事實，似乎證明了梁啓超的學說是不錯的。其實這種見解，國父早就顧慮到了，他的革命方略不就是針對着這一點麽？民國以來的割據局面，完全是黨人不瞭解訓政時期的重要，不實行革命方略纔弄出來的，與共和政府有什麽關係呢？至於梁啓超主張君主立憲，完全因爲光緒帝對他們有知遇之恩，除光緒帝一人外，他於滿清的當局，尤其是西太后，都盡力詆毀，又好譯述外國革命的故事，實際上不啻爲革命黨排滿的宣傳工作。況且滿清政府不識抬舉，光緒帝也不爭氣，更使憲政派的人大大失望，在相反方面，就無異爲革命黨增加宣傳效力了！

說到晚清的政治，眞是愈來愈糟，當庚子拳亂的時候，光緒帝曾有留京議和幷逃往東交民巷的意思，但這個懦夫，一點勇氣沒有，仍舊被西太后像綿羊一般的牽制着，直到西太后臨死

的前日，也把他害死了。從庚子以後的八年間，政府仍在慈禧手裏。她因爲受了那樣大的打擊，不能不有點掩世人耳目的措施，在西安就下詔變法。從二十七年到三十年，裁汰了好多無用的衙門，設立了會議政務處，廢八股、興學校、練新兵、派留學、許滿漢通婚、編中西律例，戊戌所要實行的新政，這時都實行了。日俄戰後，時人都覺得是君主立憲戰勝了君主專制，於是國內有立憲的運動。西太后爲情勢所迫，光緒三十一年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法，等他們回來以後，清廷宣示預備立憲，先從調整政府的組織入手。三十二年九月釐訂中央官制，仍留軍機處，爲行政總機關，此外設立十一部，每部以尚書一人爲最高長官，侍郎二人爲次官，其餘九卿衙門都併入各部。這種改革，雖不圓滿，但比舊制好多了，因爲從前的六部滿漢尚書各一人，侍郎各二人，共六人主持，責任不專，遇事推諉。且咸同以後各省督撫權大，六部成了審核機關，本身幾全不舉辦事務。經此改革，各部的權力集中了，譬如新軍都歸陸軍部直轄，更可掃除軍隊私有之弊。無如制度雖改，而人事方面仍爲親貴所把持，這些親貴，招權納賄，無惡不作，政治腐敗，簡直不成個樣子，內閣改組以後，十一名尚書發表，漢人只佔五名。比以先六部滿漢各一的比例還差了。所以漢人對於這種改革，並不心服，總覺得他們是缺乏誠意的。以往西太后和光緒帝爭權，滿清的親貴以爲維新就是漢人得勢，所以聯合起來，煽動一切的反動勢力，打倒新政，藉此排斥漢人。庚子以後，他們又假改革爲名，以收取漢人的政權，並且鐵良和良弼想盡了法子把袁世凱的北洋兵權也奪來了，欲鞏固滿清統治的地位。這

種把戲，漢人豈有看不出來的？所以光緒三十三年雖設資政院於北京，作爲中央的民意機關，設諮議局於各省，作爲地方的民意機關。次年又須佈憲法大綱，並規定九年爲預備立憲時期，後又縮短爲五年。而漢人始終不相信，以爲他們不過藉此敷衍民情，擱置立憲，反覺得清政府是我民族復興的唯一障礙，非打倒它不可，因此革命的潮流，就日益澎湃了。

當時國內的報紙，早有倡言排滿，不稍避忌的，如光緒二十九年的上海「蘇報案」，就是最好的例子。蘇報的主筆章士釗介紹鄒容的「革命軍」，說：『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髮衝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章炳麟作「駁康有爲政見書」，並說：『載湉（光緒帝）小醜，未辨菽麥，固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命哉？』類此的激烈話很多，清吏以政府的名義向上海會審公廨控告他們，平民與政府聚訟，也是從來未有的事情。結果鄒章雖判處二三年的徒刑，而此案已轟傳全國了！但是章炳麟等尚非　國父所領導的革命黨員。及同盟會成立，主張革命的人物纔聯成一氣，分頭活動，「革命黨之宣告，殆已爲全國之所公認」。就完全到了實際行動的時期了。其先黃興與馬福益等在湖南謀起義，事洩失敗，三十二年始有萍醴之役，劉道一等死之。這時日本政府應滿清的請求，強迫　國父離開日本，他就率領胡漢民等到安南，在河內成立革命的總機關，發動潮州黃岡、惠州、欽廉、鎮南關、欽廉上思、雲南河口共六役。前仆後繼，清廷防不勝防。三十四年　國父又被迫離開安南，乃

漫遊美洲，專事籌款，把一切計劃，交黃興胡漢民執行。這是清廷最感受威脅的，還是革命黨人的暗殺團。最初由中國教育會的領導人蔡元培所組織，後改爲光復會。徐錫麟是最著名的首領之一。他在江浙一帶活動，又到安徽混入官場，擊殺巡撫恩銘。女同志秋瑾在紹興也被牽連遇害。前後作暗殺工作的，尚有劉思復之擊李準，吳樾之擊五大臣，熊成基之擊載洵，汪兆銘黃復生之擊攝政王，溫生才之擊孚琦，陳敬嶽林冠慈之擊李準，李沛基等之擊鳳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但這種革命的「烈德」，眞使滿清親貴，人人自危，奪其氣而喪其膽，爲革命運動增加不少的助力。

黃興胡漢民在廣州運動的新軍，宣統二年起事，又失敗了，他們都深感憂慮。 國父召集他們到檳榔嶼，加以鼓勵，遂決定一種大規模的起義計劃，先佔廣州，然後北伐：「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七十二烈士殉難，就是這計劃的實現。軍事上雖失敗了，心理上則大成功，因爲革命精神，從此深入國民腦際，到處滿佈着火藥，只有乘機待發而已。適巧清廷宣佈鐵路國有的計劃，給革命黨人一個很好的利用機會。本來鐵路由人民經營，資本不夠，成績不好，進行很慢，應當改良。宣統三年慶親王奕劻的皇族新內閣成立，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乃奏請借外債修路，把粵漢川漢兩路都收歸國有，這政策並不能算壞。但盛宣懷的官聲不好，滿清政府早已喪失了人民的信心，何況民營公司的股東又要損失大利源呢？因此引起多數人的反對，革命黨從中煽動，竟成了大革命

的導火線。

同盟會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廣東，自黃花崗失敗以後，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就想利用長江流域爲革命策源地，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原想準備幾年再起事。及四川湖北湖南爭路風潮擴大以後，清廷用武力壓迫，人民也誓死反對，四川更有抗糧罷市之議，羣情尤爲憤激。黨人遂決定秋間在武昌起事。但以革命黨的機關被破，名册被搜去，於是倉卒間於八月十九日（即十月十日）就發難了。新軍的砲兵營和工程營的官兵，由熊秉坤蔡濟民二人領率進攻總督衙門，總督瑞澂並未抵抗出走了，新軍統制張彪也逃走了，武昌便爲革命軍所據。他們臨時強迫官階較高（協統）聲望較好的黎元洪出任鄂軍政府都督。風聲所播，只一個多月，湖南、江西、江蘇、安徽、陝西、山西、山東、浙江、福建、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新疆、甘肅、十六省相繼獨立，河南直隸東三省也有革命軍起義，並沒有一處發生劇烈的戰爭，清朝就土崩瓦解了。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會，公舉 國父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爲副總統，組織參議會，製定臨時約法，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忽然變爲民國，國民革命算是初步成功了。清朝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只好請袁世凱出來挽回大局。袁世凱原是繼李鴻章而操軍政大權的漢人，滿清親貴都很嫉視他。宣統即位，其生父醇親王載灃攝政，因爲袁世凱戊戌告密，以致光緒帝被幽，他想爲兄復仇，立刻勒令回籍。但北洋軍人都是袁世凱訓練出來的，隱隱中仍握有實力，所以起用他作湖廣總督，不久又組織內閣，這種臨急抱佛脚的辦法是不易生效

的，結果袁世凱表面與革命軍商量議和，陰促段祺瑞率北洋將領四十七人電請速定共和政體，並有「帶隊入京」之語，清帝就不得不被迫退位了。袁世凱爲清室只謀得了退位後的優待條件，爲自己却攫取了中華民國的首任大總統。

辛亥革命的成功，雖說出於「意外」，但從歷史上看，二百幾十年的民族革命之醞釀，二十七年的國民革命之奮鬬，都是那鼓短時間十七省光復的因子。革命黨所假借的主要力量有二種：（一）會黨，（二）新軍。會黨原是老革命集團，經 國父之提撕，更加活躍，以後新軍的聯絡，華僑的資助，大半由他們來幫忙的。但這種集團，以下級社會爲基礎，不能隨時代而改進，逐漸變成江湖上的惡勢力，殊覺可惜。新軍是從淮軍防營蛻變而來，仍係漢人的武力，用新法操練，所以容易接受新思想。但它也有兩派，一是比較有系統的北洋新軍，一是比較散漫的各省新軍，他們雖爲革命助力，但究竟來路不同，所以後來就變成軍閥了！袁世凱與是一個幸運兒，他利用多年革命的成果，以取代滿清，又利用北洋軍人的擁護，以壓迫民黨；他原是反革命勢力的繼承者，帝制自爲，毫無足怪，只是二百多年所造成的民族復興機會，被他的私心白白犧牲了。他是民族一大罪人。但他以一個非文非武，毫不成材的政客，如何能有這種重要的地位？還不是曾國藩李鴻章一般人的心血所造成而遺留給他的！六十年間湘淮軍獲得的漢人勢力之成果，也被他吞食了。他尙不能體察這種機會的難得，把它輕輕放棄，足見他的聰明才智有限，玩一點小權術又算得什麼本領？結果還不是等於自殺麼？清末革命黨人那

種爲國奮鬪，不顧生死的精神，眞是可歌可泣，値得我們贊歎！然而破壞有餘，要建設又感覺知識不足了，他們不了解三民主義，不能聽　國父的指導，以致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只是把民族復興的障礙掃除了，取得中華民國的形式，而民族內在的種種困難，又接踵以起。　國父本於這些經驗，遂不能不從新創造基幹，而有十三年的組黨建軍，以爲完成國民革命的本身力量，不再假手他人了。所以纔有國民革命第二期的成功，以及最近抗戰建國的事業。近代史實昭示我們，只要我們能依照　國父的遺敎邁進，民族復興是不成問題的，因爲他已經在任何方面——無論文化政治經濟等都替我們鋪好了光明的大道。

結論

清朝建國近三百年，自入關迄遜位，奄有中土，亦二百六十八年，凡十三朝十二君（太宗天聰崇德兩朝）頗多英明之主。太祖太宗創業開國，勇武睿智，自不必說，世祖年幼，賴多爾袞以爲治，駕馭武臣，混一天下，痛愛妃之死而思逃禪，其聰慧亦有過人者。聖祖六十一年，是清朝培植根基的時候，文治武功，都很可觀，因爲他有好學不倦的的精神，寬大愛民的治術，雖末葉稍流縱弛之弊，但休養生息，也是守成必不可少的階段。世宗剛毅明察，完全是政治家的作風，任法治，尙廉潔，吏治澄清，海宇乂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爲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幾百年顢頇無爲的消極思想，社會也不至於停滯腐化而不進了。無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的諒解，遂致有暴崩之傳說。高宗席累朝之積德，作太平之粉飾，好大喜功，稽古右文，雖有全盛的規模，却種衰弱的肇因。乾嘉以後，武力不競，紀綱敗壞，教徒紛起，民不聊生，但仁宗之淳厚，宣宗之節儉，均有可稱。只以十九世紀爲世界劇烈變動的時代，西力壓迫，門戶洞開；多少年民族革命的醞釀，造成太平天國的大亂，政權逐漸轉移於漢人手中。文宗穆宗，巽懦童騃，曷能當此大局？然而他們也沒有顯著的失德。同治以後，完全是慈禧太后的天下了。她的才能敏捷，意志堅強，信用曾左胡李諸人，遂有中興之事

業，惟好逸樂，貪財貨，閹寺弄柄，吏治日偸，攬權競勢，頑固驕傲，內阻自強之機，外招聯軍之禍，卒爲清朝滅亡的最大原因。德宗毫無秦始皇的才幹，偏有宋神宗的理想，以一個懦夫，如何敵得過三次專政的宮廷老婦呢？結果變法無成，身被囚死。可憐亦復可哀！溥儀乳臭小兒，生父是親貴的班首，嫡母乏西后的才略，大廈將傾，賴人支持，又不度德，不量力，自加斫伐，遂不免土崩瓦解矣。我們綜論關內十帝，性格和成就都不相同，但是和明朝的君主相較，尙覺高明倍蓰，明朝除開國之君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宦官權臣胡鬧。清朝只咸豐帝溺沈聲色，同治帝好作微行，但並沒有像明武宗那樣荒淫！慈禧隆裕寵用李蓮英小德張，招權納賄，也沒有像明朝的「客魏之禍」。明君賢相，仁政惠績，都比明朝來得多；權奸巨憝，苛刑暴歛，也比明朝來得少。何以我們的先民還時時刻刻要打倒它，驅除它呢？這顯然是因爲種族關係。二百幾十年的民族革命，完全爲「蠻夷猾華」的意識所驅迫，何況「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又留下了許多的血痕呢！不過清朝乃東胡的後裔，也是華族的支派，受我薰陶，逐漸同化，旗人血統，早就不純了，滿漢通婚，更無畛域可言，僅只一個皇室沒有更改漢姓，那裏還有所謂滿族？所以　國父的民族主義並不像光復會以「排滿復仇」爲事，而欲「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只是革命政權要建立，不能讓他們再尸位宰制罷了。

鴉片戰後的中國，其禍不在滿清，而在列強的帝國主義，它們有優越的科學機械之勢力，民族國家之組織，我們要抵抗，就必須「迎頭趕上」，造成近代化的國家，意義非常簡單。然

自強運動以來，我們新工業的建設安在？辛亥革命以來，我們民主化的精神安在？民初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科學與民主，不錯，這是我們所亟需的，但後來他們向左右轉，走入歧途，忘却大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一言以蔽之，都是文化的積孽。我們不能建設自力更生的民族文化，一般學人，又沒有澈底的認識，徘徊聚訟，光陰都消磨在講說辯論上，仍受理學家蹈空談玄之遺毒。有些人埋首研究，「爲學問而治學問」，成績亦頗斐然，但偏鄙自是，忽視一切，不知指導社會，照顧人生，和現實聯爲一氣，仍受經學家擘績補苴之遺毒。二毒不去，徒肆紙墨宣傳，就離開科學愈遠了！科學的進步很快，瞬息千里，追蹤攀援，必不可及，只有「迎頭趕上」，纔能抓着要領。日俄土泰，不乏前例，尙何遲疑之有？但人心積患不去，民族文化不興，好像沒有茁茁健旺的新血輪，則毒素仍可肆虐，所以 國父的民族主義歸結在建立民族文化。這民族文化的內容，並非漢唐的經學，宋明的理學，實爲古代的大學中庸之道，內聖外王之學！以治平爲最後之鵠，以執兩爲時宜之措，明道救世，纔能發揮「有禮有用」的精神。大本既立，枝葉自茂，科學民主，皆不待繁言而應迅速力行者，蓋非此不足矯正積弊，建設近代國家也。倘使對於文化的理則和功用，具有眞知灼見，則必能發揮一種正確的領導作用，而非驕虛自大可比。 國父既以先知先覺創造三民主義，規定革命建國方略，只要我們作後知後覺，不知不覺的「仿效推行」和「竭力樂成」就夠了！晚清突遇大敵，倉卒無以自救，其情尙有可原。現在遺教分明，規模具在，還有什麼討論的餘地？如果除去私心成見，要救中國，就

只有實行的問題了。

有清一代——尤其是晚清，爲中國新舊社會轉變的過程，應該使它加速度的變，以完成近代化的國家，而不致久居於落伍的地位。則七八十年來，不是沒有進步，實在變的不夠快，「自強」「維新」諸運動，似乎都被舊社會阻滯了，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將近三十年未得效果，又是被那個阻滯的？實際上還是領導的士大夫階級本身的缺點，不能全歸咎於舊社會。我們看社會一般的人民，在農業經濟的生活中，不識不知，自足自樂，雖水旱災祲，貧苦不擴，依然勤勞生業，守分安命，絕不肯挺而走險。按時的納粮，求政府不苛擾，謹守着禮法，怕貽譏於社會，民族素質原是很好的。等到受了帝國主義的機械生產的影響，手工業不能立足，農產品不易出手，終歲胼胝，也不能供給兒女的學費，呻吟憔悴，坐待破產。稍微活動一點的人，被城市工業吸引而去，以極少的工資，爲帝國主義者製造廉價的貨品，向農村社會來傾銷。因此金銀流出海外，洋貨遍於中國，甚至外國的米麥水果油料都充斥市場，和我們的粗製農產品來競爭，穀賤傷農，購買力自然小了，老百姓有啥子辦法？只好一天一天的貧困了。士大夫階級不知領導社會向新工業的路上走，利用機器，改良農產，反盡量的享受，不惜剝削人民的脂膏，替洋人推銷貨物，間接來斲傷國本。還說老百姓愚昧骯髒，不可救藥，這有什麼道理？遊手寄食，欺騙社會，使鄉間淳樸敦厚的風俗漸趨爲城市澆薄浮華的習氣，道德不能約束，以爲應該打倒，法律不願遵守，以爲應該「自由」。這種新起的士大夫階級，仍以新學爲

洋八股，文憑爲敲門磚，未得一技之長，便作士劣之事，這纔是社會的障礙物。所以社會的腐敗並不是大多數人民的關係，而是少數知識份子的關係，我們只應痛恨教育的失敗，不能說社會不好，究竟誰負改良社會的責任呢？現在要建設新工業，不管是自由發展，或計劃經濟，只要加緊進行，爲人民謀生路，有那一個不歡迎的？所不歡迎者，乃私人壟斷的企業，官吏假借的統制而已。

國父的民生主義正是防制一切的流弊，爲建國的首要工作：平均地權，則人民的生活，可以改善，農村的購買力，亦可增強，爲經濟建設佈置一個基礎；節制資本，則新工業不至造成貧富懸殊的階級，而國家更當集中力量來改進社會，爲全體民衆謀福利。義和團時代的舊思想，毀鐵路，燒電桿，早就沒有了，尙何阻礙之可言？所以要「不知不覺」者「竭力樂成」是毫無問題的，所差只在「後知後覺」的「仿效推行」耳。

復次以民權主義而論，舊社會原有自治的規模，鄉里的道德，被推主持其事，權力很大，所以人民對於官府，除納糧與訟外，幾乎全無關係。自清末抄襲日本的成法，頒佈自治章程，由官代辦，這眞是削奪民權，摧毀幾千年社會的基礎！人民只有任聽與官府勾結的「士紳」擺佈，正人歛迹，游滑橫行。這種新起的士劣階級，可以藏身於法律範圍以外，爲所欲爲，對民衆則施官府之威，對官府則脅民衆之勢，兩方均無可奈何。一切新政，全被擱置在他們手裏，人民行四權的訓練，更談不到了。前清的人民有冤抑，可以「告御狀」，民國的人民有冤抑，簡直打不起官司。幾項基本的自由，一點都沒有保障，人民還敢要求行使四權麽？現在要

實施憲政，必須恢復從前的自治規模，由政府指導監督，少用干涉政策，尤須劃除十劣，改善人民生活，使一般老百姓有胆量有閑暇來參加政治。總而言之，不論物質建設與心理建設都是同等的重要，司其鑰者，仍爲教育。教育辦不好，不能培養眞正的建設人才，只增加一些自私自利的破壞份子，雖上有博大精深的主義，勵精圖治的政府，下有蘊藏厚實的社會，勤勞耐苦的人民，而病苦中膈，氣脈不通。譬如說前清反對新政的人，那里是什麼義和團？實際上還不是頑固的士大夫階級！一般愚民的愛國熱，反被他們利用，當然要禍國有餘了！明朝人說：欲平海上　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　國父也說：『革命必先革心』。我們在敍述清朝三百年歷史將畢的時候，緬懷無數革命先烈的高風，益感國民責任的重大，清人所遺留下來的許多問題，都要我們來解答完卷，萬代興亡，繫於俄頃，還能再因循敷衍甘作民族罪人麼？最後我們仍引魏默深的話，來作本書的結束：

天時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無期？何患奮武之無會？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去僞去飾，去畏難，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蓄之，網臨淵而結之，毋馮河，毋畫餅，則人材之虛患去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傳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後記

民國八九年間，日人稻葉岩吉之清朝全史譯本方流行，而觀點紕繆，疏舛頗多，私念爲吾國士林之恥，遂發奮撰清代通史。十二年上卷出版，不二年中卷亦出版，共約一百二十萬言。後皆歸商務印書館印行。下卷迄未殺青，轉眼已二十年矣。社會屬望綦殷，函牘徵詢，愧無以應。蓋二十年來，因生事牽累，校課煎忙，而志慮不專壹；又新出之史料，汗牛充棟，殊非短時間所能整理。抗戰軍興，書稿留藏故都，無可參考，而上中卷猶有待於修正，下卷更何敢聊且命筆乎？計全書之成，附以圖表，將近三百萬言，以資治通鑑之卷帙，古人尚有難讀之歎，抑何論此一代之書？故常有請爲簡編之作者，而旋寫旋輟。適獲休假之暇，乃盡日力以從事，成清代史約二十萬言，綜敍近代三百年事變之由來，以爲知古知今之一助耳。是書皆本余所持之民族革命史觀，與清代通史體材略有不同，非其縮影，二者實可相輔而行也。爰綴數言，希通儒教之！

三十三年五月蕭一山寫成後記於三台寓廬。